
庞进文集第十三卷

龙飞凤舞

庞 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随笔、故事新编、评论等共九十三篇，二十八万多字，配图一百零九幅。书中对龙凤的精神蕴涵、龙与图腾、龙与儒佛道、龙的传人说、国家元首与龙文化、奥运会与中国龙、三星堆龙凤文化、李白杜甫苏轼与龙、龙凤与山水风物、有关龙的争议、将龙英译为 loong、华龙文学等，做了专题性的深入细致的析理、阐述。旨在揭示：龙凤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多层次、多色彩、全方位、全时态的载体和象征，了解、理解了龙凤，就一定程度上了解、理解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



作者简介：庞进 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1956 年生于陕西临潼。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华龙凤文化网([www. loongfeng. org](http://www.loongfeng.org))主编，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20 世纪 70 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发表各类作品两千多篇，出版《创造论》《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庞进文集》等著作四十多种，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陕西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大赛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之誉。

微信号：pang_jin

庞进文集第十三卷

龙飞凤舞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庞进文集第十三卷

龙飞凤舞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Western Ontario Press Inc.

加拿大安大略省剑桥市

119 Chateau Crescent, Cambridge Ontario N3H 5S3 Canada

Tel: 001-416-729-4381

Email: wopressbook@gmail.com

2023年11月第1版

开本: 300mm x 240mm

字数: 280千字

书号: ISBN 978-1-988641-55-3

定价: \$68: 00



目录

容合：宇宙的胸怀——龙凤精神漫谈之一/1
福生：恒本的价值——龙凤精神漫谈之二/4
谐天：生态的呼唤——龙凤精神漫谈之三/7
奋进：人类的优长——龙凤精神漫谈之四/9
和美：普适的理想——龙凤精神漫谈之五/12

毛泽东与龙/15

邓小平与龙/19

多哈亚运会开幕式之文化图腾/23

奥运奖牌弘扬龙文化/35

祥云与龙/27

奥运会与中国龙/29

青奥会上的龙元素/33

上海世博会体现龙的精神——在 2010 上海世界博览会首届“龙文化日”盛会上的发言（择要）/35

国徽与金龙和玺彩画/37

PK 及图腾/39

龙早就是中华先民的广义图腾/41

孔子是敬龙的——兼析诸位“弃龙”者是不是“龙的传人”/44

关于龙标志的几个问题 47

“龙的传人”称号属于整个中华民族/56

三星堆龙凤文化/58

龙与帝王/76

龙与帝的千年情缘/79

龙与佛教 86

龙象腾骧/90

水陆庵里的龙/93

龙之福生与全真道之济世 96

李白诗的龙情结/98

杜甫诗与龙/100

苏轼与龙/103

龙行江湖：以《水浒传》为例/107

给小朋友们讲讲龙/110

龙故事新编（二题）/118

沔河龙文化（二题）/123

龙脉/127

骄龙腾跃秦遗址/130

大明宫与龙/132

渭河龙迎来新机遇/134

中国原点新城与龙文化/136

地铁与龙文化/1137

龙腾凤翥说阎良/140

龙城太原/143

龙套/145

乌龙与乌龙球/147

龙树婆娑/149

龙竹/151

龙文化与面文化/153

龙之邮/157

国外的龙邮票/160

牛与龙的文化缘/192

马能够被龙化/164

从“龙马”到“孽龙” /165

福生与行善/169

财神与龙/171

辟邪旺财说貔貅/173

貔貅文化 人类之福——为大嘴貔貅而作/176

怪异的智慧/177

由翔凤泉龙说起/180

英杰为“凤凰”添彩/182

龙凤可英译为 Loong Feng/186

凤凰朝歌/188

凤城的说法/190

门名丹凤/193

凤凰与少陵原/195

取名“凤凰”的六个原由——以湘西凤凰为例/197

重庆：火凤凰（二题）/200

凤之邮/204

龙飞凤舞华清城/206

龙山凤泉真晒水/208

麻将中的龙凤/212

关于舞龙进校园之建议/213

建议安顺龙宫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215

春节社火中的龙——答陕西卫视《村里村外·咱们过大年》主持人问/218

龙的定义及其他——庞进答裴雅辉同学问/221

龙商的定义/224

复张力玮/225

关于龙母/207

乘龙兮辘辘，高驰兮冲天——在纪念屈原大夫祭祀仪式上的讲话/228

华山龙文化与“登顶”精神——在“陈州登顶华山研讨会”上的发言/230

关于《龙行天下》系列片/232

就将龙英译为 loong 致全球华人的公开信（征集签名稿）/234

刻痕、华痕、华龙文学 236

华龙文学：容合多元、纽带情感、图腾精神 238

庞进：正说中华龙文化（刘勇）/240

庞进答《三秦都市报》记者问/245

传统符号与时代新义

——读庞进《博大精新龙文化——以浙江龙游为例》（王哲）/250

腾龙飞凤——记龙凤文化研究专家庞进（王晓红）/252

腾龙起凤自从容——“龙凤之魅·庞进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侧记（张静）/256

庞进的意义（孙见喜）/263

总有山楼在前头——答《西安之子网》主编张星利问 270

庞进的“容合”（张星利）277

老友庞进（孔明）279

《庞进文集第十三卷·龙飞凤舞》后记/281

容合：宇宙的胸怀

——龙凤精神漫谈之一

“容合”是笔者创造的一个词，与“融合”有区别，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

龙凤的形象是“容合”的。龙是中国人对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云、雷电、虹、龙卷风、星宿等自然天象的多元容合；凤是中国人对鸡、鹰、燕、乌、鹑、孔雀、鸵鸟等鸟禽，和太阳、风、火等自然物象的多元容合。龙凤的容合对象，涉及到动物、植物、非生物和自然天象，可以说，龙凤的容合，几乎将自然界中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两网打尽。

龙凤的容合是由人创造的，准确地说，是由历朝历代亿万中国人共同创造的。最早的创造者可能是生活在距今八九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原始先民，也可能是生活在距今万年以上的旧石器的原始先民。最晚的创造者，就是生活在 21 世纪今天的每一位中国人以及许许多多的地球人。这是一条历久弥新的创造链，它将一代一代地连续下去，只要地球还存在，人类还存在，这条创造链就存在。

中国人为什么会创造出龙凤这样的神物呢？原因可以找出多条，其中有一条便是中国人意识到世界是容合的，或者说，中国人对龙凤的创造，吻合着、体现着一种叫作“容合”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地球是容合而成的，地球人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是容合而成的；地球人所看到的太阳、月亮、星星是容合而成的，与地球人同存共处的山原河流也是容合而成的：容合实在是一种宇宙胸怀。这种胸怀博大而永恒：空间上无边无沿，时间上无始无终。

我们说，龙凤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就在于其容合过程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相一致，是中华民族大容合的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体现者和标志着。新石器时代及随后的青铜时代，是中华民族的形成期。考古学界以考古实证为据，将这两个时代划分为若干个区系和多种类型文化，而我们在各个区系、

众多类型文化中几乎都看到了“原龙”“原凤”的身影——如东北区系的兴隆洼文化石块摆砌龙，赵宝沟文化凤型陶杯及陶纹龙、陶纹凤，红山文化玉雕龙、玉雕凤；西北、中原区系的仰韶文化陶纹龙、陶纹凤、蚌砌龙，马家窑文化陶纹龙、陶纹凤，龙山文化陶纹龙；山东区系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陶纹龙、陶纹凤；东南区系河姆渡文化陶纹龙、陶纹凤，良渚文化玉雕龙；西南区系的高庙文化陶纹凤，大溪文化摆砌龙；等等。

我们说，龙凤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除龙凤的起源、形成与中华文化的起源、形成具有一致性外，还在于龙凤能够体现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比如儒家讲的“仁”，就有“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论语·先进》）“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能行五者（笔者按：即恭、宽、信、敏、惠五种德行）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等多种阐释，显然是一个容合性概念。而道家讲的“道”，也有宇宙的本原、万事万物的规律、自然变化的过程等多种解释，显然也是一个容合性概念。龙凤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容合性的形象表达着容合性的概念，或可说是容合性的概念选择了容合性的形象为标志。

容合是和谐的前提和基础。不讲兼容、包容，就不会有综合、化合，也就谈不上合力、合作，以至于和谐。大凡成功的事业，都是容合的事业，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凡成功的人士，都是善于容合的人士，所谓“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谐的家庭氛围，和谐的社会秩序，都有赖于容合；一个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的形成，容合是最核心的要素。

当今世界，之所以冲突不断、战乱不止，许许多多的家园被毁，许许多多的生灵涂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有些人把“文明差异”视作“文明差距”或“文明冲突”，不愿意正视各种文明各有其优长的事实，自认为某种文明高超于、优秀于、尊贵于其他文明，总想用“一元”取代“多元”，不讲“容合”或不愿意“容合”。所以，加大力度，弘扬、宣传、推广中华龙凤文化容合的精神理念，让更多的地球人，尤其是那些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领袖们接受这样的精神理念，并将其尊重为普世的公理和通行的准则，自觉、自愿地应用于国家、地区、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问题的协调和处理中，就显得特别有必要。所谓“有矛盾，坐下谈；弃暴力，戒强权；莫急躁，勿狂癫；崇理性，释前嫌；容众异，

存多元，谋共赢，求大全”，如此这般，何愁一个和谐地球、一个太平世界不能构建？

这样的设想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起码有两条理由：第一，龙凤的容合对象，不光中国有，世界各地都有，也就是说，龙凤产生的基础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只不过是智慧的中国人首先将其创造出来了而已。既然都有这样的基础，接受龙凤所蕴涵和体现的精神理念就不是困难之事。第二，相信和谐、和平不仅是中华民族崇尚和追求的状态和境界，也是世界各民族都崇尚和追求的状态和境界，这也就是说，龙凤所蕴涵和体现的容合的精神理念，具有普适性。

（刊于《环球华报》2007年8月31日）



福生：恒本的价值

——龙凤精神漫谈之二

“福生”是“造福众生”的简称。

中华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注重现世生活的“重生”文化。“生”是生存、生产、生活、生育、生生不息。在国人的心目中，现世人生是最可靠的，是最需要用心来打理的，有苦难了就克服苦难，有快乐了就享受快乐，即使再苦再难，都要活下去，咬着牙活下去，传宗接代地活下去。所以说中华文化是重生文化，是过日子的文化。儒家、道家、墨家，等等各家的学说，都是旨在让国人过好日子的学问，尽管对什么是好日子各有各的定位和说法。

龙凤反映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这种重生性。龙凤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建筑名胜、工艺美术、歌舞影视，还是岁时节令、婚丧礼仪、服饰冠履，龙凤都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盘旋、腾跃、舞蹈、奋飞等多种形式，占据着醒目的位置。就拿日常生活来说，喝茶有龙凤茶，饮酒有龙凤酒，吃菜有龙凤菜，穿衣有龙凤服，佩带有龙凤饰，走到大街上，龙凤产品、龙凤招牌、龙凤雕塑、龙凤书画，可以说随处可见。

重生必然要求福生，龙凤反映着这样的规律。也就是说，中国人创造龙凤的目的，是为了有福于自己，而不是为了有祸于自己。事实上，古往今来，龙凤的身上都一直体现着福生的精神。龙作为水利神、农业神，是福生的；凤作为风神、太阳神，也是福生的；龙凤对应、配合，作为祖先神、爱情神，进而成为审美之神、民族之神，更是福生的。

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等远古帝王几乎都有龙之名、龙之誉。为什么人们要将他们称龙、比龙呢？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人文先祖秉赋着、体现着龙的福生的精神，干出了一番番兴国利民、功惠后世的事业。伏羲画八卦、结网罟、造甲历；女娲炼石补天、抔黄土造人、始创嫁娶；炎帝肇始农

业、发明医药；黄帝的制陶造车、分土建国；大禹为了根治泛滥天下的洪水，“尽力沟洫，导川夷岳”，三过家门而不入，堪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典范。

有一种舞龙形式叫“板凳龙”。为什么要舞这样的龙呢？相传很久以前，浙江浦江一带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井枯河干，庄稼绝收，饥渴而死的人不计其数。人们盼望老天爷能下场大雨，可不管怎样祈求，总是无雨。东海的一条水龙看到这种惨状，为了救助生灵万物，就不顾一切地跃出水面，聚云掣电，在当地播下一场大雨。万物复苏了，人们得救了，可水龙由于违反了天规，被玉皇大帝下令，用刀剁成一段一段，撒向人间。人们发现后，就把龙体拾起，放在板凳上，并把它连接起来，不分昼夜地奔走相告，希望它能活过来。于是，产生了舞“板凳龙”的习俗。

有一则传说叫《百鸟朝凤》。讲的是凤凰未雨绸缪，在众鸟无忧无虑的时候，就勤劳地采集、收藏果食。后来遇到了大旱灾，众鸟找不到食物，饿得奄奄一息。这时候，从远方归来的凤凰，拿出自己多年收藏的果实，使众鸟度过了难关。众鸟为了感谢凤凰的救命之恩，每只鸟都从自己身上选了一根最漂亮的羽毛，集在一起，做成一件五光十色、绚丽耀眼的百鸟衣，献给了凤凰。从此，凤凰成了最美丽的鸟，且被推选为鸟王。每年过生日时，百鸟都飞来向它祝贺。

传说都是人编的。老百姓之所以要编这样的传说，就是为了褒赞和弘扬龙凤福生的精神。在龙凤文化中，有许多造福众生的善龙祥凤，也有一些祸害人间的恶龙孽凤。善龙祥凤是人们褒赞颂扬的对象，是龙凤族中正面的、居主导地位的力量。恶龙孽凤一般都会受到善龙祥凤的惩处，其祸害人间的行径，反衬出了善龙祥凤福生的可贵。

福生是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无论个人、团体、民族，还是政党、政府、国家，只有以福生为目的，其所作所为才是有价值的，福生的事情做得越多，其价值越大。相反，如果以祸生、害生为目的，其所作所为就是负价值的。

福生具有永恒的、根本的性质。也就是说，对人类而言，你的任何行为，任何活动，其根本目的，都是福生。当然，福生的“生”，不光指人类，还指人类之外的所有生物，是“以人为本，兼顾众生”。还有，福生也不光指造福众生，还有幸福人生的意思，是造福众生与幸福人生的统一。

福生为容合提供了目的和规定。也就是说，容合是以福生为目的的，也是有

原则和限定的，这个原则和限定的根本点，便是看这个对象是否符合福生的精神。如果这个对象的所言所行不是福生，而是祸生的，那么在容合之前、之时，就要做教育、规劝、等待、惩处等工作，总之要使其改邪归正，弃祸生为福生，然后容而合之。

（刊于《环球华报》2007 年 10 月 3 日）



桃木透雕
龙凤福字

谐天：生态的呼唤

——龙凤精神漫谈之三

谐天”就是“与天和谐”，即与大自然相和谐。

龙凤的容合对象，都来自于自然界，无论是蛇鳄蜥鱼猪鹿牛马，还是鸡鹰燕鸟鹑鸿雀鸵，都是自然界中的生物；无论是云电虹，还是日风火，都是自然界中的天象。龙凤崇拜来自自然崇拜，是自然崇拜的升华。龙凤的身上反映着中国人与大自然相沟通、相对话的愿望，体现着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理解和敬畏。概言之，龙凤是与天和谐的产物，是天人关系的形象化表述，是人与天相沟通的桥梁。

于是，谐天就成为龙的基本精神之一。

这个基本精神，可以作为一种“天人观”。这种天人观认为：天是人之母，人是天之子；天永远大于人，人永远小于天；人只能谐天，不可能胜天；人若做逆天、悖天、害天之事，必遭天谴。

古今中外的不少思想家，都对天人关系做过思考。先哲老子曾有“犹龙”之比。一般认为，将老子比龙，是说老子具有龙的神采、龙的气概。其实，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老子思想的精髓，和龙凤谐天的精神具有一致性。

《道德经》五千言，第一句便是“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道”，可以言说，但不是平常讲的道路的“道”，或道理的“道”，而是“可以为天地母”的“道”，即宇宙万象的根本。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这个“道”又从何而来呢？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说，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它自己，即“道”的本来样子是自然，体现的是大自然的规律。在人、地、天、道“四大”中，人的构成性地位最低；这就决定了人与大自然只能是顺应、效法的关系，而不是违背、对立的关系。

按老子的思想，自然界的生态是循环往复的，人按生态规律生活，便是“知常”。“知常”就是明白人，而“不知常，凶”。这个凶，就是我们讲的环境危机、

生态灾难。于是老子警告说：“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人放任自己的欲望，无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这当然是“失道”的行为，“失道”，自然要承受“失道”带来的后果，即领受大自然的惩罚。

总体上看，中国的思想家大多认为，天道大于人道，天道与人道相通，人道师法天道，所谓“天人合一”，尽管在局部的具体的小范围内，也有“裁天”“胜天”“造天”之说。西方思想家中也有主张天人和谐者，但不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主张天人对立的一派。他们认为，人是天的主宰，天是人的工具，所谓“人为自然立法”。这样的观念，是导致近代以来，西方出现严重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

鉴于此，在全球范围内，大力倡导、推广、弘扬龙凤所蕴涵和体现的谐天的精神理念，对纠正天人对立派的理论偏差，解决全球性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的意义。这样的倡导、推广和弘扬，相信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因为保护唯一的地球家园，创建新型的生态文明，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何况由一些有识之士发起的“绿色运动”，已在世界各地程度不同地进行了多年。

（刊于《环球华报》2007年10月10日）

绿龙



奋进：人类的优长

——龙凤精神漫谈之四

奋进就是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

在龙的诸多民俗活动中，龙舟竞渡典型地昭示着奋进的精神。但见彩旗如云，鼓呼雷动，人人奋力，龙争龙先，如弹出膛，如箭离弦，桨影纷然，浪花激溅，那热闹的景象，那宏大的场面，那激昂的情绪，那蓬勃的力量，实实在在地令人振奋！

从姿态上看，无论水中游、地上行，还是天上飞，龙凤给我们展示的多是昂首挺胸、瞠目张口、振鳞展翅、精神抖擞、全力以赴、一往无前的形象。

自古以来，龙凤都多被用来象征、比称人间的杰出人物。人们之所以将人杰俊才比龙称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身上具备着奋发进取的素质，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繁荣昌盛做出了创造性、开拓性的贡献。

炎帝神农氏是崇龙族团的领袖，被誉为“龙子”或龙的化身。炎帝的身上，就充盈和洋溢着奋进的精神。他带领部族，多次、多处迁徙，翻山越岭，穿林涉水，开辟新的生活基地，拓展新的生命空间。他“作树五谷”，是农业的发明者；他“尝味草木”，是医药业的发明者；他“耕而作陶”“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是工具制造业的推进者或发明者。他还是畜牧业、纺织业、原始贸易、原始音乐和劳动分工制度的创立者。为了开拓和创造，炎帝“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鞠躬尽瘁，无私无畏。

作为炎黄部落联盟的首领，黄帝轩辕氏有“龙祖”之称。黄帝的事业，是开拓创造、奋发进取的事业。黄帝的奋进，为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华文明的成型奠定了基础。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提供的证据，黄帝族的发祥地在西北黄土高原，即黄河流域的上、中游，之后，沿着黄河流域，甚至越过黄河流域多处迁徙，“抚万民，度四方”。——迁徙就是开拓，就是进取。而归于黄帝名下的发明创

造，也有许多项，如文字、算数、律历、音乐、阵法、货币、养蚕、衣裳、舟车、宫室、典章制度，等等。

奋进的精神要求我们“自强不息”“与时俱进”。

“自强不息”是个成语，来自《易经》的第一卦《乾卦》。这个卦其实是一个“龙卦”。其卦以龙的发展变化为喻，由潜龙、见龙、跃龙，到飞龙、亢龙、群龙，既形象又抽象地阐发了一种道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说，自然界行的是一种刚健的大道，而人呢，应该像可以在水中游，也可以在地上行，但终要腾飞于云天的神龙那样，努力上进，毫不懈怠。

“自强不息”可以分开来理解：首先是“自强”，即靠自己的努力强大起来。中华民族就是靠自己的力量，由部落联盟到华夏族、由华夏族到汉族、由汉族到中华民族这样一步一步地，容合、强大起来的。龙凤也是这样，是龙凤族人自强、自觉、自慧的结晶。学术界曾有过中国龙凤来自古巴比伦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已被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所证伪。其次是“不息”，就是选准方向，克服困难，百折不挠，坚持不懈，也即鲁迅先生讲的“韧的战斗”。

龙凤的形象是与时俱进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龙凤。新石器时代有早期的简单质朴的“原龙”“原凤”，夏商周时期有神秘抽象的“夔龙”“夔凤”，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有粗犷雄健的“飞龙”“朱凤”、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有刚柔并存的“行龙”“瑞凤”，元明清三代有复杂华丽的“黄龙”“金凤”。进入新世纪后，我们看到了许多吉庆嘉瑞的“祥龙”“祥凤”，如穿福字褂、钱字衫、骑摩托、打手机、用E卡的“时尚龙凤”，以绿叶为发、为眉的“生态龙凤”，活跃在影视屏幕上的“卡通龙凤”等。从龙凤形象的演变，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断开拓、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轨迹。

“与时俱进”也有两层意思：首先是跟上时代，不要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要对新学问、新事物要保持足够的敏感，勤于学习、善于吸收。其次是适变图强，所谓“变则通，通则达，达则胜”。龙凤由众多的物象容合而成，各容合物象之间又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因此，龙凤有“可变”的神性。比如，在古人的心目中，龙在天可以是云、电、虹、星宿，在地可以猪、鹿、牛、马，在水可以是鳄、鱼、蛇、鲛。换句话说，天上的云、电、虹、星，地上的猪、鹿、牛、马，水中的鳄、鱼、蛇、鲛，以及天地间的龙卷风等等，都可以是龙的变体和化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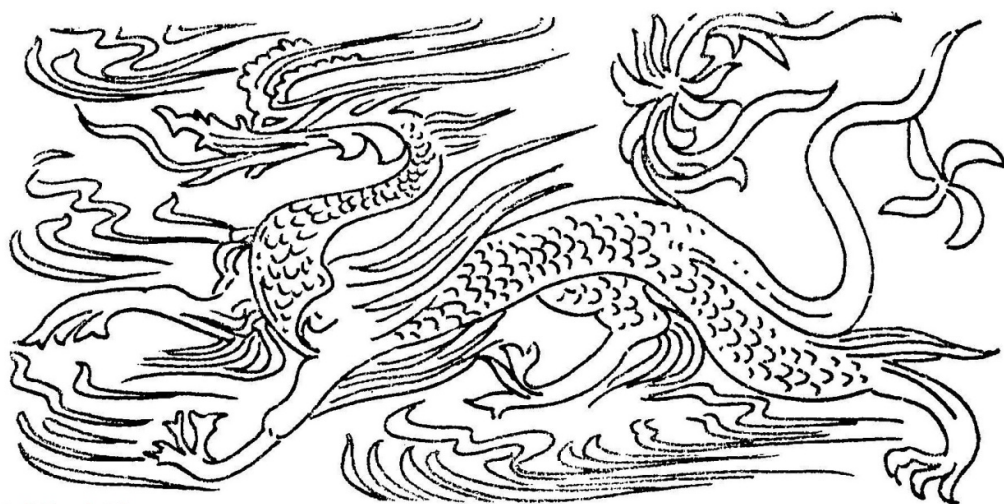
龙凤所蕴涵和体现的奋进精神，是人的精神状态的反映，而这样的精神状态其实是人类的优长。动物也奋进，但动物的奋进只局限在生存即维持生命和种族延续层面，人类的奋进除有满足生存层面需要的指向外，还有满足发展的、探索的、精神层面需要的指向，这是由人所具备的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智慧的创造性本质所决定的。而且，人类面临的诸多困境和难题，只有奋进才能得到逐步缓解以至于解决。

由此看来，奋进就是一种人生观。这样的人生观认为：奋发进取、努力向上的人生，才是积极的、健康的、正面的、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一致的人生，否则就是消极的、病态的、负面的、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违背的人生。

当然，我们所崇尚的奋进，是以容合为手段，以谐天为条件，以福生为目的，以和美为理想的奋进，悖离这些要求，任何奋进产生的都是负价值，都要受到正义力量的谴责和制裁。

奋进不仅是中国人崇尚的精神，也是世界许多民族都崇尚的精神。就奋进精神的发扬和产生的效果来看，古代的中国强于西方，近代以来的西方强于中国，目前呢，中国正在奋起直追。

（刊于《环球华报》2007年10月17日）



行龙纹（南北朝）

和美：普适的理想

——龙凤精神漫谈之五

“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古代的先哲们把“和”作为做人的基本、立论的基础和理想社会的至高境界。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阐述过“和”。如“和实生物”（《国语·郑语》）“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和为贵”（《论语·学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和合故能习”（《管子集校》）、“离散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集解》），等等。秦汉之后，道、儒、佛三家，逐渐构成中华文化大厦的三根支柱，而这三家的思想，以其理论侧重而论，似乎都可以概括为“和”：道家主要讲“天道自然之和”，即“天和”；儒家主要讲“人伦道德之和”，即“人和”；佛家主要讲“心性觉悟之和”，即“心和”。

如果要给“和”找象征物的话，龙凤无疑是最佳选择。我们将“容合”排在龙凤精神的首位，而“容合”与“和”几乎就是同义词，所谓“和，犹合也”（《礼记·郊特牲·孔颖达疏》）。所以，完全可以说，龙凤是“和”的产物，亦是“和”的表征。比如，龙凤都来自于大自然，龙凤的容合对象都是自然界的生物和天象，这便与道家的“天和”相吻合；龙凤是人创造的神物，经过发展演化，龙已代表男，凤则代表女，男女婚配，龙凤呈祥，这便与儒家的“人和”相吻合；龙凤的产生，离不开中国古人丰富多彩的想象力，反映着古人超越尘世苦恼、摆脱世俗烦嚣的努力，是自由意志的体现，这便与佛家的“心和”相吻合。

那么，可不可能用“和”来概括龙凤文化的精髓呢？当然可以，但不够全面。龙凤还有一个“美”的问题。龙凤是美的集合、美的体现、美的反映、美的化身、美有标志。从发生美的角度看，龙凤的创造、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美的因素被发现、被选择、被采纳、被综合、被升华的过程，也就是人们通常讲的审美的

过程。从形式美的角度看，龙凤符合对称、平衡、整齐、对比、比例、虚实、主次、变幻、参差、节奏、多样统一等形式美法则，其线条是流畅的，其色彩是鲜丽的，其形状是悦目的，其姿态是雅致的——或活泼、轻灵、奔放，或雄健、浑朴、昂扬。

从内涵美的角度看，龙凤至少具备以下几种美：第一，祥瑞美。龙凤是吉兽瑞鸟，人们将求吉利、求顺遂、求可心、求如意、求生活富足、求社会安定、求爱情美满的愿望，再再地寄托在龙凤身上，所以，祥瑞美实际上就是理想美。第二，新异美。新是创造，异是不同。龙凤是求新求异的结果，龙凤有与时俱进的品质，有自新自变的性能；而且，从古至今，大凡新的时间和空间必有新的龙凤出现，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群，也必有不同的龙凤。第三，神奇美。作为审美范畴之一，神奇指的是进入审美视野的那些特别伟大、特别出众、特别不可思议的现象。而这样的现象在龙凤身上有丰富多彩地呈示，如升天落地、随缘幻化、呼风唤雨、扶危解难等等。可见，龙凤既具有形式美，又具有内涵美，龙凤是形式美与内涵美的统一。

如此，“和美”就成为龙凤所蕴涵和体现的基本精神之一。那么，如果把“和谐”换成“和美”，可不可以呢？当然是可以的。理由：第一，“和”字本来就有“和谐”之意，“和，谐也。”（《广雅·释诂三》）古代先贤谈“和”时，也都将“谐”略去。第二，与“和谐”相比，“和美”增加了“美好”“审美”之意，即“不仅是和谐的，还是美好的”。可见“和美”比“和谐”更好，是“和谐”的升格。

“和美”是一种理想观。对这个理想观，余秋雨先生讲过一段很到位的话：“哲学家说过，真善美三个字都重要，但具有终极归结意义的是美。因为真实不能概括人类的终极目标，善良也不能概括人类的终极目标，人类的终极目标是美好。对个人来说，最高的理想，也是人格的完美。”（《秋雨时分》，凤凰卫视 2006 年 9 月 22 日）那么，“和美”的理想观有哪些内容呢？至少包括：和美的心灵世界，和美的人际关系，和美的生存环境，和美的社会制度，和美的国际秩序，等。

作为理想观，“和美”具有普适性，也就是说，世界上大概不会有哪个民族、哪个人拒绝过和谐美好的生活，除非这个民族、这个人患有精神病。所以，将龙凤所蕴涵和体现的和美的精神理念推向世界，并为之做不懈的努力，正是我们的

使命和责任。

（刊于《环球华报》2007 年 10 月 24 日）



毛泽东与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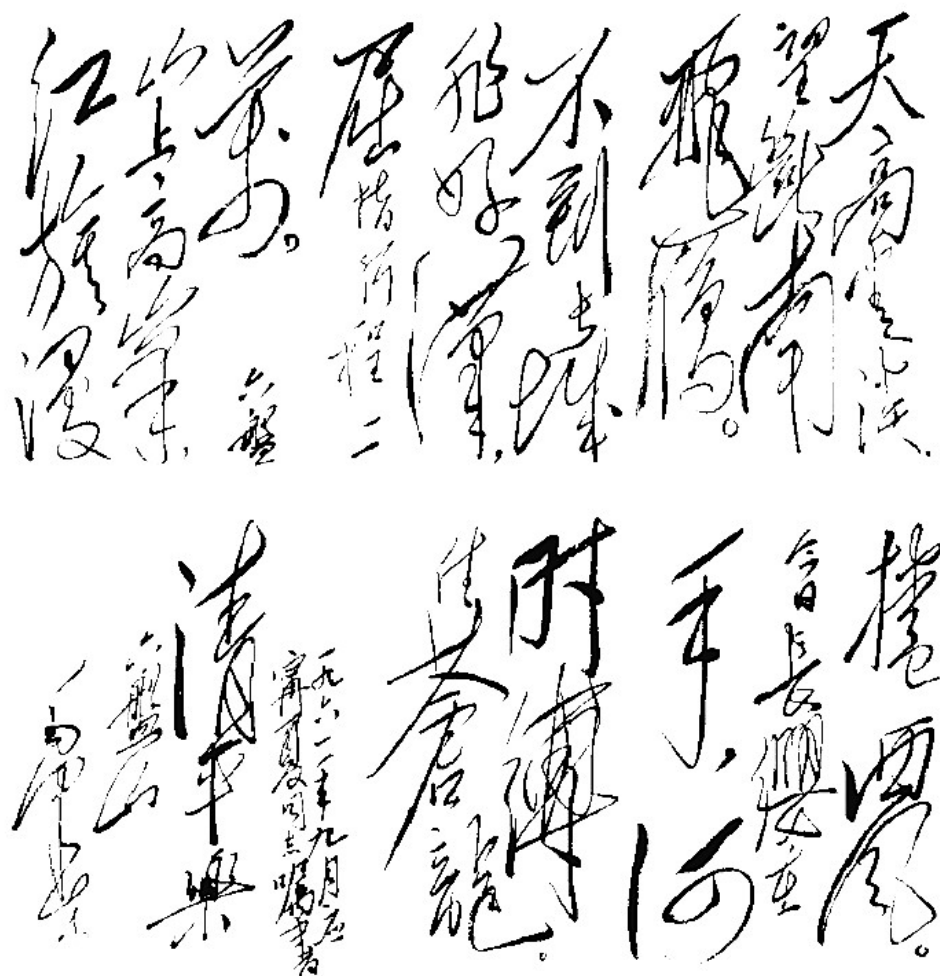
毛泽东生于 1893 年，此年为农历癸巳年，也就是说，毛泽东生肖属蛇，蛇是龙的最重要的容合对象之一，故民间称属蛇为“属小龙”。

毛泽东故居韶山冲附近有一座龙头山，还有一个虎歇坪。据说，这虎歇坪位于“龙脉”之上。毛泽东的警卫员张耀祠在回忆录中讲，毛泽东曾给他讲过，说其祖父毛翼臣有一个哥哥叫毛德臣，兄弟俩在虎歇坪干活时，发现这个地方很干燥，任何时候雨水都淋不到，就想作为百年后的墓地。他们请了一个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先生说，这里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正好在“龙脉”之上。那么，谁将埋在这里呢？两兄弟为此争吵不休。风水先生见状说：“这块土地告诉我，你们两人谁先死谁就埋在这里。”后来，毛翼臣先于其哥病故，虎歇坪遂成为毛泽东祖父的安葬之地。

有报道称，国共战争时期，或许是得到了蒋介石的授意，国民党湖南省省长何键曾从长沙派兵到韶山挖毛泽东的祖坟，以断“龙脉”。韶山民众闻讯，集合起来去保护毛家祖坟，他们一面在山上放火铳、炮竹，摆出平日围哄野猪的阵式，大施疑兵计；一面迅速将毛泽东的祖坟墓碑掀倒掩埋，再把坟堆摊平，盖上草皮，把坟“藏”了起来。国军来到后，听见山上这里响枪那里响炮，不免疑惑恐慌，便胡乱地挖了几处，就收兵交差了，毛家祖坟遂安然无恙。负责毛泽东回湖南时生活安排的原湖南省委接待处处长肖根如回忆说，20 世纪 60 年代，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曾讲到这件事，说：“蒋介石要挖我的祖坟，这是失民心嘛！失民心者失天下。”

毛泽东诗词中，有“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念奴娇·昆仑》）句，和“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句。前者以玉龙喻飞雪，后者句中的“龙盘”，一指南京的地理形胜，二指各代帝王曾居。还有一句叫“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

此句中的“长缨”，无疑是指毛泽东所率领和指挥的革命军队；“苍龙”，以往的解释是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武装集团；现在看来，毛泽东或许另有深意：苍龙，一种解释是苍龙星，即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的合称，代指东方。那么，“何时缚住苍龙”，就有“什么时候才能获得东方之地的掌控权”之意。



毛泽东和杨开慧生有三个儿子，依次是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将三个名字的最后个字连起来读，就是“英青龙”，“英青龙”之“英”谐“应”，那么就是“应青龙”。“青龙”即“苍龙”，主宰东方之神。而“岸”音谐“按”，有高大、伟岸之意。联系到“泽东”二字，我们不难体会到毛泽东为儿子取名的深层意蕴。

陕北佳县中部有一个坐落在高高的陡坡上的小山村叫白龙庙。据说，毛泽东当年转战陕北时，一听说这个村子叫白龙庙时，就毅然决定住了下来，并坐在村前的一块大青石上，远眺黄河，唱起了京剧《空城计》：“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据毛泽东的警卫李银桥回忆：“白龙庙是一个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树及少，缺水，老百姓为了求雨祈水，便在村里盖了一座白龙庙，村庄因此而得名。就在毛泽东进村后不久，天下起了雨来，老百姓纷纷传说这是‘真龙下界’，给他们带来了雨水。刘戡的几万追兵在山下安营扎寨，篝火望不到头，毛泽东在山上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据村民李巧霞回忆：当年，村里的老百姓听说毛主席来了，一个个奔走相告、一户户竞相神秘地传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是真龙天子、真龙下界，龙走行云、风调雨顺，白龙庙的小龙摆雨接驾呢！这段记载不无迷信色彩，但从中可以看出：第一，毛泽东有自比为龙的意思，至少对龙持喜欢、肯定的态度；第二，老百姓出于敬仰和爱戴，将毛泽东比为龙，所谓“真龙下界”之说。

龙是水神，龙离不开水。毛泽东打少年时起就喜水、亲水，尤其喜欢在汹涌波涛的大江大海中游泳，他以“到中流击水”“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为乐。有报道称，毛泽东一生畅游长江多达四十二次。1966年7月16日，已七十三岁的毛泽东还游了一次。





毛泽东喜欢喝龙井茶。有报道称，毛泽东进北京后，喝的茶主要是龙井茶。龙井茶的味道不如湖南烟熏茶味浓，毛泽东就加大投茶量，以至于一个月能喝掉二斤龙井茶。喝完一杯龙井茶，毛泽东常常会用三个手指把茶渣从茶杯里抠出来，放到嘴巴里咀嚼，还连连发出啧啧声。浙江杭州西湖国宾馆历史上曾盛产龙井茶，后来也一直辟有龙井茶园。1963年4月28日下午，毛泽东亲自在此采龙井茶并在品尝他亲手采摘的茶叶时说：“茶叶是个宝。龙井茶，虎跑水，天下一绝。”

张玉凤女士之所以能够从毛泽东专列车厢上的一个服务员，到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原因几多，但其中一条可能未被人们注意：这便是张玉凤名字中有一个“凤”字。

北京城有由天安门、故宫到十三陵天寿山一线（也称中轴线）为“龙脉”之说。毛泽东于1976年（农历丙辰龙年）9月9日去世，供老人家安息的“毛主席纪念堂”，就修建在这条“龙脉”之上。

（刊于“中华龙凤文化网”2014年12月26日，2020年12月25日增订于加拿大枫华阁）



邓小平与龙

邓小平出生于1904年8月22日，逝世于1997年2月19日。1904年是中国农历甲辰年，故邓小平生肖属龙。

邓小平故居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镇牌坊村，俗称“邓家老院子”。故居前有一个“洗砚池”，面积约8亩，形似墨砚。当地相传池下盘旋着一条“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的巨龙，一方地面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有赖于此龙的佑护。据说，童年时代的邓小平，常取此池中水研墨，并在池中洗笔。

离邓家老院子半里远有一石坝，一条大路穿石坝而过。路旁有两块神道碑，是清朝嘉庆年间朝廷为表彰两名广安籍高官而赐造的。石碑高3米，宽1米多，分别由两个巨大的石乌龟（赑屃）驮起。一次，邓小平与几个小伙伴在石坝里玩耍，看见石乌龟，就对小伙伴们说：“我们爬到乌龟背上去要好不好？”小伙伴们纷纷拒绝，说：“听大人们讲，爬石乌龟会得罪神碑，会闹肚子痛，还会给家里招灾！”邓小平却说：“我不信石乌龟有那么大的本事，你们不敢爬，我去试试！”于是，就爬到石乌龟上玩耍了一阵。这段故事，人们多从邓小平打小就具有非凡的胆量和叛逆精神的角度理解。其实，这段故事还有一个理解的角度，这便是“赑屃驮龙”：古代形制，赑屃所驮石碑，一般都是螭龙盘顶，驮石碑，也就意味着驮龙。邓小平无意间，做了一回赑屃所驮之“龙”。

邓小平家的祖坟，位于四川广安协兴镇果山村的佛手山，距邓小平故居约3

公里。民间堪舆的人士认为，邓家祖坟地的风水符合“龙穴”的说法，“其龙来自天府尊星，起顶降势，一路左棲右闪，脱胎换骨。到临结穴处，山势翻身转右来龙，大顿小伏……左青龙，右白虎，两侧各有秀峰石印随身，明堂龙虎砂层层交锁，堂前众水汇聚，实是世间难得……”

龙州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南部。早在三千多年前，壮族的先民骆越人便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龙州正式并入中国版图。其得名未见说法，古骆越人崇龙或是原因。1929年12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化名邓斌，来到龙州，与李明瑞、俞作豫等一起，领导和发动了于1930年2月1日举行的龙州起义。龙州起义是继百色起义之后的又一次威震南疆的起义，创建了左江革命根据地，把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当时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

194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由邓小平担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之后，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西南军区，贺龙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生于公元1892年，农历壬辰年，生肖属龙，大邓小平十二岁；贺龙生于公元1896年，农历丙申年，生肖属猴不属龙，但其名“龙”，故时人称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为“三龙际会”。

安徽阜南王化集曾有两座建于明代初年的联拱石桥：南桥青石砌就，中孔青石梁雕昂首龙，称青龙桥；北桥白石砌就，中孔白石梁亦雕昂首龙，称白龙桥。两桥连接南北交通，为阜阳通往河南之要津。1947年8月，刘邓大军通过两桥，挺进大别山，随之将两桥炸毁，以阻碍后面追赶的敌军。但桥毁后，给当地群众的生活、生产也造成了不便。20世纪80年代，当地人上书邓小平，要求中央拨款重修双龙桥。邓小平批示“尽快解决”，于是，国家拨款，省、县筹资，于1990年将双龙桥建成。桥面栏杆上雕饰盘绕双龙，气势非凡。

1981年7月6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香港“船王”包兆龙及其子包玉刚，当面接过了包氏捐赠的一千万美元的支票，并践诺题写了“兆龙饭店”四字——此为邓小平给外资饭店的唯一题名。此前，包氏父子曾向中国政府表示，愿捐赠一千万美元，用以在北京建造一座现代化、高规格的名为“兆龙饭店”的旅游饭店和办公楼，建成后归旅游总局管理与使用。此事一直未落实。

后来邓小平发话说：“用他一个名字，也没有关系嘛，为什么不可以？人家有贡献也可以纪念啊！别人不同意，我来替他题字。”不久，邓小平批示：“兆龙饭店问题是政治问题，包玉刚捐献一千万美元，并非投资、合营，搞得不好，谁还来呀！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有此支持和关照，兆龙饭店于1985年10月建成。10月25日开张那天，邓小平破开荒地亲自去剪彩。后人遂称兆龙饭店为“邓小平工程”。如今，兆龙饭店的走廊边上，还摆着当年邓小平坐过的花梨木雕龙椅。



1992年1月29日，身着杏色便装的邓小平，来到位于广东顺德的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视察。在对中国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的“南方谈话”中，“发展才是硬道理”是核心，而这句话，就是在视察“科龙”时讲出来的。“科龙”有“科学技术之龙”的意思。

邓小平夫人卓琳生于1916年，农历为丙辰年，生肖也属龙，刚好小邓小平一轮。1977年，邓小平复出，一家人搬进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一个两进的院子。院子里有两棵青翠苍劲的松树，一大一小，高矮错落，枝叶交织在一起。邓家儿女们认为这两棵树可以作为邓小平与卓琳的象征，便为其取名“双龙树”。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其主持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接受来自武汉大学的查全性的面谏，拍板恢复高考招生。此举意义重大而深远，许多人的命

运因此而大转折。出生于陕北吴堡辛庄村的张维迎，当年中学毕业回乡务农，因言语不慎得罪了某些掌权者，有人就针对他扬言：“除非天上来龙抓，否则他休想出去。”正是高考制度的恢复，使张维迎一跃跳出“农门”入“龙门”。后来成为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的张维迎感慨地说：“要不是邓小平这条龙，我是不可能离开黄土地的，邓小平是抓走我的龙。”

自十六岁“少小离家”，到1997年九十三岁时逝世，邓小平一直没有回过家乡广安。广安人说邓小平属相为龙，他从广安经渠江到嘉陵江，再到长江进入大海，“龙归大海不回头”。有道是“海为龙世界”。邓小平喜欢大海，尤其喜欢在大海中游泳，80多岁时，还能坚持在大海中畅游一个小时以上。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3月2日，胡锦涛和邓小平夫人卓琳及子女，遵照邓小平生前的遗愿，将其骨灰撒入辽阔的大海。



上述之外，邓小平“三起三落”的经历，能屈能伸的政治家风格，也与龙的品性相吻合。《三国演义》中，曹操言“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王安石在《龙赋》中也言“龙之为物，能合能散，能潜能见，能弱能强，能微能章”。这些话都可用来评说邓小平。

（2010年4月28初稿于西安慧雨庐，2014年8月29日发表于“中华龙凤文化网”，2021年9月7日增补于加拿大枫华阁）

多哈亚运会开幕式之文化图腾

第15届亚运会开幕式演出的第二幕《亚洲奇迹》中，有《丝绸之路》一节，解说词是这样的：“在亚洲风格的鼓乐声中，场地显现巨幅亚洲地图……七十五名演员手舞红黄相间的布条，代表丝绸之路，六辆装饰华丽的花车代表着亚洲各国的商队出场。车队绕场行进到地图上各自所属的位置，车门打开，几种文化图腾出现……顺序依次为：龙（北亚、东北亚）、虎（南亚）、金翅鸟（东南亚）、大象（中南亚）和马（中亚）。”

这样的解释不够准确，如果用龙来代表包括中国、朝鲜、韩国、蒙古和日本在内的东亚，自然是可以的，而北亚指的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俄罗斯人是不崇拜中国龙的。这里，开幕式的编导还犯了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让中国龙跟在了日本文化表演团的后面。不错，东亚各国，甚至东南亚、南亚各国，都有龙崇拜现象，也都有舞龙、划龙船的习俗，但这些国家的龙，大都是受中华文化的影响，由中国本土传过去的。中国的龙崇拜起源于距今八九千年的新石器时代，而舞龙活动，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典籍中已有明确记载，且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已有表现。而日本的舞龙就晚得多了，一般认为，是其江户时代（1603—1867，相当于中国明代的天启年间至清代的光绪年间）随着日本摄取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高潮才由中国传至其长崎等地的。

这样的错误值得我们警惕：龙（当然还有凤），是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我们民族创造和选择这样的文化符号，花了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漫长时光，它凝结、寄托着历朝历代、亿万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想，体现着五分之一地球人的心理认同。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不注重保护、弘扬和宣传，就很有可能被别的民族、别的国家拿去，韩国将其“端午祭”“申遗”成功，就是一例。尽管我们倡导亚洲人民大团结、世界文明大融合，但团结和融合，要以保持本民族的特色为前提，不可以牺牲本民族最本质、最精华

的东西为代价。

用虎来代表南亚（包括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和锡金），也有问题，比如印度，其主要崇拜物或曰图腾物就不是虎，而是象和牛；尼泊尔也崇拜牛，而不丹受中华文化影响，崇拜龙。有意思的是，中国龙也摄纳、容合（兼容、包容、综合、化合）了虎的成分，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就出土有虎型原龙；而龙子之一狴犴，即旧时监狱门上常见的图像，就取材于虎。

东南亚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家。用金翅鸟来代表这些多信仰佛教的国家，似还说得过去。因为金翅鸟是佛教中的天神之一。据说此鸟来自古代印度的神话，是一种性情猛烈、类似鸷鹰的大鹏鸟；也有说此鸟是释迦牟尼的老师文殊菩萨的化身、代表着智慧和勇猛。金翅鸟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后，一定程度上已被中国凤凰摄纳、容合，中国民间有凤凰拔己之金羽送给无名鸟，使其变成金翅鸟的传说。

中亚包括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南部。游牧经济在这些国家占有重要位置，所以选马为代表是对的。当然，马也是龙的取材对象之一。中国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龙，其头部就参照了马首或马鹿首；宋代人言“龙有九似”，其中之一就是“头似驼”，而驼头与马头差别不大。

演出中，以大象代表中南亚（实际上是南亚），却没有代表西亚（包括阿富汗、伊朗、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土耳其、塞浦路斯、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巴林）的文化象征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刊于《西安晚报》2006年12月5日）

奥运奖牌弘扬龙文化

2008 年奥运会奖牌设计方案正式发布了，奖牌正面采用国际奥委会规定的图案，背面镶嵌的玉璧取自中国古代龙纹玉璧的造型，挂钩由中国传统双龙蒲纹璜演变而成。北京奥组委的发言人称，这是中华文明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奥运会形象景观工程中的又一次“中西合璧”。

璧是平圆形、正中有孔的玉器。其用途有二：一是作祭天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以苍璧礼天”之记。二是身份和财富的标志，是古代贵族佩戴的饰物。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有最早的光素无纹饰的玉璧。

龙纹玉璧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如出土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墓葬的龙纹玉璧：璧上雕饰多组龙纹，每组龙纹由一头二身蟠绕而成，龙头呈兽面形，眼鼻突出，身躯细长且弯曲。观察奥运奖牌上的玉璧造型及比例，与此龙纹玉璧接近。所谓“参考了中国龙形玉璧之神、型”，大概指的就是此璧了。

蒲是一种水生草本植物，又叫香蒲，可以制席。那么，蒲纹就指的是那种如席纹般成排密集排列的六角形格子纹饰了。这样的纹饰常见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玉璧上，玉璜上倒不多见。

璜是体扁平、呈弧形的玉器。其用途与玉璧相似：一是作祭祀、朝聘礼器，所谓“以玄璜礼北方”（《周礼·春官·大宗伯》）。二是作装饰用品。璜的形制多为璧、瑗、环的二分之一（有“半璧曰璜”之说）、三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璜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多光素无纹饰，商周时璜上出现纹饰，战国至秦汉纹饰趋于丰富，有龙纹、凤纹、兽纹、几何纹等，也有将整个璜雕成龙形、鱼形的。奥运奖牌的挂钩，显然参照、取像于龙形璜。

弧形的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弧形的虹。虹是龙的模特儿之一，龙在形成过程中兼容、综合了虹。这是因为虹和雨水有关，所谓“出虹，自北饮于河”（《殷

虚书契菁华》)，而龙则是司理雨水的神灵，何况弯身垂头的虹，又很像龙弯下腰在吸水。于是，虹，璜，龙，在人们的心目便具有了同一性，而虹与璜就可以互代了。如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双龙首虹形玉饰”，就又称“双龙首璜形玉饰”。

龙纹玉璧和龙形璜，是龙文化与玉文化的结合。龙有喜水、好飞、通天、显灵、征瑞等神性，玉有天然、柔和、温润、坚刚、秉德等品质，龙与玉的结合是神奇与美妙的结合，龙玉携手，共同承载了蕴涵、彰显、传播、弘扬中华悠久文明的历史重任。2008 年奥运会奖牌取龙又取玉，说明其设计者和决策者们对中华文明的优秀精华已有深刻的认知，且自觉地担负起了传承和弘扬的责任。在我看来，2008 年奥运会奖牌不仅体现了“中西合璧”，还体现了“古今贯通”，说明博大精深的中华龙文化既能“承古”，也能“开新”，它能够伴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吸纳、兼容、综合海内外一切新的优秀的文明成果，从而意气风发地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刊于《西安晚报》2007 年 4 月 17 日）

祥云与龙

北京奥运会火炬及运动员服饰都采用了“祥云”图案，发布的新闻解释说，“祥云的文化概念在中国具有上千年的时间跨度，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体现着“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寓意。

其实，祥云与中国文化的可排在首位的代表性符号——龙，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云是龙的取材对象，龙则常以云的形状呈现。

作为一种自然天象，云的盘卷翻腾变化不居的形状，以及和雨水的密切关系，是不可能不引起古人注意的。唐代的韩愈在《杂说》里讲：云“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云亦灵怪矣哉”。云雨的聚散浓淡多寡匀偏，直接影响着生产和生活，古人对云的敬畏和崇拜是很自然的。因此，古人在以多元容合的方式创造龙这个“雨水之神”的过程中，是不可能将云排除在外的。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泥质加砂陶尊上，可见到最早的云龙。小山遗址属新石器时代赵宝沟文化，距今近七千年。江苏吴县草鞋山和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距今四千五百年以上）墓出土的陶鼎盖上，都刻饰有龙形卷云纹。同期及之后出现在陶器、玉器、青铜器、建筑物等材质上的云雷纹、星云纹，看上去也都有几分“龙”形。——据此，说祥云的文化概念在中国“具有上千年的时间跨度”是不确切的，应改为“具有数千年的时间跨度”才符合实际。

史籍中也不乏对云和龙关系的描述。《周易·乾》言“云从龙”。云为什么要“从龙”呢？唐代学者孔颖达解释说：“龙是水畜，云是水气，故龙吟则景云出”（《十三经注疏》上）。这也就是说，在一些古人心目中，就像诗人吟诗那样，云是龙“吟”出来的。而《淮南子·天文训》则讲“龙举而景云属”，《春秋元命苞》则讲“龙举而云兴”。其间的道理，《淮南子·地形训》做了进一步的解释：“黄龙入藏生黄泉，黄泉之埃上为黄云。……青龙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为青

云。……赤龙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为赤云。……白龙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为白云。……玄龙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为玄云。”换成现在的话就是：黄龙潜入地下便产生黄色的泉水，黄色的泉水上涌，穿过地表尘埃，便变成了黄色的云团。以此类推，便有了青云、赤云、白云、玄（黑）云。

我们知道，云的形成主要是由水汽凝结造成的。而水汽则是来自江河湖海，及土壤和动、植物所含水分的蒸发，即“汽化”。水汽升空，进入大气层，或成云致雨，或凝聚为霜露，即“凝化”，然后又返落地面，渗入土壤或流入江河湖海。以后再蒸发“汽化”，再“凝化”下降。周而复始，循环不已。——这是现代科学对云的解释了。古人的说法，与科学的解释当然有距离，但也含有一定的科学的成分，是古人对观察到的自然界“汽化”“凝化”现象所做的朴素的理解。这样的理解因引入了龙而具有了神奇的、文化的意味。《论衡·龙虚篇》言：“云雨感龙，龙亦起云而升天”。三国时代的管辰在《管辂别传》亦言：“龙者，阳精，以潜乎阴，幽灵上通，和气感神。二物相扶，故能兴云。”显然，在古人看来，没有龙，云无以举而兴；没有云，龙无以神其灵：云与龙，龙与云，二者竟是不可分离的。当然，在我看来，尽管云与龙关系密切，但云只是龙的取材对象之一。龙的容合对象包括着云，也包括着云之外的雷电、龙卷风、泥石流、海潮、星宿等自然天象，还包括着蛇、鳄、蜥、鱼、鲛、猪、鹿、熊、牛、马等众多动物。

至于将“祥云”的寓意概括为“渊源共生，和谐共融”八个字，我认为是对的，这八个字，和龙的“容合”精神相一致。但不够全面，“祥云”还有“福生”，即“造福众生”的寓意。中国人有将美好的祈愿和美丽的想像寄托予“祥云”的传统，所谓“云行雨施”“云布雨润”“云集景从”“云舒霞卷”“风云际会”，等等。当然了，“福生”，也是龙的基本精神之一。

通过以上释析，再来看北京奥运会上的“祥云”图案，如果哪位朋友说：“那一团团‘祥云’，不正是一条条翻卷、升腾、抱团、飘逸的‘祥龙’吗？”我会说：“对，有道理，祥云从龙嘛！”

（2008年8月14日于西安慧雨庐）



2012伦敦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冠军龙服

奥运会与中国龙

2012年7月28日，举世瞩目的伦敦奥运会正式开赛的第一天，中国射击运动员易思玲在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一举夺冠，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首枚金牌。喜极而泣的易思玲登上领奖台，面向亿万观众挥手致意。人们注意到，易思玲所穿的领奖服的左肩部，有一个大大的、金黄色的、鲜亮的“龙”字。这个“龙”字，取形于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草书“龙”，却有所拓展——那潇洒的最后一笔，一直延伸到肘弯处，可谓韵味悠长。不仅如此，领奖服胸前的拉链部位，还有一处“龙”的印记；而在领奖服背部，英文CHINA字体中也融入龙元素，那个“C”，既是英文字母，又是一条跃跃欲腾的中国龙。

伦敦奥运会开幕之前，6月26日，国家体育总局在居庸关长城举行奥运领奖服命名仪式，中国奥委会副主席晓敏，国际奥委会委员杨扬出席，奥运冠军许海峰、郭晶晶等人助阵。于是，我们知道，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领奖服叫“冠军龙服”，其主旨是“彰显中华文明”。中国代表团将在包括开幕式、闭幕式、领奖等重要场合穿着这款服装。发言人称，“冠军龙服”在创意和设计及工

艺科技方面均有不少亮点。2012 年是中国农历龙年，将“龙”融入到 2012 年伦敦奥运会领奖服中，希望“龙”的精神可以激励中国奥运健儿在伦敦奥运赛场上再创辉煌。

其实，“龙”出现在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领奖服上已不是第一次了。在 2000 年悉尼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领奖服上就有“龙”。那款服装以红白黄三色为主，胸前在白底中凸显一条以红黄颜色构成的中国龙。当中国选手穿上这套领奖服一次次登上领奖台时，不光运动员激动，所有的中国人都为之自豪。因为那一年刚好是中国的龙年。媒体报道也有《中国巨龙震惊悉尼》之说。

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上，中国代表团的领奖服名为“龙腾祥云”。祥云与龙，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云是龙的取材对象，龙则常以云的形状呈现。故史籍中有“云从龙”（《周易·乾》）“龙举而景云属”（《淮南子·天文训》）“龙举而云兴”（《春秋元命苞》）等说法。中国人相信祥云能“福生”，即给人间带来好处，所谓“云行雨施”“云布雨润”等等，而“福生”正是龙的精神之一。领奖服之外，中国乒乓球队的比赛服上也有龙，那是一幅正面的“龙首”图。有外国运动员说，他们之所以输球，是因为被那“龙首”耀花了眼睛。这当然是玩笑之言。不过，那“龙首”图看上去，的确威风八面，气势凛然。



北京奥运会与龙的结缘还见于奖牌上和开幕式的表演中。北京奥运奖牌，其正面采用国际奥委会规定的图案，背面镶嵌的玉璧则取自中国古代龙纹玉璧的造

型，挂钩由中国传统双龙蒲纹璜演变而成。北京奥组委的发言人称，这是中华文明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奥运会形象景观工程中的又一次“中西合璧”。而在开幕式表演中，三十二根龙柱擎天竖立，气势恢宏。这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颇引人注目的一幕。龙柱高耸，巨龙腾空，既是向国人昭示，也是向世界宣告：从悠悠远古走来的中华龙族已奋然崛起，且巍然屹立于地球之东方，雄伟壮阔，豪气冲天。

再回到伦敦奥运会。2012年7月30日，中国男子体操队卫冕成功，获得金牌。当金黄色的五角星在赛场闪耀的时候，我们发现健儿们的比赛服上有特别醒目的“双龙”图案：黄底红色，头颅高昂，亮目张口，拱卫着位于胸部正中的国徽；8月1日，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出场的两位中国运动员身着同样图案的“龙服”，两龙一红一黄，皆扬首振鳞，气势磅礴……



为什么中国龙要在奥运会上频频出现？

这是因为——

龙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作为中华先民创造的神物，龙是中华民族起源和形

成的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体现者和标志者，其容合过程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中华民族形成后，龙以其根系之深、内涵之丰、时间之久、传衍之广、容合性之大、凝聚力之强，而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所推崇和喜爱，海内外绝大多数华人，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显然，中国龙之所以在奥运会上频频出现，是因为它标志、象征着中华民族，标志、象征着中国，标志、象征着中国人。

据报道，由于龙元素已被多次使用，设计团队对这次伦敦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领奖服，在设计之初曾有过犹豫，但后来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分析，大家认为，龙的概念是不可回避的。“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龙的寓意实在太深刻了。更何况今年又是龙年，在奥运会这个展示世界各国体育实力和交流多元文化的大舞台上，又怎么能少得了龙的元素呢？”相关负责人徐阳对采访他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们觉得这就像春晚，每年大家都想看不一样的。龙服也是，我们要做一件与众不同、令人眼前一亮的龙服。”

毋庸讳言，从远古走来的中国龙，在承载着大量的正面、积极的内容的同时，也携带有一些负面的、消极的东西，如政治上曾经象征专制皇权，民间传说中有恶龙作孽等等，一些人也以此来诟病中国龙。然而，经过广泛、深入的一番又一番的讨论、争辩，绝大多数国人已认识到：就像不能以人间有坏人就放弃“以人为本”一样，不能因为龙文化中有负面的内容就否定中国龙的主流的、巨大的、正面的意义和功能。

古往今来，没有哪一种神物或自然物，能像龙这样，寄托、凝结着历朝历代万万亿亿中国人的智慧和情感；也没有哪一种神物或自然物，能像龙这样，激励、鼓舞着万万亿亿中国人齐心协力、勇往直前。中华民族是需要标志的，这个标志非龙莫属——对中华民族而言，其他任何象征物都不能与龙相比肩。而且，更应当看到，一个世纪以来，龙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文化标志、情感纽带的身份已得到中华民族大多数成员的认同。龙已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告别了皇权、保守和软弱，已成为自觉自信、团结合力、适变图强且爱好和平的新龙。

（刊于《西安晚报·文化纵横》2012年8月5日、《中国文化报》2012年8月7日）

青奥会上的龙元素

2014年8月16日晚，在南京举行的第二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可谓精彩纷呈，而其中的龙文化元素也颇值得一说。

贯穿开幕式始终的核心道具是浑天仪，那熊熊燃烧的青奥会圣火，就是通过浑天仪点燃的。浑天仪最早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天文学家张衡创制，其四根支柱被做成四条龙蟠绕向上的形状。青奥会开幕式上的浑天仪依然是“龙柱托圆”的造型：四根巨大的红色龙柱，均饰以蟠绕向上的龙纹，看上去既醒目又庄重。

我们知道，龙是中国人对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具有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蕴涵的神物。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海内外华人大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而圆，可以象征圆融、圆满、圆梦，也可以象征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于是，“龙柱托圆”就有了两层含义：一是表达秉赋着龙的精神的中华健儿要尽心尽力，使本届青奥会开得圆满、成功；二是象征以龙为标志的中华民族要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梦，要使这个世界更加圆融和谐、文明美好。

“龙柱托圆”的核心道具之外，在《追梦》篇里，还出现了表演者们手持龙面纹道具的“青铜”群舞——

龙面纹也被称为饕餮纹、兽面纹，最早出现于距今五千年前的我国新石器时代属于良渚文化的玉器上，之后成为夏、商、周（尤其是商、周）青铜器上比较多见的具有代表性的纹饰。该纹的设计一般为：以鼻梁为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成龙面形象，头顶有双角，大眼，翘鼻，通常没有下唇。整个图像给人以庄严、凝重、神秘的感觉。

关于龙面纹的来源，有说是取材于虎，有说是取材于鳄，有说是取材于鸮，还有说取材于鹿、牛、羊等。通过比对，我们会发现，考古出土的相关面纹均不

是某一种单纯动物所能简单对应，而虎、鳄、鸮，以及鹿、牛、羊等动物，都是龙的取材对象，故可将该类面纹统称为龙面纹。

古人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龙面纹且将其造饰在青铜器上呢？李学勤先生指出：“图像中的兽，即龙，本来是神话性的动物，是古人神秘信仰的体现，同时又是当时正在逐渐形成、增长的统治权力的象征。要在图像中表现这一点，于是构成了如此奇幻的纹饰。”（《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0 页）

所谓神秘信仰，即对人类之外的神秘力量的信仰和崇拜。中国古人，将人类之外的神秘力量通称为“天”。而龙，因取材于自然界的各种动物和天象，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天”的化身、天的象征、天的使者。那么，崇拜龙就意味着崇拜“天”，即崇拜自然力。而在古代，鼎、簋等青铜器常常被做为祭天的礼器，这样，将龙面纹造饰于青铜器上就可以理解了：让龙作为沟通天人的媒介和使者，体现天对人的眷顾，传达人对天的尊敬。

由此，青奥会上出现龙面纹“青铜”舞就有了这样的意义：常怀敬畏心，尊重大自然。

上述之外，本次青奥会，中国代表团的冠军领奖服依然是“冠军龙服”：沿用了“龙”的概念，将“中国龙印”作为整体的设计主题。龙服上龙印主要分布在袖子两侧，两袖的龙印结合银色龙鳞印花，象征龙盘柱而上，后背的龙印又如书法落款，寓意师出名家。相关报道称：“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领奖服，使得在中国健儿勇登领奖台，向世界展示中国健儿的雄风之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底蕴。”

（2014 年 8 月 18 日于西安龙凤院）



上海世博会体现龙的精神 ——在 2010 上海世界博览会首届“龙文化日”盛会 上的发言（择要）

龙参与、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形成，龙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先祖，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龙联系着中华民族的情感，龙反映着中华民族的进步：龙与中华民族血脉一体，不可分离，中华民族的精神就是龙的精神，龙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对龙的精神，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容合，福生，谐天，奋进。

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福生是造福众生的简称。谐天就是与天即与大自然和谐。奋进是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的简称。

于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举行的上海世界博览会（Expo 2010 Shanghai China），体现、弘扬了龙的精神——

容合：上海世博会是世界上参加国家和组织最多的世博会，有来自全球的189个国家和57个国际组织参展，展馆多达323个，可谓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大容合、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容合。世博会的理念为“理解、沟通、欢聚、合作”，这八个字可精炼为两个字：容合。福生：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正是福生精神的体现。谐天：上海世博会各展馆，多采用节能、环保材料，如中国馆的太阳能屋面、生态水帘，加拿大的植被墙，日本馆的“紫蚕岛”发电膜等，体现的便是谐天的精神。奋进：上海世博会还是新材料、新技术的大荟萃，如中国民营企业联合馆内的“闪耀矩阵”水晶展示墙，英国馆的六万根亚克力种子管，各国馆普遍采用的空调末端设备等，当是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精神的物化和践行。

（2010年9月16日）



国徽与金龙和玺彩画

2019年10月3日，北京日报等媒体报道，一枚重新复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已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据悉，这枚采用木质结构制作的新国徽，是1950年至今天安门城楼上经过三次更换后悬挂的第四枚国徽，不仅工艺精湛，高度和宽度的尺寸精确到了毫米，而且使用期至少可达五十年以上。

一如既往，金光灿灿的金龙和玺彩画配饰和衬托着国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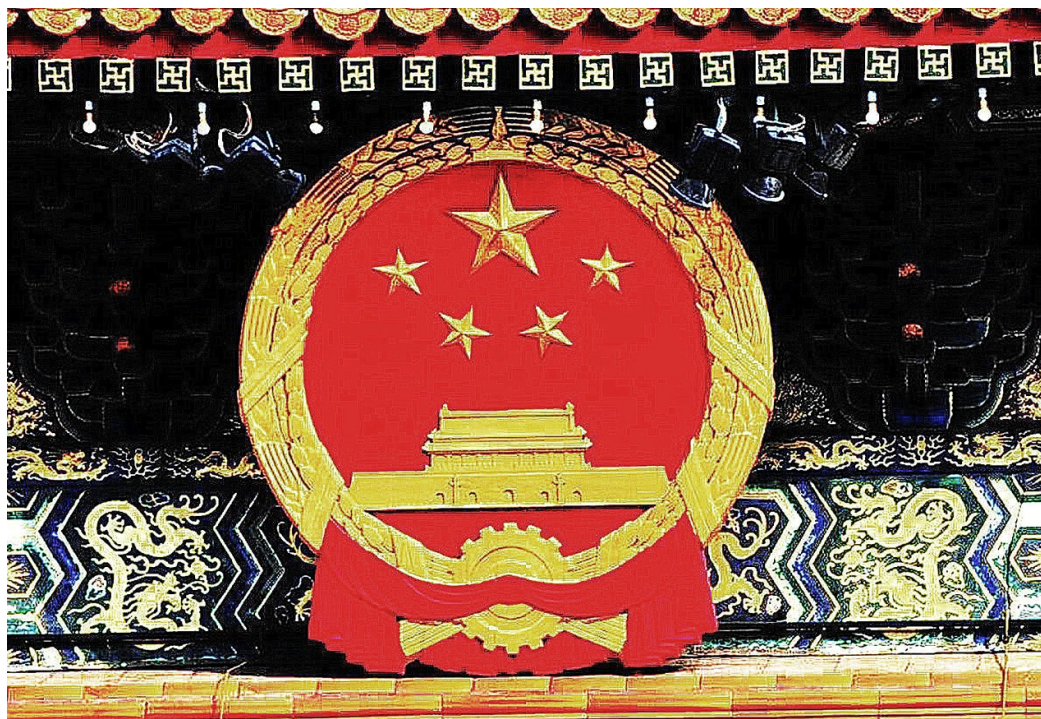
彩画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一个常见而重要的装饰手法。和玺彩画，则是建筑彩画等级中的最高级，一般只用于宫殿、坛庙等大建筑物的主殿上。和玺彩画分为金龙和玺、金凤和玺、龙凤和玺、龙草和玺和苏画和玺等五种。金龙和玺彩画位列第一。

金龙和玺彩画的主图案是贴金的龙纹，龙纹周围还常配以云纹或者火焰纹，使金龙金碧辉煌，且呈腾云驾雾之势。

“金”有尊贵、难得、持久、坚固、有光泽等喻义。“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即兼容、包容、综合、化合而发明、展现的，具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品性，和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蕴涵的神物，其实质，是中华先民对宇宙自然力的认知、升华和神化；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创造、演进，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海内外华人大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和”的基本义是和谐、协调。“玺”的基本义是印，自秦代以后专指国家元首之印，引申为尊贵。可见，金龙和玺彩画不仅是中华民族先进的营造技艺的一种表现，还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精彩、庄重、崇高的展示。

显然，共和国国徽以金龙和玺彩画为配饰和衬托，是在向世人说明和昭示：以龙为象征标志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共和国的繁荣昌盛，提供着历史的基础、

丰厚的滋养和强健的助力。



（刊于《西安晚报》2019年10月13日06版“文化纵横”）



PK 及图腾

丙戌春节期间，我在西安图书馆开办的“天禄讲坛”上，做了一场《正说中华龙文化》的讲演。事后，有记者就其中的部分内容写了题为《中华民族只能是龙的传人——庞进“龙图腾说”对阵姜戎“狼图腾说”》的报道。消息见报后，新浪、大江等网络传媒迅速转载，题目却换成了《“龙图腾”PK“狼图腾”——中华民族只能是龙的传人》，有读者看到后，打电话问我：RK 是什么意思？我说我还弄不明白，得查查才能回答你。

于是上网搜索，很快便有了答案。原来 PK 是英文 PlayerKiller 的简称，原意是“玩家杀手”，即“在游戏中杀死其他玩家的玩家”。引入中国后，名词变成了动词，意思可译解为“决斗”“对决”等。这样的解释，尽管带点我不怎么喜欢的“火药味”，但于我的讲演大体上还是接近的。如果以其原意，即“在游戏中杀死其他玩家的玩家”，就显得太“血腥”、太极端而非我所愿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杀死其他玩家”。就此话题而言，我只想说明，龙图腾并非由狼图腾演变而来，众多的动物和天象进入了龙的多元容合过程，狼有可能成为龙的容合对象，但只能是其中的一种。所以，“狭义的狼图腾不可能取代广义的龙图腾，就像人的一个指头不能代替一个人那样”。我还想说明，像对许多优秀作家那样，

我对姜戎是持有敬意的，因为《狼图腾》是近年来罕见的写得很棒的小说，其功力不是一般作家可以达到的。然而，称赞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也要认同作者提出的某些文化观点。

这里，牵涉到对图腾的认识问题。“图腾”一词，是 20 世纪初，严复先生由北美印第安鄂吉布瓦人的方言“Totem”译过来的。说来严前辈的这个译名是很妙的，其妙不仅在于发音相谐，还在于“图”和“腾”这两个字选得绝：“Totem”的原意是“他的亲族”，即说某种自然物（以动物为多）或天象与其族有血缘关系，是其族的始祖或亲人，从而将其尊奉为其族的徽号标志和保护神。而任何自然物都是有形象的，这便与“图”，即“用绘画表现出来的形象”相吻合；“腾”呢，有“升到空中”之意，既然是本族的徽号标志和保护神，自然要被高高在上地尊奉起来。然而，正因为这两个字的如此这般的含义，使后人很容易一见到古代一个什么图案，就浮想联翩地以“图腾”视之，以至于后世直到当今，大凡有徽号标志意义的图案，都有“图腾”之谓。这大概是“图腾”，这一盛行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延续至新石器时代以后，与宗教信仰、族祖崇拜、社会制度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文化现象，至今还脉息不绝地存活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原因。

狼曾被我国北方如乌孙、突厥、匈奴、蒙古等民族奉为图腾，这在学术界基本上已无争议；而龙是否是图腾，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否定性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按本意，图腾物应该是现实中存在的自然物或天象，而龙尽管来自自然物和天象，但现实中并不存在。肯定性观点的主要依据，是龙的取材对象，如蛇、鱼、鹿、马等，都曾为远古先民的图腾，而龙正是这些图腾的合并。因为有这样的争议，此前我对此问题一直持谨慎的态度，著述中多用“图徽”“图章”，而未用“图腾”。现在，由于《狼图腾》向学术界提出了挑战，便觉得有必要以“构成图腾的四条基本要素（某种自然物或天象；认为与族祖、族人有血缘关系；是部族保护神；是部族的徽号标志）”为据，提出狭义图腾和广义图腾的概念。四条全部符合者为严格意义上的狭义图腾，部分符合者可称为宽泛意义上的广义图腾。狼是狭义的某些少数民族的图腾，龙则是广义的中华民族的图腾——其徽号标志的意义最明显、最突出。

（刊于《西安晚报》2006 年 2 月 21 日）

龙早就是中华先民的广义图腾

北京的王先生撰文《龙何时竟成了中国人的“图腾”》（《西安晚报》2007年1月8日），提出了中国人“事实上从来也没有把这个鳞虫类的龙视为图腾”；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之说，“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无知的表现”等观点。其实，王先生的观点并不新鲜，十多年前就有类似说法，在2006年12月初暴发，至今不曾平息的“弃龙”风波中，也有人持同样的观点。

“图腾”源自北美印第安鄂吉布瓦人的方言“totem”，作为书面用语，最早见于1791年伦敦出版的人类学家龙格所著的一本书中。1903年，严复先生首次把“totem”一词中译为“图腾”。此后，中国学者普遍接受图腾概念和图腾理论。一个20世纪初才引进的概念，二十四史中当然不会有。史书中没有图腾概念，不等于中国古代不存在图腾现象。构成图腾的基本要素有：1，某种自然物（以动物为多）或天象；2，被认为与族祖、族人血缘关系；3，是部族的保护神；4，是部族的徽号标志。四条全部符合者是严格意义上的狭义图腾，部分符合者可称为宽泛意义上的广义图腾。以此考量，首先，龙是中国古人对蛇、鳄、蜥、鱼、猪、鹿、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等天象多元容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它来自动物和天象又不是动物和天象；其次，伏羲是中华民族的先祖之一，史传伏羲乃雷神之子，雷是龙的容合对象之一，雷神之子即龙神之子，故龙与中华先祖有间接的“血缘”关系；再次，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土的龙已有好多件，这些龙或摆在原始村落广场中央，如距今约八千年的辽宁查海兴隆洼文化化石块摆砌龙；或置于氏族首领身边，如距今约六千五百年的河南濮阳仰韶文化蚌砌龙；或放在重要人物的头部位置，如距今约三千七百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作为部族保护神和徽号标志的用意已很明显。至于祭祀礼器上的龙纹、部族旗帜上的龙纹等等，更是或多有出土，或已见于文献记载。据此，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判断：龙很早就成为中华先民崇拜的广义图腾，王先生的说法与事

实不符。

“龙的传人”作为概念，是1978年12月，由台湾音乐家侯德健通过《龙的传人》一曲，首先唱出来的，但作为观念，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据是至晚在汉代，龙崇拜就与华夏族的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了。伏羲女娲是传说中的创世英雄，也是炎帝、黄帝的直系祖先。出现在汉代画像石上的伏羲女娲生着长长的龙尾，而且亲密地交缠在一起。文献资料中也有伏羲是雷神之子，是其母华胥氏踩踏了雷神在雷泽留下的“大迹”而孕生的描述，有“伏羲鳞身，女娲蛇躯”之说——雷、蛇都是龙的容合对象，“鳞身”“蛇躯”即“龙身”“龙躯”。炎帝、黄帝、颛顼、唐尧、夏禹等先祖，也都有龙之称、龙之比、龙之功、龙之誉，如“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帝王世纪》）“轩辕黄龙体”（《史记·天官书》）等。正因为龙以象征物的面目和身份融入了华人的祖先崇拜，并参与、助力、见证、体现、标志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新石器时代及随后的青铜时代，是中华民族的形成期。在和这一时期相对应的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区系类型文化中，都发现有早期的“原龙”。中华民族的主体正是在这各大区系、众多类型文化的交汇影响、彼此容合中逐步形成的，所以，普天下的中华儿女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据此，我们可以说，否认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才“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无知的表现”。

龙是先民对宇宙自然力感悟、认知、神化的产物，在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劳动人民就把龙创造出来了。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帝王们将龙拿去，做了自己的比附象征物。随着帝王从历史舞台退出，龙也就失去了象征帝王皇权的意义，遂以吉祥物的面貌和身份，回到了劳动人民中间。几千年来的事实是宫廷有宫廷的龙，民间有民间的龙，两种龙并行不悖。而龙作为帝王皇权的象征，对龙的地位的提升、影响力的扩大、世界各国对龙的了解和认识有正面作用，并非一无是处。对帝王专制应该清理和批判，但不能一概否定，一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们不能扔掉历史。就像一棵树，我们不能只要树梢，而不要树干及树根；二是以龙为象征的帝王也做了许多促进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社会进步的大事好事，我们不能视而不见。那种凡是帝王用过的我们就要抛弃的观念是荒谬的，也是危险的。不能因为长城是秦始皇修的，就把长城炸掉；故宫是明清帝王住过的，就一把火将故宫烧毁。至于王文中提到的孽龙为害、英雄屠龙等，

民俗传说中也都是有的，但那只是龙传说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相比之下，善龙造福、俊杰比龙的传说及民俗要多得多，且影响大。如舞板凳龙以纪念因行雨而献身的水龙，竞渡龙舟以纪念诗人屈原，诸葛亮、嵇康比称“卧龙”，贺龙、李小龙、成龙以“龙”为名，等等。

包括龙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优秀的精华多多，落后的糟粕亦有，正确的态度是有扬有弃，而不是以偏盖全、抓住一些负面的东西不放，以至于要全面否定、全盘抛弃。当然，事实上也抛弃不了。举一个例子，仅就民俗生肖而言，中国当今至少有一亿多人“属龙”，还有一亿多人“属小龙（蛇）”能抛弃吗？再如，王先生本人姓王，而王姓的源头必然会追溯到某某帝王，即被王先生骂为“小丑”“畜牲”“真不要脸”的“真龙天子”。这也就是说，王先生的身上已承传有龙的“基因”，如果王先生真有什么妙招，能把已经渗入自己血脉骨髓中的龙性基因剔除掉，那我们就开眼了。

（刊于《西安晚报》2007年1月21日、《国学》2007年总第8期）



伏羲女娲龙身像（汉代画像石）

孔子是敬龙的

——兼析诸位“弃龙”者是不是“龙的传人”

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薛涌最近发表了《“龙的传人”新解》（《南方周末》2007年1月4日）一文，提出他“会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是孔子的后人，但绝对拒绝做龙的传人”，并说“在原始儒家那里，龙是没有地位的”。无独有偶，从教于陕西某大学的朱先生也发表文章，认为“龙在子不语‘怪力乱神’之列，古之贤士不研究它”；“中国以孔子作其文化形象的代言人，是因为孔子非龙”。（《龙不增加中国的软实力》，《西安晚报》2007年1月22日）从而把孔子与龙文化对立起来。

薛涌先生远在北美，还兴致勃勃地参与由上海滩刮起的“弃龙”风波，说明薛先生毕竟是生着黑头发、长着黄皮肤的中国人，对中华文化还是有感情的。然而，也许是年龄尚轻，又去了他国，未来得及对中华龙文化做全面了解的缘故，薛先生的文章暴露出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三、其四、其五……”的缺陷。——顺便指出，持“弃龙”观点者几乎都有此缺陷；而其文品意旨，均可谓之“毁树式批判”，即一棵大树的某一枝干落了鸟粪或被虫蛀了，就主张把整棵树及树根都砍倒、挖烂、烧毁。

其实，孔子是很关注龙文化的。是他老先生开了将人间出类拔萃者比龙喻龙的先河。《庄子·天运》篇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孔子曾去拜见老子，归后三日不谈拜见之事。弟子问道：“夫子您去见老聃先生，难道就没说一些规勉的话吗？”孔子回答道：“你知道我见到什么了吗？我见到了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着云气飞翔于阴阳之间。我惊异地张开了口却忘记了合，又怎么能规勉人家呢！”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也有几乎相同的记述，末了，孔子还感叹道：“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其对龙的敬重，溢于言表。

孔子晚年喜好《周易》，曾投注精力和智慧加工整理《易传》。这期间，他提

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如“龙德广大”“神龙精处”（《二三子》），“龙德而隐”“龙德正中”“龙德时进”“云龙谐天利人”“亢龙思危”（《易传·文言》）“龙德知化”（《易传·系辞》），等等。孔子所讲的“龙德”，实际上就是正人君子之德，也即谐天利人、广施普惠、追求中正、懂得进退的理想之德。显然，孔子的上述观点具有前所未有的开创性，故有学者精辟地指出：“孔子不仅是中国儒学理论奠基人、义理学派的孔门易学奠基人，而且是中国龙学奠基人，中国龙文化的理论奠基人。”（王东《中国龙的新发现》第1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据此，我们可以说，在原始儒家那里，龙不但是有地位的，而且是地位很高的。

再将孔子学说的精华与龙文化的基本精神相比较，我们也会得出二者具有同一性的结论。龙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博大而庞杂，但其主流的、基本的精神底蕴，仍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中国古人对蛇、鳄、蜥、鱼、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等天象多元容合的结果，便产生了龙。而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容合的过程，龙参与、助力、见证、体现、标志了这个过程——因此中国人才称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孔子学说也是容合的结晶，其核心理念“仁”，就有“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论语·先进》）“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能行五者（笔者按：即恭、宽、信、敏、惠五种德行）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等多种阐释，显然是一个体现着容合精神的概念。还有福生，即造福众生，龙是水利神和农业神，兴云布雨、司水理水，使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龙的天职，而孔子的“泛爱众”（《论语·学而》）“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等思想，体现的也是福生的精神。至于孔子提倡的入世、有为的价值取向，和龙的奋进精神之契合，就无须多言了。

龙是几千年来亿万中国人共同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神奇、宏大、充满智慧的“集体创作”，因此它才有资格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而中华文化，就包括孔门学说，即儒家文化在内。因而说龙也是孔学、儒学的象征，自然没有错。这样看来，薛涌先生一旦“承认自己是孔子的后人”，也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是“龙的传人”。同样，朱先生一旦声称自己热爱孔子学说，也就等于承认自己热爱龙

文化。

还有一些情况可能是薛、朱二先生，以及同样主张“弃龙”的陈先生（其文见 2007 年 1 月 22 日《西安晚报》）所没有意识到的，这便是三位所姓的“薛”“朱”“陈”与“龙”的关系。据考察：薛姓主要出自任姓和妫姓，而任姓是黄帝的后裔；妫姓是舜帝的后裔，舜帝又是黄帝的七世孙。朱姓主要出自曹姓和狸姓，曹姓是颛顼的后裔，颛顼是黄帝之孙；狸姓是帝尧之子丹朱之后，而帝尧也是黄帝后裔。陈姓出自妫姓，妫姓与舜帝、黄帝的关系已如上述。而黄帝，乃公认的“龙祖”之一，是古人将龙崇拜与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的“人文始祖”，有“轩辕黄龙体”（《史记·天官书》）“黄帝龙颜”（《论衡·骨相》）等说法。这样看来，薛、朱、陈三先生的先祖如果没有意外情况的话，就一定出自黄帝一脉——除非更换黄皮肤、拔光黑头发、将心脉里流淌的华人血也换成其他什么血，甚至重新投胎，换掉“基因”——诸位“弃龙”者的“龙的传人”身份，竟是无法割弃的。

（刊于《西安晚报》2007 年 1 月 29 日）



关于龙标志的几个问题

事情是由上海《新闻晨报》（2006年12月4日）刊登的一则所谓“弃龙”的报道引起的。报道称：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吴友富教授领衔的“重新建构和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的研究，已正式被列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这个课题如果完成，中国形象标志将有可能不再是“龙”，他们所塑造的国家新形象标志，很有可能将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用。

消息一出，舆论大哗，一天之内，近二十万网民参与有关网站举办的民意投票，九成多的人明确表示反对。上网文章多不胜数，其情绪之愤激、语词之尖刻，大有千夫所指、万众共诛之势！如“龙文化是华夏文化中不可替代的命根”“屠龙意味着对中华文化的灵性根基毁灭性摧残”（朱卫华）；如“中国人已经把自己的祖坟掘得面目全非了，有些人还不罢休，连自己的灵魂也要出卖”（匿名）等等。在这种情势下，吴友富教授赶快于当日下午向媒体表明：“自己此前从未就此事接受过媒体采访，所谓龙不再作为中国形象标志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并强调：“中国龙的形象一定要坚持！”（《光明日报》12月5日）

有道是“无风不起浪”，“树欲静而风不止”。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广大网民对民族图徽标志的强烈认同，对放弃本民族的文化精华，以迎合、迁就西方语境的言行的理智的批评与愤慨的指责，的确都让我们感动，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民意不可欺”“众怒难犯”也！而在讨论中提出和暴露的问题，也值得我们重视，做深入的进一步的思考。

一．中华民族的标志，有必要迎合西方吗？

言龙“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容易招致误读误解”，因而应该放弃的言行，并不新鲜。此前，北京奥组委一些人就以“龙

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理解”为由，不顾大多数国民意愿，也不惜伤害海内外华人的感情地将龙排除在 2008 年奥运会吉祥物之外。

这些“弃龙”的说辞和做法，形成了一种现象，表面上看似乎是对一个文化符号不够重视的问题，而其实质，则是反映出了中国在走向世界，即“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一些国人，尤其是一些掌握着话语权和决策权的“精英”人物，“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媚外心理。按说，某些西方人有“不同的理解”了，或“误解”了，要做的工作是向他们讲清我们的道理，消除误解，即使一时消除不了也没关系，互相尊重对方的文化信仰和风俗习惯就是了，大可不必迁就和迎合。而这些人的做法则是：一定要挤压我们的头颅，以适应洋人的帽子，或者干脆不要我们的头颅，只要洋人的帽子。如此作为，被网民指斥为“数典忘祖”“自矮身形”“自我阉割”“用屁股思考”“阉人心态”“软骨症”“见了洋人腿肚子转筋”“太监文化逻辑”等等，就很自然了。

是的，在对外交往中，我们不能妄自尊大，但也没有必要妄自菲薄。生活中的道理常常是：站不起来，是因为自己跪着。在文化问题上，尤其是民族形象标志问题上，既不可以用东方的讲究来要求西方，也不可以用西方的说法来框范东方。世界是多元的，文明是多样的，各种文明都有它的优长，全球化绝不是一种文明的一元通吃，而是各种文明的多元集优。

和这次“弃龙”风波有关，在 2006 年 12 月 1 日卡塔尔多哈亚运会开幕式上，大型演出的编导还犯了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将中国龙安排在了日本的花车上。不错，东亚各国，甚至东南亚、南亚各国，都有龙崇拜现象，也都有舞龙、划龙船等习俗，但这些国家的龙，都是受中华文化的影响，由中国本土传过去的。中国的龙崇拜起源于距今八九千年的新石器时代，而舞龙活动，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典籍中已有明确记载，且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已有表现。而日本的舞龙就晚得多了，一般认为，是其江户时代（1603—1867，相当于中国明代的天启年间至清代的光绪年间）随着日本摄取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高潮才由中国传至其长崎等地的。

这样的错误值得我们警惕：如果继续掉以轻心，不注重保护、弘扬和宣传，我们的文化符号、民俗样态，就很有可能被别的民族、别的国家拿去，韩国将其所谓的“端午祭”“抢注”成功，就是一例。还有将“中医”说成“韩医”，将

中国的围棋说成是韩国的发明，等等。尽管我们倡导亚洲人民大团结、世界文明大融合，但团结和融合，要以保持本民族的特色为前提，不可以牺牲本民族最本质、最精华的东西为代价。

有人说，我们应该用“大国心态”或“地球村”心态来对待这样的事。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参照系的问题。比如，太阳会老化，地球会毁灭，这当然是真理，如果以这样的真理为参照，我们当下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意义。然而，这样的真理太遥远了，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有限的、现实的时空里，我们还不能什么都无所谓，因为别人有所谓，你“君子风度”，你“拱手相让”，你“以身饲虎”，别人正好拿去，壮大了他们，反过来让你尴尬，让你难受，甚至让你失落尊严，匍匐在地。

二. 中国龙与西方 Dragon 的区别何在？

“弃龙”风波的直接原因是有人将西方的 Dragon 与中国龙相混同，而两者无论从起源、形象、文化背景，还是功能、地位，都属于性质不同的两种象征物，是不可混同的。

西方的 Dragon 是对鳄、蛇、鹰、蝙蝠等少数动物的集合，具有喷火、吞人、破坏、护宝等神性；表象丑陋，主要代表恶，可以说“充满霸气和攻击性”；如《圣经·启示录》中的七头十角、等着吞食妇人孩子的大红 dragon，这条 dragon 就被说成是魔鬼撒旦的化身。中国龙是对蛇、鳄、蜥、鱼、鲛、猪、鹿、熊、牛、马等许多种动物，和雷电、云雾、虹霓、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神物，具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表象神奇，主要代表善，不存在所谓的“攻击性”；如以尾划地、协助大禹治水的应龙。中国龙有神圣威严的一面，更有和悦可亲的一面。

西方的 dragon 有海洋文明的背景，是暴力和邪魔之怪，由此产生了许多英雄屠戮 dragon 的传说，如英国的圣乔治就是一位战胜 dragon 的英雄；中国龙主要以农耕文明为背景，是水利和农业之神，由此产生了许多祈祷龙神以求风调雨顺的习俗，如过“二月二龙抬头节”，等。dragon 在西方文化中地位不高，无足轻重，中国龙经过长时间的集合、演进和升华，事实上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

神符号、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是吉祥嘉瑞的象征，其地位是崇高的，其象征性和凝聚力是巨大的、无可取代的。

以担心西方人误解，就轻率地放弃龙的中国标志地位，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中也因与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认同相悖而行不通。我们民族发明和选择龙（当然还有凤）这样的文化符号，花了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岁月，它凝结、寄托着历朝历代、亿万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想，体现着五分之一地球人的心理认同。不说放弃了可惜，事实上也放弃不了。

龙与 dragon 相混，很大成分上是过去的误译造成的。所以，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学者都曾郑重建议：将 dragon 直译为“劫更”或“劫根”，将龙英译为“loong”（拼音 long 英文发“朗”音，所以要多加一个“o”，且将第一个字母大写）以示区别。

三. 中华儿女非“龙的传人”吗？

对“龙图腾”以及“龙的传人”说的挑战，早在此前已经展开。

先是作家姜戎在《狼图腾》一书中提出了“龙图腾极有可能是从游牧民族的狼图腾演变而来”的观点。对此，我在西安图书馆举办的“天禄讲坛”上，曾郑重地予以回应——

图腾是人类早期产生的与宗教信仰、族祖崇拜、社会制度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文化现象，对后世文化影响很大。一般来讲，构成图腾的基本要素有某种自然物（以动物为多）或天象，被认为与族祖、族人有血缘关系，是部族的保护神，是部族的徽号标志等四条。四条全部符合者为严格意义上的狭义图腾，部分符合者可称为宽泛意义上的广义图腾。龙是多元容合的神物，它来自自然物和天象又高于自然物和天象，其徽号标志的功能最明显，因而可称为广义的中华民族的图腾。

狼有可能成为古代某些游牧民族的狭义图腾，也有可能进入龙的多元容合过程。但是，说龙图腾由狼图腾演变而来，文献证据缺乏且没有来自考古的实物证据的支持。至于《狼图腾》书后提的几条“证据”，均因判断有误而难以成立，最多只能算作一种猜测。比如，为了说明没有翅膀的狼图腾演变成了龙图腾，姜

戎断言说龙图腾也没有翅膀，岂不知长翅膀的“飞龙”形象在汉代的石刻、砖刻上就有。众多动物和天象进入了龙的容合过程，狼即使成为龙的容合对象，也只能是其中的一种。所以，狭义的狼图腾不可能取代广义的龙图腾，就像人的一个指头不能代替一个人那样。

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容合的过程，龙参与、助力、见证、体现、标志了这个过程。龙的传人主要指文化精神的一脉相承，而非血缘意义上的基因遗传。中华始祖的文化精神与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同一。对古代一些游牧民族所崇尚的所谓狼的强悍进取、不屈不挠、团结合作等精神质素，龙自然也会采取容合的态度，使其变成龙精神的一部分，事实上，龙的精神中已包含有上述精神。所以，总体上说，中华民族只能是龙的传人，而非狼的传人。

之后，黄守愚先生又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提出了“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对此，我也做了回应——

猪是一种具体的动物，将其再神化，也脱离不了作为自然界具体动物的生态特征；而龙则是容合了众多动物和天象的神物，它来自自然物又超越了自然物，其神性、神职之大、之多，是任何一种单一的自然物所不能比拟的，猪当然不会例外，不管是黄先生褒扬的野猪，还是黄先生贬责的家猪。不错，中国古代的确有过对猪的崇拜，东北红山文化区域内也出土了不少猪型原龙。但是，这些，只能说明，猪是龙的容合对象之一，而不是“惟一”，因为龙的取材对象，除猪之外，还有蛇、鳄、蜥、鱼、鲉、鹿、熊、牛、马、虎、鸟等动物，以及雷电、云、虹、龙卷风、星宿等自然天象。

显然，黄先生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猪崇拜的问题，而在于拔高了猪崇拜，将作为龙的容合对象之一的猪，以点代面、以枝节代整体地高抬到可以取代龙的地步；将中国古代属于局部性、一般性的猪崇拜现象，高抬到全局性、标志性的民族信仰和精神象征的位置；甚至将中华民族的人文先祖黄帝、夏禹等诬指为猪，其牵强附会、轻率荒谬之处比比可见。其“论述”，乏见理论创新之功，却有混淆视听之嫌。因而，其说动摇不了龙图腾的崇高地位，中华民族只能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猪的传人说”可以休矣。

黄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还提出了“龙的传人说”只有三十年的观点，对此我也做了阐明：“龙的传人”作为概念，的确是1978年12月，由台湾音乐家侯德健

通过《龙的传人》一曲，首先唱出来的，但作为观念，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据是至晚在汉代，龙崇拜就与华夏族的祖先崇拜结合在了一起。伏羲女娲是传说中的神话英雄，也是炎帝、黄帝的直系祖先。出现在汉代画像石上的伏羲女娲生着长长的龙尾，而且亲密地交缠在一起。文献资料中也有伏羲是雷神之子，是其母华胥氏踩踏了雷神在雷泽留下的“大迹”而孕生的描述（雷电是龙的重要的取材对象之一，闪电为龙之形态，雷声为龙之发音，雷神就是龙神，雷神的儿子也就是龙神的儿子，龙神的儿子当然是龙），和“伏羲鳞身，女娲蛇躯”之说。至于炎帝、黄帝、蚩尤、颛顼、唐尧、虞舜、夏禹等先祖，与龙的关系就更亲密了，他们都有龙之称、龙之比、龙之功、龙之誉。正因为龙以象征物的身份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崇拜，所以普天下的中华儿女都认同自己是“龙的传人”。

在这次“弃龙”风波中，有的媒体也把神话学家叶舒宪提出的“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来源于熊图腾”的观点搬了出来。这样的观点我依然不能苟同。是的，史籍曾载“黄帝号有熊”“轩辕出自有熊之国”，东北红山文化区域也出土了五千年以前的“熊型原龙”；我也认同叶先生讲的熊有“自我复生的能力”的观点，但说“熊图腾要比龙图腾悠久得多”“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来源于熊图腾”，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东北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了目前发现最早的距今达八千年的石块摆砌龙，这条龙就一点都不像熊；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距今约六千五百年的蚌砌龙也与熊的形象相去甚远。叶先生举出的所有证据，都只能说明熊是龙的取材对象之一，而非惟一。因为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已经证明，熊型原龙之外，还有蛇型原龙、鳄型原龙、鱼型原龙、猪型原龙、鹿型原龙、虎型原龙、鸟型原龙，等等。

至于个别人提出的“熊猫传说”“狗的传说”“蚯蚓传说”等，因离谱太远，不必细说。

四. 龙没有开新的能力吗？

对龙“承古”的资格和能力，大家没有争议，但龙是否具备“开新”的资格和能力，看法就不一了。

有的网友说：“我不喜欢把不存在的动物作为图腾，那代表着虚幻和没有未

来。”（佚名，新浪网 2006 年 12 月 4 日）有的学者讲：“龙本身是一个帝王专用的符号”“是皇帝的标志”。（吴思，《南方日报》2006 年 12 月 10 日）“中国人对龙的崇拜，就是对王权的崇拜和臣服。”“在现代都市生活里，龙正在遭到淡忘，它仅仅在节庆时刻跟民俗一起短暂地现身，然后再度退出我们的生活。仅此而已。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龙是那种正在逐渐离开我们的事物。”（朱大可，《南方日报》2006 年 12 月 10 日）“抛弃龙文化，才能解放思想。”（彭凌玉树，搜狐博客 2006 年 12 月 5 日）

对上述说法，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第一，龙既是虚的又是实的，是虚与实的统一。说它虚，是说它是虚拟的神物，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生物意义上的活蹦乱跳的龙。说它实，一是说它在自然界中有活生生的模特儿，二是说还有作为文物、作为艺术品的龙。这些模特儿和文物、艺术品，可都是实实在在的，可视可见的，甚至是可触可摸的。显然，有了那些模特儿之实，才有了神物之虚；有了神物之虚，才有了文物、艺术品之实。这是一个逻辑的辩证的创造过程。这个过程是滚动发展的，不断升华的。一代一代的龙都既是实的，又是虚的，虚实相生的。

选择来自现实生物又非现实生物的龙作为文化标志，正好反映了中国人的聪明。龙体现的是一种“容合”的世界观。若是崇拜具体生物，无论外在形象还是文化内涵，都不好再增添新的东西，而作为神物，从远古到当今，龙一直呈现着开放的胸襟和纳新的气魄，且不断地从形和神两个方面增加着与时代前进的脚步相吻合的新鲜活泼的质素。

第二，龙是原始先民对身外自然力神化的产物，在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劳动人民就把龙创造出来了。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龙身上具备着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遂被帝王们看中，拿去做了自己的比附象征物。随着帝王从历史舞台退出，龙也就失去了象征帝王皇权的意义，遂以吉祥物的面貌和身份，回到了劳动人民中间。几千年来的事实是宫廷有宫廷的龙，民间有民间的龙，两种龙并行不悖。而龙作为帝王皇权的象征，对龙的地位的提升、影响力的扩大、世界各国对龙的了解和认识有正面作用，并非一无是处。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倒也显得痛快潇洒，但难免失之于简单、粗率和偏激。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在主体认同的前提下有扬有弃。

我不认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龙是那种正在逐渐离开我们的事物”的判断。龙是一个凝结着中华文化精华，从而魅力无穷、具有广阔开放的襟怀，从而新新不已的系统，是可以涵纳、容合各种文明的全色彩象征，也是一种包括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在内的全时态象征。龙的身上所蕴含和体现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基本精神并没有过时——

容合：龙的形象是容合的，龙的形成过程是容合的过程。龙的容合，参与、伴随、见证、标志了中华民族的容合。容合意味着凝聚，意味着团结，意味着协作，意味着合力。容合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容合的精神，大到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处理国家关系，小到个人事业、人际交往、家庭生活，都有指导意义。

福生：作为自然龙，龙由水神而农业神，兴云布雨、司水理水是龙的天职。作为人格龙，中国古代的创世英雄、圣哲明君、精英贤良，多有龙之比、龙之名、龙之誉。作为吉祥物，龙有显灵、征瑞的神性，人们相信，龙能给他们带来绵延不绝的幸福和嘉惠多多的好运。龙的福生的精神，启示和教育人们：做好龙、善龙、祥龙、造福众生的龙。

谐天：龙的容合对象来自自然界，龙是人天关系的形象化表述，它体现着中国圣哲“天人合一”的思想，反映着先民对天道的理解、对身外众生的尊重。谐天的精神告诉世人，中国应当走重视生态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绿龙”的道路。中华民族应该成为绿色理念深刻、绿色制度健全、绿色行为普及的与天和谐的龙族。

奋进：龙的形象是与时俱进的。从新石器时代简单质朴的“原龙”、商周时期神秘抽象的“夔龙”、春秋战国与秦汉之际粗犷雄健的“飞龙”、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刚柔并存的“行龙”、元明清复杂华丽的“黄龙”，直到当代的吉庆嘉瑞的“祥龙”：中华龙呈现着不断开拓、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轨迹。龙具有“好飞”的神性，而“好飞”正是“奋进”的同义词；龙舟竞渡是龙的奋进精神的外化。这样的精神，激励人们发奋自强，锐意创新，积极进取。

显然，上述基本精神，使龙不仅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魂的载体而千古传承，而且使其以紧扣当代生活的姿态，与中华儿女一起，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地走向未来。

近年以来，国家在大力倡导和谐文化，而龙文化与和谐文化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毫无疑问，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龙文化既可以为和谐文化提供民俗基础、智慧参照和精神动力，也可以作为和谐文化的象征和载体承古开新。

（刊于《文化月刊》2007 年第 1 期、《谷雨》2007 年第 2 期）



“龙的传人” 称号属于整个中华民族

朱维群在 2012 年 2 月 14 日《学习时报》上发表《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一文，其中有“汉族喜欢说的‘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其实并不科学”语。由此引发争议。单仁平在 2012 年 2 月 16 日《环球时报》上撰文称：“‘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在社会的笼统观念里，并非汉族的专属概念。它们甚至不是民族概念，而是文明概念。”“这些概念迄今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凝聚力，远远大于它们带来的副作用。”

笔者认为，所谓“龙的传人”，只能从人文的意义上理解，而不能从血缘遗传的意义上理解。如何理解呢？第一，龙以象征物的面目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崇拜。伏羲、女娲位列三皇，是炎帝、黄帝的直系祖先。出现在汉代画像石上的伏羲女娲生着长长的龙尾，而且亲密地交缠在一起。这说明，至晚在汉代，龙崇拜就和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了。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人文先祖有龙之称、龙之比、龙之功、龙之誉，其后代自然就成了“龙的传人”。第二，中华民族的主体是在各大文化区系、众多类型文化的交汇影响中逐步容合而成的，而在各大文化区系、众多类型文化中都发现了原始的龙，说明龙是民族大容合的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体现者，当然，也是标志者，因为不管容合前的各族团以何物为标志，容合后的统一的中华民族的主体选择了龙。第三，龙的精神是容合（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这样的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具有同一性。以上三点，决定了华人、华裔“龙的传人”的身份。

应当看到，一个世纪以来，龙的中华民族精神象征、文化标志、情感纽带的身份已得到中华民族大多数成员的认同。龙已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告别皇权、保守和软弱，成为一条自觉自信、团结合力、适变图强且爱好和平的新龙。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有五十六个成员。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以龙为标志毋庸置疑。

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崇龙、敬龙者有壮、苗、彝、土家、布依、侗、瑶、白、哈尼、黎、傣、畲、傈僳、仡佬、拉祜、佤、水、纳西、羌、仡佬、景颇、布朗、毛南、普米、阿昌、怒、京、基诺、德昂、门巴、独龙、珞巴、蒙古、藏、朝鲜、锡伯、满、土、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回等四十二个民族，其他十三个民族从成为中华民族成员的那一天起，就程度不同地对龙文化持理解、尊重、欣赏的态度，对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持认同、吸取、弘扬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龙的传人”属于整个中华民族，海内外华人都可谓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

（2012年2月16日于西安慧雨庐）



三星堆与龙凤文化

1.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

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城西 7 公里，因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而得名。

2021 年 3 月 22 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记者专访，谈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的发掘情况。在谈到三号坑新出土的“堪称国宝级器物”的“顶尊跪坐人像”时，雷雨说：“这件尊很奇特，它从口部一直到肩部、腹部有好几条龙形的纹饰或者牛形的纹饰，以前大口尊上没有这样的附件，它可能全中国唯一的一件，从来没有出过。这个龙形的纹饰，跟一号神树上一条从天而降的飞龙一样。还有这个从器物的口部头朝下，给人感觉是从天而下的一条龙，龙身牛头这样一种怪兽，可以看出三星堆人思维很开阔，敢做敢想，他们把牛和龙捏在一起，做了一件非常美的艺术品。像这个跪坐顶尊人像，应该是平时搁在皇家的宗庙里祭祀时候用的。”



此前，尤其是 1986 年的发掘中，三星堆遗址的一号、二号坑，出土了金、铜、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近千件。其中青铜器类有龙形饰、龙柱形器、龙虎尊、神树、立人像等龙纹、龙形器若干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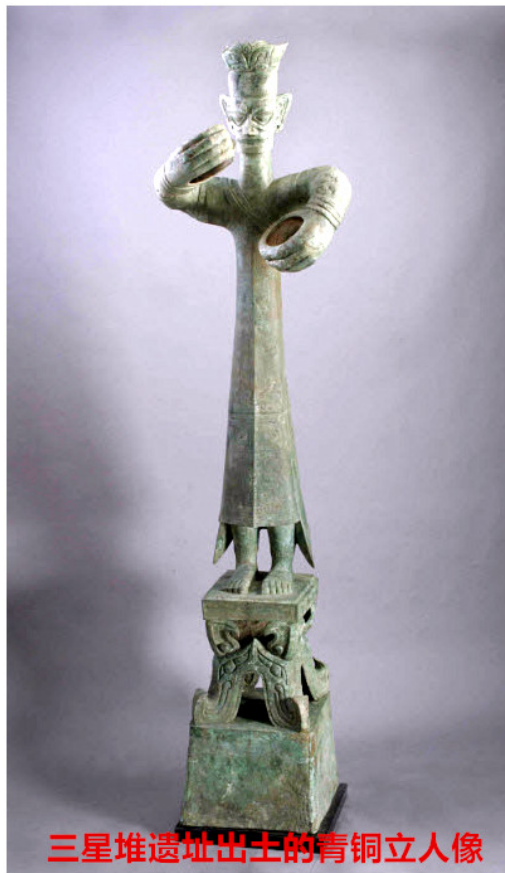
约公元前 2000 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了若干件原始的龙纹、龙形。如辽宁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达八千年的石砌龙和龙纹陶片，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距今近七千年的陶纹龙，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六千五百年蚌砌龙，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五千五百年的玉雕龙，内蒙古赤峰、辽宁辽西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五千年玉雕龙，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四千三百年彩陶盘龙纹等。这些原始的龙纹、龙形，与中华文明的起源至初成期相对应，是中华文明起源至初成期的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体现者

和标志者。

接下来，约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前 771 年，即中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三代，在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等材质上，有了更多的龙纹、龙形。如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龙纹陶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司母辛方鼎龙纹、妇好墓出土的玉雕龙、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尊龙纹，出土于陕西临潼零口西段村的西周利簋龙纹、出土于陕西宝鸡贾村塬的西周何尊龙纹等。这些龙纹、龙形，与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形成期相对应，是中华文明进一步形成期的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体现者和标志者。

考古工作者判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器属于该遗址的二三期，断代约为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前 1000 年，约相当于中原的夏、商、西周时期。龙形饰仅存头部，龙张口，上吻向后勾卷，龙角长而前伸，龙耳廓大。龙柱形器，上大下小，器顶平，一龙站于器顶，龙角后卷，龙口大张，垂须，下半身垂于器壁。龙虎尊之尊肩上，铸高浮雕呈蠕动游弋状三龙，龙头由器肩伸出，龙角为高柱状造型，龙眼浑圆；尊腹部主纹均为高浮雕虎与人。青铜神树之一侧有一条龙延主干旁侧自上而下作蓄势待飞状，龙身细长弯作 S 形，龙首昂起，龙角上扬，龙口大张。青铜立人像着左衽长襟龙纹上衣，衣右侧和背部饰阴刻龙纹，龙昂头张嘴，颌下有须，长颈，尾上翘。

比照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与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会发现：1. 细长、弯转的龙身基本一致，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之飞龙龙身，与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砌龙龙身、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彩陶盘龙纹龙身。2. 龙的头部取材于动物基本一致，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柱形器之龙头，与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砌龙之龙头；三星堆遗址三号坑新出土的“顶尊跪坐人像”之“龙身牛头”，与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玉雕龙之“龙身牛头”。由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比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晚出，故可做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承接、借鉴了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的判断。也即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产生的以龙为标志的文明，辐射、影响到了三星堆文明。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飞龙

比照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与中原夏、商时期出土的龙纹、龙形，会发现：1. 细长、弯转的龙身基本一致，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之飞龙龙身，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龙纹龙身；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虎尊龙纹，与安徽阜南出土的商代龙虎尊龙纹。2. 龙的头部取材于动物基本一致，且龙角耸扬、龙口开张的造型基本一致，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虎尊之龙首、柱状龙角，与安徽阜南出土的商代龙虎尊之龙首、柱状龙角；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柱形器、青铜立人龙纹之龙角后卷、龙口大张，与商代弋觚之龙角后卷、商代戊觚之龙口大张。鉴于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的祭祀坑之断代，与中原商代基本同时，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青铜器出土件数相对少、不成系统、没有祖型、精细程度相对不高，而商代龙纹、龙形青铜器出土件数相对多、成系统、有祖型、精细程度相对高，故可做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借鉴、学仿了中原商代龙纹、龙形的判断。也即商代产生的以龙为标志的文明，辐射、影响到了三星堆文明。

综上所述，可以有三点认识：第一，龙纹、龙形参与、见证，且一定程度上标志了三星堆文明的形成，生活在三星堆方圆的古蜀人也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第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承接、借鉴、学仿了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和中原夏商两代的龙纹、龙形。这便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说明了三星堆文明在形成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承接、借鉴、学仿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文明和中原夏商文明。第三，三星堆遗址在中国版图之内，三星堆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尽管三星堆文明有与中原文明相异的成分和特色、三星堆遗址及出土文物也还有不少谜团有待破解。

2.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风

2021年3月22日，考古工作者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提取出一批精美金器，一枚精美的“鸟型金饰片”首次正式亮相。相关介绍说，这枚鸟型金饰片，长约30厘米，宽约18厘米，厚仅0.12毫米，在目前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具有唯一性。初从祭祀坑里提取出来时，考古人员还以为只是个长条形的金饰，经过初步整形修复后，“展现出了凤凰、孔雀般的典型尾羽特征”；“这么薄的金器，一般不会单独使用，它有可能是敷贴在什么器物上作为装饰或者沿边镶嵌在里面”。



笔者仔细地察看了这枚金饰片，觉得可以将其直接称为“凤型金饰片”。

这里牵涉到凤的定义问题。

《说文解字·鸟部》对凤的解释是这样的：“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鹳颡鸳腮，龙文虎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从鸟凡声。”这个解释中有蛇、鱼、鹳、鸳鸯、虎、燕、鸡七种动物和龙、麒麟两种神物成为凤的取材对象。民间画凤、谈凤，有“锦鸡的头，鹦鹉的嘴，鸳鸯的身，大鹏的翅，仙鹤的腿，孔雀的尾”，“蛇头、龟背、鹰嘴、鹤腿、如意冠、九尾十八翅”等说法。这些说法，将《说文解字》释凤所涉及的动物之外的鹦鹉、鹤、大鹏（鹰）、孔雀等列入凤的取材对象。

借鉴上述说法，笔者给凤下了一个定义——

凤是凤凰的简称，是中国人对自然界中的鸡、鹰、燕、鸟、鹤、鹑、鸿、孔雀、鸵鸟等动物，和太阳、风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具备尖喙、双翼，大多有冠、有羽、有爪、有尾等形象特征，和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等精神蕴涵的神物；其实质，是对宇宙自然力的感悟、认知和神化。经过七八千年的演进、升华，凤与龙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

此定义中的“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这个“容合”，既是凤所具备的基本精神，也是凤所具备的基本特性。也就是说，只要具备“容合”特性，和“尖喙、双翼，大多有冠、有羽、有爪、有尾等形象特征”，且具有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等精神蕴涵者，我们都可将其称为“凤”。

考察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至夏、商、西周三代，出现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材质上的，被人们所称的风纹、凤形，会发现：形态上只要与自然界中某种具体鸟禽不能完全对应，兼容、包容、综合、化合了多种鸟禽和其它动物、天象等元素者，人们都将其以“凤”称之。也就是说，从形态上讲，凤是人们对自然界中多种鸟禽和其它动物、天象等元素的容合化、抽象化、艺术化、神物化。

以上述定义、观点，来看三星堆新出土的“鸟型金饰片”，会发现，其“鸟”与自然界中任何一种具体的鸟禽都对应不上，比如，其尾羽像孔雀的尾羽，但通体看显然不是孔雀。所以，笔者认为应称其为“凤型金饰片”，其形象，是三星

堆先民对包括孔雀在内的多种鸟禽和其它动物、天象等元素容合化、抽象化、艺术化、神物化的结果。

在“凤型金饰片”面世之前，三星堆遗址已出土为数不算少的所谓“鸟形器”“鸟纹饰”。这些所谓的“鸟形器”“鸟纹饰”，在笔者看来，在一定的程度上、数量上，都可以称为“凤形器”“凤纹饰”。因为，它们几乎都是对自然界中多种鸟禽和其它动物、天象等元素的容合化、抽象化、艺术化、神物化。比如所谓的“青铜鸟”，它们或有成排高扬的冠，或有上下分叉的翅，或有硕大上翘的尾：都不是对自然界中某种鸟禽形象直接地、简单地照搬。



三星堆出土青铜凤1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凤3



“凤形器”“凤纹饰”比较多地在三星堆遗址出土，说明什么问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把目光伸远一些——

约公元前 2000 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及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了若干件原始的风纹、凤形。如湖南洪江高庙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七千八百年的陶器风纹，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达七千年的象牙器风纹，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近七千年的陶器风纹，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小山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六千八百年的陶器风纹，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五千五百年龙凤璜，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五千年以上的玉凤，湖南澧县孙家岗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四千五百年的凤形玉佩，以及发现于山东昌乐的属于龙山文化的距今四千年以上的骨刻文凤字等。这些原始的风纹、凤形，与中华文明的起源至初成期相对应，和同时期的龙纹、龙形一起，成为中华文明起源至初成期的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体现者和标志者。

接下来，约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前 771 年，即中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三代，在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等材质上，有了更多的风纹、凤形。如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风纹，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凤、凤鸟负龙玉雕，湖南宁乡黄材乡出土的商代戈首风纹，陕西扶风白家村出土的西周凤纹丰尊，现藏上海博物馆的西周凤纹甲簋，等。这些风纹、凤形，与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形成期相对应，和同时期的龙纹、龙形一起，成为是中华文明进一步形成期的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体现者和标志者。

三星堆遗址的断代，最新的数据是 2021 年 3 月 24 日公布的，公元前 1199 年至公元前 1017 年，也即距今约三千二百年到距今约三千年。这个时间段，在距今约四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之后，故可以推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风形器、风纹饰，有可能受到高庙文化陶器风纹、河姆渡文化象牙器风纹、仰韶文化陶器风纹、凌家滩文化龙凤璜、石家河文化凤形玉佩等新石器时代风纹、凤形的影响，是对新石器时代风纹、凤形的传承、弘扬。

更要指出的是，距今约三千二百年至距今约三千年这个时间段，属于商代晚期。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风形器、风纹饰，与属于商代的风形器、风纹饰比照，会发现其造型、神态基本一致：都多为侧面形象，凤头上扬，胸挺，有冠，多耸

起，有翼，尾长而上翘；整体上看，都是对自然界中多种鸟禽和其它动物、天象等元素的容合化、抽象化、艺术化、神物化；而构图完整、装饰性强则是其共同特征。鉴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风形器、凤纹饰与商代晚期相对应，且比较零散、没有祖型、精细程度相对不高，而属于商代的风形器、凤纹饰成系统、有祖型、精细程度相对高，故可做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风形器、凤纹饰，学仿了商代的风形器、凤纹饰的判断，也即中原商代的风文化，传播、辐射、影响到了西南蜀地三星堆的风文化。

综上所述，至少可以有两点认识——

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风形器、凤纹饰，与该遗址出土的龙形器、龙纹饰一道，参与、见证，且一定程度上标志了三星堆文明的形成；而生活在三星堆方圆的古蜀人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作为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文明，三星堆文明无疑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故可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风形器、凤纹饰，与该遗址出土的龙形器、龙纹饰一道，参与、助力、见证、体现，且一定程度上标志了中华文明的形成。

二，三星堆先民即古蜀国人是盛行鸟崇拜、凤崇拜的，而且经历了一个由鸟崇拜升华到凤崇拜的过程。三星堆先民即古蜀国人崇拜鸟、崇拜凤，有可能受到了中原商朝的影响，也可能是其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精神的原因使其然。言其“有可能受到了中原商朝的影响”，是说商朝、商人是崇鸟、崇凤的，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言其“也可能是其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精神的原因使其然”，是说商周时期的古蜀国是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国，其疆域北达陕西汉中，南至南中（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东至鄂西清江。境内山林莽苍、河流纵横、食物丰足，是鸟类佳好的繁衍生息之地；而鸟类与稻作经济关系密切，是种子的传播者和节气的昭示者；自由飞翔的鸟儿又能给人们超越尘世、放飞精神的想象以参照、以象征。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是古蜀国五位有名的“称王者”，其中柏灌、鱼凫、杜宇三个，都是鸟名或与鸟有关——这也是古蜀国人鸟、凤崇拜的一个佐证。

3. 三星堆：太阳崇拜与凤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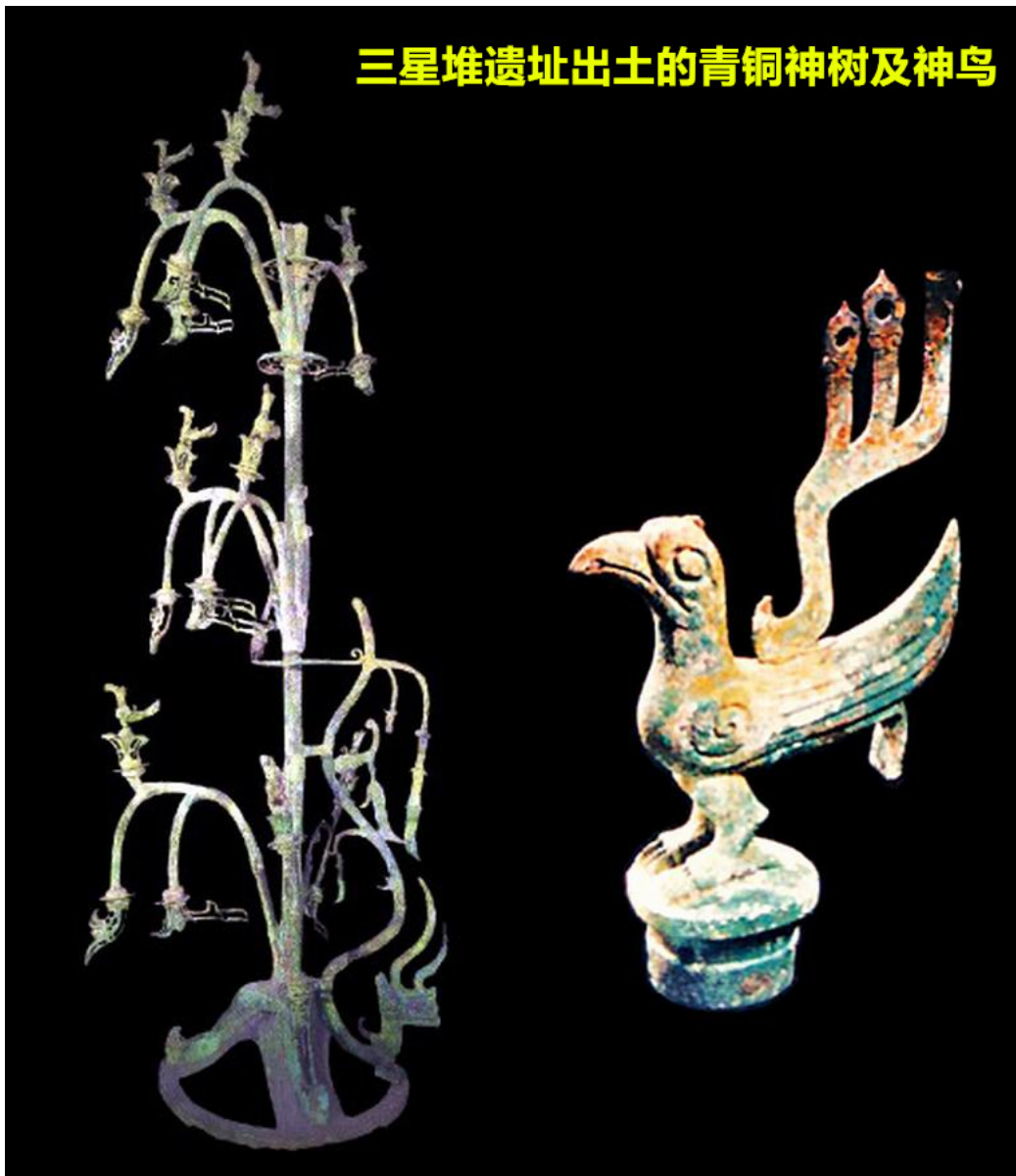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太阳轮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有六个汽车方向盘似的青铜太阳轮（也称“太阳形器”）。轮的中心凸起一个圆形，象征太阳；由圆凸中心伸出五条分枝，象征太阳光芒，亦将中心至外圈形成的圆面大体上均分；五分枝撑着一个圆形外圈，象征日晕。圆凸中心有一小孔，晕圈上与五分枝对应处也各有一小孔，合起来共六个孔，可能用于固定。青铜太阳轮可能是三星堆先民的祭祀用器，钉挂在墙壁上或某种物体上供人们膜拜。

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六株青铜神树。已修复的一株，其树枝分为三层，共栖落着九只神鸟，与《山海经·海外东经》里记载的“……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相吻合——因顶部出土时已断裂，尚未复原，推测还应有象征“一日居上枝”的一只神鸟。在中国上古的神话中，太阳是由“鸟”背着从东方的树上升起、落在西方的树上休憩，故神树与神鸟都是太阳的象征。再看这些神鸟，每只都呈昂头、瞪目、勾喙、扬翅、翘尾状，分明取材了鹰、鸟、杜鹃等多种鸟禽。笔者曾言：形态上只要与自然界中某种具体鸟禽不能完全对应，兼容、包容、综合、化合，即“容合”了多种鸟禽和其它动物、天象等元素者，都可以“凤”称之，故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上的神鸟，都可称为“凤”。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及神鸟



位于四川成都城西的金沙遗址晚于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是部分重叠和承继的关系。金沙遗址出土有被谓之“四鸟绕日”的金饰一件。此金饰的外廓呈圆形，图案分内外两层，都采用了透空的表现形式。在红色衬底上观看，该金饰内层图案很像一个旋转的火球或太阳；外层图案中的鸟很容易联想到神话传说中与太阳相关的神鸟。据此，有关专家将其定名为“太阳神鸟金饰”。研究者指出，太阳神鸟金饰以简练生动的图像语言，“透露了有关古蜀太阳神话传说的信息，记述了商周时期古蜀国极为盛行的太阳崇拜习俗”。其图案可分为内外两层，“内层图案中心为一镂空的圆圈，周围有十二道等距离分布的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

这些外端尖锐好似象牙或细长獠牙状的芒，呈顺时针旋转的齿状排列。外层图案是四只逆向飞行的神鸟，引颈伸腿，展翅飞翔，首足前后相接，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排列均匀对称。整幅图案好似一个神奇的水涡，又好像是旋转的云气或是空中光芒四射的太阳，四只飞行的神鸟则给人以金乌驮日翱翔宇宙的联想。”（黄剑华：《太阳神鸟的绝唱——金沙遗址出土太阳神鸟金箔饰探析》，《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1期）

2005年8月16日，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采用“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文物局的新闻发言人介绍说：“太阳神鸟金饰”是21世纪我国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其图案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像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其造型精炼、简洁，具有较好的标识特征，表达着“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和“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在笔者看来，“太阳神鸟金饰”就是“凤金饰”，因为“太阳神鸟”就是凤。之所以这样说——

第一，凤是凤凰的简称，是中国人对自然界中的鸡、鹰、燕、鸟、鹤、鹑、鸿、孔雀、鸵鸟等动物，和太阳、风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具备尖喙、双翼，大多有冠、有羽、有爪、有尾等形象特征，和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等精神蕴涵的神物；其实质，是对宇宙自然力的感悟、认知和神化。简言之，凤是中国人对自然界中多种鸟禽和其它动物、天象等元素的容合化、抽象化、艺术化、神物化。以此观点来看所谓的“太阳神鸟金饰”，会发现，其“鸟”与自然界中任何一种具体的鸟禽都对应不上，显然是对鹤、雁、天鹅等鸟禽的容合化、抽象化、艺术化、神物化。

第二，凤和太阳、凤崇拜和太阳崇拜具有难以割离的关系。在凤所具备的诸多神性中，向阳可排在第一位，所谓“丹凤朝阳”“凤鸣朝阳”。凤之所以有向阳神性，是因为凤的容合对象主要是鸟禽，而鸟禽绝大多数都是喜欢温暖、喜爱阳光的。有的鸟禽就直接被称为“阳鸟”或“阳禽”。《尚书·禹贡》提到古扬州时有“阳鸟攸居”之语。为什么称“阳鸟”呢？唐代学者孔颖达解释说：“日之行也，夏至渐南，冬至渐北，鸿雁之属，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日，阳也，此鸟南北与日进退，随阳之鸟，故称阳鸟。”阳鸟当然不仅鸿雁之属，如鸡，也是“火阳精物”，有“积阳”之象，民间有“太阳里有一只公鸡”之说。因此，太阳快出来的时候，鸡便有了“类感”，就特别高兴，喜于即将相见而振翅鼓翼，喔喔啼鸣。所谓“嚶嚶司晨鸣，报尔东方旭”（唐·李益《闻鸡赠主人》）。再如鸟，也是“日禽”“阳鸟”“阳精”，所谓“乌在日中”“日中有三足乌”。为什么两只足的乌鸦到了太阳里，就变成“三足”了呢？古人认为，奇数属阳，偶数属阴，“二”是阴性偶数，和“阳鸟”的称号不相吻合。因此就添上一足，由二而三，由偶而奇，让其成为“阳数”，所谓“三阳开泰”。总之，鸟禽们一个个都那么喜欢太阳，凤作为它们的代表，又怎能不“向阳”呢？于是，可以说：凤就是太阳鸟，太阳鸟就是凤。

据此，笔者认为，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金饰图案，实质上是一幅“四凤绕日图”。

由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太阳轮、青铜神树，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四凤绕日金

饰可以看出，三星堆先民是崇拜太阳的，古蜀国是流行太阳崇拜的，而且，三星堆先民已将太阳崇拜与凤崇拜结合在了一起。

太阳崇拜属于自然崇拜范畴，是原始人最基本的崇拜之一。太阳出来，光芒万丈，世界一片亮堂，太阳落山，万物隐形，世界一团漆黑。有了太阳才有了白昼和黑夜的分别与更替，有了太阳才有了源源不断的取之不尽的温风和暖气，在古人心目中，太阳显然是能给世间带来光明和温暖的神灵了。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产食、养食性经济逐步取代了采食、猎食性经济，太阳同人们的关系就更直接、更密切了。万物生长靠太阳。阳光足够且适度，谷物和牧草茁壮成长，丰收有望；阳光不足，稼禾萎靡，造成减产；阳光过量，禾苗又会晒旱而死，导致绝收。即使成熟的谷物，也要在阳光下碾打晒干才便于收藏，否则，就会霉烂变质。

但是，太阳并不总是按人们的意愿运行的，阴雨连绵，需要它出来晒一晒，它却总是躲在厚厚的云层后面不肯露脸；干旱少雨，需要它隐去的时候，它却依然当空普照，撒下如火的光焰。还有更邪乎的事情，明明晃晃照得正好的时候，却忽然间就一点一点地黑了，直把这个世界变成夜晚一般。一会儿过后，又一点一点地亮了，直到完全恢复光明。

这一切，在古人眼里都是神秘的、使人惊奇的甚至是令人恐惧的。神秘、惊奇和恐惧，构成了将太阳神化起来，进而崇拜起来的基础。

太阳崇拜在世界各民族中普遍存在，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可以说阳光照耀到什么地方，太阳崇拜就出现在什么地方。古代中国当然不会例外。不少古籍文献，如《山海经》《楚辞》《国语》《淮南子》中，都有关于太阳神话的记载。全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有关文物，都证明着中华民族崇拜太阳的历史。

而崇拜太阳，必然会崇拜凤；崇拜凤，也必然会崇拜太阳。其原因，笔者前面已讲过：凤就是太阳鸟，太阳鸟就是凤；太阳崇拜与凤崇拜是互相渗透、彼此结合、相生类同、难以分离的关系。

古人将凤与太阳放在一起崇拜的情形，已得到考古发现的有力佐证。新石器时代，湖南洪江高庙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就有凤纹与太阳光芒纹在一起的图案；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双凤朝阳纹”——两只凤头相对，供护着

一轮蒸腾着烈焰的太阳；同遗址出土的“双头凤纹”——两只凤体相连，头相背，太阳位居中心；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的“鹰（凤）猪（龙）八角星纹”玉质组合件，其八角星纹处圆圈之中，象征太阳。

商朝人也是崇拜太阳的，所谓“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也。”（《帝王世纪》）夏桀不敬太阳，《尚书·汤誓》便言：“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郭沫若曾根据殷墟甲骨文的记载指出：“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殷人于日，盖朝夕礼拜之。”（《殷契粹编》）商人同时又是崇拜鸟、崇拜凤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的传说，使商人将祖先和神鸟，也即凤联系起来。于是，凤的形象，就屡屡地出现在商代的青铜器、玉器上，如父乙簋凤纹、殷墟妇好玉凤，等等。

这样看来，三星堆先民崇拜太阳，古蜀国流行太阳崇拜，且将太阳崇拜与凤崇拜结合在一起，是自然的、不奇怪的。因为，如上所述，农业文明与太阳崇拜、凤崇拜是分不开的，也即从事靠天吃饭的农耕，必然要崇拜太阳、崇拜凤。农业是三星堆先民的生活依赖，是古蜀国的立国基础，故三星堆先民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自然会崇拜太阳、崇拜凤；古蜀国作为中华大地上的一个地方王国，自然会流行太阳崇拜、凤崇拜。再者，三星堆先民崇拜太阳，古蜀国流行太阳崇拜，且将太阳崇拜与凤崇拜结合在一起，也可能是受到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高庙文化、河姆渡文化、凌家滩文化，和中原商代文化既崇拜太阳，也崇拜凤，且将太阳崇拜与凤崇拜结合在一起的影响。

4. 三星堆：龙凤同体

媒体报道，2021年9月11日，考古工作者从三星堆3号坑提取出一件造型新颖独特的青铜器。该器的主体是一个昂首挺胸四肢着地的猛兽形象，头上有一根夸张的犄角，爪子有一些类似于龙，但尾巴却又像鸟，考古人员猜测是否会是“龙凤合体”。

龙是中国古人对蛇、鳄、蜥、鱼、鲛、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雷电、星宿、龙卷风等自然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一种神物，具有喜水、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是龙的主

要容合对象，因此，龙有“鳞族之长”“众兽之君”之称。凤是中国古人对鸡、鹰、燕、乌、鹤、孔雀、鸵鸟等动物，和太阳、风等自然现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一种神物，具有向阳、达天、秉德、兆瑞、示美、喻情等神性。长羽毛和翅膀的鸟禽是凤的主要容合对象，因此，凤便登上了“羽族之长”的宝座，有“百鸟之王”之称。



作为源远流长、蕴含丰富的文化现象，龙凤携手走过了至少八千年的漫长岁月。考古发掘出土的属于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的龙凤，其相依相伴的情形，大体上可作四类划分：龙凤同时；龙凤同地；龙凤同器；龙凤同体。

龙凤同时，是说龙凤同时起源。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龙纹，出土于辽宁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断代在公元前 6000 年左右；最早的风纹，出土于湖南洪江高庙文化遗址，断代在公元前 5800 年左右；二者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而且差不多是同时、同步的。

龙凤同地，是说龙凤出土于同一个地方。其典型者，如出土于辽宁辽西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断代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的玉雕龙和玉雕凤；出土于湖南澧县孙家岗石家河文化遗址，断代在公元前 2400 年左右的龙形玉佩和凤形玉佩；出土于属于龙山文化区域的山东昌乐，断代在公元前 2200 年左右的骨刻龙字、凤字；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断代在公元前 1200 年左右的玉雕龙和玉雕凤。龙凤同地，意味着龙凤同时。

龙凤同器，是说龙凤出土于同一个器物上。其典型者，如出土于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断代在公元前 5000 年左右的龙凤纹陶壶；出土于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小山赵宝沟文化遗址，断代在公元前 4800 年左右的龙凤纹陶尊。2020 年 7 月 28 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在三星堆古城东北侧约 8 公里的一处古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阴刻有龙凤纹的陶盖。陶盖顶部，一只有羽冠的凤鸟昂首立于中央；盖顶边缘，一条有龙角、龙须、龙爪的动感十足的游龙盘旋于凤鸟的周围。此文物也属于龙凤同器。龙凤同器意味着龙凤同地、同时。

龙凤同体，是说龙凤组合成一个形象出土。其典型者，如被判断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期，断代在公元前 3900 年左右的龙凤同体纹彩陶盆；出土于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址，断代在公元前 3400 年左右的龙凤璜；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断代在公元前 1200 年左右的凤负龙玉雕和凤顶龙玉饰。这次三星堆出土的龙凤同体青铜兽，也大体上可断为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同时代，即公元前 1200 年左右。龙凤同体意味着龙凤同器、同地、同时。

包括古蜀国先民在内的中华先民为什么要让龙凤两种神物同时、同地、同器、同体呈现呢？对这个问题可用十二个字回答：沟通天地、和谐阴阳、强化功能。龙的生物类容合对象，主要是能在水中潜游的鳄、鱼、鲛和能在地面上跑卧的猪、鹿、熊、牛、马，以及两栖的蛇、蜥蜴等，总之都只是生活在大地上的动物，可象征、代表“地”。凤的生物类容合对象，主要是既能在地上跑卧、又能（或者说尤其能）在空中飞翔的鸟类，可象征、代表“天”。而在古人的直观感悟中，

天与地是相通的：比如天上的雨下落到地上便是水，地上的水蒸发到天上便是云；而相通的天地，对古人的生产、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如何表达对天地相通的理解呢？或者说如何沟通天地呢？古人想到了能够飞天的羽翼类动物的代表凤，和能够游水行地的鳞、毛类动物的代表龙，认为让二者同时、同地、同器、同体呈现，就能表达沟通天地之意。

阴阳是中国古典哲学最早出现的范畴。阴代表暗淡、消极、退守、柔弱、雌顺等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物象，阳代表光明、积极、进取、刚强、雄健等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物象。古人认为，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发展，有赖于阴阳之间的对应、互渗、消长、交融和变化，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传》）、“阴阳交感，化生万物”（《朱子语类》）。

对包括古蜀国人在内的中华先民而言，阴阳当是他们对天地、日月、昼夜、寒暑、阴晴、水火、山泽、男女、雄雌等两两对应又相互联系的自然现象的感悟。在先民心目中，阴阳和谐，则风调雨顺，生活相对好过；阴阳不和谐，则风不调雨不顺，甚至多灾多难，生活就难过。于是，先民们就希望阴阳能够和谐。让龙凤同时、同地、同器、同体，就是这种希望的形象化。

需要指出的是，秦汉以前的夏、商、周，甚至更早，龙因其容合对象多是喜水的蛇、鳄、蜥、鱼等鳞类动物而主要代表阴，凤因其容合对象多是向阳的鸡、鹰、燕、孔雀等羽类动物而主要代表阳。龙偏重代表阳、凤偏重代表阴，是由秦汉开始，以龙喻比男性帝王、以凤喻比女性后妃之后的事。

强化功能，是说让龙凤同时、同地、同器、同体呈现，意味着强强联合，组合彰显，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龙凤所具备的通天、征瑞、秉德、示美、喻情等神性，和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等精神蕴涵，会因为二者同时、同地、同器、同体呈现而得到强化。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刊于《西安日报》2021年5月6日第8版；《三星堆：龙凤同体》，刊于2021年10月10日《西安晚报》第6版“文化纵横”；《太阳崇拜与凤崇拜》，刊于《神木》杂志2022年第3期）

龙与帝王

秦汉以后，龙的身上开始具有可以比附、象征人间帝王皇权的神性。其原因，盖由于经过几千年的吸纳、综合、演进，到此时，龙的形象已趋于成熟，龙身上所具备的种种基本神性已经强大且彰显，这些基本神性和“帝王性”多有吻合之处：龙潜飞自如，无挂无碍，自由来去于昊天潢池，自然而然地就充当起天地间的信使：既可直达天廷，向天帝报告人间的情况；又可以从天廷下来，传达天帝的旨意。帝王称“受命于天”，是天的儿子，代天帝而管理人间。于是，龙的通天的神性和帝王们代天牧民的帝王品格在这儿扣在一起。于是，帝王们都成了“真龙天子”。龙有兆瑞的神性，是能够给天下人带来好处的神物。帝王们也都认为自己的君权是神授的，自己是人民的大救星，肩负着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使命，具备着布德于四方，施惠于万民的神力。因此，帝王们差不多都感觉良好，认为自己的王道德政，和龙的吉祥嘉瑞是一致的，同功同能的。龙还具备着善变、显灵、示威的神性，它时而怪诞，时而灵异，潜显无时，变化莫测，也有发威迁怒、张牙舞爪、凶恶狰狞的一面：这一切都是帝王们所需要的。

龙明确地成为人间帝王比附、象征的对象，大约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秦始皇嬴政因其得罪了六国贵族而有“今年祖龙死”（《史记·秦始皇本纪》）之咒，“祖”有“始”的意思，“祖龙”，即“初始的龙”“第一个龙”。汉高祖刘邦为了实现君临天下的理想，编了一个自己是“真龙天子”的神话：“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通。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史记·高祖本纪》）从此，大凡想做帝王的人，都效法这位“始作龙者”，编造出了各式各样的“帝王龙”神话。如王莽要“当仙成龙”，汉光武帝“梦骑赤龙”，南朝宋武帝见“五色龙章”，唐太宗有“龙凤之姿”，等等，直到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还做了一回恢复帝制的“金龙”之梦。

元、明、清三代明文规定了皇帝对龙纹，尤其是五爪大龙的垄断权，龙遂被

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出现了因僭用龙纹、触犯“龙颜”，被重罪处罚，甚至丢掉脑袋的事件。如乾隆年间，清廷观天象的人忽然发现天上的紫微星暗淡了——这是有人要篡夺皇位的征兆。巫师们紧张地卜算了一番，算出此人在东南方向，即山东曲阜一带。最后经过确认，定在孔子的第六十九代孙孔继涑身上。乾隆皇帝立即派人赴曲阜查抄孔继涑的家。查抄者发现其家堂屋屋脊九间连在一起，这当然是犯禁的，即令立刻拆断。接着又去挖他的祖坟，发现其父母墓室左右各埋着一条像龙的大虫子，每条都缺一只爪。巫师解释说，只待龙爪生长齐全，孔继涑就要篡夺帝位作“真龙天子”。于是，孔继涑一下子变成罪人，孔氏家族也赶快将其开除出族籍。孔继涑后来发愤研究书法，曾有法帖行世，晚年病死在北京。这位圣人后裔死后身上还背着山一样重的罪名，棺材朝家乡运的时候，也要锁一道铁链，再锁一道铁链，再再锁一道铁链，而且不准埋进孔林。

认为龙是帝王皇权的象征，进而认为龙是农耕文明，即黄色文明的象征，和以工业化、信息化、民主化为特征的当代文明格格不入，应该被列入批判、抛弃的对象。——这是全盘否定龙文化者的主要观点。

不错，在中国漫长的阶级社会里，龙的确是帝王皇权的象征，这当然是需要认真分析清理，但是：1，龙起源于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是原始先民对身外自然力感悟、认知、神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劳动人民就把龙创造出来了。帝王皇权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龙的出现自然与帝王皇权无干。2，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龙身上具备着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遂被帝王们看中，拿去做了自己的比附象征物。随着帝王从历史舞台渐次退出，龙也就失去了象征帝王皇权的意义，遂以吉祥物的面貌和身份，回到了劳动人民中间。3，即使在阶级社会，龙在象征帝王皇权的同时，也没有和劳动人民断绝关系。事实是宫廷有宫廷的龙，民间有民间的龙；帝王贵胄戴龙冠，穿龙袍，坐龙椅，乘龙辇，平民百姓属龙相，玩龙灯，划龙船，喝龙茶，打龙拳；两种龙尽管有交错、有互渗，却也同时并进了数千年。4，还应当指出，龙作为帝王皇权的象征，对龙的地位的提升、影响力的扩大、世界各国对龙的了解和认识有正面作用，并非一无是处。

将龙和当代文明对立起来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龙是一个象征符号。所谓象征，一种情形，是以 A，代表、比喻、暗示 B；另一种情形，是以 A，代表、

比喻、暗示 B、C、D、E、F、G……。龙属于后一种情形。也就是说，将龙可视为 A，帝王皇权可视为 D，除 D 之外，前面还有 B、C，后面还有 E、F、G……。我们不能因为它代表、比喻、暗示了 D，就连 B、C、E、F、G……也同 D 一块抛弃。很多象征符号都不是封闭的、僵化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我们中华民族创造、选择龙（当然还有凤）这样的象征符号，花了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漫长时光，它凝结着、寄托着亿万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想，体现着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心理认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和情感纽带。如果谁能创造出一个新的能让海内外华人都认可的象征符号，来代替龙，从理论上讲，当然可以，问题是至今还没有出现。

2008 年奥运会吉祥物设计组的某专家曾提出“中国龙过于威严，缺乏亲和力”的观点。龙的确有威严的一面，但也有和悦喜庆的一面。从远古到当今，威严的缺乏亲和力的龙有，和悦的不乏亲和力的龙也有——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见到过许多和悦可爱的新龙形象，如中国建设银行的“龙博士”、河南濮阳的“世纪新龙”、陕西西安大唐芙蓉园的吉祥物“龙龙”等。而且，对艺术造诣高深、思想观念也能与时俱进的中国艺术家，设计出吉祥和悦的、新颖独特的龙的形象当不算什么难事。所以，以“中国龙过于威严，缺乏亲和力”为由，将龙排除在奥运吉祥物之外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龙是一个凝结着中华文化精华从而魅力无穷、具有广阔开放的襟怀从而新新不已的系统，是可以涵纳、容合各种文明的全色彩象征，也是一种包括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在内的全时态象征。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基本精神没有过时，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现代化建设，以及当代人的精神和生活依然有积极的、正面的意义。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努力找到古老的、传统的龙文化同当代社会的共通点、贯穿线、结合面，从而给这个得到广泛认同的、不可多得的文化符号注入新颖鲜活的内容，如生态龙、科技龙、民主龙，等等。

（刊于《长安大学报》2006 年 3 月 30 日）

龙与帝的千年情缘

龙起源于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或者更早。进入阶级社会后，龙的通天神性和帝王们代天牧民的品格联系在一起，便有了“真龙天子”一说。汉高祖刘邦是第一个将其出身与龙联系在一起的皇帝；汉宣帝刘询是第一个以龙为年号的皇帝；元成宗铁穆耳限定五爪龙为皇家专用，从此，五爪龙成为皇权的独特符号。

龙与古代帝王的结合，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在《周易》。《周易》的第一卦为乾卦，其卦辞中有“初九：潜龙，勿用”“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句。一种理解认为：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yǒu）里时，是“潜龙勿用”；其子周武王灭商而登天子之位，是“飞龙在天”。后世遂以“龙潜”喻指帝王未即位时，以“龙飞”喻帝王的兴起或即位。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镇出土了一件西周前期的盛食器——利簋。该器腹内底有铭文三十二个字，记述了周武王伐商获胜的史实，为商周断代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标本。该器圈足饰有夔（kuí）龙纹，反映了西周崇龙的情况。

古代帝王穿龙袍的讲究，大概就是从周朝开始的。《礼记·礼器》载“天子龙衮”，而衮（gǔn）是古代帝王的朝服，上绣龙纹。

“龙种”刘邦

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时候，“真龙天子”的神话第一次见诸于史。

《史记·高祖本纪》记述，刘邦是江苏沛县人，其父人称刘太公，其母人称刘媪（ǎo）。早年，刘媪曾经在大泽的岸边休息，梦见自己与神相遇，当时电闪雷鸣，天地昏暗。刘太公前去看望老伴，发现有蛟龙在刘媪的身上。之后，刘媪就有了孕身，生下了刘邦。刘邦这个人，“隆准而龙颜”，即天生一个高鼻子，一

副龙的相貌（后世遂以“龙颜”称皇帝的面貌、表情）。

刘邦是将其出身与龙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个皇帝。从此，后世帝王纷纷效法刘邦，编造各种各样的龙神话，将自己包装成“真龙天子”。

到了刘邦的六世孙汉宣帝刘询执政期间，即公元前 49 年，“黄龙”被立为年号，这是龙与皇权正式结合，即龙文化成为官方文化、制度文化的起始标志。

盘龙镜

到了唐代，龙与皇权的关系日益密切。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唐太宗李世民和他身边的谋士们也曾编造过龙的神话。《旧唐书·太宗本纪》说李世民诞生之时，“有二龙戏于馆门外，三日而去”，这便将李世民和龙联系在了一起。又有相面先生放言，说李世民具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



存世的盘龙镜，是大唐时代龙文化的见证。史料记载，唐玄宗将自己的生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在这天的庆典活动中，其中一项即是大臣们向皇帝敬奉铜镜和皇帝向四品以上的大臣们颁发铜镜，铜镜的规制和图案也有严格的等级区别。

第一种是天子镜，以正面的龙头吞珠为纹饰；第二种是王公镜，纹饰是侧身的龙，龙头侧转；第三种是大臣镜，颁发给宰相以上的官员，纹饰为双鸾、花蕾和宫灯；第四种是赐给武官的，是以麒麟和燕鹅为主的对称图案。将天子镜的纹饰定位在正面龙饰，以区别于王公镜和大臣镜，由此可见，龙之地位愈见凸显。

中国语言中，将皇帝车驾称“龙驭”，将皇帝用床称“龙床”，将皇帝后代称“龙孙”等，均起自唐代：白居易《长恨歌》中有“天旋地转回龙驭”；冯贽《云仙杂记·龙床》记“韩志和有道术，宪宗时，献一龙床，坐则鳞、鬣（liè）、爪、角皆动”；温庭筠《昆明池水战》中则有“赤帝龙孙鲜甲怒”之句。

独衷五爪龙

12 世纪后半叶，蒙古族崛起于漠北草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国，经过三代人的奋战，至其孙忽必烈时，灭亡南宋，统一中国，定国号为“大元”，定国都于燕京，即今天的北京。

元世祖忽必烈喜欢汉文化，施政多采用“汉法”，对龙也是情有独钟。出于抬高身价的需要，他不但穿龙袍、坐龙椅，还下令对龙纹进行垄断。

帝王穿龙服，传说自尧舜始，至晚在周代已成形制。不过，从周代到宋代，不光帝王穿龙服，王公大臣们也可以穿龙服，忽必烈首开垄断龙纹之先河。至元七年（公元 1270 年），忽必烈明文规定市街商店不得织造或贩卖有日月龙凤纹的缎匹，违者除没收缎匹外，还要“痛行治罪”。二十七年之后，忽必烈的孙子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将限令更加具体化，限定五爪龙为皇家专用。从此，五爪龙成为皇权的独特符号。

到了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时，除蒙古人外，其他人“不许龙凤纹”，此外，还规定器皿、帐幕、车舆等都“不得用龙凤纹”。这里讲的龙纹，指的依然是“五爪二角者”。

元代统治者尽管三令五申，对龙纹，尤其是“五爪二角”龙纹进行垄断，但实际上，执行得并不严格。

元代的龙纹玉器、瓷器，宫廷所用者，有五爪的，也有四爪、三爪的；民间所用者，三爪四爪之外，也有五爪的，只是数量比较少而已。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玉镂雕花草龙纹带饰，其龙纹就是五爪；而该院收藏的云龙纹兽环玉壶，其颈部的云龙纹则是三爪龙纹，两物都是元代皇室用器。

被特权化的龙

元之后的明清两代，龙的皇权特色进一步强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皇帝对龙特别敏感，发生了因龙治罪的案例；二是宫廷建筑、服饰、器物等大量用龙。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起于乡野，可称之为“草蟒”。经过南征北战，一介“草蟒”变成了坐天下的“真龙”，这就有了一个身份认可的问题。于是，在自卑和自尊之间“蹦极”的朱元璋对龙格外敏感，生怕有人对他这条“龙”不认可、不敬重。于是，明文规定：“官吏衣服、帐幔，不许用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凤纹，违者罪及织造之人。”老百姓取名，也不能出现“龙孙”字样。

洪武年间，画家盛著奉旨为南京天界寺影壁作画，他精心画了一幅《水母乘龙图》，本想邀赏，不料朱元璋看后大怒，认为此画是以“龙被女人所乘”来奚落、讽刺他这位“真龙天子”，遂以“不称旨”罪名，将盛著“弃市”，即在人群集中的地方处以斩首之刑，并将其首高悬于市。

而在宫廷中，龙的形象大行其道，更是有充分的物证。以已经发掘的明定陵为例，足以见得龙之大获帝心。皇帝的龙袍就不必说了，它的主体图案就是十二个团龙；皇帝的帽子，叫做“金翼善冠”，冠的上方饰有两条对称的五爪金龙，作二龙戏珠状；皇帝坐的自然是“龙椅”，在定陵玄宫的中殿摆放有汉白玉雕琢的皇帝“神座”，“神座”正中雕刻的就是龙头；而在“神座”的前方，有盛油以供长明灯的青花云龙纹大瓷缸。此外，皇帝用的金酒注、金爵杯、金托盆、痰盂、香囊、带钩、梅瓶、香炉等等，都多用龙纹。如金酒注的注体上遍刻云龙花卉纹，注腹两侧各镶以白玉雕成的盘龙；金爵杯的爵腹外壁压刻半浮雕式的二龙戏珠及海水江崖流水纹饰，三足及二柱各刻龙首纹。



夫贵妇荣，皇后也有使用龙纹的权利，如孝靖皇后棺内出土了一件罗地刺绣百子女夹衣。该衣纹样以云龙百子为主题，衬以海水江崖、山石、树木、花卉，前后襟均绣二龙戏珠，两袖也绣龙戏珠，龙纹皆系五爪大龙，以金线盘绣而成。该衣绣技高超，做工精致，凸显皇家特色。同时，孝靖皇后棺内还出土了凤冠三项，一项是“三龙三凤冠”，一项是“六龙三凤冠”，一项是“九龙九凤冠”，上面都饰有金龙，且均在翠凤之上。这样的形制，自然有龙辖凤、凤从龙的寓意。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宫廷内的各种用具、器物，多以五爪龙纹为主图案。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剔彩龙纹长方盒，盒正中开光，锦地下陷，内雕五爪坐龙，龙二目圆睁，张口露齿，双臂高擎寿字盘，属万历时期雕漆的标准作品。

到了清代，五爪龙纹更成为皇家的特权。这样的龙纹，基本上已成清代皇家龙纹的固定图案。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佚名画家绘的《乾隆皇帝朝服像》，画上的乾隆身着五爪龙纹袍，龙纹多达几十条。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绘有《乾隆大阅图》，图上乾隆所穿戴的盔甲，也是绣五爪金龙。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传为乾隆帝大婚时所用的门帘，上绣五爪升龙。五爪升龙纹还出现在乾隆帝的皇后所穿的袍服上。

清代皇家用龙，具有高、多、全、丽的特点：“高”指作为皇帝的象征，高高在上、高不可攀；“多”指多得不可胜数；“全”指造型要素齐全，全到了繁复、甚至累赘的程度；“丽”指追求装饰化、图案化效果。

故宫：无处不龙处处龙

北京故宫，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帝王的皇宫，也是集龙最多的地方，真所谓“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无处不龙处处龙。

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故宫三大殿之一。殿正中，有象征帝王权威的金漆雕龙宝座，俗称“龙椅”。宝座两侧有六根漆金沥粉的盘龙大柱，顺着龙柱朝上看，宝座顶上，有一口藻井，一条巨大的浮雕蟠龙雄居藻井中央，作腾云飞升状。蟠龙的嘴中衔有一枚外涂水银的玻璃大宝珠。这宝珠号称“轩辕镜”，又名“避尘球”。由于采用了透雕等手法，龙头探出，龙须飘起，稍有清风，宝珠便微微晃动，与井口四周的十六条小金龙相映生辉，遂成故宫第一绝：藻井蟠龙。

故宫第二绝是那块最大的丹陛云龙石雕。石雕，长近 17 米，厚近 2 米，宽 3 米多，重约 250 吨。四周刻缠枝莲花纹，下部为寿山福海纹，中间是九条蟠龙戏珠于突起的朵朵瑞云之中。瑞云缓缓流动，蟠龙雄健逼真，堪称我国古代石雕艺术的瑰宝。据说这块整体石料，采自距北京一百多华里的房山县。当年的工匠民夫，为了输运巨石，从石窟到京城每隔一里就挖井一口。寒冬腊月将井水汲上来泼成冰道，用旱船将巨石一步一步地拉进宫中，其情景之艰难，可想而知。

三大殿外的台基分上中下三层，每层之间以龙墀(chí)相叠连。太和殿有 1460 根望柱，望柱下面伸出 1442 个螭首。螭是无角的龙。每逢雨天，螭首嘴里泄下一条条连珠状的白色水线；如果雨大一些，连珠状的白线就变成一道道喷玉溅珠的白练。千龙吐水，白练飞悬，蔚为壮观。这便是故宫第三绝：龙墀白练。

故宫皇极殿门前还耸立着一座九龙壁。该壁建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 1772 年），是一座长 20.4 米、高 3.5 米的高大的琉璃照壁。壁正面饰有九条戏珠巨龙，皆五爪。与大同、北海九龙壁的浑厚古朴、粗犷豪放的风格不同，故宫九龙壁以龙身婀娜、纤细玲珑为特色。

属于故宫正门的天安门城楼也是一座“龙楼”。楼上有 932 条彩绘金龙；

大殿内的天花板上有卧龙、行龙、腾龙、飞龙、团龙等 1700 多条，千姿百态，神采万方。天安门前的华表上也盘升着庄重神气的汉白玉雕龙。



在中国漫长的帝制社会里，帝王与龙结了两千多年的情缘。作为帝王皇权的象征，龙、尤其是五爪大龙，的确起过为皇权统治壮胆效力的作用，同时，因为龙成了帝王皇权的象征，对龙的地位的提 升、影响力的扩大、世界各国对龙的了解和认识有了正面的作用。随着帝王从历史舞台退出，龙作为帝王皇权的象征也相应地成为历史，今天的龙，多以民族象征、文化标志、吉祥瑞符的身份出现。

（刊于《中国之韵》2012 年第 1 期）

龙与佛教

公元前 3 世纪，也就是中国的两汉时期，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开始向东方各国传播。和原始宗教关系密切的中国龙，这时候又开始容合来自域外的宗教因素。佛教传入以前，中国本土有龙神但没有龙王，龙王名号的出现与佛经的传入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是佛经的广泛传布，与中国人崇龙、尊王心理的交融互渗，尤其是主政帝王对龙王的诏封，共同导致了龙王在中华大地上的滥觞和兴盛。从中国民间流传的有关龙王，以及龙母、龙女的传说故事中，也能看到佛经故事的影响。龙的造福众生的精神与佛的拔苦救难的理念的相通和一致，构成了龙文化与佛教文化容合的基础。

但有证据表明，佛教中的龙是由中国传过去的，经过印度人的再创造，成为龙王后，又随着佛教的东传，反馈回中国的。其理由如何星亮先生分析，如——

中国已出土距今八千年左右的辽宁阜新查海石块堆砌龙，其它如河南濮阳西水坡蚌砌龙、内蒙古赛沁塔拉玉雕龙、湖北黄梅焦墩卵石摆砌龙，等，也都在距今五千年以上。而据目前所见的印度龙的最早考古资料是公元前 1 世纪的见于阿旃陀石窟的壁画《龙王及其家族》和纪元前后的《龙族向菩提树礼拜》，比中国的辽宁查海龙晚了大约五千年。

中国在三千五百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了“龙”字和祭祀龙神的记载，而印度有关龙的文字记载最早是龙树于公元 2 世纪左右写的《智度论》，距今只有一千八百年左右。

据考古资料，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石器文化就传播到西藏及其以南地区。这便为龙文化经西藏传入印度，提供了可能。还有，据记载，中原王朝早在三千多年前就与西域有过接触，传说周代早期已有移民到达葱岭以东地方。商灭夏之后，一部分崇拜龙神的夏人徙往西北地区，到达甘肃等地之后，继续西迁，进入西域的焉耆国。到晋代时，这支东来的龙族部落成为该国的统治者，且以“龙”

为姓。中国本土的龙文化由他们带入西域是无需怀疑的。

梵文中，起初只有“象”而无“龙”，雷电是骑白象的大神因陀罗手持雷凿造成的。后来，因陀罗被东来的中国龙取代，成为风雨雷电的主宰神。于是，表示“象”的词又来表示“龙”，“龙”“象”合而为一。

在鸠摩罗什翻译的《妙法莲花经》里，龙王共有八位。他们是：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娑伽罗龙王，和修吉龙王，五德义迦龙王，阿那婆达多龙王，摩那斯龙王，优钵罗龙王。到了《华严经》里，龙王增至十位。在其它佛经里，还有五龙王、七龙王、八十一龙王、一百八十五龙王之说。佛经中的龙王功能有二：一是护持佛法，导佑众生；二是兴云布雨，消灾弥难。这后一条与中国龙兴云布雨的神职相吻合。

龙王在佛教中地位不高，有时候在天神之列，如“天龙八部”中的“龙众”；有时候在诸鬼之列，如“八部鬼众”中的“诸龙”。不管是“天神”还是“诸鬼”，位置都在佛、菩萨、罗汉之后。这种佛大于龙的情况，也传到了中国。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如果出现有龙有佛的情况，多为佛治龙、佛胜龙，或佛感龙、佛助龙。

昆明市拓东路地藏寺有一座被称为“滇中艺术极品”的石雕经幢。民间将这座经幢称作“压龙经幢”。据说昆明从前是个龙窝，金汁河里的小金龙是条孽龙，专干为害老百姓的坏事。地藏寺的莽和尚决心治服小金龙。他以招收徒弟为名，贴出告示，小金龙果然变作一个小伙子前来应召。莽和尚让小金龙挑水，趁其不备，一把掌将其打入井中，顺手拿过一个蒲团盖上。随后又使法将蒲团变成了这座经幢。这是“佛治龙”。

山西省介休县城南的绵山因春秋时的介子推宁肯烧死也不肯下山的故事而闻名。绵山有许多胜景，抱腹岩可列第一。相传抱腹岩原名五龙山，山上住着五龙娘娘和她的五个儿子。唐朝初年，有个姓田的秀才，出家数年修炼成佛，见五龙山风景殊丽，就搬来居住。五龙娘娘爱下棋，天天与田秀才对奕，却总是输棋。时间长了，就将五龙山抵给了田秀才。五位龙子闻知后大怒，欲推倒五龙山将田秀才压死。不料田秀才有佛祖保佑，法力无边，双手撑住了大山。这样一推一撑，挺拔的山峰就变成弯腰状的“抱腹岩”了。据说岩壁上至今还有巨掌的痕迹。这是“佛胜龙”。

安徽省青阳县的九华山，位列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人称“仙城佛国”，是地藏菩萨的道场。化城寺东的东崖峰西麓，有一眼“龙女泉”。相传地藏菩萨在这儿苦修时，每天都要到山下去打水，很不方便。有一天，地藏端坐在东崖峰西麓一块岩石上静修，忽然被一条小蛇咬了一口，地藏不为其所动。过了一会儿，一个漂亮女子出现在地藏面前，向他赔礼道歉，并说地藏所坐的岩石下有泉眼。地藏用锡杖拨开岩石，果然发现泉水。原来这位漂亮的女子是一位龙女，被地藏精心苦修的精神所感动，前来献泉的。这是“佛感龙”。



关于桂林山水的由来，有这样的传说：在秦始皇当政的时候，东海龙王的三公主到南海拜见观音菩萨，途中看到成千上万的民夫累死累活地抬石头修长城，顿起怜悯之心。到南海见到观音后，就请求观音救救修长城的众生。观音给这位好心肠的龙女一支柳条，让她把南海中的石山赶去修墙，并叮嘱她路上不要贪玩，

不要和凡人说话。于是，龙女挥动柳条，南海中的石山便接二连三地跳出水面，变成虎、豹、象、马、鹤、鸡等各种活蹦乱跳的动物。龙女就用柳条赶着它们向北走。走啊走，几天后，走到了一个江水清秀、风景优美的地方。龙女想到江边梳洗梳洗，可那些动物却越跑越快。这时候，一个头戴风帽、身披大袍的老公公迎面走来，龙女忘了观音菩萨的嘱咐，就请老公公帮忙看管一下这群动物。老公公揉了揉眼睛，说：“哪里有什么动物？明明都是些石头山嘛！”老公公一语道破，这些动物立马变成了真的石山，再也不会走了。龙女见状，只好叹息一番，将这些石山托给老公公照看，自己到南海向观音菩萨请罪去了。这边老公公精心照管石山，天长日久，自己也变成了石山，这便是有名的老人山。老人山周围那些像老虎、像大象、像鹤、像鸡的大小石山，据说都是龙女当年从南海赶来的。这是“佛助龙”。

龙王成为中国龙族成员后，被迅速中国化，其标志，一是被纳入属于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系统，成为玉皇大帝的部下；二是受讲伦理、重道德的儒家文化的影响，有了家族、家庭、辈份，表现出浓郁的人间情感，且有善恶好坏之分；三是受帝王龙的提携，地位逐步得到提高。如在一些石刻、石窟造像中，龙的地位，由起初的佛菩萨的乘骑、保镖和门神，即工具龙和龕梁龙，逐步向居于中心位置的盘柱龙，和居于窟顶的藻井龙过渡。至盛唐时期，在构图、造型、色彩等方面，藻井龙已在佛像之上。



（刊于《长安大学学报》2006年3月15日）

龙象腾骧

象是陆地上体形最大的动物。有亚洲象和非洲象两种。亚洲象主要分布于南亚、东南亚诸国及中国云南等地。因印度是象的主产国之一，印度人也喜爱和崇拜大象，于是人们就用象来比喻和代表印度。如将中国与印度的全面经贸合作喻为“龙象共舞”或“龙象赛跑”等等。

象进入龙的多元容合过程是不存在疑问的。其生物根据是中国的云南出产大象，古代的中原也有大象，先民们完全有可能将象纳入龙的容合过程。其文化依据是象音谐“祥”，因而常被用来寓意吉祥。如传统吉祥图案中的《吉祥如意》：以手持如意的童子骑象组成，象征吉庆、平安、万事顺利；还有《太平有象》：一头大象，驮一宝瓶，以瓶谐“平”。另外，一些地方的人们，还以大象象征威武雄壮，象征和平谦逊，象征父母大人，象征五谷丰收，象征猪肥牛壮，象征万象更新，当然，也象征无常的暴风雨，等等。阿昌族人民还将青龙白象作为吉祥幸福的象征，每逢节庆，都要舞“青龙白象”。而象被龙作为取材对象的证据，便是从商代开始，龙的家族里出现了象鼻龙。——象的主要体征是生有圆筒状且伸卷自如的长鼻，象鼻龙即在已有的龙身上加以长鼻而为龙。

在印度梵语中，象最初被称作“那伽”（Naga）。后来，“那伽”又被用来表示“龙”。于是，在佛教中，“龙”与“象”合二为一。佛陀的罗汉弟子中，凡是修行勇猛、有最大力者，释尊即称他们为“龙象”。如旧译《华严经》卷七：“威仪巧妙最无比，是名龙象自在力。”《大智度论》卷三：“那伽，或名龙，或名象，是五千阿罗汉，诸阿罗汉中最大力，以是故言如龙如象。水行中龙力大，陆行中象力大。”可见，佛教中的“龙象”，是修行最好者、功力甚大者的喻称，说这些高僧大德，既如龙，也如象。

佛教传入中国后，“龙象”一词也传了进来。其用法，多是继续作高僧大德们的喻称，也兼用作对出家人的尊称，如说某某高僧为“法门龙象”。《华严经》

里有“欲做诸佛龙象，先做众生马牛”的偈语，其意思和人们常说的“要做人上人，先吃苦中苦”差不多。

佛教密宗有“龙象般若功”，据说此功源自西域密宗，有不同层次。相传练到第十层，每举手投足间就有“十龙十象”之大威力，发一招即可致对手于死地。又据说此功传至兽王派时威力稍减，但又被融入了禽兽灵通之术，具备超自然的能力，甚至能改变自身形态，如变熊、变鹰进行战斗，奇妙处另人叹为观止。这样的传说，吻合龙的“善变”的神性，而熊、鹰等兽禽，也都在龙的容合对象之列。

对“龙象”的另一种解释，是“龙”是用来修饰“象”的，如《维摩经·不思议品》有“譬如龙象蹴踏”一句，僧肇注释道：“象之上者，为龙象也。”嘉祥对此作疏云：“此言龙象者，只是一象耳，如好马名龙马，好象云龙象也。”也就是说，在僧肇和嘉祥二位老先生看来，龙象还是象，但不是平常一般的象，而是上品象、好象。

耸立于南宁青秀山风景区的龙象塔，其得名就取意于“水中龙力，陆上象力”——可见此塔与佛教的广泛传播有关。此塔为广西群塔中最大的名塔，修于明代万历年间，为南宁市淡村人萧云举所建。整座龙象塔为八角形重檐九层塔式砖结构，气势宏伟。为了不给侵华日军轰炸南宁提供导航目标，1938年8月，国民党桂系政府下令拆除龙象塔。1986年，南宁市人民政府于拨款重建龙象塔。今天人们看到的龙象塔是参照广西桂平市东塔的式样，保持了明代建塔的风格。谈“龙象”不能不说说广西南宁的五象岭。关于五象岭的得名，《南宁府志》云：“武号山，在城南十里，山势雄峻，拱向城廓，为邕之砥障，五峰相倚，如五象饮江，故名五象岭，为八景之一。”南宁市别名“五象城”，也是因五象岭而得名。

关于五象岭，民间相传，秦始皇当年为了治理南方的水患，把岭南的五头宝象赶来，以堵住洪水，永保平安。五头大象在临近南宁的时候便停步不前了，秦始皇用手去拍大象的屁股，却拍了个空，不禁大怒而醒，原来是一场梦。梦醒后的秦始皇半信半疑，就派大臣去南方打探，不料南边果然多了五座如大象的山。从此以后，南宁这块地方的水患减少了，五象岭成了人们心目中保护南宁的吉祥形象。

从神话象征学的角度考察，这则传说给我们提供了可资进一步索解、推衍的信息：象具有平定水患，保佑一方平安的神性和神职，而这样的神性和神职，历来都是龙所具备并承膺的。龙的神性和神职由象具备并承膺，说明此象已经不是一般化的平凡之象，而是具有龙性之象，或者竟是神龙所化身之象。也就是说，这些前来治理洪水、福佑地方的象，本质上是龙，不过是吸取了象之大力，并化作或借助了象的外形而已。

据此，我们可以将“龙象”理解为“龙纳象力”——龙吸纳了象的大力，其形象化的表现便是“象鼻龙”——象之大力主要通过其长鼻表现出来；和“内龙外象”——本质上是龙，担当的是龙的职责，做的是龙的事情，但其外形还是大象。

（刊于《教师报》2006年8月23日；收入《龙子龙孙龙文化》，庞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



水陆庵里的龙

水陆庵位于陕西蓝田县城东 10 公里的普化镇王顺山下，以保存着古代精巧罕见的三千七百多尊彩塑而闻名，有中国第二敦煌之誉，是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 世纪 80、90 年代，我曾两次到水陆庵参观，发现其壁塑群中，有龙的形象。只是都因时间紧促，未及细察。丙申仲春，参加“陕西散文家走进美丽蓝田采风活动”，第三次到水陆庵参观，时间相对宽松，就比较仔细地察看了壁塑群中的龙形象。

水陆庵中的龙雕塑大者有五处：1. 大殿中阁正壁释迦牟尼坐像头上方的韦驮乘龙；2. 北壁间正中表现释迦牟尼出生故事的双龙浴佛；3. 北壁间西侧释迦牟尼与龙王相对而立；4. 中隔正壁背面观音菩萨盘龙底座；5. 南壁间正中释迦牟尼涅槃雕塑下佛弟子乘龙像。上述之外，水陆庵中还有不少比较小的龙雕塑，大多分布在佛菩萨像的底座上。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其初始的典籍中有梵文名曰“Naga”的神物。这 Naga 的主要取材对象是蛇，因而形象似蛇，长身无足，居住在地下或水中。由“Naga”衍生的一个词叫“Nagaraja”。Nagaraja 也是 Naga，但比 Naga 功能强一些、地位高一些，在地下或水中往往称王为尊。据考证，在佛教创立之前，印度的神话传说中就有了 Naga 和 Nagaraja，它们具有神性，拥有神奇的力量，能够幻变为人形，有自己庞大的家族，居住在环境优美的宫殿里。佛教产生之后，佛经的撰编结集者就将 Naga 和 Nagaraja 的传说故事在进行了加工和再创作之后，纳入了佛经之中。

公元前 3 世纪，也就是中国的两汉时期，佛教开始向东方传播。翻译佛经的高僧都是一些对中印文化通晓或有所了解的人，这些人发现佛经中的 Naga 和中国本土中的龙，形象相仿、功能接近，于是，就将 Naga 译作“龙”，将 Nagaraja 译作“龙王”。——有观点称，古印度的 Naga 文化，有可能是受到了来自中国

的龙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因为从时间上看，中国的龙文化比古印度的 Naga 文化早了几千年。

龙、龙王在佛教中地位都不高，有时候在天神之列，如“天龙八部”中的“龙众”；有时候在诸鬼之列，如“八部鬼众”中的“诸龙”。不管是“天神”还是“诸鬼”，位置都在佛、菩萨、罗汉之后。

在佛教中，龙、龙王的一个主要功能是护法或协助护法。中国的佛教寺院中一般都有韦驮像，这个韦驮，本是婆罗门教的天神，后来被佛教吸收为护法诸天之一。相传释迦牟尼圆寂后，曾有一个罗刹鬼乘机盗走佛牙舍利，是韦驮见状奋起，将舍利追回。于是韦驮赢得诸天众王的赞扬，认为其有驱除邪魔、保护佛法的本领。在中国佛教寺院中，韦驮一般被安置于天王殿的大肚弥勒背后，背对山门，面朝大雄宝殿。而水陆庵中的韦驮，则被置于释迦牟尼头顶上方，且让一条神龙来协助。

佛教中的龙王，还被认为与佛祖有关。《佛教的故事》里讲，在释迦牟尼由净饭王的妻子摩耶夫人右肋降生时，曾有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在虚空中喷出清淨香水，一温一凉，灌洗太子。浴佛节就由此而来。水陆庵北壁间正中那两条张着大口由上而下的龙，就是对这个说法的艺术再现。

和中国本土龙兴云布雨的神职是相一致，佛教中的龙、龙王也有兴云布雨的职能。《华严经》称，诸位无量龙王，“莫不勤力兴云布雨，令诸众生热恼消灭”。佛经中有一部《佛说十善业道经》，是释迦牟尼给海龙王讲如何修行“十善”的经。水陆庵北壁间西侧释迦牟尼与龙王相对而立，释迦牟尼站得比龙王高出半头，龙王身体前倾面向佛陀：佛陀是在给龙王布置兴云布雨的任务，还是在宣讲经文？耐人寻味。

水陆庵中隔正壁背面观音菩萨盘龙底座，和南壁间正中迦牟尼涅槃雕塑下佛弟子乘龙像，以及作为韦驮坐骑的龙，其龙都是工具性的。这种现象，不光在水陆庵，在其它佛寺里，尤其在年代早一些的佛教建筑里也多如此。这样的情形，后来受中国的帝王称龙比龙的影响，有所改变。在一些石刻、石窟造像中，龙的地位，由起初的佛菩萨的乘骑、保镖和门神，即工具龙和龕梁龙，逐步向居于中心位置的盘柱龙，和居于窟顶的藻井龙过渡。至盛唐时期，在构图、造型、色彩等方面，藻井龙已在佛像之上。敦煌莫高窟中的龙图像就表现出这样的趋势。



龙王与佛陀（陕西蓝田水陆庵泥塑）

宗教因人类要解决终极需要即“我要到哪里去”而出现。佛教给出的方案，是经过皈依和修行，“往生”天界（或称“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水陆庵里的龙，表现的是龙如何协助佛菩萨等到人间弘法，对龙和“往生”的关系没有说明。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黄帝乘龙、颡顼乘龙、神人仙家乘龙等等说法。乘龙到哪里去呢？上天。如此这般，给我们就有启发了：龙是沟通有限与无限的中介，可以为中国人解决终极需要提供“载体”和“出路”。

（2016年4月28日于西安龙凤院）

龙之福生与全真道之济世

福生，即造福众生，是龙的基本精神之一。

龙是中华先民经过对自然界中诸多动物和天象“多元容合”而创造的神物。中华先民创造龙的目的，就是要在敬畏自然力的基础上，理解、利用、改造自然力，让自然力与人的创造力相结合，从而为以人类为主体的众生服务，即福生。如果不能福生，先民创造龙就失去了意义。

古往今来，龙的身上都一直体现着福生的精神。作为水利神、农业神，龙是造福众生的；作为祖先神、人格神、民族神，龙更是造福众生的。

王重阳曾言其创立全真道的目的是“普济群生，遍拔黎庶”（《三州五会化缘榜》）。他要求教徒们“方便救度一切众生”（《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谭处端要求同道“常行矜悯提贫困，每施慈悲契下殃”（《水云集·赠韩家郎君在家修行》）。全真道的戒律、道规中有“不得欺罔老幼”“不得惊怖老少”（《中极戒》）“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长春真人规榜》）等要求。而丘处机更是一个既有言又有行的“普济群生”的模范。饥荒、战乱年间，丘处机告诫弟子们要“立观度人，时不可失”（《大都清逸观碑》）；指令用全真道观所积备的余粮赈济灾民；又劝说山东农民起义军与官兵和解，以避免血腥的杀戮；尤其是金元年间，不惜以七十多岁的高龄，爬山涉水，西行觐见成吉思汗，建言“止杀”，使无数生灵免于涂炭。

龙之福生，是人间福生思想和福生行为的反映，全真道的济世思想和济世行为无疑是人间福生思想和福生行为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重阳、丘处机、谭处端等全真道的诸位领袖，都堪称“人间福龙”，他们创立的全真道也堪称“福生道”。

有些人否认普世价值。其实普世价值是有的，这便是我们讲的“福生”，也就是全真道讲的“济世”。为什么福生会成为普世价值呢？因为世界是由众生组成的，没有众生，就无所谓世界。古往今来，人们的一切活动，其根本目的，都

是为了福生。也就是说，福生是带有根本性的价值所在。福生的事情做得越多，价值越大。相反，如果祸生、害生，那么，产生的就是负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是讲福生的。全真道的济世思想之外，还有“民惟邦本”“仁者爱人”“民贵君轻”“兼爱非攻”“民胞物与”，以及“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人民为中心”，等等。

“福生”是任何朝代、任何国家的老百姓和领导者都必须关心和着力解决的问题。发展到今天，“福生”问题已经全球化，且具有严重性和迫切性。也就是说，当今的“福生”，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团体、一个宗教、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全人类的事情。恐怖犯罪、核扩散、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传染性疾病，等等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都需要全世界人民携起手来，通力合作，才能解决。

所以，我们说福生精神具有影响和范导现实的功能——这应当也是我们今天开这个会，来讨论和弘扬全真道济世思想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此文是作者 2009 年 11 月 19 日，在陕西宾馆举行的“全真道济世思想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





李白诗的龙情结

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余光中《寻李白》）被后人誉为“诗仙”。

在《李白诗全集》中，有“龙”的诗句共一百九十九条，涉及到龙文化的各个方面，如：直指“神物龙”的“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赠崔侍郎》）“海若不隐珠，骊龙吐明月”（《赠僧行融》）；描写“山水龙”的“杨花满江来，疑是龙山雪”（《题瓜州新河，钱族叔舍人贲》）、“风吹绕钟山，万壑皆龙吟”（《金陵听韩侍御吹笛》）；喻指“人杰龙”的“得水成蛟龙，争池夺凤凰”（《拟古十二首》）、“龙虎方战争，于焉自休息”（《商山四皓》）；言称“工具龙”的“举手何所待，青龙白虎车”（《早望海霞边》）、“百川随龙舟，嘘吸竟安在”（《赠僧朝美》），等。

但是，在《李白诗全集》涉“龙”诗句中，出现比较多的，要数以“攀龙”“龙飞”“龙颜”“龙鳞”等表现出来的“帝王龙”，达二十句。——这可以说是李白“龙”诗的第一个特点。如：“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梁甫吟》）“陛下应运起，龙飞入咸阳。”“跪双膝，立两肘。散花指天举素手。拜龙颜，献圣寿。”（《上云乐》）“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猛虎行》）“天子龙沉景阳井，谁歌玉树后庭花。”（《金陵歌送别范宣》）“一遭龙颜君，啸吒从此兴。”（《赠新平少年》）“惟昔不自媒，担簦（dēng）西入秦。

攀龙九天上，忝列岁星臣。”（《赠崔司户文昆季》）。

这些诗句表明，李白有浓厚的“帝王龙”情结。“帝王龙”情结换个说法就是“攀龙意识”，即通过献身皇家、结附帝王以建立功业、实现生命价值最大化的意识。在《赠张相镐二首（时逃难在宿松山作）》中，李白将自己的“攀龙意识”讲得很明白：“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富年颇惆怅。世传崆峒勇，气激金风壮。英烈遗厥孙，百代神犹王。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龙颜惠殊宠，麟阁凭天居。晚途未云已，蹭蹬遭谗毁。……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六合洒霖雨，万物无凋枯。”“一生欲报主，百代思荣亲。其事竟不就，哀哉难重陈。”还有《赠溧阳宋少府陟》：“李斯未相秦，且逐东门兔。宋玉事襄王，能为高唐赋。……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

在京城长安受到挫折后，李白有些消沉，“白玉栖青蝇，君臣忽行路。”（《赠溧阳宋少府陟》）“攀龙忽堕天，还家守清真”（《留别广陵诸公》）。但他没有死心，想着还有实现理想的机会。“遂令世上愚，轻我土与灰。一朝攀龙去，蛙黾安在哉”（《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何日清中原，相期廓天步。”（《赠溧阳宋少府陟》）

李白“龙诗”的第二个特点，是借用龙的“好飞”“通天”的神性，和自由往来昊天潢池的本领，抒发超越尘俗的浪漫情怀。如：“浮云蔽颓阳，洪波振大壑。龙凤脱罔罟，飘摇将安托。”（《古风五十九首》）“骑龙飞上太清家，云愁海思令人嗟。”“乘鸾飞烟亦不还，骑龙攀天造天关。”（《飞龙引二首》）“海凌三山，陆憩五岳。乘龙天飞，目瞻两角。”（《来日大难》）“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玉浆倘惠故人饮，骑二茅龙上天飞。”（《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蹶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我知尔游心无穷。”（《元丹丘歌》）“六驳食猛虎，耻从弩马群。一朝长鸣去，矫若龙行云。”（《送张秀才从军》）“谬忝燕台召，而陪郭隗踪。水流知入海，云去或从龙。”（《江上答崔宣城》）读这些诗句，我们能感受到李白纵横无羁的思绪，和随手拈来、妙语喷涌的才华；仿佛看到，诗仙已经如神龙般在浩渺的云海里飘飘遨游了。

（刊于《西安日报》2022年9月15日）

杜甫诗与龙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被后人誉为“诗圣”。

在《杜甫诗全集》中，有“龙”的诗句共七十九条，这些诗句所指称、喻比、象征、修饰的物象人事比较丰富，有“人才”“名胜、山水”“帝王”“龙的某种容合对象”“神物”“骏马”“纹饰、形象”“宝剑”“体态”“舟楫”等类别。

通过检索、梳理，笔者发现杜甫诗——

第一，涉及人才的“龙”句比较多。如“门阑多喜色，女婿近乘龙”（《李监宅》）、“凤穴邹皆好，龙门客又新”（《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干戈虽横放，惨澹斗龙蛇”（《喜晴》）“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奉赠严八阁老》）、“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紫宸殿退朝口号》）、“渥洼骐驎儿，尤异是龙脊”（《送李校书二十六韵》）、“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遣兴五首》）、“天用莫如龙，有时系扶桑”（《遣兴五首》）等，说明杜甫比较看重龙喻人才的功能。

第二，涉及帝王的“龙”句也不少。如：“五圣联龙袞，千官列雁行”（《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上韦左相二十韵》）、“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哀王孙》）、“讎归龙凤质，威定虎狼都”（《行次昭陵》）、“元帅归龙种，司空握豹韬”（《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漫焚香”（《曲江对雨》）、“鹤禁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洗兵马》）等，说明杜甫也有“帝王龙”情结。笔者讲过，“帝王龙”情结就是“攀龙意识”，即通过献身皇家、结附帝王以建立功业、使自己的生命价值最大化的意识。在《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中，杜甫生动地回忆他接受玄宗皇帝朝见的情景：“去岁兹辰捧御床，五更三点入鹓行。欲知趋走伤心地，正想氛氲满眼香。无路从容陪语笑，有时颠倒著衣裳。”“忆昨逍遥供奉

班，去年今日侍龙颜。麒麟不动炉烟上，孔雀徐开扇影还。玉几由来天北极，朱衣只在殿中间。”有心情，有场面，有细节，眼中所见，鼻中所闻，耳中所听，都历历如述。

在帝制时代，包括诗人在内的文化人，其生命的主要价值，是要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的。“修身”“齐家”自己多少可以把握，“治国”“平天下”离开了帝王和朝廷，就无从展开和实现。所以，中国古代的文化人是不可能摆脱帝制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文化人要摆脱“帝王龙”情结即“攀龙意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区别只在于强弱重轻。比如杜甫和李白，都有“帝王龙”情结，但李白的“帝王龙”情结就比杜甫的“帝王龙”情结重得多。杜甫只是“捧御床”“侍龙颜”，李白则是：“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梁甫吟》）“跪双膝，立两肘。散花指天举素手。拜龙颜，献圣寿。”（《上云乐》）“一遭龙颜君，啸吒从此兴。”（《赠新平少年》）“攀龙九天上，忝列岁星臣。”（《赠崔司户文昆季》）“龙颜惠殊宠，麟阁凭天居。”（《赠张相镐二首》）李白有“济苍生，安社稷”的伟大抱负，其理想，是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萧何、诸葛亮、魏征之类的人物，至少也应当成为太师、太傅、太保之类的“帝王师”。可尽管李白心机多费、才华多显，算是得到了一个比以唱歌、跳舞供皇帝消遣的优伶强一点的“翰林供奉”的位置，却难得久长，最终落了个离京流浪、颠沛至死的结局。正因为杜甫的“帝王龙”情结比李白轻，故杜甫因“攀龙”不得而造成的失落感也就比李白轻了。

第三，杜甫写给李白或写到李白的诗共有十余首，其中三首写到了“龙”：“深山大泽龙蛇远，春寒野阴风景暮。”（《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此句中“龙”指的江河中的鳄类。全句写孔巢父和李白已超脱尘世，深山大泽中的鳄蛇之类已伤害不到了。“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梦李白二首》）此句中的“龙”也指水中的鳄类。全句旨在表达对李白的关心和提醒。“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句中的“龙舟”是摆渡工具，全句是说李白做了翰林供奉后，忙于在宫廷应酬。

第四，与李白“龙”诗表现出来的超拔、浪漫、奇幻等相比，杜甫的“龙诗”相对“实在”一些，这当与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有关。在李白诗中，龙是诗人潇洒飞天、遨游云海的依凭者、助力者，所谓“骑龙飞上太清家”（《飞龙引二

首》)、“身骑飞龙耳生风”(《元丹丘歌》)等。甚至可以说,龙在一定程度上已是李白的化身,即“龙是我”“我是龙”。而在杜甫诗中,龙只是诗人描写的对象,即“我是我”“龙是龙”“龙非我”“我非龙”,所谓“龙门横野断,驿树出城来”(《龙门》)、“徘徊虎穴上,面势龙泓头”(《寄赞上人》)、“停骖龙潭云,回首虎崖石”(《发同谷县》)、“长淮浪高蛟龙怒……南有龙兮在山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等。



(2022年10月18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苏轼与龙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的诗词文章中多有涉及龙的语句。《苏轼集》中涉“龙”语句达八百一十三条，限于篇幅，本文只选苏轼创作的诗歌《起伏龙行（并叙）》，和发生在苏轼身上的“乌台诗案”作以简析。

《起伏龙行（并叙）》：“徐州城东二十里，有石潭。父老云与泗水通，增损清浊，相应不差，时有河鱼出焉。元丰元年春旱，或云置虎头潭中可以致雷雨，用其说，作《起伏龙行》一首。何年白竹千钧弩，射杀南山雪毛虎。至今颅骨带霜牙，尚作四海毛虫祖。东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碧潭近在古城东，神物所蟠谁敢侮。上欹苍石拥岩窦，下应清河通水府。眼光作电走金蛇，鼻息为云擢烟缕。当年负图传帝命，左右羲轩诏神禹。尔来怀宝但贪眠，满腹雷霆暗不吐。赤龙白虎战明日（是月丙辰，明日庚寅），倒卷黄河作飞雨。嗟吾岂乐斗两

雄，有事径须烦一怒。”

苏轼这篇《起伏龙行（并叙）》，描写了江苏徐州一带民间曾经流行的一种用虎头骨求雨的习俗。这种习俗唐代就已出现。在唐人李绰撰写的《尚书故实》一书中，就有记载：“又南中久旱，即以长绳系虎头骨投有龙处。入水，即数人牵制不定。俄顷云起潭中，雨亦随降。龙虎敌也，虽枯骨犹激动如此。”这种习俗产生的原因，是人们认为龙和虎是仇敌，一旦相遇，就会发生争斗；争斗中龙会发怒，从而倒海翻江，降下雨来。

苏轼以其卓越的文学天才，生动地描述了这种习俗。一开笔，就以夸张的艺术想象，写出了参与习俗的主角之一：虎。什么虎呢？“南山雪毛虎”。怎么得来的呢？用“何年白竹千钧弩”射杀的。目前是何状况呢？“至今颅骨带霜牙，尚作四海毛虫祖”。接下来该另一位参与习俗的主角——龙出场了。写龙之前，先写为什么要“起伏龙”。“东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看看，已旱到了何种程度！“东方”“千里赤”“行人口生土”：一句宏观、概览，一句微观、细描。有了这两句铺垫，下面的“碧潭近在古城东，神物所蟠谁敢侮？上倚苍石拥岩窦，下应清河通水府”就很自然了。龙出场了，此龙非同寻常！“眼光作电走金蛇，鼻息为云擢烟缕”。形象很厉害吧。不光形象厉害，资历也厉害：“当年负图传帝命，左右羲轩召神禹”，曾经为远古帝王伏羲、轩辕黄帝和大禹负过图、传过命、效过劳呢！然而，也许是功劳太大了，有些居功、摆谱了：“迩来怀宝但贪眠，满腹雷霆暗不吐”。怎么办？以白毛老虎来刺激你、激怒你！“赤龙白虎战明日，倒卷黄河飞作雨。嗟吾岂乐闻两难，有事径须烦一怒”，你怒了，迎战了，就会出现“倒卷黄河飞作雨”的壮观场面，人们求雨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发生，苏轼是此案首当其冲的被告，蒙难四个月零十二天，险些丢掉性命。案情大略是：其时朝廷御史台官员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中，有讥讽朝廷新政、诽谤皇帝的内容。于是，苏轼被逮捕，关在御史台监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故称“乌台”。

在御史台官员搜集、整理的关于苏轼所谓“罪行”的材料中，有一首《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此诗中出现了“蛰龙”二字。

全诗为：“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译成白话：“凛凛然两棵古桧相对，谁也不敢欺负谁；树干笔直耸向高空接近流云，却并未想标新立异。它们的根深扎到九泉之下，也直直的不弯曲；当然，这情景只有潜伏在地下的蛰龙才知悉。”

显然，这是一首咏物抒怀诗。苏轼在诗中以桧喻人，旨在歌颂挺拔不屈、刚正不阿、通达磊落的优秀品格。

但苏轼没有想到，有人竟然借此诗大做文章，指控他有不臣之意。《宋史·卷十二·下》：“……元丰中，轼系御史狱。上本无意深罪之。宰臣王圭言苏轼有不臣意，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咏桧，何预朕事？’圭语塞，遂薄其罪。”

王圭的意思是：“皇上是飞龙在天，苏轼却装着不知道，反而去求地下的蛰龙，这不是想造反是什么？”好在神宗皇帝的脑子还没有进水，回应王圭说：“人家苏轼在咏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

多亏神宗皇帝在此事上还算清醒，使王圭的挑拨、陷害没有成功，也使苏轼的这句“蛰龙”诗，最终没有在中华“文字狱”的历史上留下恶名。

关于乌台诗案及“蛰龙”，《宋史演义·第四十一回 奉使命率军征交趾蒙慈恩减罪谪黄州》有一段文学性的记述：“会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劾奏知湖州苏轼怨谤君父，交通戚里，有诏逮轼入都，下付台狱。……同平章事王雱（pāng），闻神宗有赦轼意，又举轼咏桧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二语，遂说他确系不臣，非严谴不足示惩。神宗道：‘轼自咏桧，何预朕事？卿等勿再吹毛索瘢哩。’文字不谨，祸足杀身，幸神宗尚有一隙之明，轼乃得侥幸不死。”

《宋史演义》中的这段记述，比《宋史·卷十二·下》的相关记载详细、生动了些，尽管“宰臣王圭”变成了“平章事王雱”。尤其是“卿等勿再吹毛索瘢哩”一语，令笔者有了点赞的冲动。

宋人王巩《闻见近录》载：“王和甫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欲覆人’

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这些记述说明，宋神宗及其身边有公正心肠的大臣，对龙的象征的多义性是了解的、清楚的。也就是说，宋代的精英们知道、明白：龙非帝王所独专，龙没有被帝王垄断，龙不光可以象征帝王，还可以象征人臣、人杰，以及天象、物象、事象，等等。

上述之外，苏轼还被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称为“人中龙”。据北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中记：“舒王在钟山，有客自黄州来。公曰：‘东坡近日有何妙语？’客曰：‘东坡宿于临臯亭，醉梦而起，作《成都圣像藏记》千有余言，点定才一两字。有写本，适留船中。’公遣人取而至。时月出于东南，林影在地，公展读于风檐，喜见眉须，曰：‘子瞻，人中龙也！’”这段话中的“舒王”是王安石的封号，“公”是对王安石的敬称。

（刊于《陕西工人报》2022年7月12日）



龙行江湖：以《水浒传》为例

龙文化广泛地渗透、融会于物质器用、习俗仪规、观念理论等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广义的“江湖”，多指非官方非主流的民间社会；狭义的“江湖”，一般指民间社会的某个群体或组成部分。显然，龙文化毫无疑问地会与“江湖”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江湖文化中一定会有龙文化的参与和表现。

将讲述北宋山东梁山泊以宋江为首的绿林好汉，由被迫落草，发展壮大，直至受朝廷招安、东征西讨故事的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归入“江湖小说”，朋友们大概不会有异议。

那么，龙在《水浒传》这部主要江湖小说中有哪些表现呢？“江湖”一词，常常和“好汉”一词联用，谓之“江湖好汉”。“好汉”，一般指勇敢坚强、敢做敢为的仗义男子，其同义词有“英雄”“豪杰”等。那么，江湖好汉就指的是在江湖上行走、闯荡的好汉、英雄、豪杰。龙是多种动物和天象的容合，这些动物和天象代表着强大的自然力，故，如果要将龙的诸多神性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这个字就是“力”，力量的“力”，威力的“力”。江湖好汉之“好”，在于其勇敢坚强、敢做敢为、行侠仗义，这些品性，离不开一个“力”字，也都要靠“力”来支撑。于是，以“力”为基础、为媒介，龙与江湖好汉就有了“梦与枕头”般的合作：江湖好汉与龙相互借力、获力、增力、彰力、显力。

在《水浒传》中，龙与江湖好汉的合作，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一是名字、绰号直接用龙。绰号也称浑号，起一个不同凡响的绰号，且以绰号相称，是汉代以降江湖上流行的习尚。《水浒传》中有一百零八位好汉，其中名字、绰号直接用龙者有五位：入云龙公孙胜，九纹龙史进，混江龙李俊，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间接涉龙者有八位：出洞蛟童威（蛟为龙族神物），火眼狻猊邓飞（狻猊为龙生九子之一），井木犴郝思文（犴即狴犴，龙生九子之一），玉麒麟卢俊义、铁笛仙马麟（麒麟为龙族神物），两头蛇解珍、白花蛇杨春（蛇

有小龙之称，龙的主要取材对象），旱地忽律朱贵（忽律即忽雷，鳄鱼的别称，龙的主要取材对象）。加在一起共十三位，占了水浒好汉群的百分之十二。这应该说是已是一个不小的比例。一百零八位好汉之外，《水浒传》还有一些好汉或强汉的名字、绰号直接用龙。如：“老爷是梁山泊好汉韩伯龙的便是。”（第66回）“御前飞龙大将酆美。”（第75回）“角木蛟孙忠，亢金龙张起。”（第87回）“这个是李擒龙。”（第91回）“飞龙大将军刘赞……赤须龙费保。”（第113回）“为头的四个水军总管，名号浙江四龙。那四龙？玉爪龙都总管成贵、锦鳞龙副总管翟源、冲波龙左副管乔正、戏珠龙右副管谢福。”（第116回）“差御林护驾都教师贺从龙。”（第118回）名字、绰号有标志人物身份、彰显其精、气、神的作用。同时，对其人的江湖属性也是一种认定和渲染。“这些诨名一旦叫开，便作为其人格精神、个体形象的具体化象征，表明这个人与绿林社会之间的一种相互认同的结构关系，一种身份标识。它一旦产生，便会在其深层人格精神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所以，诨名与其所代表的绿林文化系统是无法分开的，与其他江湖习俗相比，取诨名有更深刻的意味，它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它的内涵所表达的则是整个绿林文化，也就是江湖那个特殊社会范畴的物质条件、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的综合。”（宁稼雨：《〈水浒传〉趣谈与索解》，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第142页）

二是以龙的形象、说辞强化、包装好汉。《水浒传》第1回，写“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脱著，刺着一身青龙……约有十八九岁，拿条棒在那里使……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绣，肩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口顺，都叫他做九纹龙史进”。第78回，写金陵建康府有一支水军，其头统制官，唤做刘梦龙。该人初生之时，其母梦见一条黑龙飞入腹中，感而遂生；及至长大，善知水性。书中言明，这刘梦龙，旧日也是“绿林丛中出身，后来受了招安，直做到许大官职，都是精锐勇猛之人”。还有：“只恨敝山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第18回）“打翻拽象拖牛汉，颠倒擒龙捉虎人。”（第26回）“浔阳江上，聚数筹搅海苍龙。”（第35回）“匣里龙泉争欲出，只因世有不平人。”（第44回）“当日因争一虎，后来引起双龙。”（第49回）“独龙无助，难留飞虎扑雕。”（第50回）“如龙大蟒扑天飞，吞象顽蛇钻地落。”（第52回）“凤落荒坡凋锦羽，龙居浅水失明珠。”（第56回）“鞭舞两条龙尾，棍横一串狼

牙。”（第 58 回）“铺排打凤捞龙计。”（第 61 回）“直教龙离大海，不能驾雾腾云。”（第 63 回）“胸藏锦绣，笔走龙蛇。”（第 76 回）“立业成名鱼化龙。”（第 113 回）在人们心目中，龙是自然界的强者、英雄，好汉是人间的强者、英雄，以龙的形象、说辞强化、包装好汉，可谓“强强联合”。这样的“强强联合”，是古往今来世间人物被神化的一条规律，也是好汉成为好汉的规律。



三是江湖好汉们的品性、追求、作为，与龙的神性、精神有契合之处。江湖好汉们的行为，多与“行侠仗义”“仗义疏财”“打抱不平”“除暴安良”“解困救厄”等词汇联系在一起，所谓“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好汉歌》）。尽管其作为往往会夹杂、产生“任气斗狠”“恣欲自快”“以武犯禁”甚至“滥杀无辜”等偏颇性、负面性的内容、效果，但整体地来看，还是以呈现正面的、利他性的内容、效果为多、为主，其核心价值，是“将无私的援助提供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王同舟：《地煞天罡：〈水浒传〉与民俗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第 47 页）。上述这些，与龙的“示威”的神性、“福生”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江湖好汉们身上是具备、散发、彰显着一定龙性、龙魂的，用龙来指称、喻比、形容、描写江湖好汉是能够为好汉们增光添彩的。

（2022 年 9 月 17 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给小朋友们讲讲龙

如果我问同学们：“你们见过龙的形象吗？”大家一定会回答：“见过！”是的，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是一位中国人、一位炎黄子孙，你对龙，就不会没有感觉。

十二属相是中国人的记岁方式，龙是十二属相之一，中国现有人口超过十四亿。这也就是说，中国至少有一亿多人“属龙”。另外，还有一亿多人属蛇，而蛇则被称为“小龙”。

蛇之外的其他属相，也都多多少少与龙有关。比如马、牛、猪、狗、虎。它们都是龙的容合（兼容、包容、综合、化合）对象，龙的家族中有“马面龙”“牛角龙”“猪首龙”“狗头龙”等等，成语中也有“龙马精神”“龙虎风云”等等。

即使你不属龙、不属蛇，甚至不属马、牛、猪、狗、虎等，你也难以摆脱龙。因为，只要你活过十二岁，你就至少要过一个龙年。这还不算你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听到、感受到的龙。

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具备长身，大口，大多有头、有角、有足、有鳞、有尾等形象特征，具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品性，和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蕴涵的神物。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海内外华人大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龙的实质，是中国人对宇宙自然力的感悟、认知和神化。

中国是龙的国度。龙文化广泛地渗透、体现在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到风景名胜参观，会看到龙的雕塑；你去参加婚礼，会看到“龙凤呈祥”图案；正月十五元宵节，有舞龙表演；端午节，有划龙舟的比赛；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有龙。可以这样说，三百六十行，没有哪一个行当与龙不发生关系。

中华民族是龙的民族。你到世界各地走一走，凡是有华人居住、生活的地方，你几乎都能看到龙。

龙的传说故事很多，这里只给小朋友们讲三个。

1. 我是天龙

我是天龙，生活在离你们非常非常遥远的天空中。或许你们看不到我，但我常常伏在云朵中远望着你们。

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我从天空下来，变成一个打鱼人，来到黄河岸边。我发现，这里有一个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有一个首领，我听见部落里的人都叫他黄帝。我还听说，部落联盟是好多个部落合在一块的。原来，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标志图像，分别是鳄、蛇、鹰、鱼、狗、牛、鹿、熊，还有云、闪电等。黄帝就把这些标志图像，每个取一部分，组合成一个新的标志图像，取名为龙。龙字的发音，是黄帝听到天上隆隆的雷声后想到的。这样，人们眼中的我，就是鳄的身子、蛇的脖子、鹰的爪子、鱼的鳞、狗脚、牛的耳朵、鹿的犄角、熊的牙齿、云和闪电的形态。

有一天，我发现黄帝带着一些人，把黄河边枯死的空心大树伐倒，做渡河用的木船。我就化作一团白云从蓝天上悠悠地飘下，来到黄帝面前。黄帝一愣，还没缓过神，我已变成一个白胡子老人了。我拱手施礼道：“黄帝大人辛苦！”黄帝很惊奇，拱手还礼，问：“您是谁？”我笑了笑说：“我就是我呀。我想问你，为什么要用龙来做标志图像呢？”黄帝说：“龙是合起来的呀！好多事情，大家合在一起才能做成啊！”我觉得黄帝说得对，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起来力量大嘛！就对黄帝说：“我会关注你、帮助你的。”说毕，我显化真身，飞回天上。黄帝恍然大悟地望着我，说：“原来是龙神啊！”

之后，我就把一幅画着山原、河流的图画献给黄帝，供他治理天下时用。在黄帝出行的时候，我就派下属变成长得又好、跑得又快的骏马为黄帝拉车。黄帝呢，就把我的形象画在旗帜上、车船上，还做了一件绣有我的形象的袍服，处理大事时穿在身上，可神气啦。我协助聪明、勇敢、勤劳的黄帝，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如修渠挖井呀、制造车船呀、创造文字呀、发明音乐呀，等等。

黄帝渐渐地老了。有一天夜里，我进入黄帝的睡梦中，对他说：“铸一尊大大的铜鼎吧”。黄帝眼睛一睁，问我：“为什么要铸铜鼎呢？”我说：“人老了，都要离开人间的。你可以把怎么治理天下的话都铸到鼎上去，让后世的人们学着做呀。”黄帝想了想，点点头说：“您说得对，就按您说的办。”于是，黄帝就派人到首山去采铜。这首山位于黄河的南岸，山上有铜矿石。铜矿石采回来后，黄帝让工匠们在荆山建起巨大的熔炉，开始熔化铜矿石，铸造铜鼎。

有一天，我听到了“当——当——当——”的声音，很洪亮。我俯身朝下一看：原来是黄帝在敲新铸好的铜鼎。听到这声音，我就从云端飞了下来。黄帝见我飞来，就拱手说：“神龙，您看看这鼎铸得怎样？”我绕着鼎看了看。鼎铸得很好，很大很好看，闪着亮光。上面有风云雷电和我的图案，有治理天下的文字。我对黄帝说：“你为天下人做了很多事，劳苦功高。现在，你离开人间的时候到了，我来接你到天上去。”说着，我就盘旋着身子，把长长的胡须垂下来。黄帝说：“好吧，我随你走。”又对臣民说：“再见了！你们要继续团结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吧！”说毕，黄帝就向各位大臣，以及众多老百姓拱手告别。然后，他拉住我的一络胡须，一纵身，跨到了我的背上。



我扬起巨大的头颅，发须随风飘动，双目放出光芒，打了个大大的喷嚏，然后摇头摆尾，准备腾空。黄帝身边那些大臣，眼见着我要将黄帝驮走，就纷纷向前，想随着黄帝一起升天。他们有的拽住我的胡须，有的抠住我身上的鳞片，有的抱住我的腿脚。我吼叫了一声，震得地动山摇，接着一扭身，一甩尾，就把那些拽我胡须的、抠我鳞甲的、抱我腿脚的大臣，都甩掉了。大臣们纷纷对着我呼喊：“为什么不带上我们呀？”我回答说：“做好事多的人优先嘛！你们好好地老百姓做事吧，过些日子我再来接你们！”

我飞了起来，向着悠悠蓝天，向着茫茫云海。我背上的黄帝频频地向大家挥着手，越来越远。我的胡须末落到了地上，变成了龙须草；我的鳞片渣落到地上，变成了龙山冈。我的唾沫星溅落到林子里，林子里就长出了龙松、龙柏、龙爪槐、龙胆木、龙血树……

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故事——是我的故事，也是中国人祖先的故事。

2. 大力士颧颥

远古时期有一段时间，流经中原的黄河泛滥了，到处都是洪水，老百姓四处逃难。当时管理天下的是舜帝。舜帝先是派一个叫鲧（gǔn）的大臣负责治理洪水，鲧用堵的办法治水，没有成功。舜帝又让鲧的儿子大禹接着治水。大禹吸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治水。

大禹很有智慧，也很勤劳，他把国家大事放在第一位，三次经过家门都顾不上回家。这天，大禹查看洪水情况，发现黄河水泛滥成灾，是因为水流被一座又高又大的山给挡住了。大禹就征派民工挖这座山。这座山是石头山，好多民工撬呀抬呀地挖了好多天，也只挖去一小部分。大禹有点着急。他摆起香案，向华夏族的远祖、“三皇”之一的伏羲祷告，希望能得到一些指点。

晚上，伏羲进入大禹的梦中，对大禹说：“那座山是被一只神龟驮着的，那神龟有一个别致的名字，叫颧颥（bi xù）。”伏羲对大禹说：“那颧颥现在遇到麻烦了，没有力气了，爬不动了，你快去解救它吧。”梦醒后，大禹潜到水底查看。果然见到一只特别巨大的龟。龟背上驮着的，正是挡住了黄河水流的那座大山。那龟的头，被几十条巨大的树藤给紧紧地缠绕住了，动弹不得。龟嘴也被封住了，

不能吞吃食物。大禹见状，就返回岸上，召了几百个壮士，每人发一把大斧，再潜入水底，让壮士们轮流用大斧砍那些树藤。

壮士们砍呀砍，终于将那些树藤一条一条砍断了。那龟得救了，头能伸缩活动了，也能张嘴说话了。大禹问：“你就是赑屃吗？怎么爬到了这里？还驮着一座大山，挡住了东流的河水？”那龟答：“我是赑屃，是龙的大儿子，模样长得像龟，生来力气大，三山五岳压到身上，都能驮起来呢。”那龟又说：“这不，我驮着这座山，游玩到这里，不想被这些树藤缠住了头，不能动了。”又说：“谢谢你们搭救哩。我都快饿坏了，你们好事做到底，给我找些东西来吃吧。”大禹就让人张网，捕来许多鱼虾让赑屃吃。说：“吃吧，吃饱了，有劲了，赶快把你背上的山驮开吧。”赑屃吃饱后，真的就一步一步地，将背上的大山驮到了一边。河道敞开了，洪水退去了。



洪水退后，赧辰爬到了大禹跟前，抬起头看着大禹。大禹问它：“你怎么还不离开呢？”赧辰说：“这个地方的洪水退了，其它地方还有洪水呢。我想将功折罪。跟着你治水。”大禹说：“治水是很辛苦的工作，你不怕吃苦吗？”赧辰说：“我的父亲是龙，母亲是龟。龟生来耐受力是最强的。”大禹听后很高兴，拍拍赧辰的头，说：“好啊，有你这位大力士加盟，治服洪水就更有希望了！”于是，赧辰就成为大禹治水队伍中的一员大将。大禹安排它驮运治水物资。遇到有石山、土原挡住水道的时候，大禹就让赧辰出阵。赧辰用头一顶，那石山就让开了；用脚一踹，那土原就散开了。

洪水治服了，大禹打制了一座特别大的石碑，上面刻上了赧辰参与治水的功迹，叫赧辰驮着。赧辰昂起头，四脚撑地，想向前挪动。但是，石碑太重了，无论它怎么使劲，也不能移挪半步。赧辰心中纳闷，就问大禹：“我以前能驮着三山五岳行走，如今怎么就被这块石碑压得不能动了呢？”大禹说：“石碑上刻着几百个字呀，那每一个字，都重得像一座山呢！”

3. 消防员螭吻

螭（chī）是龙的第二个儿子，长相很可爱：大大的鼻头，宽宽的嘴巴，圆圆的眼睛，耳朵也圆圆的，像猫咪的耳朵。螭小的时候，头上的角还没有长出来，身子黄黄的、长长的，爬行时，尾巴就翘起来。螭喜欢在大海里游泳，在江河边玩泥巴。游累了、玩累了，就仰躺在水面上，看天上的云彩和飞鸟。

一天，一只小黄雀落在了螭的肚皮上。螭正想把小黄雀赶走，却见一只长尾巴大灰鸟从空中直冲下来。大灰鸟一下子就用两只尖爪按住了小黄雀，小黄雀惊恐地叫着，大灰鸟抓起小黄雀，翅膀一展，就要飞起来。这时，水中忽然窜出一只青黑色的鳄（è）鱼，那鳄鱼大嘴一张，就要把大灰鸟连同小黄雀都吞到肚里去。螭见状，连忙翻过身来，向前一冲，朝着鳄鱼的腮帮子猛咬一口。鳄鱼疼得一哆嗦，口松开了。大灰鸟得救了，小黄雀也得救了。它们都扑噜一下翅膀，飞走了。第二天，螭在河边玩泥巴，大灰鸟飞了来，对螭说：“这位大哥，谢谢你救我，怎么称呼您啊？”螭说：“我叫螭，你叫什么名字？”大灰鸟回答：“我叫鸱（chī）。”“咱们的名字，发音是一样的啊。”螭说。从此，螭和鸱交成了朋友。

它们常常在一起喊着、叫着，追着白花花的浪花玩。

螭渐渐长大了，头上的角也长出来了。龙王，也就是螭的爸爸，对螭说：“你到了该学本领的时候了。”龙王又对螭说：“你嘴巴大、嗓子粗，肚子也不小，我看你就学吞水吐水吧。”于是，在龙王的教导下，螭很快学会了把许多水吞到肚子里，然后再喷吐出去的本领。

有一天，人间的皇帝向龙王求助，说：“龙王啊，快来救助呀，我们的大殿着火了！”龙王赶忙腾飞到云端，果见皇宫里一座大殿着了火，火势熊熊，浓烟滚滚，呛鼻的味道随风飘来。龙王立即把螭唤到跟前，吩咐说：“你显示本领的时候到了，皇宫大殿着火了，你赶快准备，出发灭火！”螭不敢怠慢，当下就张开大嘴，“呼噜呼噜”地吞吸大海里的水，一会儿，肚子就鼓胀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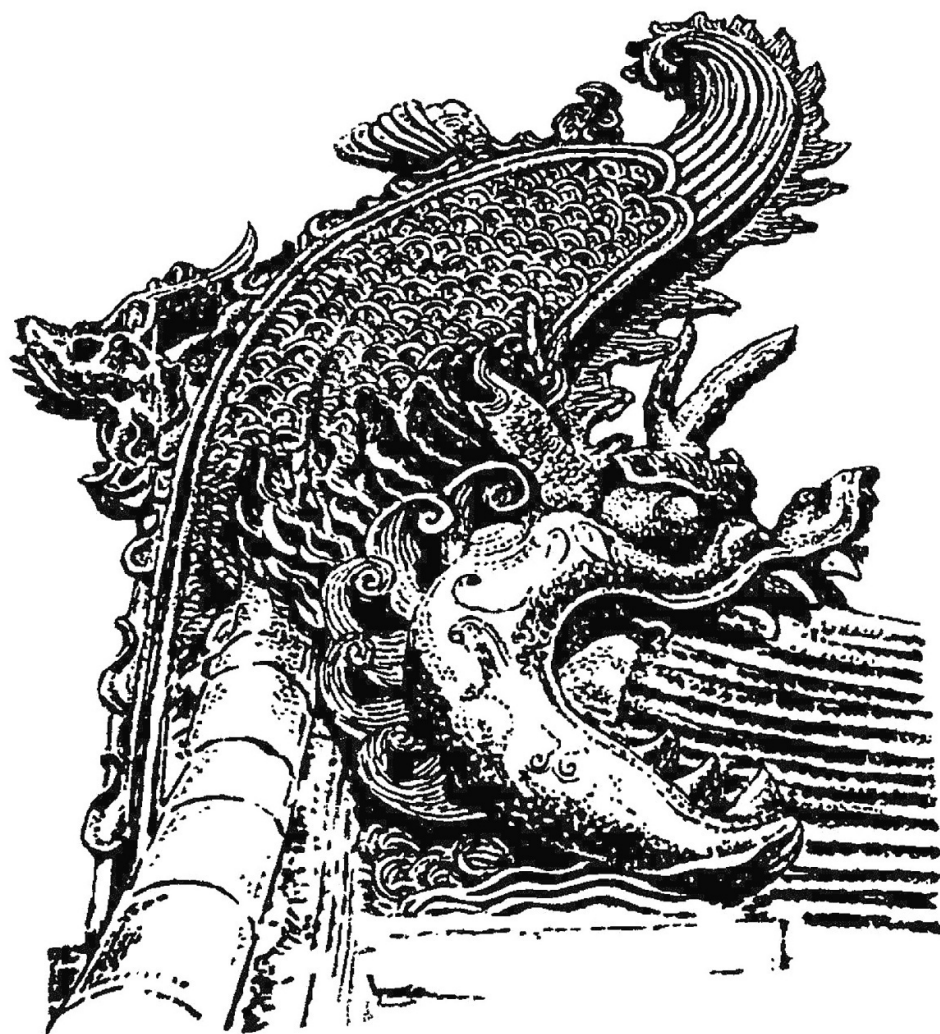
螭飞到着火的皇宫大殿上空，“扑扑扑”地将肚子里的水一股脑地喷吐出来。一肚子水喷吐光了，螭又返身到大海，吞吸满一肚子水，再飞到皇宫大殿上空，“扑扑扑”地喷吐出来。如此这般，来来回回几十次，皇宫大殿的烈火渐渐地小了。再吞吸、喷吐一次，火就彻底灭了。

也就在螭最后一次将海水快吞吸满一肚子时，忽然觉得尾巴根处一阵巨痛，它不由得浑身一抖。螭扭头一看，原来是那只鳄鱼。螭的尾巴竟然被那鳄鱼咬掉了，那鳄鱼好像很得意，“嘻嘻”地笑着。灭火要紧。螭顾不上和鳄鱼纠缠。它忍着疼痛，奋力地飞到皇宫大殿上空，喷吐出肚子里的水。

大火熄灭了。皇帝亲自到龙宫，送上一方黑漆大匾，匾上刻着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灭火英雄”。皇帝对螭爸爸说：“龙王呀，把你这位能吞水吐水的儿子留在人间吧，让他当宫殿房屋的守护神！”龙王同意了皇帝的请求，就让螭动身，到人间去，为防火、灭火尽心尽力。

螭却有些作难了：因为它的尾巴被那鳄鱼咬掉了。作为龙的儿子、灭火英雄，没有尾巴，多难看呀！这时候，螭突然听到了“咕嘎嘎、咕咕嘎”的鸟叫声，原来是好朋友鸬飞来了。鸬对螭说：“螭哥哥，别作难。你看我这尾巴怎么样？漂亮不漂亮？”说着，就翘起尾巴来。螭说：“你这尾巴确实好看，可我长不出你这样的尾巴呀！”鸬说：“你张开嘴。”螭张开了嘴。鸬说：“你再张大些。”螭就再张大些。忽一下，鸬飞到了螭的大嘴里。螭还没有反应过来，鸬就钻到了螭的肚子里。几天后，螭长出了新的尾巴。新尾巴很漂亮，一翘一翘的。

有了新尾巴的螭来到人间，以消防员的身份，守护在宫殿房脊上。人们知道了它的故事，就叫它“螭吻”，或者“鸱尾”。



（2023 年 9 月 6 日）

龙故事新编（二题）

1. 贪食的饕餮

大约五千年前，黄帝统一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众多部落，成为炎黄部落联盟的首领。

南方有一个九黎族，不服从黄帝的统治，其首领叫蚩尤。蚩尤率领着八十一个兄弟，起兵造反。这蚩尤长着野兽的身子，人的面孔，大头，大眼，嘴像老虎的嘴，牙齿尖利，像狼的牙齿。蚩尤手下的八十一个兄弟，个个也都是野兽的身子，人的面孔，横眉毛，竖眼睛，凶巴巴的。

黄帝率领的军队，和蚩尤率领的军队，在黄河北边一个叫涿鹿的地方打了一仗。开始时，黄帝的军队有些吃亏，因为兵士们用的是石刀石斧；而蚩尤掌握了冶炼青铜的技术，兵士们用的多是铜刀铜斧。后来，黄帝让经过训练的老虎、豹子、狗熊等野兽参战。蚩尤的八十一个兄弟敌不过野兽，一个个都被咬得头破血流。蚩尤请来了风神。这风神将手中的扇子一扇，顿时狂风大作，刮得昏天黑地。黄帝见状，就请天上的龙来帮忙。龙发起洪水。滚滚水流，卷着浪花，淹向蚩尤的部队。蚩尤的部队招架不住了，纷纷溃退。

黄帝的军队乘胜追击，蚩尤的八十一个兄弟先后都战死了，蚩尤却被活捉了，被戴上枷锁，带到了黄帝面前。蚩尤心想：这下完了，黄帝一定要杀我了。黄帝却没有杀蚩尤，倒亲自解开了他的枷锁。黄帝对蚩尤说：“早就听说你们九黎族掌握了冶炼青铜、制造兵器的技术。这次打仗，也看到了。”黄帝接着说：“我不杀你。倒想让你来负责青铜的冶炼和兵器的制造，你愿意吗？”蚩尤虽然勇猛粗鲁，却大事不糊涂，见黄帝不杀他，自然喜出望外，说：“我愿意。”于是，九黎族归顺了炎黄部落联盟，蚩尤成为炎黄部落联盟内负责冶炼青铜、制造兵器的官员。

蚩尤尽心尽力，炎黄部落联盟在冶炼青铜方面发展很快。他们不光用青铜制造兵器，还用青铜铸造食器。以前，部落里都是用泥陶烧制食器，泥陶烧制的食器不够坚固，一不小心，就碎了。而用青铜铸造的食器，如鼎呀、锅呀、壶呀、罐呀、盆呀的，既坚固，又耐用，还亮光灿灿，很好看。人们用青铜食器煮饭、盛饭、吃饭，饭食的花样比以前多了许多，味道也比以前好了许多。

蚩尤生来胃口特别好，爱吃、会吃、贪吃，做了负责冶炼青铜的官后，吃东西更方便了。他专门给自己铸了一口青铜大鼎，用来煮肉。满满一鼎煮熟的肉，蚩尤一顿就吃光了。蚩尤吃肉的时候，像好多天没吃东西的老虎一样，号叫着，跳跃着，拿刀举斧地舞蹈着。人们见状，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饕餮(tāo tiè)”。随着他的贪吃，饕餮的名字越叫越响。



一天，一口新鼎铸成了。这口鼎比他以前煮肉的鼎大了一倍还多。饕餮就用这口新鼎，煮了满满一鼎肉。肉煮熟了，香味诱人。和往日一样，饕餮开始吃了，也像往日一样，一边吃，一边号叫、跳跃。眼见着，满满一鼎肉就要被他吃

光了。突然，只听“膨”一声，饕餮的肚皮被吃下去的肉给撑破了！

饕餮死了，被食物撑死了。黄帝很惋惜，就让铸匠们把饕餮，也就是蚩尤的形象铸在鼎和其它青铜器上。黄帝想以这种形式，给贪婪者以警戒。当然，也是一种纪念——毕竟在冶炼青铜方面，蚩尤做出了贡献。

饕餮死后，其魂魄在空中游荡，天上的龙发现了，说：“你有过，也有功，我把你收进龙族吧。”于是，饕餮成为龙子之一。

2. 吼声震天的蒲牢

有一天，龙王将他的儿子蒲牢叫到跟前，说：“你不要一天到晚都在龙宫里玩，要出去交朋友，学些本领。”

蒲牢听了龙王的话，就出了龙宫。它看到一条鱼在前边游。这鱼长得好奇怪，脚长在头顶上。蒲牢数了数，那鱼长在头顶上的脚，竟然有十条，两条长，八条短，都软乎乎地摆来摆去。

蒲牢向那鱼游去。快到跟前时，那鱼忽然惊觉起来，先是“噗”的一声，口中喷出一团烟雾。蒲牢还没有回过神来，又听到“噗”的一声，周围的海水竟然变成了黑色，那鱼也不见了。

蒲牢心想：父王让我交朋友，学本领，我就交这个朋友，学习“噗”一下，就能喷出烟雾，还把海水染黑的本领吧。这么想着，当第二次看见那鱼在前面游玩时，它就不敢贸然进前，只是不远不近地跟随着。

那鱼发现蒲牢只是跟着它，没有攻击的意思，就游近些喊道：“喂！伙计，你是谁？老跟着我干什么？”蒲牢答：“我是龙王的儿子，叫蒲牢。我想和你交朋友，学喷烟雾和让海水变黑的本领。”“好啊！”那鱼说，“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多了没忧愁。我也想有个好朋友呢！”于是，蒲牢和那鱼交上了朋友。它知道了那鱼的名字叫墨鱼。蒲牢和墨鱼玩得很开心。

一天，墨鱼教蒲牢口喷烟雾。墨鱼深吸一口水，“噗”地朝出一吐，就是一团烟雾。蒲牢也学着墨鱼的样子，深吸一口水，“噗”地一声吐出来，却还是一股水。墨鱼又教蒲牢将海水变黑。它尾一摆，一扭身，一股黑水便从体内喷出，周围海水顿时成了黑色。蒲牢也学着墨鱼的样子，摆尾，扭身，却没有黑水从体

内喷出。再摆尾，再扭身，还是没有黑水从体内喷出。

蒲劳有些沮丧。这时，墨鱼游到它身边来，用长在头顶上的那两条长脚仔细地把蒲劳从头到尾触摸了一遍。墨鱼说：“伙计，我知道你为啥不能吐烟雾、变黑海水了，你身上没有长墨袋子呀！”蒲劳说：“为什么你身上长有墨袋子，我身上就没长墨袋子呢？”墨鱼说：“这得问我妈妈。”于是，墨鱼就带着蒲劳，去找墨鱼妈妈。

在一片水域，它们看到了正领着一群小墨鱼在水中找食物吃的墨鱼妈妈。见到墨鱼妈妈后，墨鱼将蒲劳介绍给妈妈，说：“它是我的好朋友蒲劳，它身上怎么没有长墨袋子呢？”墨鱼妈妈说：“世界上的生物长得都不一样，每种生物、每个生物，都有自己的本领。你有的它没有，它有的，你也会没有呢！”

听了墨鱼妈妈的话，蒲劳扬起头，想：我有什么本领呢？就在这时，扬起头的蒲劳忽然看到一头大鲸鱼向墨鱼群扑过来。蒲劳吃惊得跳了起来，同时大叫一声。蒲劳的叫声太大了！震得海面荡起了几尺高的浪花！

巨大的叫声和腾起的浪花使大鲸鱼也禁不住浑身一抖。说时迟，那时快，墨鱼妈妈也就在此刻发现了扑来大鲸鱼，它立刻发出信号，率领墨鱼们迅速潜入水底，跑掉了。

蒲劳的叫声也传到了水下龙宫，龙宫也被震得晃了几晃。谁的叫声这么洪亮？龙王跳出水面，腾到空中，看到了正朝龙宫游的蒲劳。“刚才是你在叫吗？”龙王迎着蒲劳问。“是啊，父王。”蒲劳回答，“我发现有大鲸鱼要吞吃墨鱼，就惊叫了一声。”龙王拍了拍蒲劳的脑门，赞赏地说：“叫得好，叫得好，叫得墨鱼把命保，叫得鲸鱼没吃到！”蒲劳说：“谢谢父王夸赞孩儿，这也是本领吗？”龙王说：“是哩。你的那些兄弟姐妹们也能吼叫，但它们都没有你叫的声大。”蒲牢问：“这本领有用吗？”龙王答：“有用哩。不管什么本领，都会有用的。”

过了些日子，玉皇大帝在天宫召开神仙大会。会上，玉皇大帝宣布说：“我打算铸一口大钟，这钟一敲，不论在哪里的神仙都能听得到。”神仙们纷纷说：“这是好事啊。不过，钟好铸，但要钟声洪亮到不论在哪里的神仙都能听得到就难了。”玉皇大帝问龙王：“龙王啊，你有没有办法？”

龙王想了想，就讲了蒲牢遇大鲸鱼，惊叫声很大的事情。“好啊，好啊！”玉皇大帝高兴地说：“你回去就让爱子蒲牢到天宫报到吧。”

蒲牢



于是，蒲牢来到了天宫。那口钟快铸好时，蒲牢一跃，趴到了钟上。玉皇大帝下令将敲钟的木杵作成鲸鱼的形状。从此，木杵一撞击大钟，蒲牢就大声吼叫起来，好像有鲸鱼来了似的，声音震天动地，传得很远、很远。

（2017年7月26日于西安龙凤院）

沔河龙文化（二题）

1. 鳄鱼骨板与岐山面

2017年1月12日，媒体报道了镐京遗址首次发现12块鳄鱼骨板的消息。对这些鳄鱼骨板，考古人员有两个推测：一，可能是一种名叫鼉鼓的礼乐器遗存。商周时期人们把以鳄鱼皮做面的鼓称为鼉鼓。二，或许是当时人们食用鳄鱼肉后留下的残骸。由此可推测，西周时期，关中一带或许已有鳄鱼出没。——距今三千年左右的西周王朝是以丰京和镐京为首都的，并称“丰镐”，其遗址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马王镇、斗门镇一带的沔河两岸，丰在河西，镐在河东。

这后一个推测有意义：为岐山面的起源提供了一个注解。

关于岐山面，民间有传说：周武王伐纣大军开拔之前，曾于渭水中捕得一条蛟龙。为了让大家都沾点龙气，武王决定让部族成员共食这条龙。一条龙，显然不够成千上万的人吃，于是就将龙肉放入大锅煮汤，以汤浇面，吃了面，把汤再倒回锅内。这样不断地反复，使大家都喝到了龙汤，沾上了龙气。武王用这种方法，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伐纣大军所向披靡，一举成功，可以说与吃此面、食此龙有关。据此，我曾建议将岐山臊子面叫做“蛟龙面”。

龙是多元容合起来的神物，自然界里是没有的。自然界里有的，是龙的容合对象。日常生活中，人们常以龙的容合对象代替龙、指称龙。出现在古今面食、菜点中的龙，一般都是鳄、蛇、鱼、虾等龙的容合对象。镐京遗址发现鳄鱼骨板，说明西周时期京城丰镐附近的河流里很可能生长着龙的容合对象——鳄鱼。那么，周武王捕得的所谓的“蛟龙”的真实身份，很可能就是鳄鱼。这样，蛟龙与岐山面的传说，就不是老百姓随便编出来的，而是有事实依据的。

（2017年2月12日于《沔河记忆》书籍研讨会）

2. 解读《泮河龙王》

在泮河下游不远处，有一个不大的村子，名叫王家庄。村旁住着一个独户人家，只有老汉一个，人称王三。王三生来命硬，存不住婆娘，多年都是光棍一个。虽然孤单寂寞，但日子过得倒也清闲。

一天，喝罢汤，月亮爷明晃晃的。王三坐在门前的土堆上，一边赏着月光，一边品着酽茶，不时“巴嗒——巴嗒”地吸着旱烟，河里偶尔传来鲤鱼“忽啦——忽啦”的跌膘声，岸边青蛙“咯哇——咯哇”地鸣叫声，真是赏心悦目，舒坦极了。忽然，一股大风过后，只见面前站着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头儿，一头白发苍苍，手里拄着一根打狗棍，恭恭敬敬地问道：“老先生莫要见怪，今晚打扰先生了。我是个要饭之人，这会儿迷了路途，黑咧又没个歇脚的地方，今晚想在这儿借光借光，不知先生意下如何？”王三一听，不觉心中大喜。忙起身答礼道：“甬说住一个晚上，就是一年半载也没有啥！”说罢，搬来一条凳子，端了一壶“陕青”，两人边喝边谝，三七二八，天南地北，一直谝到鸡都叫了，才余兴未尽似的回房子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王三端了一盆洗脸水，弯腰往地上一搁，不觉大吃一惊，原来盆里有一条七、八寸长的小龙，摇头摆尾，游来游去，用手一摸，却啥也没有了，龙也不见了。他心里顿生疑团：莫非我的年纪大了，眼睛花了不成？待到水平波静，仔细一瞧，的确一点也没有错。奇怪的是，用手去摸，又没影了。纳闷一阵，王三猛然醒悟：这大概是龙王爷显灵了吧！

秋天，泮河发起了大水，眼看着大水齐岸平了，村子里的人都扶老携幼，失急慌忙地往咸阳城里跑。王三也吓得脸都变了色，赶紧跑去喊叫白发老头道：“快！快！快！快跑！一会儿就跟不上了！”谁知道，白发老头儿听后不慌不忙地说：“怕啥呢！没见过个啥。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哼哼！”一边说着，一边手给河里一指道：“你看那是啥！”王三顺手看去，只见汹涌的大浪，“哗啦——哗啦”地咆哮翻滚，吓得王三脸都没有一点儿血色。又见一股大风过去，白发老汉也没影儿了。再朝河里望去，山头似的浪尖尖上，分明有一条七、八丈长，梢桶状的巨龙，随着大浪的一起一伏、一上一下。巨龙张着血盆大口，瞪着老碗大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王三。王三一下子吓得昏死过去了。

等到王三缓过气来的时候，泮河里的大水也退下去了。白发老头再也找不见了。这时王三猛然醒悟：刚才梦中白发老头不是清清白白给自己说过了：“我就是龙王爷。”王三思前想后，悔恨得在自己的腿上砸了一拳：“唉！唉！唉！我咋是个碗大的西瓜一抻厚的皮——瓜（傻）实咧些！”

从此以后，泮河再没发过大水，不知道啥原因，水一流到王家庄附近，自然就会变小了。又不知道啥时候，人们忽然发现王三家门前的土堆上长出来一棵又高又大的白杨树。一到天黑的时候，远远望去，白杨树上还有两盏忽明忽暗的大红灯。听老年人说，那就是龙王爷的两只眼睛。时间一长，人们便把它叫做“神灯。”一个美丽而神奇的“神灯”故事，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如暮鼓晨钟，传得很远很远……

上面是一则搜集、整理者佚名的题为《泮河龙王》的民间传说。

对这则传说，我们可以做三点解读。

第一，龙是善于变化的神物，具有善变的神性。

由于龙是由众多的动物和天象“容合”而成的，各容合对象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因此，龙就有了“善变”的神性。在古人的心目中，龙在天可以是云、是雷电、是虹、是星象，在地可以是蛇、是猪、是鹿、是熊、是牛、是马，在水可以是鳄、是鱼、是鲛。换句话说，天上的云、雷电、虹、星象，地上的蛇、猪、鹿、熊、牛、马，水中的鳄、鱼、鲛，以及天地间的龙卷风等等，都可以是龙的变体和化身。

在《泮河龙王》的传说中，龙既能“人龙之变”，即变成白发老头与王三聊天谩闲交朋友；也能“小大之变”：或变作七、八寸长的小龙，悠游于一盆；或变作七、八丈长的巨龙，蹈浪于泮河。

龙善变的神性，可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自然生态在变，社会环境在变，人也效法神龙，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状态，以适应外部条件的改变。所以，“适变图强”，应该成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基本素质。

第二，龙是水神，承膺着司水理水的神职。

龙是水神。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龙源于“水物”和“水相”，或者说，龙本来就是“水物”和“水相”。龙的诸多容合对象，可以说都是“水物”或“水相”。鳄、鱼、鲛等生活在水中；蛇、蜥蜴喜处水湿阴潮之地；猪、鹿、熊、牛、

马等离开水也活不下去；而雷电、云、虹、龙卷风等自然天象，全都和雨、水关系密切——似乎完全可以用“水相”称之。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故水神也是农业神。中国是农业大国，是需水、用水的大国，也是爱水、敬水的大国。古往今来，东西南北，大陆港澳台，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龙王庙多不胜数，而那些丰富多彩的有关龙的民俗，也大多与水有关。

《泮河龙王》传说中的龙，就承担着司理泮河的神职。民间还传说，泮河龙王本是一条小白龙。当年，小白龙曾随大禹治水，不辞劳苦，立了功。于是在治水事毕后，大禹就将其封为泮河龙王，让其主管泮河流域雨水之事。农历的六月初六，据说是泮河龙王的生日，这天龙王要巡察河道，民间则要举行龙王庙会，以设坛、上供、唱戏、舞蹈等多种形式进行奉祀。

第三，福生，即造福众生，是龙的基本精神。

人们造神、敬神的目的之一，是相信神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中国人发明、展现龙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有福于自己，而不是为了有害于、有祸于自己。事实上，古往今来，龙的身上都一直体现着福生的精神。作为水利神、农业神，龙是造福众生的；作为祖先神、人格神、民族神，龙更是造福众生的。

上述传说中，在泮河龙王的管理下，“泮河再没发过大水”，也就是说，泮河龙王践行、发扬了福生的精神，没有让泮河泛滥成灾，两岸百姓也因之而安居乐业。这当然是值得称赞的了。不仅如此，龙王还使王三家门前的土堆上长出来一棵又高又大的白杨树，并让这棵白杨树上有了两盏能在夜间给人以光明和希望的“大红灯”。这当然是泮河龙王的又一功德了，这样的功德，体现的、传达的也是福生的精神。

福生是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无论个人、团体、民族，还是政党、政府、国家，只有以福生为目的，其所作所为才是有价值的，福生的事情做得越多，福生的范围越大，其价值越大。以此而论，“泮河龙王”的出现是有价值的，《泮河龙王》的传说也是有价值的。

（2017年3月26日初稿，2017年7月27日改定）



龙脉

脉的本义是血管，引申为像血管一样连贯的东西。龙的身躯多取材于蛇，可谓以绵长为特征，那么，从字面上看，龙脉就是龙的绵长连贯的血管了。龙是来自自然界，却不在自然界中生活的神物，其价值和意义主要通过象征的方式表现出来，因而，大凡绵长连贯的东西，都可以谓之龙脉，反过来说，龙脉可以象征那些绵长连贯的东西。

比如，流动的地下水就可以称龙脉。老北京有一则传说：当年刘伯温带人修建北京城，施工时不小心挖着了龙脉，龙王一怒之下带着龙子龙女化装进城，分别把北京城里所有的甜水和苦水都吸入两个水篓里，从西直门拉出了城。刘伯温急忙派匠人高良追赶，匆忙中，高良用红缨枪扎错了水篓，让苦水流了一地。而那甜水就被龙王父子拉到玉泉山。从此，北京城的地下水就成了“苦水龙”。

龙脉进入风水学是很自然的事。神州大地，山耸水流，山山水水，有走向，有起伏，有转折，有变化，只要一线贯连，就可以称为龙脉。所谓“指山水以为

龙兮，像形势之腾伏”。大山大水称干龙，小山小水称支龙；山水之头称来龙，山水之尾称去龙；山峦起伏，顿挫有致，“紫气如盖，苍烟若浮，云蒸霭霭，四时弥留；皮无崩蚀，色泽油油，草木繁茂，流泉甘冽，土香而腻，石润而明”者，称生龙，还有什么沉龙、潜龙、飞龙、腾龙、翔龙、群龙、回龙、归龙、卧龙、死龙、隐龙、高冈龙、平洋龙等等……甚至平坦之地也有龙，“高一寸为山，低一寸为水”。

风水学里有许多荒诞无稽的属于迷信的东西，风水师凭着这些东西故弄玄虚、牵强附会、蛊惑人心。如言葬死者于吉龙佳穴，可以荫福子孙，葬死者于凶龙恶穴，将会祸及后代，等等。但风水学也有重视山形地势，尊重自然规律，将小环境放入大环境中做比较考察的科学的成分。比如生活在山间水边的人盖房子，如果不考虑山势水向，若遇灾变，就有可能被倒山压毁，被洪水冲垮。再如笔者住处附近的一家饭店，眼见着装修了几回，名称变了几番，经营者及经营内容也换了几换，可就是门庭冷落，光顾者寥寥，何故？怕也有一个小环境与大环境不合窍的“风水”问题。

大概从秦始皇被称作“祖龙”、汉高祖称自己是“龙种”之后，龙就成了君主帝王象征、比附的对象。于是，龙脉就有了另一个喻义，即指那些出过帝王（或有可能出帝王），或能够安葬帝王、护佑王室后裔的山水之脉。于是，就有了当政的帝王花大力气为自己“寻龙探穴”，即为自己也为后代找一块安葬“宝体”的“万年吉地”，及所谓的“埋金更名建寺庙、挖断龙脉泄王气”之类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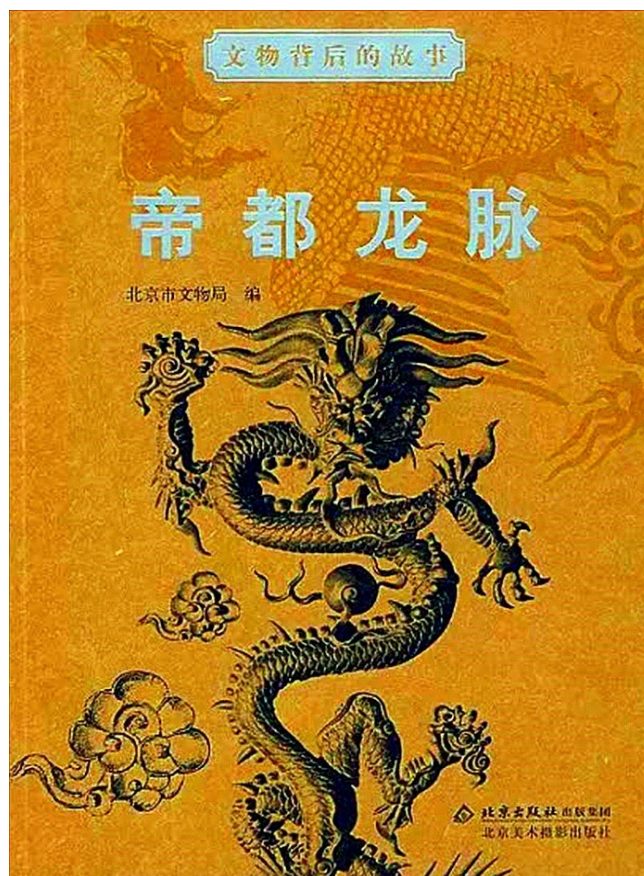
前者如明成祖朱棣登基不久即差大臣为自己勘选“龙脉宝穴”。几位大臣跑遍了燕京附近的山山水水，先选了“珠窝”“屠家营”等处，都因地名不雅而放弃，最后找到黄土山（后改为天寿山），见其山势延绵，主峰耸峙，草木丰茂，三面环顾，南面敞开，且有“龙”“虎”相护，总之是完全符合风水理论，才确定下来，随即便动工起陵。这样，便有了天安门、故宫是龙头，十三陵天寿山是龙尾，龙尾至龙头一线（也称中轴线）是京师龙脉之说。

后者如战国时期，楚威王率兵攻占了清凉山（南京旧名），听人讲此地有王气，就令手下在龙湾（今狮子山以北的江边）将金块埋入土中，以镇王气。金陵之名便由此而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干过同样的事情。至于“挖断龙脉”之事就多多发生了。河南桐柏山有一条岭，相传是盘古创世后设下的龙脉之一。

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人告知此事，赵匡胤担心他人得之会推翻自己江山，就派人在此龙的颈部挖了条深沟，以斩断龙颈，从此，此岭有了“断头龙”之名。明朝将亡之时，崇祯皇帝派人找寻并破坏李自成的祖墓，而李自成打到北京后，也欲断朱明王朝的龙脉，但没有攻进十三陵，只烧毁了外围的建筑。还有清代的乾隆皇帝，听人说河南南阳有“王气”冒出，就派部队到那里去“掘龙脉”，结果挖出一条“太子沟”。而蒋介石，也干过指示“湖南王”何健，派人去韶山挖毛泽东的祖坟，以断其龙脉的荒唐事。

像涉龙的许多词汇其词义都有扩展一样，龙脉一词在新时代也有了新的意义。如把新修成的青藏铁路，称为入藏的“龙脉”；把证券市场上的综合指数走势，称为股市“龙脉”；把由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开创、世代华人不断承续、发扬的中华人文精神，称为“华夏龙脉”，等等。

（刊于《西安晚报》2006年8月15日）



骄龙腾跃秦遗址

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结束了中国几百年的战乱，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尽管秦王朝国祚短促，但其文化却影响深远，所谓“百代皆行秦政事”。

龙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经过夏、商、周和春秋战国的发展演进，至秦朝时出现了与王权、皇权相结合并渗入贵族日常生活的特点。

这样的特点，在秦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多有反映。

早在春秋时期，秦始皇的先祖就与龙有了关联。《史记·封禅书》载：“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这是说早年秦文公出猎的时候，曾捕获一条黑龙（肤色发黑或近黑的大蛇、鳄鱼之类），因龙为水神，离不开水，故按“五德终始说”，获黑龙被视为秦将代周的“水德之瑞”。

到了秦始皇执政时期，秦与龙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公元前 211 年，有使者赶往咸阳，从华山脚下经过，突然有人挡住了他，将一块玉璧奉上，说：“请帮我把这个送给涪池君。”又说：“今年祖龙死。”使者正要问清来由，其人忽然不见。使者将玉璧带回咸阳，交给秦始皇，并转达了献璧人的话。秦始皇让御府官员鉴定此璧，原来是他八年前南巡时沉到长江中祭神的那块玉璧。于是，秦始皇默然良久，心里说：“这是在咒骂我呀！”

秦始皇为什么会被称作“祖龙”呢？因为“祖”是“始”的意思，“龙”是人君之象。秦始皇有功业巨大的一面，也有残暴的一面，故有此恶咒。

在中国漫长的阶级社会里，秦始皇是第一个被称作“龙”的皇帝。

公元前 350 年，秦孝公将都城从栎阳迁至咸阳。直至公元前 207 年秦王朝灭亡，在长达一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咸阳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据考古工作者勘测，秦咸阳城遗址面积达 72 平方公里，其中宫殿建筑遗址面积

达 15000 平方米。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出土各类文物五千多（组），其中就有龙。

如 1980 年，出土于咸阳秦二号宫殿遗址的“单龙绕壁空心砖”。该砖长 1.17 米，宽 0.39 米，厚 0.163 米。砖面阴刻头型和双角似牛、身躯绵长弯转像蛇、足爪尖利似虎爪，有间弧线圆点的人字型鳞甲、有脊鳍羽五、腹鳍羽十的龙纹。该龙回首卷尾，造型生动。



位于陕西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园，是秦始皇的安息之地。1978 年，该遗址出土“夔龙纹大瓦当”一件。该瓦当形状为大半圆形，高 0.48 米，宽 0.60 米，瓦当面左右对称分布一对夔龙纹，造型严谨洗练，风格遒劲古朴。

另外，陕西省咸阳博物馆还收藏了两件铸造精良、工艺精湛的“错银龙纹带钩”。考古人员判断，此钩很可能出自咸阳市附近某座属于秦代的贵族墓。钩长 0.93 米，重 60 克，钩身两侧各饰有一错银龙纹。该龙身躯修长，弯曲自然，饰两列小圆点状鳞甲，无足，有鳍十二。龙头朝向钩尾，有显凸的圆睛和三角形上翘的双耳。吻尖，两侧各有三根龙须。此龙造型活泼，给人游动之感。

龙纹空心砖和龙纹瓦当，属于秦代宫殿、陵墓的建筑材料，反映了秦王朝崇龙的史实；而作为挂衣帐用的龙纹带钩，则反映了龙与秦代贵族日常生活的关系。两者说明，龙文化已渗入秦文化，已成为秦文化的组成部分，而秦文化也借力于龙文化并推进了龙文化。

（2011 年 12 月 9 日于西安慧雨庐）

大明宫与龙

有朋友问我：你研究龙文化，大明宫与龙有关吗？我回答：有啊。龙首原位于西安城北，大明宫就建在此原之上。作为一道“带状高地”，龙首原东起浐河西岸，西至汉长安城遗址，绵延数十华里。称“龙首”，是“传说龙”与“地势龙”二者的结合了：相传秦朝时有一条来自南山的黑龙，到渭河饮水，这一饮竟没有离开，于是其龙首处便化成高亢的土山，故名。在古代堪舆家的眼里，龙的头部自然是占风水之先的宝地，在这里修造皇宫禁苑，居高而临下，“处上游以制六合”，当然是很好的选择了。

大明宫虽初建于唐太宗李世民主政的贞观年间，但完成却在唐高宗李治掌权的龙朔二年，即公元662年，这也就是说，大明宫是在以龙为年号的岁月里修成的。一修成，李治就告别了父辈、祖父辈工作多年的条件不怎么好——所谓“高宗染风痹，恶太极宫卑下”的太极宫，来这座干燥、宽敞、凉爽的新宫听政理事了。那么，李治为什么要以“龙朔”为年号呢？“朔”的本义是指阴历每月的最初一天，引伸为“初”“始”等义。那么，“龙朔”就是“龙初”“龙始”了。从秦汉开始，龙有了喻比、象征、代表帝王之意，李治的父亲世民先生就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必能济世安民”之说，作为继承大统的儿子，没有一点雄心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位李治性懦弱，才平庸，还恹然多病。所以，称“龙朔”，不乏作为“帝王龙”的李治想由其时开始，振作、有为一番之意。当然，想法是一回事，做到做不到是另一回事。

大明宫的确修得很宏伟，仅城门就有十一座，殿阁馆院几十所，总面积是北京紫禁城的三倍半。“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是大诗人王维描写大明宫盛景的名句。其实，这两句诗后面还有两句：“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衮龙”即“龙衮”，也就是皇上穿的龙袍。那么，这两句诗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早晨的阳光刚刚照到皇宫的仙人掌上，那仙人掌好像在微微晃动；

殿堂门外的香炉里烟气袅袅，那香烟好像要围绕着皇上的龙袍飘浮。

位于龙首原南沿的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其殿基高于地面达四丈有余。为了方便皇上和百官上朝议事，当年的建筑者们，在殿前培土为坡，铺以砖石，修成长达二十多丈的斜坡阶道，分为平行的三条：皇帝走中间的御道，百官走两边的侧道。此三条阶道“宛如龙行而垂其尾”，故得名“龙尾道”——此为“建筑龙”，即因建筑似龙形而得龙名之一例。

由于此道坡长阶高，那个时候又没有电梯，皇帝可以坐在龙轿上让人抬着上去，百官们没有此待遇，只能靠抬着自己的双脚登攀。这对年龄轻些的官员或许算不了什么，而对那些年迈的大臣就有些吃不消了。时年八十岁的太子少卿柳公权就着过一回祸：那是唐大中十二年（公元 858 年）正月，宣宗李忱在含元殿上尊号为“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柳大人从坡下一步一喘地行至殿前，已累得头晕眼花，加上耳背，竟将封号误听为“光武和孝”，结果被御史弹劾，好在李忱在“帝王龙”系列中，还排不到“恶龙”“暴龙”中去——只罚了柳大书法家一季的俸禄了事。

（刊于《西安晚报》2008 年 6 月 10 日）



渭河龙迎来新机遇

渭河可以比龙、称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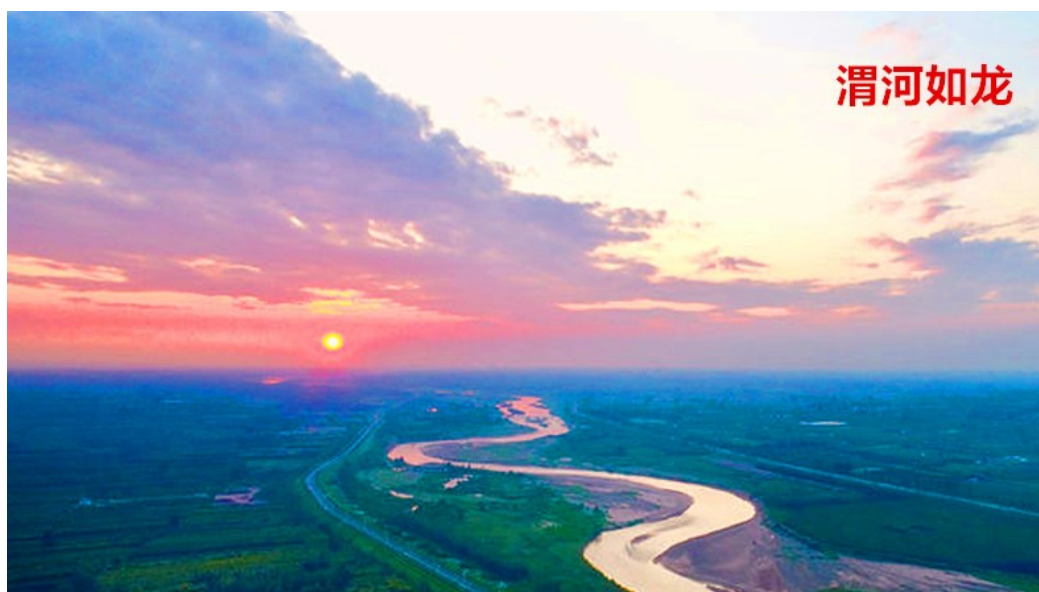
从地图上看，渭河真像一条蜿蜒的长龙。它自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发源，甘、宁、陕，一路流了 818 公里。历史上，这条龙水量丰沛、水质优美。这水滋养鱼鳖，所谓“渭水如镜色，中有鲤与鲂”；这水开载漕运，所谓“风帆一片水连天”；这水淤润沃土，使沿岸“粳稻漠漠，黍稷油油”；这水调节气候、成就美景，其“水清碧玉带，柳絮随风舞”，使多少文人墨客流连咏叹。对陕西人来说，这水因其中下游，全在关中境内而尤为重要。渭河流域集中了全省六成以上的人口、近六成的耕地、七成多的灌溉面积、近七成的粮食产量和八成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所以，渭河堪称三秦儿女的母亲河、生命河，是一条对陕西人民的生活影响甚大的“自然经济龙”。

文明是水催生和滋润起来的。中华文明能够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渭河的贡献可谓大矣。大地湾、马家窑、半坡、姜寨……先民在渭河边筑屋、制陶，繁衍生息；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在渭河边结网罟、养牺牲、画八卦、制嫁娶、肇农业、立国体，并率领族众沿渭河向中原迁徙、发展。周公制礼，商鞅变法，秦王一统，汉武开疆，张骞凿空，文景之治，唐皇盛世，闯王起义，张杨兵谏，伴随着这些政治家和国家大事的，还有周易、秦文、汉赋、唐诗，还有老子、后稷、张良、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孙思邈、唐玄奘、柳公权、颜真卿、李仪祉、于右任等一系列彪炳史册的人物。这些事件，都发生、演绎在渭河之滨；这些人物，都曾生长、生活于渭水之畔。渭水流域，已然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摇篮；滔滔渭河，堪称一条对中华文明发展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文政治龙”。

作为多色彩的综合性象征，龙族中不光有福生的善龙，也有祸生的孽龙，只是这后一种龙不占主导地位而已。作为“自然经济龙”，渭河也曾屡发洪水，祸及两岸百姓；近年来，更有“上游水干、中游污染、下游淤满”之说。作为“人

文政治龙”，被称为“祖龙”的秦始皇也有暴虐的一面。还有黄巢屠城、刘振华围城、决策失误使渭河下游成为悬河……

西咸新区开建了，古老的渭河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人们希望渭河成为贯穿现代化、生态化城市的一条“龙脉”，希望这条龙脉能起到串联关中城市群的作用，说到底，就是希望渭河龙更好地造福众生。这些希望当然都是美好的，但要变成现实，就需要辛勤的、扎实的，当然也是智慧的努力，需要“自然经济龙”与“人文政治龙”相参互动，需要每一位决策者，都成为以福生为己任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善龙！



（2011 年 11 月 13 日于西安慧雨庐）

中国原点新城与龙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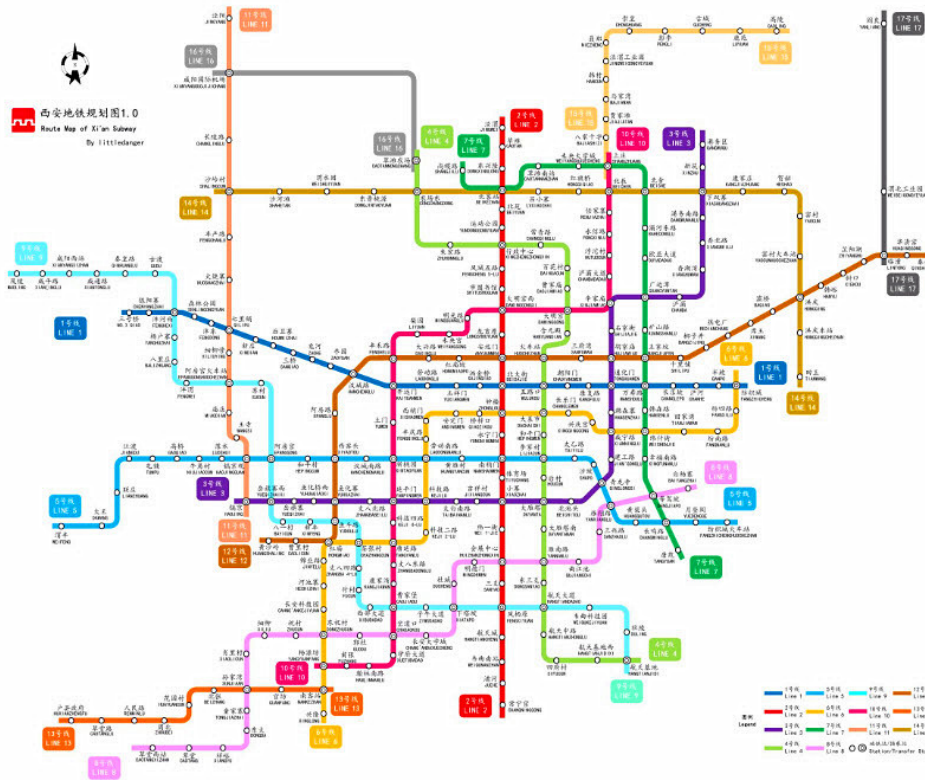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决定建立自己独立的大地坐标系统。通过实地考察、综合分析，最后将我国的大地原点，确定在陕西省泾阳县永乐镇北横流村境内。大地原点是我国地理坐标——经纬度的起算点和基准点，也是中华神州的地理中心。它不但在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象征着国家的尊严。

中国是龙的国度。如果以神州大地为龙，大地原点就处于龙心的位置，堪称“中国龙心”。陕西又是龙文化的发祥地、起源地，大地原点临近西安，位于陕西的中心部位，可谓“龙源脉冲起动点”。中国风水学把绵延的山脉称为龙脉。认为，中国的龙脉由西北的昆仑山发源，向东南延伸出三条：北龙脉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原，渡海而止；中龙脉由岷山入关中，至秦山入海；南龙脉由云贵、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大地原点正好处于中龙脉之上。

中国人也常常把江河称龙比龙。黄河是龙，黄河的支流——渭河、泾河也是龙。大地原点距泾渭交汇处不远，从地图上看，是在泾渭二龙的怀抱中，用风水学的话说，是一个得二龙润泽、受二龙拱护的“宝珠龙穴”；当然也可以说是“二龙护珠”之穴。

中国原点新城就围绕着“宝珠龙穴”而建，可谓占住了独一无二的“地利”；近年来，国家实施“大关中”战略，陕西打造泾渭新区，中国原点新城顺理成章地成为“大关中”战略的关节点和泾渭新区的一部分，可谓“天时”已来临。而中国原点新城的谋划、建设者们，又都是一些具备着龙智慧、昂扬着龙精神、激荡着龙情怀的“龙的传人”——这不仅是“人和”，而且是“人行”了：地利、天时，加上人和、人行，成就一番壮美辉煌的事业就是必然的了。

（2012 年 2 月 14 日于西安慧雨庐）



地铁与龙文化

西安地铁二号线开通运营，西安由此进入了地铁时代。西安人为之高兴，西安媒体为之欢呼，都在情理之中。大家可能有发现，在有关地铁的报道、诗文、题词中，“龙”字的出现频率特别高，如“龙行西安”“龙脉穿行”“潜龙之翔”“潜龙流光”“铁龙通幽陌”“地下飞龙”“神龙腾飞”，等等。

龙是中国古人创造的神奇灵物，地铁是当代人打造的交通工具，人们为什么会把二者联系在一起？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龙的取材对象说起。蛇是龙的主要的、重要的取材对象，蛇将其绵长的可弯转、可伸展的身躯，和能隐能显、能静能动且不断更新的性能贡献给了龙。于是，大凡具有蛇的形态的物体，都可以龙来比喻，如将连绵起伏的山脉称龙、将蜿蜒奔流的江河称龙等。引申开来，大凡连贯的事物都可以称龙，如“排成长龙”“一条龙服务”等。作为交通线路，地铁的形态是绵长的、

伸展的、连贯的，故人们一想到地铁，便想到了龙；一看到地铁，就好像看到了龙。

将西安地铁称龙，还有其地缘的、人文的因素。地铁二号线北端起首处，正好在西安城区之北龙首原附近。龙首原是古长安著名的黄土台原，相传，秦时，有一条龙从秦岭来到渭河饮水，其经过的地方形成一条土山，形状如龙，龙首原就是由这条龙所变，并由此得名。想想看，这条龙从秦岭至渭水，可谓贯通了古城南北，形成了古城的中轴“龙脉”；如今地铁二号线，也是贯通了古城南北，正好也在古城的中轴“龙脉”上。据此，若从神话演绎的角度说：地铁二号线堪称古秦龙的复活，是古秦龙的当代版。

有学者以“潜龙”喻地铁。“潜”的基本词义是“隐藏”，所谓“潜龙”，就是隐藏于地下或水底的龙。《周易》第一卦乾卦的卦词中有“潜龙勿用”句，意思是潜藏于地下或水底的龙不会，也不应有什么举动，最好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等时机到来后，再有所作为。这样的意思，显然已不适合于当今的地铁。地铁是“潜”入地下了，但不是隐藏不动，而是要运营，即要拉着旅客来来回回地跑。那么，如果要以“潜龙”喻地铁，那这条“潜龙”就与《周易》中讲的“潜龙”大不一样了，即：不是“潜龙勿用”，而是“潜龙有用”“潜龙多用”“潜龙大用”。

地铁与龙还可以从文化精神层面来分析。

我曾用“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八个字来概括龙的精神。“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龙的形象是“容合”而成的；龙的“容合”，反映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容合”。“容合”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毫无疑问，西安地铁也是“容合”而成的，它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材料之多杂、技术之精新、文化之博广、智慧之深湛，可谓荟取中外、粹取古今。如果开列一个清单，绝非我这篇文章所能容纳。别的不说，只说分布于各个地铁站及沿线文化墙的壁画、雕塑、标符等，你要欣赏下来且理解到位，就绝非一个短时间所能完成。

“福生”即“造福众生”。中华先民为了福佑族众而创造出龙，至少八千年以来，龙无论是作为水利神、农业神，还是作为祖先神、民族神，都承担着“福生”的职能。“福生”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幸福论。西安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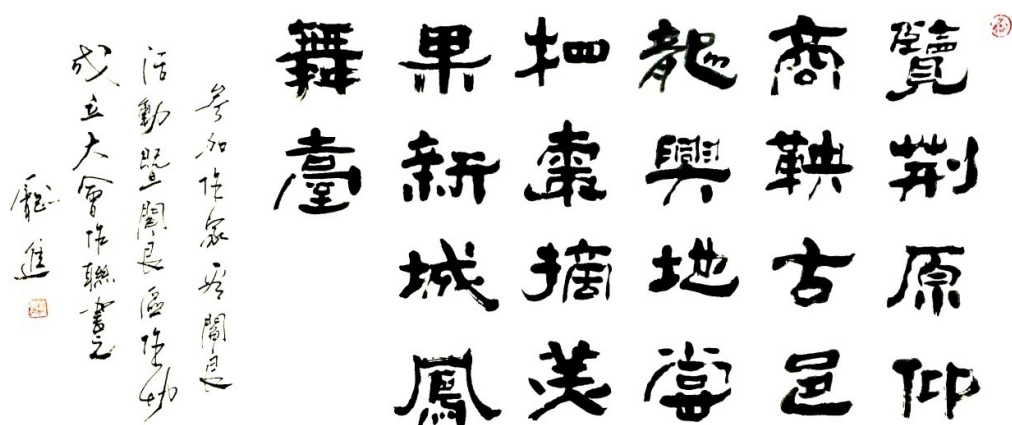
什么要修地铁？说到根本上，就是为了“福生”。继地铁二号线开通运营之后，西安还将在 2018 年前建成通车六条地铁线路，运营总里程接近 200 公里，基本形成主城区地铁交通网络，交通拥堵问题将有效缓解，城市发展的承载能力将进一步增强。这里的“基本形成”“有效缓解”和“进一步增强”，正是“福生”价值观、幸福论的践行和实现。

“谐天”即“与天和谐”，即尊重自然规律，践行科学发展观，走低碳、环保、有续的发展道路。龙是“谐天”的产物，是先民对自然力尊敬和神化的结晶。“谐天”是一种天人观，也是一种生态论。据报道，西安地铁在修建过程中，采用了许多安全、环保的材料；地铁建成运营后，许多市民会选择乘坐地铁出行、上下班，这样势必会减少小汽车的使用效率，也就意味着将降低油燃料的消耗量和有害尾气的排放量，从而减轻城市污染。当代的城市建设如何“谐天”，即如何处理环保与发展的关系？我提出过“适度为善”的观点，即要努力找到既环保又发展的适当点，这个点找到且把握住了，就是“善”。西安地铁的修建，可以说就是这样的“善”。

“奋进”即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龙的姿态是奋发向前的姿态，龙的演进是开拓创新的演进。“奋进”是一种人生观，也是一种强国论、强市论。当今的中国，是一个蓬勃向上、奋勇向前的中国。谁不进步，谁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甩到后面。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举世公认，但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还需着力打造。地铁是现代化大都市的标志，西安有了地铁，意味着这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古都赶上了时代的步伐，向世界亮出了一派“国际范儿”。同时，西安地铁已将西安人高标实干、奋力创优的风貌和一个内陆城市的经济实力展示于世人，也必将成为继续展示““人文西安、活力西安、和谐西安””的风景线。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说：龙文化为地铁提供了象征喻体、想象空间、文化内涵和精神底蕴，地铁则为龙文化提供了新美的载体、流动的展廊，从而发展、丰富了龙文化。我讲过，龙文化是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不断纳新、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文化，是开放性、动态性、普适性的文化，西安地铁的开通运营，并由此衍生的多姿多彩的文化事象，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刊于《西安晚报》2011 年 10 月 30 日）



龙腾凤翥说閿良

甲午初春，应邀参加“春韵荆山·情愫栢阳”——作家看閿良活动暨閿良区作协成立大会，被聘为该协会顾问。之后，参观了荆山原、汉太上皇陵、栢阳广场、相枣古树林、丰宜果蔬园、关山新区等。归后，作联一副并书之，曰：“览荆原仰商鞅古邑龙兴地，尝相枣摘美果新城凤舞台。”

言閿良为“龙兴地”，理由有六——

其一：东西走向的荆山原也称荆山，位于閿良区北部与富平县交界处。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黄帝铸鼎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座山。黄帝与龙关系密切，有“黄帝龙颜”“轩辕黄龙体”等说法。黄帝所铸之鼎是龙鼎；鼎铸成后，天上的神龙下界迎接黄帝，黄帝便乘龙升天。黄帝是“神话龙”的对应者和演绎者。

其二：今閿良区武屯镇境内有古栢阳城遗址。古栢阳在春秋时属晋国管辖，称栢邑，后成为秦地。战国时，栢阳曾做过秦国的都城，时在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到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其间，秦孝公嬴渠梁支持商鞅实行“变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为后来的秦始皇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中国有“人杰龙”，即将杰出人物称龙比龙的传

统，从这个意义上讲，秦孝公和商鞅都可称龙，是变法图强之龙。而秦孝公的后代秦始皇嬴政则是“帝王龙”的滥觞者，被称为“祖龙”。



其三：楚汉战争结束后，汉高祖刘邦曾以古栢阳为都，五年后才搬到长安。刘邦居栢阳时，尊其父刘煊为太上皇。公元前 197 年，刘煊病逝，刘邦葬乃父于荆山原上，称万年陵，并设万年县。刘邦是“帝王龙”的承续者和光大者，他首创性地将自己的出身与龙联系在一起，称自己为“龙种”，所谓“真龙天子”的说法，就起自刘邦。

其四：荆山上曾有始建于西汉的道观龙游宫。该宫的得名当与“帝王龙”有关：一说汉武帝刘彻曾游幸此宫，赐该宫道人王长道为“龙游真人”。又说唐太宗李世民也曾游幸此宫，与宫中的铁冠道人下棋，称道人为“道仙”。另传说龙游宫院中曾有古柏一棵，柏形有“龙狮”之态——这当属“树木龙”范畴了。

其五：石川河从阎良境内流过。相传很久以前，荆山下两村民因争水发生械斗，闹出了人命，玉皇大帝责令东海龙王平息事端，龙王派儿子小白龙去处理。小白龙化作年轻书生来到荆山下，遇一因乞雨昏倒的老人，便上前施救。老人苏醒后邀小白龙至家，遂将女儿荆花许配小白龙。小白龙回宫复命，言人间旱象及与荆花爱恋事，遭龙王痛斥。后小白龙重返凡间，化作石川河以滋润两岸土地，

河中青石为龙鳞所变。——此为“传说龙”。

其六：近当代阎良的英雄模范人物，凡男性者，都可以称为“人杰龙”。如李虎臣、许权中、郭子明、武伯伦、唐长红、周自全、黄炳新、李中华、宋庆国、沈星、张小平……

言阎良为“凤舞台”，理由有三——

其一：阎良有凤凰村、凤凰路街道，相传曾有吉祥神鸟凤凰飞落其地。

其二：凤凰是中国古人主要对有羽翼类动物的集合和升华，引申而泛言之，凡是生羽有翼形美者，皆可以凤凰为喻。阎良是中国飞机的“摇篮”，有“中国航空城”之誉，先后有三十多种军用、民用飞机由阎良飞上蓝天，这些承载着发展民族航空工业的追求和梦想的飞行器，都堪称“美凤”“威凤”“瑞凤”。

其三：中国自古有将杰出女性称凤、比凤的传统，故近当代阎良的英雄模范人物，凡女性者，都可以称为“人杰凤”，如徐九龄、高玉伟、薛莹……当今阎良区区委书记王凤萍，不但是一位女性，其姓名中就有一个凤。在采风活动中，我们一行到了栗邑村丰宜果蔬园，看大棚，摘草莓，不禁为该园的风光、丰产而喜悦、而陶醉，而该园的当家人王思妮，端庄大气，有祥凤之质、美凤之态。

我曾总结，龙的精神是八个字：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凤的精髓是两个字：和美。阎良无疑是这十个字的体现、践行之地和发扬、光大之地。如“容合”——这个词为我创造，意为“兼容、包容、综合、化合”，龙凤就是“容合”结晶；阎良区所取得成就，阎良人所做的贡献，从天上飞的飞机，到地上产的甜瓜，从荆原上的农家乐到关山镇的新家园，没有哪一个项目不是“容合”的产物。还有“奋进”，意为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古代在栌阳实行变法的秦孝公、商鞅是奋进的；革命年代在关中抛头颅、洒热血的许权中、徐九龄是奋进的；当今勤劳在设计室、蓝天上、楼宇间、田野里的二十多万阎良人，不奋进者有几个呢？！

（2014年5月1日于西安龙凤堂）

龙城太原

中国境内有龙城多座。之所以称龙城，多是因为有帝王出生、居住，或在其城建过都，即主要来源于笔者讲的“帝王龙”。之外，也有建筑龙和自然地形如龙即山水龙等因素。无论源于“帝王龙”“建筑龙”，还是“山水龙”，都多有民间传说、故事相伴随。

龙城规模最大者，当数太原。太原的前身是初建于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的晋阳城。之后，太原先后做过赵国都城、秦太原郡治、汉初代国都、汉并州治、曹魏并州治、西晋太原国都、前秦都城、北魏并州治、北魏末期实际行政中心、东魏下都和实际行政中心、北齐别都和实际行政中心、隋太原郡治、唐初并州治、武周北都、唐北京、前晋都城、后唐西京和北京、后晋北京、后汉北京、北汉都城。

人们熟悉的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等九个皇帝都是从太原起家，后成为一代帝王的。而这些帝王，几乎都有与龙相关的传说、说辞。如：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与薄姬所生，继位前为代王。《史记·外戚世家》载，刘邦在临幸薄姬时，薄姬曾言：“昨暮夜妾梦苍龙据吾腹。”刘邦说：“此贵征也，吾为汝遂成之。”于是“一幸生男，是为代王”。再如：唐太宗李世民，《太平御览·皇王部三十四》引《唐书》载，李世民出生时，“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其四岁时，“有书生自言善相，谒高祖曰：‘公贵人也，且有贵子。’因见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据此，说太原是“生龙”“潜龙”“兴龙”之城，当不为过。

风水学认为太原北方的系舟山是晋阳龙脉的龙首，西南的龙山、天龙山是龙尾，而晋阳城正是龙腹所在，故此城会有“真龙天子”出现。还有，南北走向的太原老城区，狭长而蜿蜒，形呈“龙相”。据说李世民晋阳起兵后，为了防止再

有“真龙天子”出现，就将其街巷的十字路口全都改做丁字路口，以“断龙脉”。

到了宋初，宋军攻打太原城，北汉主刘继元被迫投降。赵匡胤、赵光义兄弟，闻知太原为“龙城”、有可能出“真龙天子”的说法，为了不再有人冒出来争夺天下，决意焚毁晋阳古城。于是，下令“拔龙角”，即削去系舟山的山头，使其龙脉风水不在；重建太原城时，也效法李世民的做法，只允许修丁字街不允许修十字街，目的是将“丁（钉）子”“钉”在龙腹上，使其不得翻身。

上述之外，太原市中心区龙潭公园内有分为北湖和南湖两个部分的龙潭湖，水面宽阔，传说有蛟龙栖息于此。如今，龙潭公园已成为一座开放式文化生态公园，内有“牛头螭纹春秋大鼎”“玉夔龙环大型地景”“龙吟岛”“跑泉动感巨龙”等龙文化景观。

（2020 年 12 月 29 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龙套

龙套首先指传统戏剧的一种服装。该服装对襟大袖，满绣着彩花和龙纹，前后开叉，四周镶边，颜色不一，为帝王贵官侍者之服饰。此服之得名，一说是因为其虽有红、黄、绿、蓝、白、黑之别，但大都绣有龙纹；一说是因为穿此服者，是帝王的侍从，帝王为龙，率先出场的侍从不过是龙身外的一个“套”而已。于是，龙套就有了两个引申义：戏剧中扮演侍从的角色，和表演侍从这种角色的一系列程式套路。龙套无名无姓，不是一个演员演一个角色，而是称作“堂”（四人为一堂）的一组、或两组演员，扮演诸如“大家”“千军”“众将官”“喽罗们”“小子们”等群众性、集体性角色。

龙套在舞台上站立，起助威增仪的作用，这时候的讲究是“站如钉”，即一动不动，间或高喉咙大嗓门，“啊”“噢”“好”“有”地喊几声。站之外便是走了，或手持门旗、火旗、水旗、风旗、云牌等，几番舞动；或手持刀枪剑戟，对打、厮杀片刻；或来回穿梭，变换队形排列：总之是通过走及种种动作，将出征、行军、巡视、对阵、开打、破阵、混战、追杀、升帐、登殿、堂审、相会、迎送、行刑等等不同的舞台环境，象征性、程式化地展示给观众。这时候的走是快走，讲究“走如风”，相当于小跑，于是便有了“跑龙套”一说。

和总是占居舞台中心位置、吸引着追光灯的主角相比，龙套起的作用是陪衬、铺垫、烘托、渲染和象征。在旧戏班里，龙套被归入“杂行”，排在家院、报子等“梢干零碎”之后，常常不被人看重。然而，龙套却是不可缺少的，就像一支队伍，没有了成行的兵卒，将帅就不成其为将帅；就像一个国家，没有了连片的土地，国王也就不成其为国王。小小一方舞台，之所以能让人感觉变幻多端、气象万千，没有龙套的“跑”功，是不可想象的。

龙套是舞台上的五彩符号，其象征意义复杂而多变，有“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千军万马”之说，要求演员“装龙是龙，装狗是狗，装只老鼠顺墙走”。

这便对多方面地锻炼演员的表演能力大有好处。大凡从事戏剧表演艺术者，一般都要从“跑龙套”开始，然后才演旗、锣、伞、报，再演有名有姓的配角、直到挑起大梁，成为观众注目和拥戴的主角。著名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就曾坦言自己的戏剧生涯是从“跑龙套”开始的，并称自己是京剧里的头件“龙套”。

也有一辈子跑龙套出名的艺术家，如黄宗洛。黄先生从年轻学戏时就演“没名没姓，只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群众角色，要饭的、打鼓的、说书的、当兵的、拉洋车的等等，不下五十种。在现代话剧《智取威虎山》里，黄先生“一赶四”，连续扮演了山民、道士、匪徒小喽罗、解放军战士等“四组不同的群体”。年逾花甲之后，黄先生还在一出现代剧中演了个瘫痪老人，“尽管张嘴只能发几个单音，却不时博得堂前阵阵喝彩”。黄先生将此看作“是新老观众对他数十年来安于平凡工作的一种鼓励”。其师母、画家胡絮青曾为黄先生题诗作画，云：“常现地角乱石间，餐风饮露自怡然；但求遍野葱葱绿，休与红花争娇妍。”黄先生则总结自己是“以跑龙套始又以跑龙套终，可谓善始善终”。

龙套当然不局限于舞台剧。影视剧里也多有龙套。刘仪伟在做电视节目主持人之前，就在电影《战争子午线》里演过五个龙套：一个受伤的八路军战士、一个日本人、两具尸体、一个无名无姓，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只一个劲地在那里跑的人。在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浙江横店，不少农民扔下锄头铁锨跑起了龙套。那里有几个“临时演员村”，住的都是放弃田野耕作，专门谋求在影视剧中出演一般群众的“横漂族”。据说，这些人的收入还不低，比务农时要高出几倍。

龙套也不局限于艺术界。各行各业都是既有声名显赫的主角，又有名姓在榜的配角，更有默默无闻的龙套。好似一座金字塔，主角稀少居塔尖，呼风唤雨，威风八面，当然也有“高处不胜寒”的时候；配角不少居中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龙套众多，密密实实，芸芸泱泱，构筑着庞大的底座，支撑着那些主角和配角。当然，龙套也有脱颖而出成为配角、主角者，但大部分龙套，终其一生都是龙套。还有一种作为成人用品的龙套，不过是以龙喻男性阳根。——此龙套与上述龙套功用大不相同，这里不说也罢。

（刊于《西安晚报》2006年7月18日）

乌龙与乌龙球

谈“乌龙”首先得说“乌”。“乌”字最早为乌鸦的象形字，“乌”即“乌鸦”的本义。由于乌鸦全身被覆黑色羽毛，因而“乌”便有了“黑”的引申义。这样，“乌龙”的首要的意思就是黑色的龙，即“黑龙”。

民间有不少关于乌龙的传说故事。如《望娘滩》：村童喜儿在溪水中拾得一珠，不慎吞入肚内。于是，头上生角，眼珠突出，嘴巴咧开，身子拉长，伏砚舔墨后，变作乌龙，轰隆隆腾空而去。他的父母一面追赶，一面大声呼叫。叫一声，乌龙回一次头。一共叫了十八声，乌龙回了十八次头，回头的地方就聚起十八个沙滩。乌龙惦记着父母乡邻，每年都要回家乡行雨。人们感念乌龙，每年清明节前后，都要从烟囱里冒一股青烟上去，使乌龙能准确地认出家乡。还有《珠凤与乌龙》：村姑珠凤打水时挂上来一条小黑蛇，她怜惜地将黑蛇放回井中。回家后屋中出现一位英俊小伙，小伙说自己是一条乌龙——渭河龙君的五太子，诚谢小姐救命之恩。又将一颗宝珠放到她的手中，说这是颗龙珠，放入水缸，可免天天挑水之苦。珠凤照办，果然甜水满缸，用之不竭。不久，尹姓财主欲强抢珠凤顶债，珠凤愤而投井，被乌龙搭救托起。尹姓财主又来抢亲，乌龙现出真形，口含龙珠，喷水逐浪，将财主一行冲入渭河，作了鱼鳖之食。天霁云散，乌龙和珠凤笑逐颜开，情结百年之好。这两个故事中的乌龙，都是以肤色为名的，即黑色的龙。

龙是神物，现实生物中不会有，有的都是龙的容合对象及种种“化身”，比如蛇、鱼、马、狗等，都有龙之喻、龙之称，故而古人诗文中的乌龙，多指黑蛇、黑鱼、黑马、黑狗。《搜神后记》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晋时会稽人张然，养狗名乌龙，有家奴与张然妻私通，密谋杀害张然。关键时刻，乌龙咬伤家奴，救了主人一命。唐代诗人白居易诗句“乌龙卧不惊，青鸟飞相逐”（《长庆集·和梦

游春一百韵》、李商隐诗句“遥知小阁还斜照，羨杀乌龙卧锦茵”（《李义山诗集·题二首后重有戏赠任秀才》），用的都是这个典故。

乌龙还是茶名，指产于福建、广东、台湾等地，介于红茶、绿茶之间，俗称“绿叶红镶边”的乌龙茶。此茶为何称“乌龙”？有地名转化说、茶树品种转用说、宋元龙凤贡茶演变说等多种。流传于福建的一则传说是这样的：很早以前，安溪西洋乡南岩村，有一位单名“龙”的以种茶、狩猎为生的青年，因饱经日晒而浑身黝黑，人们便以“乌龙”称之。一日，乌龙上山采茶，返回路上捕获一只山獐，因到家后忙于宰杀山獐，忘了制茶。隔天清早才发现搁置一晚的茶叶已经萎凋，有的叶子边缘变成红色且散发出阵阵清香。乌龙赶紧动手炒制，没想到做出来的茶叶一经冲泡，竟是别具风味，甘香异常。乌龙细心琢磨，终于悟出奥秘：原来茶叶在篓中，经一路奔跑时的颠簸，是为“摇青”；后放了一夜，是为“凉青”，所以制作出来的茶叶便与以往不同。后来乌龙按悟出来的方法反复试验，终于创制出一套新的制茶技术。他把技术传给众乡亲，人家为了感谢他，就把这种茶叫做“乌龙茶”。乌龙去世后，当地群众还在南岩山上盖庙塑像纪念他。

乌龙还有“搞笑”“出错”“意外”“犯糊涂”“颠三倒四”“戏剧性现象”“令人哭笑不得”等意。这些意思都与“乌龙球”的说法有关。“乌龙球”一词的起源有两说，一是英语中有“own goal”一词，意为“自进本方球门的球”，其粤语发音与“乌龙球”接近，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起，香港媒体在报道中即将其译为“乌龙”；二是广东有民间传说称，某年久旱不雨，人们祈求青龙，谁知青龙未至，倒来了一条给人们带来灾难的乌龙。于是，便将做了事与愿违的事情称作“摆乌龙”。在足球赛场上，乌龙球本指球员将球误打入自家大门，给对方加了分。后来，也将开球、传球、接球、防球、抢球、扑球、射门等不到位，以及球场、球员的丑闻等，也称作“乌龙”。如所谓的《世界足坛乌龙十大丑闻》中，就包括有假球、队员吸毒、种族歧视、三角性丑闻、通奸、嫖妓、同室操戈、自曝性事、涉嫌强奸等内容。

一些文艺作品，采用“乌龙”之名，概因其内容中多有曲折搞笑的、出人意料的情节，如电视连续剧《乌龙闯情关》《乌龙大状师》《乌龙道士》等。

（刊于《西安晚报》2006年4月18日）

龙树婆娑

在龙的起源与本质诸说中，有一种“龙为树神说”。持此说的学者认为：“中国人传说中的龙，原是树神的化身。中国人对龙的崇拜，是树神崇拜的曲折反映，龙是树神，是植物之神。龙的原型是四季常青的松、柏（主要是松）一类乔木。”“松、龙不仅外部形象上惊人地相似，而且龙的其他属性，与松也同样惊人地相似。”此说虽不被大多数学者认同，但树与龙的关系还是值得重视的。

树得龙名，多是以其形似。北京昌平十三陵北部深山中有一座延寿寺，寺中有一棵盘龙松。松枝相盘互绕，层层叠叠，如无数虬龙盘纽，故名。此松树冠很大，大半个寺院得其庇荫。据《昌平县志》载，此寺初建于五百多年前的明代，盘龙松当为寺中僧人所植。传说清末，延寿寺曾遭雷击，大火烧了三昼夜才熄，殿堂被烧毁，惟盘龙松未罹火患，蓊绿如故。生长在北京天坛回音壁西墙外的九龙柏是北京市区最古老的一棵柏树，距今已有八九百年的历史。其树干扭结纠曲，宛如九条龙盘旋而上，故名。山西绵山白云洞附近的山崖上攀附着一棵从石缝中长出的柏树，如一条昂首舞奔的飞龙，树顶长出柏枝绿叶，尤如龙角。游客走过去后回头一看，更显真切传神，故称“回头看柏龙”。还有，北京西山长安寺的白皮龙爪松，北京门头沟戒台寺的九龙松、盘龙松，安徽黄山上的龙爪松、卧龙松、绕龙松，山东崂山太清宫中的“古柏盘龙”等，也都是以形状似龙而得名。

河北省内丘县境内的鹊山祠，是祭祀神医扁鹊的地方。据说古时，当地群众为了纪念扁鹊和其弟子们救死扶伤的功德，遂在祠庙附近栽种了九棵柏树，年复一年，这些柏树长成苍劲挺拔、枝繁叶茂的大树，而众多树根则纵横盘曲，相互引，犹如群龙盘戏，故称“九龙柏”。也有传说认为，扁鹊是天上的神龙下凡，其弟子随师多年，也都秉赋了龙性，而这些柏树又为扁鹊师徒而栽，故称“九龙柏。”

将形状似龙的松、柏、槐等树木以龙相称，反映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敬重，是

龙文化与树木文化、生态文化的结合。这样的“结合”，无疑具有生态、环保及审美的意义。

树木品种中也不乏以龙为名者，如龙松、龙柏、龙柳、龙爪槐、龙血树、火龙果等。龙松其树冠形似龙体；龙柏其侧枝扭曲如龙、抱干而生；龙柳的干、枝弯曲，如群龙共舞；龙爪槐树条盘曲下垂，颇似龙爪；龙血树原产非洲西部的加那利群岛，当地人传说，该树里流出的红色液体是龙血；火龙果原产中美洲热带地区，因其外表肉质鳞片似龙鳞而得名。这些龙字号树木，都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多年来，一些以龙文化为主题的景区请笔者做顾问，笔者便建议这些景区引进、栽植一些龙字号树木，并设置标志、介绍牌。笔者的想法是，既然是龙文化景区，没有龙树是让人遗憾的。栽植龙树，既绿化了景区，增加了景致，又弘扬了龙文化，何乐而不为呢？

（刊于《西安日报》2014年3月11日）



龙竹

龙文化可以“容合”许多文化，竹文化也不例外。

这种容合的一种表现是以龙名竹。计有：龙头竹、龙丹竹、巨龙竹、凹节龙竹、长舌龙竹、小叶龙竹、黑秆龙竹、粗穗龙竹、美穗龙竹、毛脚龙竹、歪脚龙竹、大弯龙竹、勃氏龙竹、福贡龙竹、版纳龙竹、建水龙竹、金平龙竹、毛龙竹、云南龙竹、云龙箭竹、玉龙箭竹、马来甜龙竹、缅甸龙拐竹，等等。

另一种表现是以竹为龙。如，贵州雷山的苗族就以竹为龙，将合一的龙竹，作为种族的始祖神和保护神。相传后汉时，汝南人费长房学道十年后归家，见葛陂湖内百怪兴风，于是受师父之命，投竹湖中，竹即化为飞龙，此后湖内平静，再无怪异。晋人葛洪将竹化为龙故事收入《神仙传》。唐人陈陶云《咏竹》诗云：“长听南园风雨夜，恐生鳞甲尽为龙。”韦庄《王道者》诗云：“因携竹杖闻龙气”。还有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将竹制战具称竹龙。宋代人以竹引水，时称“竹龙行雨”；苏轼有诗云：“卧听谡谡碎龙鳞，俯看苍龙玉立身”。另外，古人还将竹笛声称作“龙吟”，将竹笋、小竹别名“龙孙”……

生活在黄河、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区的汉族群众，还将农历五月十三日的栽竹之日（又称“竹醉日”“竹迷日”“竹生日”）称为“龙生日”。认为此日前后，旧笋已成竹，新根未蹿行，便于移栽、种植，且易于成活，于是。从资料记载看，南北朝时已有此俗。宋代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言：“五月十三日，谓之龙生日，可种竹，《齐民要术》所谓竹醉日也。”“若这天遇雨则更佳。”宋人刘延世《竹迷日种竹》诗云：“梅蒸方过有余润，竹醉由来自古云。掘地聊栽数竿竹，开帘还当一溪云。”

以竹为龙，表面上看，是竹色苍青，具龙体之色；竹叶交错，有龙鳞之像。而其深层含义是龙之德可以吸纳、统摄竹之德。作为多年生的禾本科木质常绿植物，竹有修长、挺直、空心、有节、枝畅叶繁、经冬不凋等自然品性。这些品性

和人们向往追求的道德操守、理想人格相吻合。于是，自然品性被人文精神关照，竹就有了“德”，这便是“本固”“性直”“虚心”“节贞”等等。而龙德是君子的道德理想、生活信念的神格化、意象化，它如孔子所言，具有“大”而“神圣”的特点，可以纳括竹之德；反过来说就是：潇洒美观的竹子，不但可以体现竹德，也可以昭示龙德。

（刊于《西安晚报》2006年6月6日；收入《龙子龙孙龙文化》，庞进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龙文化与面文化

三秦文化研究会要开面食文化研讨会，因多年来一直在做龙文化研究，就想到将龙和面联系起来做些考察。

经过大体上的梳理、统计，以龙为名的面食品种有“四海游龙面”“盘龙一根面”“龙须面”“龙虎面”“玄龙火锅面”“华龙面”等。还有一些面，未取龙名，却与龙有关，如闻名遐迩的陕西岐山臊子面。

龙是容合起来的神物，自然界里没有。自然界里，有龙的容合对象。故生活中，人们就以龙的容合对象代替龙、指称龙。出现在古今面食、菜点中的龙，一般都是鳄、蛇、鱼、虾等龙的容合对象。

陕西岐山面的起源与龙有关：传说周武王伐纣大军开拔之前，曾于渭水中得蛟龙一条。为了让大家都沾点龙气，武王决定把这条龙让部族成员敬食之。一条龙，显然不够成千上万的人吃，于是就将龙之肉放入大锅煮汤，以汤浇面，吃了面，把汤再倒回锅内。这样不断地反复，使大家都喝到了龙汤，沾上了龙气。武王用这种办法，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伐纣大军所向披靡，一举成功，不能说与吃此面无关。据此，我们可以将岐山臊子面叫做“蛟龙面”。当然，古人眼里的蛟龙，只能是龙的某种容合对象——鳄鱼或蟒蛇。

有一款面食叫“四海游龙面”，这种面要用小青龙、泰皇濑尿虾、野生大明虾、青对虾等四种虾来做。具体做法是：用葱姜和黄酒加盐和白胡椒粉腌虾，蒸熟放凉，留下头尾，剥去壳，卸下虾尾巴肉，斜刀片成片，用黄瓜丝，红黄椒丝，香菇丝，银芽段炒了拌凉面，再摆上四只大虾即成。此面中的“龙”，其实就是虾。

龙的躯体多取材于蛇，绵长、连贯、可弯转、可盘曲是蛇的形象特征。故凡是绵长、连贯、弯转、盘曲的物体都可以称龙、比龙，如把长城比龙、把青藏铁路比龙、把排长队叫排长龙，等等。

山西省有一种面食叫“盘龙一根面”。此面下到锅里是一根，捞到碗里也是一根，因柔韧、细长、顺滑，只有盘起来碗里才能放下，故称“盘龙一根面”。因含有“一根到底，顺顺滑滑”的吉祥彩头，故在山西人的生日宴中必不可少。此面即以形象似龙而得名。陕西的杨凌蘸水面与盘龙一根面相似，只是杨凌蘸水面不是一锅下一根，而是按客人所点要的数量，往往数根一起下锅，煮熟后，捞到盆里，可能是一根，也可能是两根、三根。由其柔韧、细长、顺滑的特点看，可以将杨凌蘸水面称为“水龙面”。

还有大家熟悉的“龙须面”。据说此面是由山东的抻面演变而来，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相传明代御膳房里有位厨师，在立春吃春饼的日子里，做了一种细如发丝的面条，宛如龙须，皇帝胃口大开，边品尝，边赞赏，龙颜大悦，赞不绝口。此面因之而名。



龙须面一款

龙须面的得名，一是形状似龙的胡须，二是得到了皇帝的称赞。大家知道，《周易·乾卦》爻辞中有“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句，这是以龙比君主帝王的源头，所谓“九五之尊”。秦代，秦始皇被称为“祖龙”；汉代，开国皇帝刘

邦自称“龙子”。由此，历代帝王都比龙、称龙。这种帝王龙文化反映到饮食上，就出现了不少因与帝王有关而得名的龙食、龙菜，龙须面即是其一。

在中国古代，以龙比人的情形非帝王所垄断，一些杰出人物也有龙之比、龙之称。如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把老子比为龙，有“老子犹龙”的典故；三国时的诸葛亮号“卧龙”、赵云字“子龙”，魏晋时的阮籍称“卧龙”，等等。

河南省郑州市长春饭店经营一种“龙虎面”，此面用高汤下面，配以面片包肉馅，汤鲜味美，经济实惠，颇受人们欢迎。其面的得名，一是因其形状：面条如盘龙，面片包肉似睡虎，龙虎相聚，故名。二是一则传说：相传北宋时期，黑脸包公手下有四名得力校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张、赵二人都有偏食的习惯。张龙喜吃面条，赵虎爱吃面片包肉，长期以来，二人各吃各的，倒也相安无事。只是苦了厨师，每天得为二人分别打理。有一次，一桩紧急的公事落在张、赵身上，二人马上就要出发，时间十分紧迫。厨师来不及分锅准备，就把面条和面片包肉并成一锅煮起来。张龙、赵虎一看大怒，不食而去。此事被包公知晓，便将二人召来，狠狠地责备了一顿，并下令二人把这混煮的面食吃下去。张、赵二人很不情愿，但碍于严令，只好勉强地动起了筷子。不料刚吃了几口，二人都感到滋味十分鲜美，不禁边吃边赞起来，一会儿就风卷残云，全吃了下去。包公看了很高兴，说道：“一龙一虎共食，此面可称为龙虎面。”从此，龙虎面的美名不胫而走，其制法也代代流传。

这是因人有龙名而有面名，而人以龙名的动因，是想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杰。

大家知道，经过至少八千年的创造、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这是针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的。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言，大家则更愿意将龙视为一种吉祥符号。也就是说，人们相信，或者说希望，龙能给自己、给家庭、给族团、给企业带来绵绵不断的好处。

于是，不少企业、不少产品都以龙为名。表现在面食上，有河北省秦皇岛市的“燕山龙”荞麦面、杂粮面，江西省樟树市的“变色龙面”，浙江省金华市的“金龙牛肉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玄龙火锅面”、河北省隆尧县的“华龙面业”、湖北省宜昌市的“金龙面业”、河南省卫辉市的“龙升面业”，等。

以龙为名的面食还有一种叫“乌龙面”。日文写作“うどん”，英文写作“udon”，在日文汉字中写为“馄饨”，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也被称为“乌冬面”。有资料

称，乌龙面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切面。唐朝时，日本僧人空海来中国长安学习佛教密宗，发现长安街头卖的这种面很好吃，就将其制作方法带回日本，传给了香川县赞岐地方的民众。后来逐步传播至日本各地。据此，乌龙面的得名，很可能是中国唐代“馄饨”一词发音的转化，即由“馄饨”到“乌冬”，再到“乌龙”。这里有三点可说：一是唐代的“馄饨”有可能和我们现在的“馄饨”不是一回事。二是有可能空海搞混了，把乌龙面叫成“馄饨”了。三是可惜乌龙面没有在我们这里流传下来。

乌龙面我在加拿大探亲时吃过多次，日本进口的，从超市买回来，包装像咱们的方便面，面饼为圆形，面条扁圆略粗，色白微黄，很耐煮，吃起来既筋道又滑软，汤料酱味突出。从其特征看，叫“乌龙”也说得过去，乌者，黑也。汤料中多酱，色泽就偏黑；而面条细长，有龙之形态。

乌龙面起初的基本做法是：先用盐水和面，促使面团内快速形成面筋，然后擀成一张大饼，再把大饼迭起来用刀切成面条。后来，在制作过程中向小麦面粉里加入适量大米粉，这样做出来的面条兼有切面和米粉之长，吃起来口感绵软滑溜，当然，还需要配上精心调制的汤料。现在的乌龙面基本都是机器加工，有的在和面时还会加上蔬菜汁等佐料，使其品种花样繁多。如秋田的稻庭乌龙面、群马的水泽乌龙面、埼玉的加须乌龙面、名古屋的味噌乌龙面、三重的伊势乌龙面、大阪的加上油豆腐的狐乌龙面、福岡的丸天乌龙面，等等。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龙文化具有广渗性。即广泛地渗透到中国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无处不龙处处龙，多种面食以龙为名就是一证。

二，龙文化具有容合性。龙是容合而成的神物，以龙为名的面食也都是容合的产物，这里有龙与面的容合，也有面与面的容合，还有面与各种配料的容合。

三，龙文化具有祥瑞性。龙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吉祥物，与面结合，体现并丰富了祥瑞的内涵。比如以面喻长寿，加上龙名，就吉祥而长寿。

四，龙文化具有播迁性。随着华人和入华学习者、访问者的脚步，龙文化传播到世界的各个地方。而中国面食，也是传播龙文化的一个载体，如乌龙面。

（2010年4月15日于西安慧雨庐）

龙之邮

中国的邮政是从清代光绪四年即 1878 年开始的。那时候还没有邮政局，先由海关兼办。海关在兼办邮政的十八年间，先后发行了“大龙邮票”“小龙邮票”和“慈禧 60 寿辰纪念邮票”三种以龙纹为主图案的邮票。

“大龙邮票”也称“海关大龙”票，是中国现代邮政肇始的标志。该票以蟠龙为主图，衬以祥云水浪。全套三枚，面值为 1 分银、3 分银和 5 分银。又因选用了不同的纸质而分为“薄纸大龙”“厚纸大龙”“阔边大龙”。还因印制过程中的设置差异而有“光齿”“毛齿”之分。该票 1878 年 6 月、7 月间首印，1882 年、1883 年两次加印，共印了 100 多万枚。目前，该票仅有不足 3 万枚幸存，是集邮爱好者千方百计索求的珍品，其中的“阔边大龙伍分银全张邮票”尤为珍贵。“小龙邮票”也称“海关小龙”票，是我国首次采用水印纸印制的邮票，邮票上的图案除蟠龙略小外，其他均相同于大龙邮票。该票 1885 年发行，全套三枚，发行量比“大龙邮票”大 1.5 倍。“慈禧 60 寿辰纪念邮票”是清代海关试办邮政后，于 1894 年 11 月，为庆祝慈禧太后 60 寿辰所发行的中国第一套纪念邮票。全套 9 枚，其中 6 枚以龙为图案。



“大龙邮票” 1分银、3分银、5分银

为什么在中国邮政事业诞生之初，龙就成为邮票图案的首选对象呢？这是由

龙在中华文化中的特殊地位造成的。按我的考察，七八千年来，龙在发展、演变中走过了三个阶段：由起初的自然（多种动物和天象）崇拜升华为神物（司水灵物、通天神兽）崇拜，再由神物崇拜发展至兼备人物喻体（指代帝王、喻比人杰）、皇权象征和吉祥符号，再升华至国家象征、民族标志兼备吉祥符号。这第三阶段就是在晚清以后实现的。同治年间，龙腾跃到了大清国的国旗上，俨然以中华的标徽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这样，用龙纹作为第一套邮票的主要图案就顺理成章了。在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国人民并没有因龙象征过帝王皇权就抛弃龙，而是承扬其代表中华文化、象征中华民族的功能，不断地赋予其与时代进步相吻合的正面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邮政管理部门先后发行了数十枚与龙有关的邮票。如1953年发行的《伟大祖国·古代发明》，一套四枚，其中两枚有龙：汉代科学家张衡发明创造的“地动仪”，其附饰为四条神龙造型；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发明创造的天文仪器“浑仪”（明代正统年间复制），其青铜支架为高浮雕龙。如1958年发行的《力争上游》邮票，图案为一队工交战线的职工高举红旗，驾驭一条巨龙，巨龙腾空而飞，掀起滔滔波浪。此后，还有1964年发行的《殷代铜器》，1973年发行的《中国出土文物》，1979年发行的《长沙楚墓帛画特种邮票》，1982年发行的《西周青铜器》，1999年发行的《九龙壁》，2000年发行的《龙（文物）》等等，都多有龙的图案。

生肖邮票上首次“见龙”是在1980年。1988年，国家邮电部发行了由中央美术学院学生祖天丽设计的《戊辰年》特种邮票：黄色的底色上，斑斓弯转的祥龙一爪支地，三爪腾空，张嘴翘鼻，作哈哈大笑状。图案采用大对比的装饰画法，设色艳丽，富有民间喜庆色彩。2000年，国家邮电局发行了一套二枚的《庚辰年》特种邮票。图案名称一为“祥龙腾飞”——取汉代瓦当龙纹衬以滔滔海浪；一为“旭日东升”——草书龙字衬以朝阳出水。

“龙票”既有文化内涵，又印制精美，历来为收藏者所青睐，“龙邮”也随之受到珍重。“龙票”在发行的同时，往往有大量的龙字号首日封、小本票、邮折、明信片上市。为了满足集邮爱好者的要求，各地邮局还纷纷在邮戳上做文章，如庚辰龙年到来之际，天津市推出了“兔龙交替”邮戳，西安市推出了“双龙太极阴阳戳”和“天地人和，龙腾盛世”八枚纪念邮戳。泱泱中华，龙的国度，龙

的家园。全国含“龙”字的地名上千个，这些地方使用的邮戳便是“龙戳”了。能在龙年龙票上加盖若干个龙戳（自然是盖得越多越好，但想盖全几乎是不可能的），对集邮爱好者而言，就是饶有兴味、求之不得的事情了。这些龙戳，可以按各种方式盖，如按“龙水”盖，有龙海、龙江、龙河、龙井、龙泉、龙港、龙渊、龙潭、龙池、龙溪、龙津、龙水，等；按“龙体”盖，有龙头、龙角、龙额、龙眼、龙鼻嘴、龙口、牙龙湾、龙舌、龙须河、龙颈、龙爪、龙尾，等等。



（刊于《西安晚报》2007年11月14日）

国外的龙邮票

对于集邮，我属于“割草打兔子”那种，平时收信看到不错的邮票，顺手剪下来而已，并未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但是，两年前，当妻子提出“咱们集一下龙邮票吧”的建议时，我欣然表示同意，原因朋友们都能猜到：做龙文化研究之需要也！于是，借助国际互联网，短短两个多月时间，花去三千多元，一百多张龙邮票就飞落到我们的集邮册里。

观摩这些龙邮票，我发现——

龙邮票已遍布世界各洲，也就是说，亚、非、欧、美、澳的一些国家，如日本、南非、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大都发行过以中华龙为主图案的邮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龙文化已传播到了全球各地，世界各国从政府机构到普通民众，都对中华民族的龙信仰、龙习俗表示了尊重、产生了兴趣。现在大家都在讲全球化，按我的理解，全球化绝不是一种文明的“一元通吃”化，而应该是各种文明的“多元集优”化。也就是说，利用当代科技提供的种种手段，各种文明全面交流，彼此借鉴，相互吸取，择优弘扬。世界各国发行中华龙邮票，体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它也印证着这样的观点：龙文化既是根源文化，也是标志文化；既是传统文化，也是时尚文化，既是中华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相信龙所蕴涵和所载的一些基本理念，如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能够随着龙邮票在内的传播手段，为更多的地球人所了解和接受，从而为构建新的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当然，就数量而言，龙邮票还是以亚洲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接壤毗邻的日本、韩国、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为多，反映了中华文化向周边国家的播迁和渗透。邮票上的龙图案显示，这些国家的龙与中华龙的关系是流与源的关系。比如日本的龙邮票，就反映了大约从东汉开始、中经盛唐，直到近代的中华龙文化向日本的传播情况。于是我们看到，日本的龙与中华

龙就神性和神职而言，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如龙是水神、是吉祥和权力的象征，龙有蛟龙、蟠龙、应龙、黄龙、青龙之分，等等。这些在日本发行的海水龙纹邮票、飞龙纹邮票、龙形壁画邮票上都有体现。

从画面内容看，龙邮票展现的多是龙的民俗活动。生肖民俗在中国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人至少有一亿多人“属龙”，还有一亿多人“属小龙（蛇）”。而且，中国人每过十二年都要过一个“龙年”。中国大陆及港、澳、台，每逢龙年都要发行龙年生肖票自不待言，海外各国也多在中国的龙年到来时发行龙邮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我们知悉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古巴、蒙古、几内亚、塔吉克斯坦、吐库曼斯坦等，也有我们不太熟悉的多哥、波利尼西亚、格林纳达、安的列斯、泽西岛、马绍尔群岛等。这些龙邮票上的龙，有取材于中国历代龙图的，也有直接表现龙的民俗活动的，如马来西亚公元 2000 年发行的中国龙年小型张一套两枚，图案就分别为龙舟竞渡和舞龙。

（2008 年 12 月 12 日于西安慧雨庐）



牛与龙的文化缘

牛是龙的重要的容合对象。

牛属于草食性哺乳动物。牛的祖先是几万年前生活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大陆的原牛。中国山西大同市博物馆陈列的原牛头骨，经鉴定已有七万年；安徽省博物馆保存的长约 1 米余的原牛骨心，发现于淮北地区更新世晚期地层。2004 年春天，陕西关中一位张姓农民在沔河的沙壕里挖出了一个巨大的牛头骨化石，这块牛头化石面额长 90 厘米，最宽处 28 厘米，两犄角长 120 厘米。几天后，他又在这个沙壕的不远处挖出两个牛犄角化石，一个牛犄角竟长达 126 厘米，最粗处直径达 13 厘米。牛的形象还广泛地出现在我国北方、西部、西南方各地的古岩画中。如在青海省格尔木市野牛沟岩画的一百六十幅岩画中，动物岩画约占百分之九十，而牛约占全部动物岩画的百分之八十五。

牛有形有力有精神，可养可役可食用，在古人的生产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不但重视牛，喜欢牛，使用牛，希望能拥有牛的力量，得到牛的帮助，还赋予牛以沟通天地的神性，将其作为牺牲奉献给神灵。这一切，是世界各地、各民族牛崇拜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华先民将牛作为龙的容合对象之一的主要原因。

牛向龙主要提供了自己的头部。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蟠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这是说，在神话传说中，中华民族的人文先祖炎帝，是其母亲女登感应了神龙首后孕生的，感龙首而孕生牛首，可见龙首与牛首之间的互化关系：龙首可以化为牛首，牛首也可以化为龙首。

牛首最突出的部分是角。对动物而言，角是雄性的标志和力量的象征。而且，角长在动物的头部，尖端扬起，指向天空，能给人以“通天”“近神”的联想。甲骨文中的牛字就突出了一对弯而向上的角。陕西扶风出土的西周史墙盘上面，

有八个字的关于牺牲之首的铭文，译成白话就是“牲首两角平齐有光泽，用来祭祀正相宜”（连劭名释文）。《礼记·王制》中也有“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宾客之牛，角尺”的话。古人祭天敬神，除了以牛为“三牢”之一外，还有可能以牛角为奏乐之器，因为牛角可以吹响，其音低沉、浑厚、悠扬——瑶、黎、苗、土家、仡佬等少数民族至今还有使用。这就可以说明，龙角以牛角为取材对象，主要是为了增添雄壮之神力和通天之神性。当然，从造型上看，牛角弯弯，两两成双，有曲线、对称之美——这也是龙所需要的。

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居住区，有崇拜牛角龙、牛龙的习俗。如苗族同胞的蜡染、绣品、饰物、雕塑的图案、造型，就多见牛角龙、牛龙。（苗族崇拜牛角龙、牛龙，可能与炎帝、蚩尤有关：相传“人身牛首”的炎帝被黄帝打败后，退守至南方，跟随他的苗民也跋山涉水最后落户在西南山区，或说是炎帝这位中华民族的“农神”“谷神”，最后成了管辖南方的天帝，被本是当地土著的苗民认做了自己的始祖。于是，苗人就绘制牛角龙、牛龙，以示崇拜。也有认为牛角龙、牛龙与蚩尤有关，因为传说中的蚩尤形象以牛角为标志。以蚩尤为统帅的九黎族被黄帝打败后，一部分向南迁徙，至西南山区，成为后世的苗族之祖。）

牛头成为龙头的取材对象也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支持。湖北黄梅焦墩遗址出土的断代在公元前 4000 年以上的由颜色各异的河卵石摆砌成的龙，其头部就似牛头；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断代在公元前 3300 年左右的玉雕龙，其头部也近似于牛头。另外，《尔雅翼》言龙“耳似牛”，这是说牛耳进入了龙的取材对象之列。还有，《水经注·漯水》言“有潜龙出于兹浦，形类青牛焉”，这是说有的龙形象类似于牛。

牛的品格、精神，可用朴实、勤劳、坚韧、奉献等来概括，所谓“但愿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南宋李纲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诗句）“老牛亦解韶光贵，不等扬鞭自奋蹄”（臧克家诗句）。这样的品格精神，也都成为龙的品格精神的组成部分。笔者将龙的精神总结概括为“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其“福生”“奋进”就包含着“朴实、勤劳、坚韧、奉献”。

（2021 年 1 月 19 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马能够被龙化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第一站到达古城西安，参观了名闻世界的兵马俑，题词说：“这个埋藏在地下的军队被视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是当之无愧的。它向我们述说了秦始皇在西安首次统一中国的宏伟大业。愿这些神秘的战士无声的力量能够在未来给予我们以共同的启迪！”据法新社报道，马克龙还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带来一匹马作为礼物，意在深化“法中友谊”。据悉，这匹八岁的骏马名为 Vé suve de Brekka，直到去年秋季一直在法国共和国骑兵卫队“服役”，2014 年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访问巴黎时观看了该卫队的表演，印象深刻。法新社报道时还告诉人们，法国总统的中文名字是“马克龙”，即“马战胜龙的意思”。

法新社对“马克龙”的解释可谓“一家之言”“一面之词”。在中国汉语中，“克”有“战胜”“克制”意，也有“能够”“可以”意，因此，“马克龙”也可以解释为“马能够成为龙”“马可以化为龙”“马能够被龙化”。

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的诸多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一种神物，其取材对象比较多，其中有马。

从形象上看，马头给龙头以取材参照。甲骨文中的某些龙字，头部窄长，就比较像马的头。汉代王充《论衡·龙虚》篇，言“世俗画龙之像，马首蛇尾”。在古人心目中，马是具有龙性的，是可以化为龙的。《周礼·夏官·司马》言：“马八尺以上为龙。”《吴承恩诗文集·送我入门来》言：“马有三分龙性。”柳宗元《龙马图赞》记：“明皇时，灵昌郡得异马于河，其状龙鳞、虺尾……后帝西幸，马至咸阳西入渭水化为龙，泳游去，不知所终。”

如此看来，马和龙的关系是不错的，龙是可以吸收马的一些质素的，而马在条件具备时，也是可以被“龙化”，成为龙的。

（2018 年 1 月 8 日于多伦多枫华阁）

从“龙马”到“孽龙”

周永康生于 1942 年，生肖属马。马是龙的取材对象之一。成语中有“龙马精神”，一个解释是像骏马一样精神；另一个解释是龙的精神和马的精神的结合，即以强健的姿态奋发进取，从而造福众生的精神。周永康也曾刻苦学习，也曾艰苦奋斗，其少年、青年时期，称其为“龙马”，应该是能说得过去的。

中国历史上，帝王之外，人们也把那些出类拔萃者称龙比龙，如孔子称老子为“龙”、诸葛亮号称“卧龙”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永康的中年时期，或者说腐败之前吧，称其为驰骋在广袤油田上的一匹“马龙”，也应该能说得过去。

然而可惜，这匹“马龙”后来竟演变成了一条“孽龙”。孽龙者，作恶造孽之龙也。祸害一方为小孽龙，祸害天下为大孽龙。

周永康由小孽龙而大孽龙。大孽龙身边往往簇拥一群小孽龙。

自古以来，孽龙无论大小，下场都不怎么好。当年炼石补天的女娲，就曾“杀黑龙以济冀州”，为什么呢？因为该黑龙发洪造孽，祸害众生。

宏观上看，就像世间有好人就一定会有坏人一样，泱泱龙族里，有福生的好龙，就一定会祸生的孽龙。人类能做到的，是想办法让好龙多些再多些，让孽龙少些再少些。

办法有吗？有，两个：他律与自律。他律就是法治，是以外部强制、惩戒的方式使龙们不敢造孽。自律就是信仰，是以内心修养、省察的方式使龙们不愿造孽。他律和自律的缺失，使周永康由龙马、马龙变成了孽龙。

孽龙层出，使健全和强化他律和自律的必要性、迫切性凸显。

（2014 年 8 月 2 日于西安龙凤堂）

乙未开春龙抬头

乙未年开春不久，就在报上看到了《龙该译作 dragon 还是 loong？陕籍全国政协委员岳崇雷珍民将携两“龙案”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消息，因自己多年来关注这个话题，就想看看这个消息会有多大反响。上网一搜，哎呀，井喷似的，好多媒体转发！既有中国新闻网、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中华网、环球网、凤凰网、中国社会科学、网易、腾讯等官媒、大网，也有新民网、天津网、大众网、东方网、大河网、海南网、陕西新闻网、中国台湾网等地方媒体，还有五洲四海网、海外网、美洲商报、加拿大商报、加拿大社区网等海外媒体，就连万和资讯、我乐信息、黄冈在线、达人家园、E 家股吧、伊川民声、天和翻译、商务圈等等往日不曾涉览的网站也都纷纷转发，我不完全地统计了一下，转发相关消息的中外媒体已达一百六十多家。

这么多媒体关注，说明问题的确重要。据我所知，龙与 dragon 在文化意涵、功能、地位、形象上是有重大差别的：在国人心目中，龙是司水灵物、通天神兽、吉祥瑞符、人杰喻体、权威象征、智慧结晶、和平使者，虽然也有负面的承载、消极的因素，但整体上是善、美的象征，为人类奉献的基本上是福佑性、建设性的正能量。西方 dragon 是喷火怪兽、害人邪魔、英雄反衬、战祸标志、恐怖象征、罪恶载体，虽然也有正面的内涵、积极的因素，但整体上是恶、丑的象征，给人类提供的基本上是灾难性、破坏性的负能量。

龙与 dragon 的相互误译，最早可以追溯至四百多年前的 16 世纪，在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编写的《葡汉字典》里，就有了误译的迹象。19 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其编写的《华英字典》里，明确地将龙译为“dragon”，同时将 dragon 译为“龙”。从此，错误流传，直到今天。长期的误译，已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西方人一些不怀好意者，利用误译，将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与 dragon 相联系、划等号，进行攻击、侮辱、妖魔化。纠正龙与 dragon 的翻

译错误，可以让西方人了解龙与 dragon 的区别，让那些不怀好意者失去因误译而形成的依据。

这件事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和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舞台上，人们一看到龙，就会想到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龙象征和代表中华民族、象征和代表中国，已是地球人的共识。名不正则言不顺，纠正龙与 dragon 的翻译错误，有助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的树立和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

再说龙头节。作为民俗内容丰富的传统节日，龙头节起源于黄河流域中下游，后流传至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现已成为中国大部分地区、中华民族大多数成员都过的节日。

对中华民族而言，龙、龙文化、龙精神、龙文明与生俱来且意义重大，但却一直没有一个直接、显明的节日与之对应。将龙头节作为国家法定节日，可以弥补这一缺憾。海内外华人大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将龙头节作为国家法定节日，可以最大程度地团结海内外华人，大家可以此节日为交流、合作的凭据、契机、媒介和平台，共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富强做出贡献。龙头节的民俗活动多围绕“祭”“开”“食”“剃”展开，对这些民俗活动，可以在传承的基础上，彰扬、发挥其积极内涵，并不断地推陈出新。如祭：可通过祭龙，学习龙的知识、传播龙的文化、弘扬龙的精神、倡导和推广龙的文明。通过祭祖，缅怀先祖功德业绩，激励后代奋发有为。如开：“开犁破土”有重视农业、重视春耕之意，可在农耕地区举行。“开笔破蒙”是对入学儿童的启发、教育、关怀和激励，可在全国各地小学举行。如食：无论是吃炒豆，还是吃龙面、龙饼、龙糕等，都是文化活动，还可以赋予其保健、娱乐的功能，同时也是商业活动，可以推出有特色、成系列的品种。如剃：民间有正月不剃头、等到龙头节再理发的讲究，此举有打理个体卫生，焕然容貌迎接新春的积极意义。

据悉，《关于将龙头节作为国家法定节日的提案》是由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雷珍民带到政协，经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胡振民，解放军军乐团音乐总监于海，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王西京等七十六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后，提呈大会的。而《关于纠正龙与 dragon 翻译错误的提案》，是由民进陕西省委副主委岳崇带到政协，经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浙江省政协副

主席蔡秀军、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姚爱兴、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上海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赵丽宏、内蒙古大学副校长郑福田等十二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呈大会的。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多年的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得知情况后，也欣然挥笔，题写了“中华龙抬头”。这么多名流大腕支持，实在难得。

两龙案后来的情况如何呢？前几天我电话询问了已回陕的雷珍民、岳崇二君。他们告诉我，大会秘书处收到提案后很重视，复函说已分别将两个提案作为建议送达中共中央文明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外文局，下一步会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调研、论证，争取予以落实。“非常好！”我不禁点一大赞。

（2015年7月8日于西安龙凤院）



福生与行善

常有人问我龙的精神是什么？我回答八个字：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其中的“福生”即“造福众生”，和“行善”相一致，也就是说：行善就是福生，福生就是行善。龙行天下就是善行天下。

福生有一个“度”的问题。比如，某条龙以为某个地方的行云布雨为天职，这个地方现在干旱了，需要七分雨，可这条龙只行了三分，显然不足以解除旱情；它若行了十分、十五分呢，又太多了，旱灾变成涝灾了。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内实行福利政策，可以说是福生的善行，但这种善若行过了头，情形就不妙了。比如目前正处于严重债务危机之中的希腊。其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就与福利政策有关。据报道，在希腊，所有公务员工作十二个月，却都可以获得十四个月的薪水；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额外的数目不菲的奖金。公务员四十岁之后就退休并领取退休金，而已去世公务员的未婚或离婚女儿，也可以继续领取父母的退休金。可以这样说，希腊人是平民过着贵族的生活。这样的政策导致希腊政府必须持续地借债才能维持其国民的高福利，直到外债借得多到把整个国家卖了都还不起的程度。

还有北美的加拿大，实行的也是福利政策。我因家人在那边，这几年每年都去多伦多住一段时间。我发现加拿大养了一批懒人，一批年轻的懒人，有白人，更多的是黑人。这些黑肤色的年轻人，大多没有正当的工作或干脆不找工作，只靠国家的福利金生活。整天举个酒瓶子晃来晃去，不愿意吃苦还要多享乐，钱不够花，就盗窃、就抢劫。咱们华人出去后都很勤劳，也节俭，于是就成了这些人下手的对象。华人中几乎很少有未被偷过或抢过的。

咱们国家这些年倡行慈善，效果大多是正面的，感人的事例不胜枚举。但也有负面的消息。一些被慈善的对象，将社会的救助作为生存的惟一来源，似乎其生来就该被慈善，个别人甚至被惯出了“毛病”，以接受被慈善为能事，未满

足其需求就抱怨。大街上，时见一些小伙子、大姑娘，完全可以自食其力，却宁愿做一个乞讨者，甚至伪造证件、假装病残。对这样的人慈善，未必能激活其心灵中的善根，却有可能助长其不劳而获、少劳而大获的恶念。

鉴于上述现象，我认为，福生要适度，适度方为善。就是说，雨下到合适即可，不要涝而成灾；善行到适度即好，不可滥而成害。那么，怎么做，做到怎样，才算适度呢？这里用得着那句马克思主义的老话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对被慈善的对象，尽可能地做全面地调查和实事求是地分析，然后再决定行不行善，怎样行善，行多大程度的善。

（2012年5月26日于西安慧雨庐）



财神与龙

财神是中国民间文化中掌管财富的神明。中国民间供奉的财神比较多，有五大财神、四方财神、龙财神等，但名气最大者，要数正财神赵公明和武财神关云长。财神与龙是什么关系呢？财富文化与龙文化是什么关系呢？四个观点——

一、财神是龙的传人中出类拔萃的强者。财神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财神当然是龙的传人。但财神又不是一般的人，是成了神的人，而一个民族，只有出类拔萃的强者才被尊奉为神。

二、龙支持财神、成就财神，龙与财神强强联合。赵公明有一个封号，叫“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之神”，龙是神物界的强者，赵公明是财富界的强者，于是强强联合，赵公明就有了“金龙”“龙虎”的名号，作为财神的功能就更加强大。而关公云长，有“青龙转世”“南海龙王转世”“火龙星降生”“草龙变化”“露水龙下转”“墨龙转生”等等传说。关公使用的武器，则叫“青龙偃月刀”。显然，龙与关公也进行了强强联合。

三、从一定意义上讲，财文化就是龙文化，龙文化就是财文化。五行中有“金生水”之说；有一副大家常见、生意人常用的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四海是什么？水；三江是什么？水。而龙，则是水神。你通四海，就通到龙那里去了；你达三江，也达到龙那里去了。这些话的实质是什么呢？是水来财，有水就有财，有龙就有财。

四、龙文化精髓可以给谋财、生财、用财者以指导。龙的精神是八个字：容合，福生，谐天、奋进。你要谋财、生财、用财，就一定离不开这八个字。容合即兼容、包容、综合、化合，是世界观，方法论。龙是容合而来的，财也是容合而来，人们常说的“众人拾柴火焰高”“有钱大家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福生就是造福众生，这是价值观，也是幸福论。龙就是为了福生才出现的。人是社会性存在，任何人离开了他人活不下去，你为人人，人人为你，因此赚钱一定

要和造福他人、造福社会结合在一起。谐天，就是与天和谐，就是生态文明。这是天人观，生态论。龙是天人相合的产物。如果为了赚钱，将自然环境破坏得一塌糊涂，危害当代，祸及子孙，那么你赚的钱就是负价值，你就会受到天的惩罚。

奋进，就是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这是人生观、强盛论。龙多给人以奋力前行的形象，龙舟竞渡更是给人以鼓舞和激励。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或许有，但那可能是千年一遇。对生活在当今社会的每一个人来说，你都得奋发进取，否则，钱是钱，你是你，财神也不会帮助你，财神喜欢奋进的人。

（2018年4月29日作于西安龙凤院）



辟邪旺财说貔貅

貔貅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的豹、虎、狮、鹿、羊、鸟等动物，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出来的具有辟邪和旺财功能的一种神物。貔貅有雄、雌之分：雄者曰貔，雌者曰貅；也有独角、双角之别：独角称天禄或天鹿，双角称辟邪。发展演化至今，以独角为常见，通称貔貅。因具备辟邪、旺财等功能，貔貅越来越受到生活在商品社会里的各界人士的喜爱，收藏貔貅、佩戴貔貅、欣赏貔貅，成为方兴未艾的时尚。

从词源角度考察，貔起初多半指的是豹子。《说文》言“貔，豹属”，《后汉书·光武纪》讲“寻邑百万，貔虎为群”，《北史·隋本纪》谓“莫非如豺如貔之勇”：按语言习惯，与虎、豺并称者，非狼即豹，所谓“虎豹豺狼”，由此可推貔为豹之一种。貅有两解，一为不知名的猛兽，一为貔之牝者，即雌豹、母豹。古人多将貔貅连举，以喻勇猛威武之士、之军。如《史记·五帝本纪》载距今五千年左右，轩辕黄帝曾“教熊罴貔貅羆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尚书·牧誓》篇记述，距今三千多年前，周武王的部队“如虎如貔”，在牧野大败商纣王的军队；《晋书·熊远传》讲“命貔貅之士，鸣檄前驱，大军后至，威风赫然”；唐刘禹锡诗云：“暂辞鸳鹭出蓬瀛，忽拥貔貅镇粤城。”宋杨景诗云：“天兵十万拥貔貅，紫塞今年大有秋。”

从《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曾指教貔貅打仗来看，可以做出貔貅的容合过程起自新石器时代，初步成形于汉代的判断。

貔貅是龙族成员，其容合对象与龙有相同之处：虎、鸟都在龙的容合对象之列，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圈、红山文化圈出土有鸟形原龙，良渚文化圈、龙山文化圈出土有虎型原龙，而且都被赋予吉祥嘉瑞的神性，和辟邪、佳运、镇宅等功用。据此，人们将貔貅说成是龙的后代，甚至说貔貅是“龙生九子”中的第九子。



相传貔貅本是负责巡视天廷的神兽，因其勇猛威武，不但能降魔除怪，还喜欢吸食妖魔鬼怪的精血，将其转化为财富，玉皇大帝便指派其看守天廷金库。貔貅上任后，妖魔魔怪惧怕貔貅，不敢接近金库。貔貅闲着无事，就以吞食金子为乐。玉皇大帝察觉后，便朝貔貅的屁股上猛拍一掌，堵住其肛门，意思是让其只吃不拉，受憋堵之苦。没想到貔貅不拉也可，照吃不误，却无受苦之状。玉皇大帝一气之下，就把貔貅赶下凡来。

貔貅下凡后，成为姜子牙的坐骑之一。有“麟头豹尾体如龙，足踏祥光至九重；四海九州随意遍，三山五岳刹时逢”之说，为伐商兴周出了力、立了功。貔貅相貌非凡，身散异香，似豹非豹，似虎非虎，似鹿非鹿，许多猛兽都想吃掉它，没想到交手后，没有几个回合就反被貔貅吃掉。貔貅只吃不拉，只进不出，还经常把金钱咬回来交给主人。所以姜子牙在封神的时候，就封貔貅为“天赐福禄”，简称“天禄”。民间则因其能战胜、吃掉猛兽而称其为“辟邪”。

辟邪的功能源自貔貅的容合对象主要是豹、虎、狮等猛兽。人们相信，妖魔鬼怪是惧怕猛兽的。于是便用猛兽来辟邪。貔貅是猛兽的容合和升华，用来辟邪顺理成章。

旺财的功能源自貔貅只吃不拉、把金钱咬回来交给主人、能吸食妖魔鬼怪的精血将其转化为财富的传说。只吃不拉意味着只进不出；把金钱咬回来交给主

人，意味着招财、敛财、纳财；能吸食妖魔鬼怪的精血转化为财富，意味着化险为夷、将不利因素变成有利因素：这对有发财愿望的人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理想状态。

貔貅因其辟邪和旺财的功能而有了两大用途——

一是作为辟邪的神物。如在港、台、澳及受到港、台、澳影响的地区，貔貅常被人们作为灵物来护身，或作为风水瑞兽来化煞。貔貅相貌凶猛，“坐镇在家，霸气十足，妖魔鬼怪见到它，都得畏惧三分，不敢乱来”。一旦有煞气入侵，如尖角煞、暗箭煞及顶心煞等，貔貅则会发挥自己的威力，帮主人化煞，让你“平安顺遂，事业发达”。

二是作为旺财的神物。人们相信：“貔貅以财为食”“善纳四方之财”；“一摸貔貅运程旺盛；再摸貔貅财源滚滚；三摸貔貅平步青云”；“若有貔貅神兽帮忙，就能咬住任何生意机会，促成买卖顺利、交易成功”。那些从事股票、期货、金融、赛马、收藏等行业的人，一般都会在公司或营业的地方及家中摆放一只貔貅，且将其头向着门或窗外。



（2008年11月2日于西安慧雨庐）

貔貅文化 人类之福

——为大嘴貔貅而作

北京大嘴貔貅文化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7 年，是一家以貔貅文化为主题的珠宝品牌公司。该公司创立大嘴貔貅品牌的初心，是以中国貔貅对标日本的招财猫。招财猫是日本传统文化中常见的猫型偶像摆设，其历史，一般认为起于四百多年前的江户时代。中国貔貅在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问世。招财猫形象单一，貔貅则是豹、虎、鹿、羊、鸟等动物的“多元容合”。招财猫的功能主要是招财，中国貔貅除招财、旺财的主要功能外，还具有辟邪、示祥、显瑞、开运等功能。

大嘴貔貅品牌，以让中国貔貅文化走向世界为使命，以做中国貔貅文化产品第一品牌为愿景。使命光荣，愿景美好。世界各国，实行的都是商品经济，招财、旺财是商品经济的必然追求。世界人民，无不希望生活幸福，而具有辟邪、示祥、显瑞、开运等功能的中国貔貅，能给世界人民带来幸福。

民间传说，作为龙族成员的貔貅曾为玉皇大帝守护财宝，也曾为后世的帝王守护财宝，故貔貅有“帝宝”之称。清朝的乾隆皇帝注重收藏貔貅，其珍视的皇家传世玉玺就有以貔貅为纽者，故宫所藏的数件玉质貔貅身上也均有御制年款。大嘴貔貅，立基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以“源自皇家，正宗貔貅”为品牌战略，符合逻辑，理由顺通。

大嘴貔貅以“真财实料，精美卓绝，生财有道，回馈社会”为价值观。公司自成立以来，不断创新，携手国内外知名文化团体和玉雕师，始终坚持中高端首饰产品的设计、研发和销售，赢得了好评。

大嘴貔貅，前景广阔；貔貅文化，人类之福！

（2018 年 10 月 25 日西安龙凤院）

怪异的智慧

加拿大多伦多 Zellers 公共图书馆的中文书架上，摆的多是出自港台作家之手的武侠小说，这类书历来对我缺乏吸引力。文化类的书有，不多。目光扫一扫，一本名为《怪异：神乎其神的智慧》的书进入视线。取下来翻一翻，觉得蛮对胃口，就用妻子办的图书证借了回来。

这本书由顾晓鸣先生主编、林在勇先生撰著、香港精英出版社出版，竖排，繁体字。书已有些旧了，用牛皮纸加了扉页，内文中还有用铅笔划线、打勾的痕迹：可见在我之前，已有人仔细地品读过。

先读排在书前的顾晓鸣先生的《致台湾的朋友》和《总序》。

几段话让我眼睛倏然发亮，就顺手抄录下来——

“死书读活的要旨，便在于如何把死的文献变成活的智慧。”

——不光读书啊，做文化研究不也是如此吗？就龙凤而言，相关文献之多虽不能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也让你一年半载消化不完。那么，如何将其变成“活的智慧”呢？

“德者，得也。以‘得’为‘德’是中国人的大智慧。读书有‘得’，方为读书之‘德’。而这个‘得’正产生于现代人生与万卷陈书的交融之中，是一种当下生存处境与昔日文化遗产的相互关照。智慧存在于作者和读者读解和运用的过程之中。用这一‘慧眼’去看目熟能详的中国古代文献，确能发现一种既有古代依据，又有现代意义，既有中国特征，又有世界价值的‘中国的智慧’。”

“通过中外、古今的‘两端’，使之相互发明，呈现出一种在世俗中进取成功，而又超越物界，卓然独立，安身立命的大智慧。”

——顾先生的说法可简化为六个字：“文献联系当下”。我做龙凤文化研究，曾给自己定下四条方针：“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这四条方针，与顾先生的说法，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吾也这么考

虑”。

“智慧，是在一般人看不到智慧的地方，看出智慧的能力。”“……扣住‘中国的智慧’，把最具个性的个人视角、体验和技巧，与最具共性的问题、文体和文字结合起来，既不庸俗，也不孤芳自赏，贴近日常意识而又超越之，发挥玄思妙想而又不卖弄学问。”

我在做龙凤文化研究之初，有朋友就不无怀疑，说：“龙凤都是虚拟的东西，能做出什么学问来？”若干年后，当看到了我的一系列成果后，朋友便不再怀疑，说：“还真让你做出来了。”是的，龙凤是一种文化现象，大凡文化现象都有学问。至于学问的大小，就看你怎么做，做到怎么样的程度了。做小了就是小学问，做大了就是大学问。龙凤传衍了七八千年，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历朝历代的中国人把那么多智慧寄托、灌注、体现到了它们的身上，你把这些东西梳理清楚了就是学问；你若再把当代人，包括你自己的智慧也寄托、灌注、体现到它们的身上，那当然就更是学问了。

那么，龙凤身上寄托、灌注、体现着那些智慧呢？

太多了。其中一个，便是林在勇先生在本书所讲的“逃逸的智慧”。

所谓“逃逸的智慧”，就是摆脱尘世的智慧。

为什么要摆脱尘世呢？简单地说，尘世间有许许多多的不如意。林先生说：“对现实的不满，使人产生超离它的遐想。”“智慧倘若不能给予人们解除苦难的现实方案，那么渴求摆脱苦难的强烈愿望就会把人的智慧引领到某种自我安慰、自我欺骗的逃避状态之中。”

摆脱尘世无非“肉体离开”和“精神超越”两条路径。

“肉体离开”就是死亡了，人一死，这个世界就和你没关系了，荣也罢，辱也罢，多也罢，少也罢，得也罢，失也罢，都是别人的事了。所谓“死了死了，一死百了”。但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想死，或不想很快就死，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

既不想死，还要摆脱尘世间的种种不如意，怎么办呢？只好选择“精神超越”了。

在林在勇先生看来，“精神超越”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怪异”。他说：“在极端黑暗的政治高压下，在令人窒息的纲常礼教囚室中，在无穷无尽的生活苦难

里，试着去改变些什么，试着逃避和超离，总比无所作为的逆来顺受要更积极一些。于是，怪异又一次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东西。怪异是目的，因为它在一切现实的事物之外；怪异是手段，通过它可以逃脱常规的约束。”

那么，龙凤属不属“怪异”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得搞清楚什么是“怪异”。词典里的解释是“奇异反常的现象”。从文化的角度看，没有科学依据，也不能用自然科学理论去解释的事象就叫“怪异”。

以此标准衡量，龙凤当然属于“怪异”了。不仅龙凤，大凡图腾灵物、宗教神迹、神话传说、童话寓言、魔幻故事、武侠英雄等，都可以归之于“怪异”。可以说，没有“怪异”就没有人类的精神生存。比如，现在，全世界光宗教徒就有三十多亿，这也就是说，起码有六成多以上的地球人在相信“怪异”。

“怪异”有时候是贬义词，如我们说某某人行为乖张，举止怪异；更多的时候是中性词，甚至是褒义词，比如当我们把图腾灵物、宗教神迹、神话传说、童话寓言、魔幻故事、武侠英雄等等冠之为“怪异”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这些“怪异”里，有人类的智慧，比如想象的智慧、夸张的智慧、逃逸的智慧、创造的智慧、升华的智慧、乐生的智慧，等等。试想，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人类整日只在吃喝拉撒睡等“形而下”的物质层面扑腾，那活着将是多么的单调和乏味！

（刊于《西安晚报》2008年5月3日）



由翔凤梟龙说起

中国首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支线飞机“ARJ21”日前在上海总装下线——这样的消息让人高兴，因为它开创了中国民机的新纪元，标志着我们国家在民用飞机的科研、制造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让我眼睛特别一亮的是，这架飞机取名“翔凤”。这个名字可不是哪个人随便起的，媒体报道，“ARJ21”自今年8月底就开始在网上全球征名了，参与命名、投票的人数在四百万人以上。11月份，由相关专家组成的评审团在近两万个名字中，确定十个名字候选，结果“翔凤”以十八万余票位列第一。

翔凤，翔凤，高高飞翔之凤也。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总经理罗荣怀解释说，“呼声最高的这两个字，内涵丰富隽永，凝结着人们的切切心意。”“翔”意指翱翔，而其音又谐“祥”，祥瑞的祥、吉祥的祥；“凤”是中华文化里的神物，是人们心目中的吉祥鸟，代表高贵、和谐、美满。取名“翔凤”，意谓中国人“追梦蓝天”的愿望即将实现——“中国民机工业历经坎坷，在一代代航空人的不懈奋斗下，中国终于造出了自己的飞机，就如涅槃的凤凰腾然而起、凤舞九天，令人壮怀激越、振奋不已。”此前，“我国一些军用飞机以‘龙’命名，如果民用飞机名字中含有‘凤’，刚好与之呼应，也寄托了航空工业军民同发展共辉煌的希望。”

罗先生讲的我国以“龙”为名的军用机，大概指的是“梟龙”战机。该机是中国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歼击机，具有突出的机动能力，较大的航程、留空时间和作战范围，优良的短距离起降特性，较强的武器装载能力，突出中低空和高亚音速机动作战能力以及较好的截击和对地攻击能力。为何取名“梟龙”呢？不难理解，“梟”是一种猛禽，与“歼击”“战斗”吻合；“龙”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文化标志。

取名“翔凤”“梟龙”让我眼睛特别闪亮的原因还有一条，这便是这两个名

字又一次印证了我讲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观点：龙凤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先祖、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还联系着中华民族的情感、反映着中华民族的进步。龙凤不是正在逐渐离开我们的事物，它们既是过去时，也是现在时，还是将来时；龙凤是开放的可以不断纳新的动态系统；龙凤文化是中华民族根系文化、血脉文化，世界上只要有中华民族在，就会有龙凤在；中华民族、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到何种程度，龙凤就会发展进步到何种程度。

我的这些观点不是无的放矢。在 2006 年年末刮起的“弃龙”风波中，就有人以龙曾象征过专制皇权而认为龙代表着愚昧和落后，“是那种正在逐渐离开我们的事物”。对此，我的回答是：中华龙凤从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远古走来，中间经过了从秦汉到明清的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身上自然携带有愚昧、落后的东西，但这些愚昧、落后的东西只是龙凤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龙凤文化的全部。况且，龙凤文化对自身携带的愚昧、落后的东西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也已做了认真的梳理和清除。

前段时间，有人对我提出的“创建、新增文明龙、科学龙、环保龙”的观点（见《光明日报》2007 年 3 月 23 日）不以为然，认为是在将龙“神化”，是“要给龙加上现代文明的性质”，并断言“这种造神结果是会远离百姓心灵的，从而事与愿违”。（《中国文化报》2007 年 12 月 10 日）回答这样的指责其实不用费很多口舌：第一，龙，当然还有凤，是中国古人对多种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神物，也就是说，老祖先早就将其“神化”了，正因为经过了这样的“神化”，中华民族才有了龙凤这样的不可多得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第二，我们就是要给龙，当然还有凤，加上现代文明的元素，道理很简单：中华民族在与时俱进，其象征物也要与时俱进。第三，中国的军用、民用飞机分别以“龙”“凤”为名，说明龙凤完全可以与现代社会相结合，这样的结合事与愿谐，贴近百姓的心灵，为绝大多数国人所喜闻乐见。

（刊于《榆林日报》2008 年 1 月 22 日）

英杰为“凤凰”添彩

陕西籍军官沈星为救落水少年献出宝贵生命，其事迹让天下人为之感动。沈星出生于西安市阎良区凤凰村，如今又长眠于山东省青州市凤凰山革命烈士陵园。英杰生于凤凰卒于凤凰，人们或许会问：村落、山峦为何取名凤凰？凤凰和英杰有何关系？

按我的考察，村落、山峦以凤凰为名，不外乎四种情形：一是“传说凤凰”，即因当地流传有凤凰的神话传说而得名；二是“自然凤凰”，既因山水地貌、树竹花草天然具备凤凰形态而得名；三是“建筑凤凰”，既因某座、某片建筑像凤凰、称凤凰而得名；四是“人物凤凰”，即因与某帝王妃后、硕彦英杰、佳人才女等等的业绩行踪有关而得名。——凤凰是古人对鸡、鹰、燕、鹤、孔雀、鸵鸟等鸟禽，和太阳、风等自然现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具备向阳、达天、自新、秉德、兆瑞、崇高、好洁、示美等神性的神物，有“羽族之美”“百鸟之王”的称誉，故人们常将人间的杰出人物比作凤凰，如先哲老子就将孔子比作凤凰。

中华大地，以凤凰为名的山峦有许多座。

以神话传说得名的有宁夏隆德县境内的凤凰山。其传说是这样的：生活穷困的春生、秋姑兄妹，大年三十救助了一位沿门乞讨的老婆婆。第二天告别时，老婆婆将一幅白绫送给秋姑，绫上淡淡地描着一只凤凰。于是，秋姑夜以继日地绣了一百天，终于将凤凰绣成。兄妹俩高兴地将这幅凤凰图挂在屋子里。当夜，凤凰从绫上下来，在屋中走了走，又回到绫上，却留下一颗金蛋。兄妹卖掉金蛋，买了田地耕牛，生活状况从此好转。贪婪的县官知道了这件事，就派衙役将凤凰图强行抢走。当夜，县官单等捡拾金蛋，却被凤凰啄瞎了一只眼睛。衙役闻声赶来，凤凰已冲窗而出，飞向春生、秋姑家中，驮起兄妹俩，在天上旋了三圈，最后落到一座山上。这座山原来是光秃的，自从落了凤凰，一下子变得郁郁葱葱。

从此，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好日子，这座山也就被称做“凤凰山”了。（据《隆德凤凰山》）

还有陕西延安市的凤凰山：一只美丽的凤凰，被美丽的延安古城所吸引，欲栖落筑巢。喜爱读书吹箫的叶生，用悠扬的箫声引凤凰而落，并用西山叶家渠的清水招待凤凰。从塞外来的贩盐骆驼队的头领发现此地的风水好，起了坏心，用食盐拌黄土，堵塞了泉眼。凤凰见延安的风水被破坏，气得大病一场，终于死在西山。凤凰死后，身骨化作两条陡峻的山梁。以后人们便把延安北关至南关方向的两条山梁，叫做“凤凰山”。山下的叶家渠，也改称“凤凰村”。（据《金凤落延安》）

有的凤凰山既有神话传说在民间流传，其山也具凤凰形貌。如陕西西乡县的飞凤山，此山远看就像一只引颈展翅的青凤。其传说是这样的：三国蜀将张飞率部转战秦岭山中，在一次与魏军交战中身受重伤，与部队失散，昏倒在峡谷之中。醒后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松庵内，一个美貌的青衫姑娘正准备为他换药。问知姑娘名叫凤儿。在凤儿的精心疗治下，张飞伤势好转，两人遂产生相爱之情。张飞康复后诚邀凤儿同行相随，遭到坚决拒绝。张飞情急，说她若不依从，就下令部下将其强行驮走。凤儿只好答应，却要求张飞为其备一大瓮，将松庵外的泉水汲满，并言途中她只能饮用此水。张飞应办。一路上凤儿果然只饮用带出的泉水。某天行至西乡县堰口镇的午子山下，张飞想那泉水已经不多，就趁乘凤儿不备，添补井水于大瓮中。当天下午，凤儿舀水饮用。一口咽下，脸色大变，叹说将军害了凤儿。张飞惊问原委。凤儿道出实情：“我实是一只青凤，道行尚浅，全凭那眼仙泉水滋养，一旦误饮凡俗浊物，就会化为山石！”话音未落，凤儿便跌然在地，立时化做一座石峰，形若飞凤。张飞大悲，遂掣起丈八蛇矛，用矛尖在千仞石壁刻下三个巨字：“飞凤山”。（据《飞凤山的故事》）

单纯以山形山势如凤凰而得名者也有不少。如：贵州遵义市的凤山，其山的形状，就状若凤翥——“凤山启秀”是清代以来遵义八景之一。四川万县的凤山，其崇冈绝壁，其形如凤。湖南张家界的凤栖山，山中一深褐色石头似凤头、顶端尖突如凤嘴、茂盛的植被如张开的凤翼。云南大理凤仪山，三峰高耸，若凤张两翼。山西柳林县的凤翅山，其山“中高直上，栩若朝阳之昂首，其左右开张，注目凝睇，如仰、如俯、如拱、如揖、如振翼、如扬翮，横翠错锦，俨五采之离，

披纷九苞，其如坠，故名”（据《凤翅山新建山门甬道碑记》）。河北省昌黎县的凤凰山，其南峰高挺似凤首，东北、西北两峰向两侧展开，像凤翼。“凤岩腾彩”和“凤翥祥峦”，位在昌黎八大名胜和古碣石十景之列。明朝昌黎县贡生万信诗云：“凤岩飞舞拱辽西，振翩翩似欲栖。日放朝霞呈彩色，山含瑞气吐云霓。当年丹穴呈囿（yōng）翺（huì），今日高冈颂萼（běng）萋。应识秀灵钟此地，文兴八代首昌黎。”清末昌黎县廩贡刘绍诗云：“虞周不再集休祥，凤鸟缘何翥此乡？天地秀灵钟碣石，冈峦体势逼朝阳。翼舒两峡端张拱，颌引中峰峭激昂。牧笛樵歌添逸响，何非奇律采归昌。”（据《昌黎县志》）

陕西省黄陵县桥山，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墓所在地。其山势如展翅欲飞的凤凰，故又名凤岭。“凤岭春烟接暖岗”是“黄陵八景”之一。当地民谣亦有“黄帝葬在凤凰腰，凤凰下卧水前绕；凤头就是石山村，凤尾拖至孟家塬”之说。

还有一些凤凰山，没有什么美好的神话传说，却得益于良好的自然生态。如福建泰宁凤栖山，其山峰崖突立，竹树葱郁，泉涧涌沛，其崖穴多栖燕雀，亦是野生水禽的家园，故名。湖北远安鸣凤山山势险峻，风景秀丽，相传曾有凤凰在此欢鸣，故名。四川成都的风栖山，其山林深木秀，引来百鸟栖集，啁啾啾啾，如和风鸣，故名。湖南隆回县的风形山也是如此，其山形貌若立凤欲翔，又因处于万山丛中，林木丰茂而成为过往候鸟的理想栖息地，每年春秋两季，山上便会出现群鸟聚会的奇观，故又有“鸟山”之称。广东深圳市境内的凤凰山，自然环境不错，当地人盛传有凤凰栖于山中的岩洞内，久而久之，人们便称此岩洞为凤凰岩，称其山为凤凰山。当然，人们盛传的凤凰，也只能是凤凰的模特儿——锦鸡、孔雀、仙鹤之类。

据《阎良村情》一书介绍，该区境内的凤凰村是因其村落布局状如凤凰而得名，可谓既有“自然凤凰”的因素，又有“建筑凤凰”的因素。而山东青州凤凰山的得名既有“自然凤凰”的因素，又有“人物凤凰”的因素。言其有“自然凤凰”的因素，是说其山峦形状像一只凤凰——2006年，青州当地文化人李守力曾与美国谷歌公司取得联系，得到了具有高分辨率的青州卫星三维地图，从图上看，青州凤凰山颇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据李守力博客专栏《国学之窗》）言其有“人物凤凰”的因素，是说丘处机曾率弟子在青州凤凰山修道，当年的凤

鳳山道場是元代全真教在青州的一處重要活動場所。丘處機是中國道教全真龍門派創始人，堪稱“道教鳳凰”。

《百鳥朝鳳》的民間傳說有多種版本，其中一個是這樣的：遠古時候，一隻美麗的鳳凰和眾鳥快樂地栖居在洱源縣的羅坪山。有一年中秋節，眾鳥正歡歌翔舞，天上突降大雪，眾鳥轉眼間被凍得招架不住。鳳凰見狀，就拔下自己的羽毛分給大家避寒，直到羽毛拔光，凍死在山顶。從此，每年中秋節，眾鳥都要飛來凭吊鳳凰，故有“百鳥朝鳳”之說。傳說中的鳳凰扶危解難、舍己救眾、勇于獻身，是大義薄天、精魂恸地的英雄，體現的是一種壯烈、崇高的精神，這樣的精 神，我們在出生于 1980 後的軍人沈星身上看到了，所以，沈星堪稱新時代的“人間鳳凰”。

此前，閻良鳳凰村因既有“自然鳳凰”的因素，又有“建築鳳凰”的因素稱鳳凰；青州鳳凰山因既有“自然鳳凰”的因素，又有“人物鳳凰”的因素稱“鳳凰”，那麼，英杰沈星的出現，使故鄉鳳凰有了人物的因素，使青州鳳凰的人物因素更加光耀照人。

（刊于《西安晚報》2012 年 5 月 27 日）



龙凤可英译为 Loong Feng

第 29 届奥运会吉祥物公布后，被海内外华人普遍看好的中国龙意外地落选。北京奥组委解释其原因是“由于龙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理解”。针对这样的说法，我写了《为中国龙落选而惋惜》一文（发表于 2005 年 11 月 29 日《西安晚报》，“中国思维网”等网络传媒转载），指出中国的龙与西方的 dragon 在容合对象、神性、意蕴、功能等方面多有不同，“不是一回事”：中国龙取象广博，形态神奇，主要象征和谐、善与吉祥；西方的 Dragon 取象窄狭，外貌丑陋，主要代表魔怪、恶与祸祟。那么，“龙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理解”之说就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即“将两种不同来由、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象征物混在了一起”。

随后，2006 年 2 月 3 日（农历丙戌年正月初六），在西安图书馆举办的“天禄讲坛”上，我又以《正说中华龙文化》为题，再一次阐述了上述观点。并进一步指出，“至于一些基督教学者从‘龙是怪兽、是魔鬼’的观点出发，在网络及其他场合发表文章或演说，将‘龙的传人’诬指为‘魔鬼的儿女’，说轻了是缺乏善意，说重些是别有用心。世界是多元的，文明是多样的，全球化不是一种文明的一元通吃，而是各种文明的多元容合。在文化问题上，既不可以用东方的讲究来要求西方，也不可以用西方的说法来框范东方。鉴于此，我郑重建议，将 dragon 直译为‘劫更’‘劫根’或其它谐音汉字组合者，将龙英译为 Loong，以示区别。——从而使西方人知道中国龙是怎么回事，并通过对龙这个中国第一号图徽标志的了解，进而认识中华文化优秀精华之正大与奇妙。”

近一个月后，在北京举行的“春龙节暨复兴中华文化公益性大行动”的启动仪式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钦琦研究员提出，“中国龙字在英语中应该翻译为 long，以便与英文中的 dragon 有所区别。”（见 2006 年 3 月 1 日“千龙网”）徐先生还说，“英语中的 dragon 是一个贬义词，指的是传说中的一种怪物。而龙在中华文化中是一个褒义词，是鹿、马、兔、虎、牛等哺乳

动物组成的，龙的主体也应该是哺乳动物。”徐先生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即“贬义词”“褒义词”之说是对的，后半部分不够确切和全面。龙是多元容合的神物，进入容合的既有猪、马、鹿、牛等哺乳动物，也有蛇、鳄、蜥蜴等爬行动物，还有鱼、蜃等水生动物，以及雷电、虹霓、龙卷风、星宿等自然天象。龙的主体应该是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结合，而非哺乳动物一类独占。

“long”是“龙”的汉语拼音。英语中有“long”，是一个形容词，其意为长、长远、长久、渴望等——和“龙”的外形及意蕴还算能联系上：龙的体态多是悠长的，龙的源流是久远的，弘扬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也是海内外华人所渴望的。但其发音相当于汉语的“郎”或“老”，与“龙”虽比较接近，却还是有区别。鉴于此，我觉得还是译成“Loong”比较好，即将第一个字母大写，并加一个“o”，形成一个“Loong”的专用名词，发音亦发汉语“龙”之纯正之音。这样，西方人在阅读、使用时，就容易区分，而不至于与作为形容词的“long”相混了。事实上，此前英文中对华人姓名中的“龙”字也多音译为“Loong”，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名字就被翻译成“Lee Hsien Loong”。

和龙与“dragon”被相互混译一样，中华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凤凰，长期以来，也与“phoenix”相混译。在西方世界，“phoenix”是神话中的“长生鸟”“不死鸟”，据说此鸟可活数百年，然后自焚为灰而再生。20世纪初，诗人郭沫若将“phoenix”移植、嫁接于凤凰，创作出了著名《凤凰涅槃》一诗。从此，中国凤凰有了“涅槃”“再生”，即“自新（自我更新）”的神性。这当然是郭老的重要贡献，也反映出凤凰对外来文化的“容合”品质。但是，在“phoenix”进来之前，中国凤凰就具备有向阳、达天、秉德、兆瑞、崇高、好洁、示美、喻情等神性，这是“phoenix”多不具备的。鉴于此，我建议，在将“dragon”直译为“劫更”“劫根”或其它谐音汉字组合者，将“龙”英译为“Loong”的同时，也将“phoenix”直译为“飞尼”，将“凤”英译为“Feng”，将其全称“凤凰”英译为“FengHuang”。“Feng”和“FengHuang”都取自汉语拼音，在英文中原本没有，属于新创。

（刊于《西安晚报》2006年3月14日、《英语教育周刊》2007年1月15日）

凤凰朝歌

小时候读《封神演义》，知殷纣王以朝歌为都城，觉得朝歌这名字起得蛮好听，全国找不到第二个。那么，城址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不清楚了。于是想，这朝歌该不会是小说家虚构出来的吧？2006年4月下旬的河南鹤壁之行，才知朝歌故地在今天的淇县。看相关电视剧，都将朝歌读作 chao ge，淇县人说，音发错了，应该读 zhaoge。参观完摘心台、比干庙等景点后，当地的导游解释说，朝歌之名，是纣王起的，是“迎接朝阳，歌颂黎明”的意思。

那么，殷纣王怎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呢？我的脑子转悠起来。

我想，远古时代的东方少昊族是崇拜凤凰的，甚至可以说是以凤凰为图腾的，这已为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所证实。殷商族是少昊族的后裔，将这样的传统继承下来自然不成问题。不是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吗？那是说商人的先祖契，是其母亲，一个叫简狄的女性，吞了玄鸟的蛋后怀孕生下来的。玄鸟是黑色的、天上的神鸟，也就是凤鸟。殷商族对凤凰的崇拜，也为考古发现所验证，商代的青铜器、玉器上都有凤凰纹饰。安阳殷墟距淇县不远，那里的妇好墓就出土了一件晶莹润透的玉凤，特别漂亮，堪称国宝。

这样看来，纣王能想到朝歌这个名字，实与其族崇拜凤凰有关。因为，以“迎接朝阳，歌颂黎明”论，人是比不过鸟类的，当人们还在被窝里缠绵的时候，鸟儿们已经起床了，开始向着东方的晨曦引吭高歌了。凤凰是百鸟之王，是以“向阳”“求明”为职任的，《诗经》里不是有“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的句子吗？我们不妨这样猜测：新城池建好了，国都就要从安阳迁过来了，作为国君，给新都命名之事自然要费点脑筋。叫什么好呢？纣王苦思冥想多日，定不下来。某日早醒，一抹朝曦照在窗上，窗外百鸟啼鸣如歌，于是联想到本族崇拜的神鸟凤凰，便大腿一拍，说：好了，就叫朝歌吧！

凤凰有秉德、兆瑞、崇高、示美等神性，有为造福众生而负任、而献身的品

格。以凤凰比喻、象征人间贤君良才的传统，大概也能溯源到远古。就殷商而言，可以凤凰作比者，开国之君汤可算一个。汤起兵推翻了夏桀的残暴统治，在位期间推行善政，减轻征敛，鼓励生产，安抚民众。相传他曾于大旱之年，到京郊的桑林，架起干柴，欲自焚（有点凤凰涅槃的味道）以祈雨。就在祭火点燃之时，上天被汤的宽厚和真诚所感动，降下了滂沱大雨，大旱随之解除。纣王起都名为朝歌，似乎也有以凤凰自比的意思。淇县人说，纣王登基后，开始还是不错的，也做了一些诸如开疆拓土、发展生产的好事，是后来才变坏、成为暴君的。这些说法如果属实，我们就可以将纣王看做由善凤、祥凤转变为恶凤、孽凤的一个典型。——在凤凰的家族中，恶凤、孽凤尽管不多见，但还是有的。

（刊于《西安晚报》2006年5月16日）





凤城的说法

西安市人民政府要从城中西华门大街搬至北郊凤城八路了。可以预料，“凤城”二字在传媒上的出现率会由此而大幅度提高。那么，有关“凤城”，都有哪些说法呢？

《列仙传》载，有一个俊小伙叫萧史，箫吹得棒极了，能作风鸣之声。秦穆公的女儿弄玉也好吹箫，穆公就将她许配给萧史，并修筑一座凤台让他们居住。数年后的某一日，天上的凤凰被二人的箫声引来，萧史和弄玉便驾着凤凰飞去了。这便是流传久远的“吹箫引凤”的“神话”。这则神话的一个人文效应，便是将帝王的居住之城称为“凤城”。帝王的居住之城是当然的京都之城，因而“凤城”也就成了京都的一个别称。古长安作京都历十三个王朝、长达一千一百多年，于是顺理成章，也就别称凤城了。杜甫诗句“步蟾倚仗看牛斗，银汉遥应接凤城”，章八元诗句“落日凤城佳气合，满城春树雨蒙蒙”中的“凤城”，指的都是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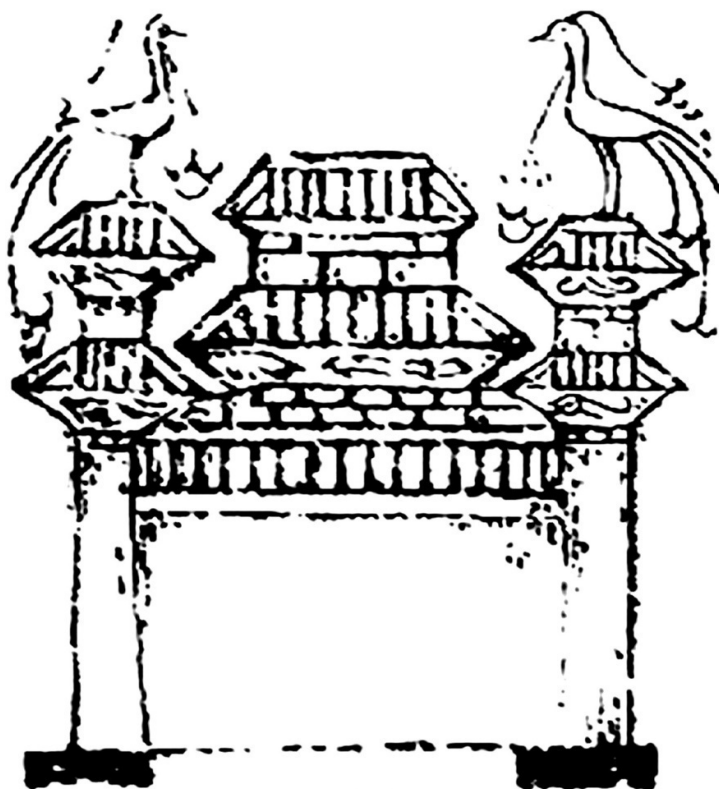
据此，我们可以把“凤城”的得名途径称为“神话凤”。属于“神话凤”的，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市。相传很久以前，长江以南居住着凤凰七姐妹，她们使江南大地山清水秀，也给百姓带来了幸福生活。南来北往的大雁把宁夏地薄人穷的情况告诉了凤凰七姐妹。最小的七妹便飞往宁夏，开渠引水，植树种谷，

使宁夏面貌大变，人称“塞上江南”。后来，宁夏西部一个异族部落进犯银川，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凤凰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城池，使异族不能侵入。据说，凤凰的头变成了银川东门外的高台寺，双眼变成了高台寺旁边的两眼井，心脏变成了城中心的鼓楼，两只足爪变作西塔和北塔，尾羽变成了西马营里的树木花草。于是，银川也别称凤城。

“神话凤”之外，还有“建筑凤”“山水凤”。

这“建筑凤”也可以以古长安为例。据《史记·孝武本纪》载：汉代的京城长安曾“作建章宫……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造如此高的凤阙干什么用呢？

《索隐》引《关中记》云：“一名别风阙，以言别四方之风。”噢，原来是用来测风向的。那为什么叫凤阙呢？《索隐》再引《三辅故事》云：“……上有铜凤凰，故曰凤阙也。”这就说明白了。难怪东汉的张衡在《西京赋》里有“凤骞翥于薨标，咸溯风而欲翔”之语。因凤阙修在皇宫门前，因而后人就以凤阙指代皇宫。皇宫称凤阙，皇宫所在的城市称凤城，也就说得过去了。



双凤阙画像砖（汉）

“山水凤”是说某地山水呈凤形凤像，其附近的城镇就取名凤城。如广东省的顺德市就因当地有凤山、凤岭而别称凤城。福建省潮州市因境内有凤凰山而别称凤城；同省的安溪县政府所在地凤城镇，因镇北的凤冠山状如凤冠而得名。还有位于辽宁省东部的凤城市，也是因境内有座凤凰山而得名，其山势突兀峥嵘，恰如凤凰展翅高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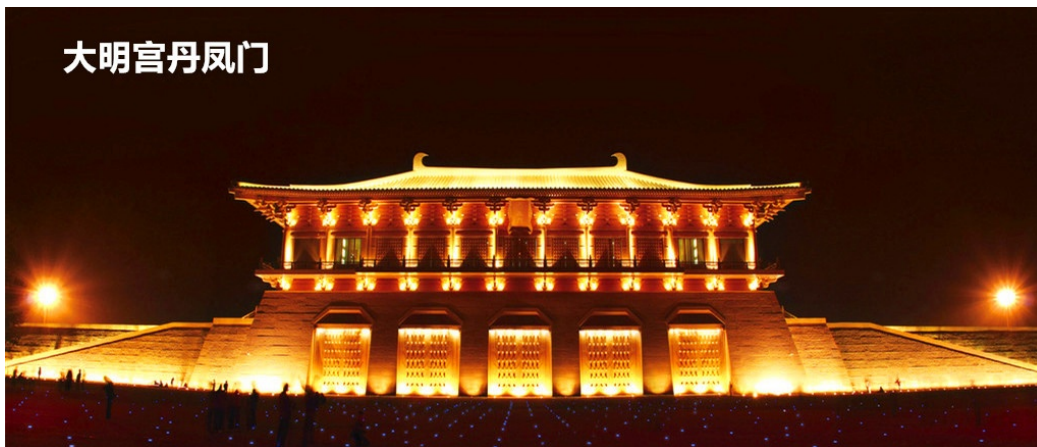
我曾用“和美”二字来概括凤凰文化的精髓。凤凰是“和”的产物，也是“和”的表征。凤凰的出现，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种种生物理解、尊重、敬畏、爱恋、审美的结果，这便与道家强调的“天道自然之和”，即“天和”相一致；凤凰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人们就将自己的种种道德理想付于其身，比如舍己献身，比如崇尚高洁，比如百鸟朝凤，等等，这当然与儒家强调的“人伦道德之和”，即“人和”有一致之处；凤凰源于鸟禽又高于鸟禽，既能在红尘中立足，又能飞至红尘之外，其能量和本领，来自人们解脱困惑、放飞心灵的愿望，这便与佛家，尤其是禅宗所追求的是“心性觉悟之和”，即“心和”相吻合。

不仅如此，凤凰还是美的集合、美的体现、美的反映、美的化身。从发生美的角度看，凤凰的容合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美的因素被发现、被选择、被采纳、被综合、被升华的过程，也就是人们通常讲的审美的过程。从艺术美的角度看，凤凰具有形象性、感染性和典型性，而且与真、与善相统一。从形式美的角度看，凤凰符合对称、平衡、整齐、对比、比例、虚实、主次、变幻、参差、节奏、多样统一等形式美法则，其线条是流畅的，其色彩是鲜丽的，其声音是乐耳的，其形状是悦目的，其姿态是雅致的一一或活泼、轻灵、奔放，或雄健、浑朴、昂扬。从内涵美的角度看，凤凰至少具备祥瑞美、新异美和崇高美。

鉴于此，我们就有了这样的观点：凤城不应该只是以凤为名之城，还应该是充分体现凤凰文化精髓之城，即“和美”之城。

（刊于《西安晚报》2006年7月4日）

大明宫丹凤门



门名丹凤

盛唐政治中心大明宫的正门叫丹凤门。此门建有高大的门楼，是皇帝举行改元、登基、大赦等重大典礼的场所。近年来，考古人员对丹凤门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此门南北宽 20 米，东西长达 60 几米，拥有五个宽敞的门道，是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门。

那么，此门为什么要以“丹凤”为名呢？丹凤又是怎样的凤呢？

我们先来看看《山海经·南山经》的记述：“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这段话为“丹凤”一词的产生提供了线索：凤凰生长、栖息于丹穴山，那么，就可以将凤凰称为丹凤。这有点以生长、生活的地方为“姓”的意思，就像将封地在商的公孙鞅称为商鞅那样。如此来理解“丹凤”成词的原因，看来不会错，但似乎不够全面，因为“丹”字不光可指丹穴山，它还有多重意思。

丹的本义是“巴越之赤石”，即朱砂。引申为赤色、朱红色。丹穴山上产朱砂吗？《南山经》没有讲，只讲“多金玉”。金在古代是金属的通称，不单指黄金，还包括属于“淡红色金属”的铜。玉是质细、坚硬而有光泽的美石，其光泽，有白，有黄，有绿，当然也有红。如此，我们就可以这样推测：丹穴山上尽管不

产朱砂，但产红色的铜和玉，这些矿物质，使山间流出的水都有了朱砂般或近似朱砂般的颜色，故称“丹水出焉”。一方水土一方鸟，生活在这座山上的凤凰，羽色也就特别鲜亮，呈五彩。五彩指的是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赤”，即朱红色，居中心位置。“其状如鸡”，如什么鸡呢？锦鸡也。锦鸡是凤凰的主要取材对象，其羽毛“五色备举”，以红为主，故又称“红腹锦鸡”，古代人则称之为“丹鸟”，有“天降丹鸟，河出应龙”之说。

丹凤，也就是神鸟凤凰，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你看它，头上的羽纹呈“德”字形，翅膀是的羽纹呈“义”字形，背上的羽纹呈“礼”字形，胸部的羽纹呈“仁”字形，腹部的羽纹呈“信”字形：好家伙，中国人所崇尚的美好的品行，几乎都具备了。不仅如此，它还“只吃大自然生长的东西”，从不肥吃海喝、纵欲无度；还“自己一边唱歌一边跳舞”，堪称乐生美世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它一出现，天下就会太平”：这可是关乎社稷安危、江山存亡的大事啊！——以上分析，差不多就是唐代领导人将其统治中心的正门称为丹凤门的主要原因了。那么，既然丹凤就是凤凰，为什么不叫“凤凰门”呢？因为这个“丹”字值得突出。丹者，红也。南门对的是南方，南方的方位色是红色。红还有红火、兴盛之意，此门是国家举行大典的地方，用“丹”也暗含希望王朝事业兴旺的意思。于是，有唐一代，门名丹凤，长达二百四十余年，几乎与唐王朝共始终。期间，唐肃宗至德年间，曾改“丹凤门”为“明凤门”，不久又恢复为“丹凤门”。

说到丹凤，人们会联想到作家贾平凹的故乡商州丹凤县。与丹凤门不同，丹凤县是因其县城南临丹江、北依凤冠山而得名。而其江之所以称“丹”，传说是因其水中曾产丹鱼。丹鱼是什么鱼呢？《述异记》称其“有赤光如火”“割其血涂足，可涉水如履平地”，可见是一种红色的、神奇的鱼。

（刊于《西安晚报》2006年6月20日）

凤凰与少陵原

凤凰与龙一样，也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一种文化象征物。考察这个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不可多得的象征物与某个地方的种种关联，是一件有趣的事。

比如位于西安城南的少陵原。

汉宣帝刘询主政之前，此原叫鸿固原。这个鸿，就与凤凰有关。《说文》释凤时有“鸿前麟后”之说。鸿有两解，一为鸿鹄，即天鹅；一为鸿雁，即大雁：两者都是凤凰的容合对象。那么，其得名就好理解了：曾有凤凰的模特儿——高洁的天鹅或远来的大雁光顾此原。

得名杜陵原，是因为刘询在这里为自己修了一座“杜陵”。而这位刘询，竟与凤凰有太多的缘分。《汉书·宣帝纪》载，在刘询刚当上皇帝不久，就有“凤凰集胶东、千乘”，“集”是降落、栖止的意思；两年后，又有“凤凰集北海安丘、淳于”；接着，“凤凰集鲁郡，群鸟从之”“凤凰集泰山、陈留”“南郡获白虎威凤为宝”……可以说，每隔一段时间，美丽的凤凰就要光顾一下这位年轻皇帝治理下的大好河山。

有朋友问了：凤凰不是世间没有的神鸟吗？怎么会频频来“集”呢？是的，作为对诸多鸟禽的“多元容合”，凤凰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但是，凤凰的模特儿，如锦鸡、孔雀、天鹅、白鹤、苍鹰、朱鹮等等，山野原林间却是不稀见的。事实上，古人看到的凤凰，都不过是，也只能是凤凰的模特儿，当然还要加上美好的想象、尽可能的渲染和神乎其神的夸张。

朋友又问了：地方官吏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央政府报告这样的“说真也真、说假也假”的消息呢？分析一下，至少有三大“利好”：一是不断地给皇帝以鼓励，促使其多行善政，“勿行苛政”。汉宣帝果然就被打动，言自己刚从底层上来，还没有做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就“获蒙”如此多的“嘉瑞”，于是“夙夜兢兢”，不敢松懈，“协宁百姓，承天顺地”。二是会给老百姓带来实惠。每次

“凤凰来仪”后，汉宣帝都要“大赦天下”，减免赋税，赏赐各地“勤事吏”爵位，“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三是恩及鸟禽，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有利。比如，某年春，当发现“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时，汉宣帝就“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摘巢探卵、弹射飞鸟”。

汉宣帝在位二十四年，其中八年可称为“凤凰之年”：“五凤”四年、“神爵”四年。以“五凤”为年号，是因为此前凤凰多次“集杜陵”“集上林”“鸾凤万举，飞览翱翔”。此后，“鸾凤又集长乐宫东关中树上，飞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余刻，吏民并观”。称“神爵”，是因为“神爵五彩以万数集长乐、未央、北宫……”这里的“爵”通“雀”，神爵就是神雀，其实还是凤凰。——凤凰是“百鸟之王”，在古代中国，对任何鸟雀的神化，都通向凤凰。也就在这以“神雀”为年号的第四年，有“凤凰集杜陵”，于是，这杜陵原便有了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凤栖原”。

至于得名少陵，乃是因为宣帝的原配许皇后，病故后葬于杜陵之南，其陵较小的缘故。那么，将这位皇后以凤凰相比称，可不可以呢？当然是可以的。帝王们从秦末汉初开始比龙、称龙，与此对应，后妃们也就开始比凤称凤了。其起始标志，是秦始皇让妃嫔们戴凤钗、穿凤头鞋。汉承秦制，许皇后作为宣帝宫中第一“凤”，是可以想象的。

当然，在后妃们比凤称凤的同时，中国自古就有的将杰出人物比凤称凤的传统也没有丢掉。——凤凰有向阳、达天、自新、秉德、兆瑞、崇高、好洁、示美等神性，这些神性与杰出人物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具有一致性。比如唐代大诗人杜甫，从小就喜欢凤凰，曾借凤凰言志，称自己“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直到年老时，杜甫还自比“朱凤”，称“山巅朱凤声嗷嗷”“翅垂口噤心甚劳”（《朱凤行》）。杜甫当年之所以选择凤栖原做居住地，“杜曲幸有桑麻田”（《曲江三章》），如此这般的“凤凰情结”，显然发生过作用。不光杜甫，汉宣帝时的名臣丙吉、冯奉世，北齐学者颜师古，唐代的玄奘法师，书法家颜真卿，文学家柳宗元、令狐楚，以及近代的杨虎城将军，等等，都安息在此原，而这些人，也都可称为“人间凤凰”。写到这里，我有了一个建议：既然此原与凤凰有这么多关联，“少陵原”之名就 pass 吧，把“凤栖原”叫响些，或者，干脆叫“凤凰原”好了！

（刊于《西安晚报》2006 年 12 月 19 日）

取名“凤凰”的六个原由

——以湘西凤凰为例

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取名“凤凰”的山原、河流、城镇、村街，以及企业、酒家、产品等等，可谓多矣。这些凤凰，以美丽之羽、动人之声、翔舞之态，为山河增色，为生活添彩。那么，它们为什么要以凤凰为名呢？

考察一下，无外乎六个原由：山水凤凰、祖先凤凰、传说凤凰、民俗凤凰、人杰凤凰、和美凤凰。

以湘西凤凰为例——

一．山水凤凰：“凤凰县”是从1913年（民国二年）起叫的。之前，由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起叫“凤凰厅”。再之前，由687年（唐垂拱二年）起叫“凤凰营”。叫凤凰营的原因是此营建在一座距现在的凤凰县城25公里的凤凰山上。那么，此山为何叫凤凰呢？是因为其形状像一只昂首展尾的凤凰。我们把这种因自然山水的形状像凤凰而得名的情形称作“山水凤凰”。这样的凤凰，反映着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敬重。

二．祖先凤凰：凤凰县是苗族同胞的居住地，苗胞占到总人口的60%以上。苗族奉炎帝、蚩尤、驩兜（头）为祖先。炎帝是太阳神，所谓“炎帝者，太阳也”（《白虎通·五行》），凤凰是太阳鸟，炎帝与凤凰有密切的关系。民间有凤凰赐炎帝五谷种籽、驮炎帝飞至东海蓬莱岛，抱回一轮太阳，从而给大地带来光和热的传说。而蚩尤和驩兜都有身生双翅的形象。所谓“以飞兽有翅者谓之蚩尤”（《日下旧闻考》）。驩兜“人面鸟喙有翼……仗翼而行”（《山海经·大荒南经》）。这里的“飞兽有翅”“鸟喙有翼”等，既是鸟的特征，也是凤的特征。人当然是不会长翅膀的，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反映的是凤凰崇拜与祖先崇拜的融合。

三．传说凤凰：指的是民间流传着与凤凰有关的传说。如《苗家“六月六”节的传说》：古时某年，湘西勾良苗寨猎手吴天龙，不满皇家官府压榨，决意在

当朝皇帝某日五更坐朝时射死皇帝。临睡前，他叮嘱母亲鸡叫头遍时将其叫醒，而其母怕误了儿子的事，未等到鸡叫，就拍打簸箕，使鸡鸣叫。于是，吴天龙起身，操弓带箭，爬上山顶，面向北方皇帝宝殿，连射三箭，因皇帝尚未上朝，箭中龙椅。皇帝上朝发现后，下旨捉拿凶犯。吴天龙率领苗民与前来围剿的官府兵激战多日，终因寡不敌众，失败被杀于阴历六月初六日。吴天龙死后，变成了一只大公鸡，天天站在勾良山上，为苗家呼唤光明。从此，每年到了阴历六月初六，勾良苗寨都要举行歌会，以歌颂和纪念自己的英雄。此传说，虽没有直说吴天龙变成了凤凰，但说其变成了雄鸡，而鸡是凤凰的取材对象，是凤凰可以排在首位的模特儿。



四. 民俗凤凰：指的是民间习俗中有许多以凤凰为主题、为内容的事象，展现和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凤凰的崇拜和喜爱。如苗族妇女喜戴凤凰银冠，喜插凤凰银簪。凤凰银冠上的凤凰多则九只、七只，少则成双，配饰银花、摇叶等。凤凰

银簪造型生动，凤头向前，凤口衔珠，凤背布满银花，凤翅、凤腹密垂灯笼穗、叶片穗。另外，苗族刺绣是也多见漂亮的凤凰纹样。

五. 人杰凤凰：凤凰是才俊的象征，是杰出人物的意象化、神物化。中国自古就有将杰出人物比作凤凰的传统，如老子就将曾以凤凰比孔子。沈从文、黄永玉、熊西龄等，就是从凤凰古城里走出的人间凤凰。

六. 和美凤凰：凤凰文化的精髓是“和美”。凤凰来自于自然界，是古人对众多鸟禽和自然天象的容合，反映了人们“天和”的诉求和愿望；凤凰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人们就将种种道德理想付于其身，是“人和”的形象化、审美化；凤凰统“阴阳”于一身，是典型的“己和”。凤凰不光是“和”的产物和表征，还是“美”的集合、体现和化身。凤凰的形成过程，是一个美的因素被发现、被选择、被采纳、被综合、被升华的过程。从形式美的角度看，凤凰符合对称、平衡、整齐、比例、主次、变幻、参差、节奏、多样统一等形式美法则；从内涵美的角度看，凤凰具有祥瑞美、新异美和崇高美，凤凰是形式美与内涵美的统一。“和美”的象征、寓涵和期望，是山原、河流、城镇、村街、企业以及古今人物取名凤凰的最根本的原因。

（2006年11月19日于西安慧雨庐）



重庆火凤凰



重庆：火凤凰（二题）

1. 火凤凰

几年前，当重庆市的美术工作者蔡跃宏将他发现并绘出图样的“火凤凰”放在网上的时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四十城区巧相连，酷似一只火凤凰”。应当说，蔡先生是慧眼独具的：直辖后的重庆地图，不知从多少人的眼皮子底下过了，但惟有他想到将四十个城市的行政节点相勾连，使简洁、好看的“火凤凰”脱颖而出。我想，蔡先生大概是先看到直辖后的重庆地图像一只飞举的鸟儿，然后勾连出凤凰图形，再加上一个“火”字来命名。

这个“火”字加得好：一是凤凰有喜火的神性，在五行、方位象征系统中，凤凰以朱雀的别名象征火，代表南方，而重庆正好位于南方；二是重庆夏季气候炎热，有“火炉”之称，而生活在“火炉”中的重庆人又偏偏爱吃火锅，于是重庆人多具火性格，多是热心肠；三是火有“火热”“红火”“激情迸发”“热烈向

上”“魅力四射”等引申义，这些意蕴与凤凰本身具备的向阳、喜火、达天、自新、兆瑞、示美、尚和等意蕴相结合，正是在改革开放中奋发前行的重庆所需要的。

2010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乘机回西安。在候机大厅里，我发现了名为《火凤凰带您走遍新重庆》的磨漆工艺图盘，椭圆形，金色的底座托起来，郑重大方地立在醒目处，其主图便是衬以重庆地图和渝地主要景观的火凤凰。当时眼眸一亮，心生喜意：看来“火凤凰”已被重庆人，尤其是重庆市的决策者们认可了，成为重庆市的形象标志了。候机大厅里有介绍重庆的杂志，取来一本翻开，扉页上便是彤红鲜亮的“火凤凰”，下署八个字：“激情之都 江山重庆”。再下面是一段阐释文字——

重庆人更愿意把自己比作一只火凤凰。“火凤凰”不仅象征吉祥、和谐，更因其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涅槃传说而代表自省自强、进取和奋斗的精神。“火凤凰”表达了重庆双重喜庆的吉祥之意，“火凤凰”代表了这片有着千年历史和美丽自然山水的土地博大开放的胸襟和情怀，“火凤凰”凝聚了重庆人向上、积极、奉献的价值观念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火凤凰”生动描绘了这座富有激情和想象力的城市的鲜明个性，“火凤凰”更蕴涵了重庆迈向开放和深化改革的巨大社会能力，象征着重庆灿烂辉煌的明天。

这段文字出自《重庆市人民政府2008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之一：新重庆城市形象定位与塑造研究》，应当说已将火凤凰的文化蕴涵和象征意义讲得很全面、很到位了。当然，如果语句再精炼些，读起来朗朗上口，就更好了。

看到一则报道，说“火凤凰”经过数年的探究和演绎，已成为蕴含重庆人文、历史、地理、经济、哲学、美学，具有完整的理念、视觉系统的文化符号；《重庆火凤凰旅游地图》和重庆市四十个区县经济地图普遍应用“火凤凰”图案，这样的地图发行量已突破一百万张。“火凤凰”正在以强大的传播速度，“演绎一场城市形象的视觉革命”“成为营销重庆的一张名片”。这样的报道令人高兴，尤其令像我这样的以研究龙凤文化为事业的人高兴。我觉得，“火凤凰”从被发现到被广泛采用，不仅对拉动与强化重庆市的软、硬实力，推进重庆市的全面进步有

大益，也是对龙凤文化研究事业的一大贡献：它为传统文化精华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了典范，使我们看到了中华象征文化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和巨大潜力。

重庆市的学者们还根据《山海经·海内经》中“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的记载，将“咸鸟”以音近释为“玄鸟”，玄鸟即为凤鸟，是为远古东夷族的图腾；太皞即太昊，东夷族的领袖。这样的解读将巴人的族源追溯至崇凤的东夷族，是有道理的。我这里还有一解：“咸”为“咸池”，神话中太阳洗澡的地方，《淮南子·天文》：“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那么，咸鸟就是咸池之鸟，咸池之鸟就是太阳鸟，太阳鸟就是凤凰。——这样的考稽，无非是想给“火凤凰”找一些历史依据。其实，有这样的依据当然好；没有也不要紧，因为凤凰与龙一样，经过漫长岁月的创造、演进和升华，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只要是中华民族成员，无论在哪里，谁都可以用，用得越好，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越大，越值得称道。

（2010年6月6日于西安慧雨庐）

2. 祝凤凰蛋项目成功

凤凰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的多种鸟禽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具有和美、福善、奋进等精神蕴涵的神物。经过近八千年的演进和升华，凤凰和龙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

重庆市是凤凰文化的祥瑞地之一，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馆藏珍品——出土于丰都袁家岩的“汉陶神鸟”堪称“巴渝古风”。

艺术家蔡跃宏先生长期致力于凤凰文化的研究、宣传，其设计、创作，并由当地企业家投资打造的《凤凰蛋》石雕，造型妙、内涵丰、寓意美，堪称凤凰文化不可多得的佳构精品，对弘扬中华文化优秀精华、丰富巴渝旅游资源、提升地方文化品位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祝福凤凰蛋项目成功！愿美丽吉祥的凤凰给天下人带来幸福安康！

（2022年10月9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朱雀文化精神

——为西安市第六中学撰

西安市第六中学位于朱雀门内，其校园内要立宣传牌四块，内容为朱雀文化精神，应邀为其撰之。

朱雀是凤凰的别称，被列为“四灵”之一。它司理南方，向阳，喜火，尚赤，有太阳鸟、火凤凰之称。它具有自我更新的品性，能够主动地于烈火中除去旧我，创造新我，是为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朱雀（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具有崇尚高洁的品性。它志在云天，不堕污泥，超越平庸，追求卓越，目标远大。

朱雀（凤凰）“五色备举”，鸣声悦耳，具有兆示祥瑞的品性，“见则天下安宁”。它能够将美好和幸福带给人间，有凤来仪，吉祥如意。

朱雀（凤凰）是“羽族之长”“百鸟之王”，龙是“鳞族之长”“众兽之君”：一个和美秉德，一个合力适变。凤舞龙腾，英才辈出，国运昌隆；龙凤呈祥，中华强盛，天下文明。

（2018年9月29日于西安邮电巷）

凤之邮

作为源远流长、蕴含丰富的文化现象，龙凤都是中华民族的图徽、标志和象征。如果按其功能效应排座次的话，龙无疑要坐第一把交椅，那么，接下来就该是凤凰了。

与“龙邮票”相比，“凤邮票”种类少一些，名气也小一些，但却要好看一些。比如1979年发行的《长沙楚墓帛画特种邮票》中的《龙凤引魂升仙帛画》，其凤就比同画面的龙壮大，姿态也矫健得多。1987年发行的《风筝（第二组）》特种邮票，其中第四枚为“凤凰风筝”——一只彩凤甩尾展翅，翱翔于白云青岚之上，给人养眼爽心之感。2004年11月1日，国家邮政局发行发行图案为凤凰的《吉祥如意》邮票一枚，其凤为金凤，扬首翘尾，洒洒而飞。同时配发有2005年贺年（有奖）明信片，其中一款的图案呈“团花”状：一壮族少女，细眉大眼圆脸庞，头顶黄黑红间色花巾，身着粉色对襟上衣和红色镶边长裤，脚下祥云数朵，手中绣球一团；一只姿态柔美的金凤低首伸喙对着绣球，其双翼开张，尾羽弯曲上举。意思大概是：美丽的少女以绣球传递情意，引来金凤鸣唱旋舞，人凤和美，喜庆吉祥。

按我的考察，古人主要是以原始的模糊思维对待身外世界的，模糊思维所具备的直观把握、整体关联、非逻辑神秘、群体意象等特点，使古人很可能一方面认为凤是对鸡、鹰、燕、乌、孔雀、鸵鸟等的综合，另一方面又把鸡、鹰、燕、乌、孔雀、鸵鸟等具体的鸟禽当做凤凰看待，因为进入古人视野的只能是凤的一个个模特儿，而作为神物的凤在自然界里是看不到的。在古人眼里，在天上飞的鹰雕是凤凰，在草下栖的鹌鹑也是凤凰，在水边落的鸿雁可以是凤凰，在水中游的鸳鸯也可以是凤凰，而且古人还很可能将锦鸡、鹰雕、鹌鹑、鸿雁、鸳鸯、孔雀、鸵鸟等等鸟禽都看成是凤凰的化身或分身——同一个东西，同一时间在不同的地方出现，或者相同地方出现不同时间的东西，这在现代人看来不可能发生的

事情在古人心里却是很寻常的事情。

那么，可不可以将鸡邮票、鹰邮票、燕邮票、乌邮票、孔雀邮票等等以鸟禽为表现内容的邮票都称为广义的“凤邮票”呢？当然可以。这样的“凤邮票”就多不胜举了，比如——

鸡属于十二生肖之一，大概从 1981 年起，每逢农历鸡年，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及亚洲各国，都会有寓意吉祥的鸡邮票面世。2005 年是乙酉鸡年，这年中国邮政局发行的鸡邮票是我国第三轮生肖邮票的第二套，于是被称为“鸡三世”。这套邮票将中国古典书法艺术与刺绣结合在一起，邮票图案上的“鸡三世”与大地、旭日构成了一个“酉”字，而鸡身则像一个“乙”字，体现出以生肖纪年的意味。有趣的是，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港、澳、台及亚洲各国发行的鸡邮票，所选的鸡多是趾高气扬、精神抖擞的公鸡。于是，有人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一只黄羽绿尾的母鸡扬着头，张嘴而言：“邮票设计咋也重男轻女？”

鹰邮票也见过几枚，如 1987 年由国家邮电部发行的《风筝（第二组）》特种邮票，全套 4 枚，第一枚就是属于软翅类的《九头鹰风筝》，那硕大的翅膀给人印象深刻。还有 2001 发行的《虎头海雕》《秃鹫》等，及 2002 年发行的《八大山人作品选·双鹰图》等。

2004 年 4 月，国家邮政部门发行了特种邮票《孔雀》，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套与孔雀有关的邮票。该套特种邮票由 2 枚邮票与 1 枚小型张组成，邮票图名起得颇拟人化，蓝孔雀叫“娉婷”，白孔雀叫“婀娜”，小型张主图绿孔雀则取名“竞艳”。三幅图中的孔雀，或傲立玉兰枝头，或斜依紫藤花边，或雌雄对映，展现开屏的瞬间：皆五彩缤纷，新美感人。值得一提的是，三幅画都出自咱们西安的画家石愚先生之手。

（刊于《西安晚报》2007 年 12 月 4 日）

龙飞凤舞华清城

因长期做龙凤文化研究，每到一地，目光总是被那些龙呀凤呀所吸引。

到了骊山脚下的大唐华清城，首先看到的，是一尊名为《春寒赐浴》的雕塑。该雕塑取了白居易《长恨歌》“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诗意，刻画的是杨贵妃在华清宫海棠汤沐浴时的情景。一千二百多年前的的大美人，挽高髻，披轻纱，掩丰乳，显肥臀，曼妙在鼓型台座之上。而在台座的东西两侧，我看到了一对凤。那凤体态丰健，扬凤首，睁凤目，鹏翅展开，作俯飞状，凤喙之前，有牡丹花枝。

唐朝立国近三百年，太宗的贞观之治、玄宗的开元之治，将中国中古社会推向鼎盛。和恢宏开放、博雅包容、刚健有为的时代特征相吻合，唐代的风也以富贵瑰丽、丰满壮健为特色。还有牡丹，其花单生，花朵硕大，色泽艳丽，香气馥郁，遂有“花王”“天下冠”“国色天香”等称呼，成为荣华富贵和繁荣昌盛的象征，在唐代被广泛栽培。于是，“美美益美”的规律发生作用：凤是象征吉祥的鸟王，牡丹是象征富贵的花王，花王配以鸟王，既吉祥又富贵。

当我们一行人在贵妃像前流连的时候，台座下粼粼腾腾的池面上，突然出现一弧美丽的彩虹——该是朝阳与水雾的杰作了。在古人心目中，虹可是龙的模特和化身啊！对，有凤就有龙，就像有龙必有凤一样。这龙，我们在霓裳羽衣广场的主题雕塑《霓裳羽衣》上也看到了。这《霓裳羽衣》既是曲，也是舞，相传其创作者和导演者，就是唐玄宗本人，故白居易在《霓裳羽衣歌》中有“飘然转旋回云轻，嫣然纵送游龙惊”的描述。诗中“游龙”所喻指，自然非唐玄宗莫属。而出现在雕塑上，正在为跳舞的贵妃击鼓配乐的玄宗，其胸前的袍服上，就腾跃着一条蛟龙。

或有朋友问：帝王们为何要比龙称龙，帝妃们为何要比凤称凤？简单地说，龙因取材于多种动物和天象，身上已具备通天、善变、显灵、彰力、示威等神性，

这些神性正好与“帝王性”多有吻合；而凤因取材于多种鸟禽而具备了向阳、秉德、兆瑞、喻情、示美等神性，这些神性正好与“帝妃性”多有吻合。于是，从秦朝开始，就有了帝龙凤妃之配：秦始皇被称作“祖龙”，他也自认为是“祖龙”，而秦宫内的三妃九嫔，也遵始皇之命，戴凤钗、着凤履。到了唐代，这样的讲究依然在运行和发展，如言唐太宗有“龙凤之姿”、武则天改年号为“仪凤”、唐玄宗有“黄龙”之兆，等等。

龙是力量的象征，凤是美好的象征。龙和凤的对应，是力和美的对应；龙和凤的互补，是力和美的互补；龙和凤的和谐，是力和美的和谐；换句话说，男人之力和女人之美，对应、互补、和谐了，也就是人们所希望、所理想、所追求的“龙凤呈祥”了。——大唐华清城的华清广场，有名为《温泉铭》雕塑，雕塑的两侧，有“龙凤呈祥”的造型：龙是雄壮的力之龙，凤是华健的美之凤，龙昂首张口，凤挺冠亮目，龙凤对望，似有无限深情。

大唐华清池的打造者们，为何要在系列雕塑中，采用并彰显龙凤？我想，一是文化传统使然，龙凤不仅是帝王、帝妃以及男儿、女士的喻体，还是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象征；二是龙凤的开放、包容和造福众生，正是唐玄宗、杨贵妃生活在其中的盛唐的时代特征；那么，第三，龙凤所蕴含的种种精神质素，也为当代中国所需要。而且，正如我在多篇文章、多种场合所强调的：一个世纪以来，龙凤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文化标志、情感纽带的身份已得到中华民族大多数成员的认同；龙凤已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告别了皇权、专制、保守和软弱，已成为自觉自信、团结合力、适变图强、爱好和平，以天下人的幸福为幸福的新龙、新风。

（2012年9月18日于西安慧雨庐）

龙山凤泉真硒水

癸巳盛夏，蒙朱文杰先生约邀，与子页、子秦、冷梦、若星、嘉瑞诸文友，出古城，上高速，钻秦岭，到达位于紫阳县的陕西硒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部，听取介绍，参观水厂，领略当地民俗风情……时间短了些，但三个比较清晰的印象或者说“意象”还是产生了，这便是：龙山、凤泉、真硒水。

先说“龙山”。

紫阳县地处秦岭以南，有“北依秦岭”之说。

而秦岭，作为横贯中国中部东西走向的山脉，素有“中华龙脉”之称。

紫阳县又位于巴山北麓，有“南依巴山”之说。

广义的巴山系指绵延川、陕、甘和鄂四省边境山地的总称，长一千公里。狭义巴山仅指川、陕、鄂三省接壤地带的米仓山和大巴山，东西绵延五百多公里，故称千里巴山。简称巴山。

不管是广义还是狭义，巴山都堪称“龙山”。为什么这么说呢？

巴山的“巴”字，本义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大蛇。大到何种程度呢？大到能把大象吞到肚子里去。《说文解字·巴部》云：“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

《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山海经·海内经》载：“朱卷之国，有黑蛇，青首，食象。”依据这些记述，我们可以将巴山称为蛇山。

蛇是龙的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取材对象。中国民间，常把蛇称为“小龙”，生肖属蛇的人，也常把自己说成是属小龙。那么，说巴山的“巴”字本义是蛇，也就可以说巴山的“巴”字本义是“龙”。这样，说巴山是蛇山，也就可以说巴山是“龙山”。

秦岭、巴山为“龙”，紫阳县好似一“珠”。

二龙养珠、二龙护珠、二龙捧珠，紫阳占了好风水。

再说“凤泉”。

紫阳县境内有凤凰山，凤凰山涌流凤凰泉。

关于凤凰泉，民间有这样的传说：凤凰原是如来佛身边的一只侍鸟，因向往人间的幸福生活，私自从天上的梵宫逃下凡来，化作一个美丽的姑娘，和一个诚厚朴实的牛郎结了婚。婚后，小两口以务农种茶为生，日子过得甜蜜和美。如来佛察觉后，十分震怒，认为凤凰违犯了佛门戒规，是大逆不道。遂令一名恶僧前来惩处。恶僧纵五雷轰塌了田庄，放天火烧毁了茶园，并将牛郎点化成一座青牛山。凤凰勇敢地和恶僧决斗，无奈身单力薄，终被恶僧用神针钉死在山坡上，化作凤凰山。此山狭长，形若凤凰展翅。山腰有根大石柱，据说就是恶僧的神针所变。山口处有一眼泉水，清凉甘冽，据说是凤凰姑娘的血泪所变。

这则传说有点悲凉。另一则传说可作为参考和借鉴——

相传西周末年，幽王无道，民不聊生，关中一带又遭旱魔肆虐，烈日当空，田地龟裂，老百姓呼天抢地，苦苦挣扎。一对凤凰飞过此地，眼见世间凄惨景况，仁心大动，决心寻觅一眼甘泉，为老百姓解脱苦难。它们飞啊飞，忽高忽低，左旋右转，终于在一个荒坡上，发现了一团湿润的泥土。凤凰落下来，用爪刨，用嘴啄，湿土揭去，清泉涌出，尝一尝，甘醇甜美，竟如醴酒一般。凤凰好高兴啊，它们“唧唧足足”地叫着，唤来了一个个濒临死亡的饥民。人们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方圆百十里的饥民都来了。大家说，多少年没见过这么美丽的鸟儿了，凤凰把吉祥给我们带来了，我们的灾难要到头了。甘露一般的泉水挽救了众人的生命，流进了众人的心田，大家感念凤凰的恩德，就将此泉起名为“醴泉”，即甜美如酒一样的泉。这就是“礼泉”县名的来历了。现在的陕西省礼泉县西北方向，有一座凤凰山，据说就是凤凰当年落脚憩息的地方。

凤凰是祥瑞鸟，凤凰泉是世间最美的泉。

再说“真硒水”。

硒是一种化学元素，这种化学元素是生命体必需的。硒有抗癌、抗氧化、抗衰老作用；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预防种种富贵病；能够调节各种维生素的吸收与利用，能够调节蛋白质的合成功能，能够增强生殖功能……总之是硒对人好处多多。

然而，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硒，需要通过饮食，从自然界中摄取。据测量，地球表面，硒的含量只有亿分之一，且分布不均。中国是国际上公认的缺硒大国，缺硒地区占国土面积的七成以上，全国有三分之二人口严重缺硒。

20 世纪 70 年代，国家地质勘探队在秦岭山脉探测到大量辐硒资源。

紫阳县属于中国最好的高富硒区。

2010 年 7 月，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旗下的陕西硒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紫阳宣告成立。这个公司从凤凰山附近的“中国硒谷”开采富硒矿泉水，建了两个厂，年产十四多万吨。水是用从德国进口的克朗斯生产线在水源地无菌灌装的，故取名“真硒水”。

真硒水采自秦岭山脉，秦岭山脉是中华龙脉，故真硒水可称为“龙脉水”。

真硒水的水源地距凤凰山不远，故真硒水可称为“凤泉水”。

如果将“龙脉水”与“凤泉水”合二而一，真硒水就可称为“龙凤水”。

龙凤的精神可以用“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来概括，这样的精神，对真硒水也是适合的——

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容合的精神是龙凤最基本、最特色的精神。从质地上讲，真硒水容合了硒、锶、锌、钠、钙、镁等微量元素；从开采上讲，真硒水容合了大自然的赐予、中国人的智慧和能力、德国的技术设备……

福生是造福众生的简称。福生的精神是龙凤文化最核心、最重要的精神。硒是人类和动物生命中必需的微量元素，真硒水是养生水、益智水、长寿水，是造福众生的健康水。

谐天就是与天和谐，就是尊重自然规律，建设与大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文明。真硒水来自秦巴山地“中国硒谷”，水源在地下一百五十多米，是难得的生态水；而且，真硒与“珍稀”“珍惜”谐音，事实上，真硒水的确是很“珍稀”的水，是需要备加“珍惜”的水。

奋进是奋发向上、开拓创新、适变图强的简称。真硒水是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投资开发的，“陕煤人”有苦干、实干、创优、争先的传统，他们锐意进取，追求卓越，“特别能战斗”。仅仅三年时间，陕西硒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形成了年产二十七万多吨的生产规模，而且有望成为全国排在前列的矿泉水生产企业。

和美就是既和谐，又美好。真硒水的开采、陕煤人的努力，广大消费者对真硒水的认可，许许多多的人对真硒水的奉献，这一切的根本目的就是：让大家的生活更和美，让这个世界更和美。

（刊于《文化艺术报》2013 年 7 月 3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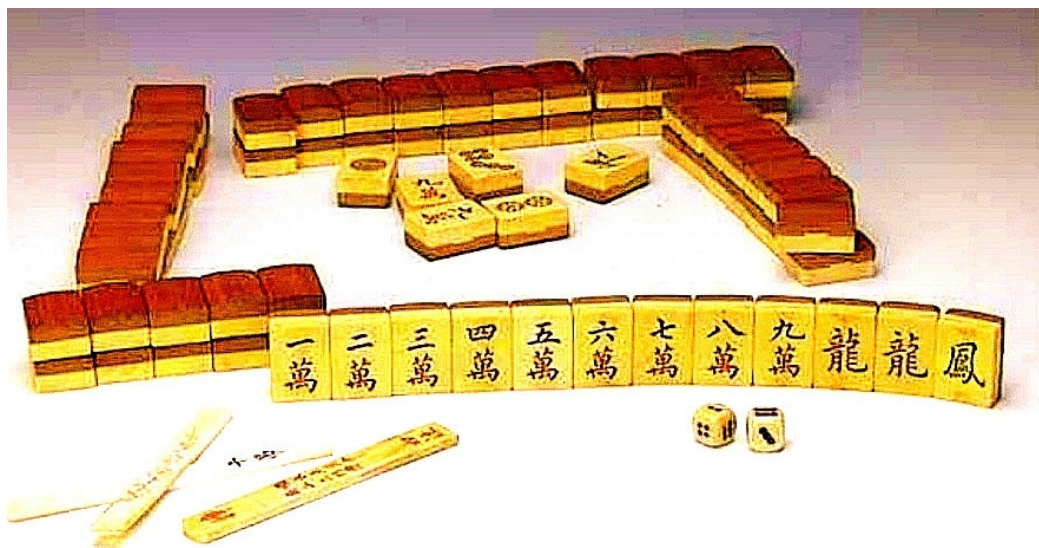


麻将中的龙凤

有收藏家收藏了一副骨质麻将，发现其中有其它麻将中未曾见有的龙凤牌块，问我原由。

我回答说：一种解释是：骨质麻将为清宫后妃们游戏所用，为了体现皇家特色，就用“龙”取代了“中”，用“凤”取代了“发”。当然，龙凤不光能体现皇家特色，还能象征阴阳、男女等。

我曾言龙凤文化具有广渗性，可广泛地渗入世间各种文化，也即龙凤文化能与世间任何文化相结合，此即一例。



（2022 年 1 月 16 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关于舞龙进校园之建议

在庆祝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一周年和首个“全民健身日”启动之际，我应邀出席了在北京首都体育学院举办的“2009 中国高校龙狮运动科学报告会暨校长龙狮论坛”，做了《龙文化的历史职能、精神底蕴和重要使命》的主题报告；随后又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的开幕式，观看了舞龙表演和比赛。精彩的表演和比赛，令我欣喜、振奋，也使我多年前就萌生的一个想法又一次激荡开来，这便是：让舞龙成为国家重视的全民健身项目，进入中华大地的每一所学校。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和建议，是基于三条理由——

一、舞龙是传承和弘扬中华龙文化优秀精华的好载体

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多种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一种神物，经过至少八千年的创造、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海内外华人大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龙文化既是根源文化，也是标志文化；既是传统文化，也是时尚文化；既是精神文化，也是物质文化；既是中华文化，也是世界文化。舞龙是最能体现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精神的民俗活动之一。舞龙进校园，可以使青少年对龙文化有一个形象化的认知、感受和理解，从而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自觉地担负起传承、弘扬、创新、发展的责任。

二、舞龙是培养团结协作精神的好手段

舞龙是团结的产物，是合力的结晶，没有团结和协作，任何一条龙都难以舞

动；而在舞龙的过程中，任何一个个体的不配合、动作不协调或出现失误，都会影响到全局。所以，让青少年学习和练习舞龙，有助于团结协作精神的培养，而团结协作精神，不仅对舞龙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国家建设、对民族振兴，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三、 舞龙是能够强健体质、娱乐身心的好项目

舞龙属于大运动量项目，可以强健人的体适能，如心肺耐力、肌力、肌耐力、柔软度、身体质量指数，及敏捷、平衡、协调、速度、反应时间、瞬发力等等。同时，舞龙的参与性和娱乐性都很强，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发育和成长，好处多多。

中国是龙的故乡，也是舞龙的家园。史籍记载和出土的画像石上的图案，都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舞龙就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发展至今，民间舞龙的资源已相当丰富，品种多达数百。

大学生舞龙，堪称舞龙大花园中的新卉奇葩，其异军突起，发展迅速，已蔚然一片风景。2003 年，由中南大学首创先行的“全国百校龙狮进课堂推广计划”，得到教育部、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重视，短短六年，加盟的大学就达 119 所。而“舞龙活动进中学”，据悉也已被国家教育部列入议事日程，并着手实施。

我觉得，舞龙进大学、中学都是好事，但还不够，最好让舞龙进小学，即让中华龙由娃娃们舞起——让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新生代，从小就在锻炼身体的同时，领略龙文化的魅力，接受团结协作精神的培育。简言之，就是让舞龙成为国家主导的文化体育行为，进入全国的每一所大学、中学和小学。

工程巨大，需要政府决策、主导、推行，也需要全国人民关注、响应、支持；过程复杂，需要论证、编教材、定规则、培训、试点、推广……然而，它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需要做，尽早、尽快、尽好地做。可以想象，一旦这个建议被采纳并开始逐步实施，若干年后，我中华民族之体质必将会大大提高，凝聚力会大大增强，而文化精华呢，也会籍此而得到传承、创新和弘扬。

（2009 年 8 月 13 日于西安慧雨庐）



建议安顺龙宫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2022 年 2 月 6 日（壬寅虎年正月初六），黄佶先生在朋友圈发出图片并说明文字：“贵州安顺龙宫译为 Loong palace。在离开安顺不远的地方，公路两边的山上竖立了两块大牌子，不仅大书‘龙’‘宫’二字”，还写上了英文。目测这些英文字母的高度大约有一人之高。这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英文 Loong 单词了。”

我看到后，立即转发至“龙凤国际联合会”群，并言“译龙为 Loong 渐成共识”。黄佶发帖应之“是的”，黄益苏、正合、安然等同道点赞。随之，黄佶又发出《巨 Loong 出世！贵州山头耸立巨大龙字》文章，言“贵州龙宫景区可以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这使我想起与安顺龙宫的一段缘分。

那是十一年前，即 2011 年的 2 月下旬，我应邀，与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刘文阁先生，赴贵州省余庆县，考察修建中的飞龙湖飞龙长廊项目，回答相关咨询，商定举办“龙文化与民族团结进步论坛”及飞龙长廊竣工典礼等事宜。27 日返程途中，至安顺龙宫参观。到景区后，忽然想到应该和景区领导联络一下，或许以后会有什么合作。因事先未联系，就抱着试试看的心里，打开手

机上网，搜出龙宫景区联系电话，打过去，自报身份。没想到景区很重视，几分钟后，当天值班的一位总经理就来迎接我们。见面握手，总经理说他读过我的文章。于是，安排我们下榻龙宫酒店。第二天，派专人导引我们游览景区，中午还将当地的风味菜肴摆满一桌。



那晚，我与文阁坐于酒店简而雅致的凉亭之下，谈龙说凤，心旷神怡。忽然诗意袭来，遂吟出一首《夜坐凉亭》：“草味馨馨扑面来，涛声阵阵抚鬓腮。星灯点点随风晕，似莅飘飘梦境台。”第二天，在兴味盎然地领略过溶洞、峡谷、瀑布、溪河、峰林、绝壁等丽景奇观之后，又推敲出一首《安顺龙宫》：“曲脉清波穿洞窟，幅幅妙画次迭出。灵仙隐在幽幽处，且启心弦会胜殊。”我还想到，日后若有机会，当回报受到的盛情款待。

机会来了：何不将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建议告诉龙宫景区呢？

于是，上网搜到了安顺龙宫的官网，查到了可以联系的电话号码。拨通后，是位姑娘的声音。说明意思后，姑娘说“我给你一个我们薛总的电话你联系”。

于是，记下了一个手机号。拨打了几次，未通。估计是，我在加拿大，打的是网络电话，对方手机不会有号码显示或显示不正常的缘故吧。

于是想到微信，在“添加朋友”栏输入号码，很好，瞬间便有了显示，名字中有一个“莎”字，表明这位薛总是位女士。

接下来是请求加好友了，发了两次，未见回应。加拿大和中国时差十三个小时，已是晚上 11 点，该休息了。

一觉醒来，已是 2022 年 2 月 8 日的凌晨 4 时许。拿起手机，再给薛总发一条，注明有关龙宫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事。

过了一会儿，显示来了：“我通过了你的朋友验证……”“不好意思，今天在忙”。

太好了！于是开门见山：发上相关图片、文章，言：“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吁更改龙的英译名，即将译成 dragon 改为译成 Loong。”“建议贵公司将此广告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扩大影响，也有利于龙宫知名度的提高。”

薛总回复“好的，谢谢”。

我再加一句“我们团队全力支持并大力宣传”。

是的，十几年来，我们与众多有识之士一起，为更改龙的英译名，做着持续不断地努力，开办网站、撰写文章、搜集图像，在各种媒体上发声，在各种场合呼吁，连续多年策划、支持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将相关提案、建议呈致全国会议，发动海内外华人网络签名……我们的努力已然有了令人欣慰的效果：许多产品、单位，如龙芯集成电路（Loongson）、翼龙军用无人机（Wing Loong）、长龙航空（Loong Air）、电影《龙之战》（War of Loong）、伟龙食品（V-Loong）、龙工场（Loong Works），等等，都译龙为 Loong，真可谓沉舟侧畔千帆过，众人已译龙为 Loong。

相信安顺龙宫（Loong palace）能够成功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也相信这件事对景区营销、对龙文化的发展、对民族精神的传播、弘扬，会产生积极的效应。

（2022 年 2 月 8 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春节社火中的龙

——答陕西卫视《村里村外·咱们过大年》主持人问

1. 我省旬阳县有春节期间玩懒龙的习俗。玩懒龙之前，先要找当地有威望的人去请龙，为什么非要选择这些人？

答：这是表示对龙的尊敬。龙是神物，大家觉得只有找有威望的人去请，才相配。

2. 玩懒龙的时候为什么要把火往龙向身上喷？龙身体里面有不少的蜡烛，这只是为民好看，还是有别的说法？

答：好看是重要的一条。另外，还有营造气氛的作用、祈福辟邪的作用。

3. 懒龙对于当地人来说，究竟图个什么？

答：我曾总结舞龙的四大功能：一是“祈”，即祈雨祈福；二是“娱”，即娱神娱己；三是“显”，即彰力显威；四是“旺”，即旺丁兴族。玩懒龙除这四条外，还有“唤”的功能，即春天快到了，连懒龙都苏醒了、起来了，大家也都醒来，做春耕的准备吧。

4. 只要是玩社火，几乎都离不开龙，为什么过年中，龙的地位这么重要？这其中有什么讲究？

答：这与我国的农业文明有关。龙是古人对蛇、鳄、蜥、鱼、猪、鹿、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等天象多元容合而产生的神物，因取材对象多为水物和水象，故龙成为古人心目中的水利神和农业神。一年到头了，将龙神请出来，希望龙神担当起兴云布雨、司水理水的责任，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是原初的意思，发展到现在，龙已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人们舞龙，就有了彰显团结和谐、凝聚力量、展现龙的传人们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的意思。

5. 懒龙相对应的是滚龙，就是要上下翻滚？那么玩龙的时候为什么要翻滚

呢？

答：懒龙是不爱活动的龙，反映的是龙的取材对象相对静的一面；一般都是由多人举着，沿着街巷走一走，表演套路不多，动作幅度也不大。这样的龙不但陕南旬阳有，湖北、安徽的一些地方也有，旬阳的玩懒龙是由湖北传过来的。滚龙是喜欢活动的龙，也叫勤龙，反映的是龙的取材对象动的一面。有静有动，有弛有张，才是大自然的本色；而龙的诸多意蕴，只有在动中才能显示出来。再者，上下翻滚，做各种动作，一是好看，有表演性质；二是动作增加了难度，这就有了比赛、竞技的意思。



6. 春节社火中，常常是龙狮同舞，在旬阳，人们把孩子放到狮子嘴里，然后从狮尾接出，这是什么讲究？舞龙中有没有类似的讲究？

答：这有点“感生巫术”的意思，目的是“旺丁”。即让孩子秉赋狮子的力量，健康、活泼、成为出类拔萃的“王”者。舞龙中也有这样的讲究。龙灯也是灯，是“灯”就谐“丁”。而且，龙是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是力量和智慧的象征，龙灯也就寓意着“龙丁”——谁不希望自己的家里出一个“龙子”呢？这样，在全国各地的舞龙活动中，常有一些和“龙丁”相关的程式、讲究、说词。浙江

奉化流行一种盘龙灯，“盘”到子孙众多的大户人家，放“百子炮”；盘到小户人家，放三只连响炮。放炮者不能将炮蹲在地上放，认为炮一蹲地，就意味着这家子孙是“泥坯子”；要将炮提在手中放，寓意“龙子”一步登天。盘到新屋落成的人家，要让这家的妇女摸“龙须”和“龙角”（象征性地与龙交会），让其小孩“钻龙门”（和“登龙门”意同，认为钻过龙门就有了成龙的希望）。龙灯不会白舞，钱呀物呀，总是需要的，而且多多益善。平时生活再节俭的人家，这个时候一般都表现得慷慨大方。湖南湖北一些地方，人们相信龙灯对生育有利。在龙灯舞到门前时，那些多年求子不得的妇女，往往加钱加物，让龙绕一绕自己的身体。浙江东阳、金华、贵州桐梓等地的龙灯会，有“分子息”（舞完龙灯会分灯或分糖果礼物）、“挂红”（村主或族长给龙头上披挂红绸被面）、“抢红”（谁家将此被面抢购到手，谁家就子孙兴旺）、“产龙蛋”（舞龙者进屋后，将两个红鸡蛋送给主人，让主人放到被窝里）、“放圆宝”（将逗耍龙灯的圆宝在家中存放一年，来年灯会前奉还）等节目。因为人们祈求子息、旺丁兴族的愿望代代传承，这些节目也就常演不衰。

（陕西卫视 2007 年 2 月 21 日丁亥年正月初四 13：20 分首播。）



龙的定义及其他

——庞进答裴雅辉同学问

来信——

庞老师：您好！我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一名学习美学的硕士研究生，裴雅辉。12月11日，在听您的讲座的时候，因时间问题，没来得及提问，现在想向您提几个问题：

1. 怎么样判断一个图腾（或一个我们远祖先民的图案）是不是关于“龙”的图案？对于什么是龙，有没有一个相对明晰或确切的标准？

2. 在龙的起源上，你选择了龙的模糊起源说或者是多元融合说，那么是否意味着在判断龙的标准，尤其是“原龙”的标准上你也认同模糊说？比起猪说、牛说、蛇说总总……在您所列举的图片里，有一个图片是一个有冠的蛇的图像，您认为是原龙，那么是否也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图案，只要它不是什么所谓的猪、牛、蛇等等原体，只要是一个关于他们的变形或变体就是原龙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关于什么是龙，怎么样判断龙似乎就没有了一个明晰的标准或确切的标准？

3. 单纯地面对一个图像或图案，又怎么样单纯地从图形上来判断中国龙和西方龙的区别，不考虑其文化和内涵的差异，如果只从图形外表上来看，他们的本质差异又在哪里？

4. 龙文化的研究，如果从学术上来讲，关于龙文化的研究，其学术前沿现在研究的又是什么？又都在研究些什么东西？

5. 关于龙的内涵的，您一方面说现在要与时俱进，加入了科学、环保等等内容；另一方面又说龙是中华文化前进的标志和象征，我觉得这里面存在着一个矛盾：本来科学、环保的东西是我们加诸于龙这个意向上的，但我们怎么又

能够反过来说我们加在某个东西身上的特质成为我们前进的标志和象征呢？还有，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的话，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东西？难道只是一个工具，任我们不断往里面放置诸如科学、民主、环保等等东西？历史上的龙本身应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龙的边界又是什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龙变成一个承载某些东西的工具的合理性又在那里？

6. 最后一个问题：是最幼稚也是我最不明白的问题：龙到底是什么？

鉴于本人学识有限，再加上对龙文化涉猎浅显，以上问题，有冒犯或无知之处，请庞老师见谅！

学生：裴雅辉 2007 年 12 月 11 日

答复——

裴雅辉同学好！现在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1. 判断一个由远古先民创造的图案是不是“原龙”，一是看其是否属于自然界中本有的某种动物，或与自然界中本有的某种动物完全对应。如果不属于自然界中本有的某种动物，或与自然界中某种动物不完全对应，那就意味着“高于生活”，向“神物”迈进了；二是看这个图案是否具有长身、大口、有角、有足等特征，如果没有，就将其排除，如果全有，或部分有，就可以“原龙”视之。

2. 在龙的起源问题上，我之所以提出“模糊集合——多元容合说”，是基于对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思维的认识，因为原始思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模糊性为主要特征的思维。这样的思维具有直觉把握、整体关联、神秘的非逻辑、群体意象，及不确指、不惟一、不固着等特点。基于此，我们就不能为“原龙”提供一个特别明晰的确切的标准，因为“原龙”的创造者们的思维本来就是“模糊”的，其创造过程也是“模糊”的。

3. 单纯地从图形上看，中国龙造型神奇、比例协调、无硕腹、无巨翅，表象多彩悦目，西方的 dragon 造型丑陋、比例失调、挺硕腹、展巨翅，表象灰黑刺眼。当然，两者的本质不同还在于其象征义：中国龙经过至少八千年的演进，虽有一些负面承载，但主要代表善，是吉祥、正义、和谐之神；西方的 dragon

只有两千年左右的历史，虽然有若干正面意义，但主要代表恶，是暴力、邪魔、恐怖之怪。

4. 龙文化研究，从学术上来讲，有对龙的起源、本质、流变、精神内涵、当代意义等多方面的研究，牵涉到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宗教学、创造学、哲学、美学、传播学等多种学科。目前大家的注意力多集中在龙的精神内涵和当代意义上。

5. 在我看来，龙是一个开放的可以不断纳新的动态系统，它既是过去时，也是现在时，还是将来时。龙是由历朝历代亿万中国人共同创造的，龙的身上集纳着、承载着历朝历代亿万中国人的智慧和情感，所以，它能够为不断进步的中华民族提供智慧参照和精神动力；同时，不断进步的中华民族也再再地为龙文化灌注、增添新的内涵。这是一个双向的、互动的、必然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说，龙没有“边界”，因为作为中华民族的血脉文化和象征载体，它是随着中华民族的脚步向前走的，中华民族进步到何种程度它就会进步到何种程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龙增加科学、民主、环保等等与世界文明发展高度相吻合的内涵，是中华民族要进步、在进步的现实所致，也是龙文化要进步、在进步的必然诉求。对我们这些文化研究者而言，如果仅仅满足于将过去的东西梳理、阐释清楚，而不努力地为这个世界创造些什么、增添些什么，那将是我们的失职。所以，我主张既“承古”，又“开新”。

6. 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的蛇、鳄、鱼、鳃、猪、鹿、牛、马等多种动物和雷电、虹、龙卷风等多种天象多元容合而产生的，具备长身，大口，大多有角、有足、有鳞、有尾等形象特征和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品性的神物。经过漫长时间的创造、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龙具有容合（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内涵。

以上答复，乃一家之言，未必正确。欢迎继续提问，我们共同探讨。祝福！

庞进 2007 年 12 月 14 日

龙商的定义

来信——

庞老师好！我是昨天与您通话的刘彦平，现在想做一本新刊物冠名《龙商》，主要报道全球商界华人及商会商帮等商业组织。是一本着重体现商业信仰，追求商业原动力的大型商业读物。彦平曾斗胆对之下了个定义，以为龙商者即有华夏基因的商人之简称。在此特别请教庞老师对龙商之定义做评判，彦平甚是感激！（2011年9月27日）

回复——

彦平好。“龙商者即有华夏基因的商人之简称”的说法，原则上能讲通，但面有点窄。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只提“华夏”，汉族无问题，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会有被排除之感。经过至少八千年的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这里的中华民族，即包括汉族，也包括汉族之外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故龙商的定义可为：“龙商是华人经商者的简称。”仅供参考。（庞进 2011年9月27日晚）

复张力玮

来信——

庞老师，您好，我是一名就读于巴黎十大的研究生，2007 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校，最近正在准备自己的毕业论文，想得到您的指点

我的论文是关于中国龙的。涉及影视作品中的中国龙。但是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发现缺少 1912 年之后龙文化在人们生活中，以及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角色相关的材料，一直到近几年，才又兴起对龙文化的深入探索和再发现。

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推荐一些书籍，特别是关于 20 世纪的龙在人们生活和文化发展中的角色（包括是否在文革中也经历了退步等等）。

非常抱歉，刚开始构思论文，用词还不准确和专业。

我也想通过我的论文，至少让我的指导老师和同学对中国龙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感谢您抽时间看我的邮件!!! 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张力玮 2010 年 1 月 15 日

回复——

张力玮同学好。因赶做一个很费神的风文化的工程策划，迟复为歉。

1912 年之后，也即辛亥革命之后，据我所接触到的，有关龙文化的材料确实不多。此前，1908 年 12 月，鲁迅先生写过一篇《破恶声论》，对龙持肯定态度，批驳了一些否定龙的观点。1912 年 8 月，鲁迅、钱稻孙、许寿棠三人设计了一个中华民国国徽图案，主纹为龙凤呈祥。鲁迅当时还撰写了《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连同国徽图案发表于 1913 年 2 月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

第一册“文牍录要”栏（《鲁迅全集》有载）。再下来，1919年，英国学者史密斯（G. E. Smith）写了《龙神的进化》一书（1919年伦敦出版），提出了龙源于巴比伦，经印度传入中国的观点；1922年，美国学者海斯（Newton Hayes）写了《中国的龙》一书（1922年上海英文版），提出了龙即远古时期的恐龙的观点；1924年，章炳麟发表《说龙》一文（载《华国》1924年第11期），提出了龙即扬子鳄的观点；1942年，杨仲健发表《龙》一文（载《文史杂志》1942年第5卷第3-4期），提出了“龙是假设动物”的观点。再下来的重要文章，就要数闻一多于1948年发表的《伏羲考》了。闻氏在该文中提出了龙起源的图腾综合说，认为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影响很大，直到今天，一些学者还坚持图腾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继续有学者就龙的起源问题进行探讨，也有重要论文见诸报刊，但整体上算不上热。龙文化热起来，被广泛重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88年戊辰龙年前后、2000年庚辰龙年前后。还有两件事比较重要，一是台湾音乐人侯德健于1978年12月创作的《龙的传人》歌曲，20世纪80年代初，唱响两岸及海外华人世界；二是2006年年底至2007年年初，由上海刮起的“弃龙”事件，引起了由网络传媒引导、鼓动的全民大讨论，使龙文化被空前关注。

以上简复，仅供参考。祝福吉祥！

庞进 2010年1月26日凌晨



鲁迅参与设计的中华民国国徽图案

关于龙母

广东肇庆学院教授赖翹萍发来论文《从神到人——论岭南龙母文化对中华龙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该文通过对中华龙文化和岭南龙母文化在起源、职能和精神等三个方面的异同比较分析，提出“岭南龙母文化作为中华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了中华龙文化的文化基因，但也因自身独特的生存实践需要，丰富和发展了中华龙文化的人性和性别文化内涵，从而使中华龙文化完成了从神崇拜到人崇拜的文化转型，为中华龙道信仰增添了世俗化与女性化的文化内涵，为解决当下信仰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的观点。

对此，笔者通过微信，说：“言中华龙文化完成了从神崇拜到人崇拜的文化转型，可再斟酌。整体来看，龙文化至今主要还是神崇拜，龙母是人格化了的神，是由人而神。当然，龙母使神奇的龙文化更有了人的气息。”

此前，在 2017 年 10 月 31 日的交流中，笔者曾说：“龙是属概念，龙母是种概念。龙的司水灵物、通天神兽、人杰喻体、皇权象征、吉祥瑞符、民族标志六大职能，除皇权象征外，龙母多多少少都具备，只是吉祥瑞符的职能更突出。龙母所做的一切，或者说老百姓赋予她的一切，都可视为吉祥瑞符的具体化、民间化。”

（2017 年 12 月 3 日于多伦多枫华阁）

乘龙兮骖骖，高驰兮冲天

——在纪念屈原大夫祭祀仪式上的讲话

丁酉年端午节，我们在西安先卓书院，纪念屈原大夫。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世界文化史上，屈原都是一个伟大的、辉煌的、永久的存在。解读、怀念、研究屈原，可以多种话题展开，如忧患意识、忠君情怀、求索精神、高洁气节等。有一个角度，前人少有涉及，即由“问天”而“冲天”。

两千二百多年前，屈原先生站在小小的有限的地球上，仰望着、探索着极其巨大的无限的宇宙。《楚辞》里，充盈着屈先生以经验思考超验、以有限追索无限的内容，他思考、追索得那么执着、那么宏阔高远、那么飘逸超妙、瑰丽雄奇、气象万千。“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圜则九重，孰营度之？”（《天问》）他的诗句里有龙，龙在他的意识里，是神物，是工具，是遨游宇宙天河的车船：“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之委蛇。”“驷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风余上征。”（《离骚》）“乘龙兮骖骖，高驰兮冲天。”（《大司命》）

近年来，我在探索、研究中华民族的终极关怀问题，提出了宇宙力、灵魂力等概念。宇宙力是世界本原、世象总根，是宇宙所有能量的综合；灵魂力是由人的意识、思想、理念、情志等构成的能力。龙是宇宙力，尤其是属于宇宙力组成部分的暗物力的代表，是宇宙力与灵魂力之间的中介。当人的肉身消散时，龙能够吸纳、承载足够强健的灵魂力冲决地球引力和大气层压力的束缚和框限，到更广阔的外空间去，成为宇宙力的一部分，随宇宙力运行化转，从而实现永恒和不可朽。

这样来看屈原先生当年的投江之举，就不仅仅是一个“忧愤自尽”的问题了。屈先生可能已感悟到人的肉身终究要消散，而人的精神魂灵有可能通过龙的中介，冲破俗世的束缚和地球的框限，到达更广阔的宇宙空间。因此，他的投江，很可能是主动地奔龙而去。

屈原有长期的信力和德力的修炼，他的灵魂力是强健的，是强健到足以与龙同频共振的。因此，我们相信，龙已将屈原先生的灵魂力中介到了广阔的宇宙空间。那么，就可以说，屈原先生依然活着，在另一个宇宙空间里活着。而且，他一定知道，今天人们在以各种方式纪念着他。他甚至通过龙的中介，又回到了地球，来到了我们中间，与我们一起吃粽子，佩香囊，读《楚辞》，看龙舟赛……

因此，纪念屈原的一个好方式，就是学习屈原：乘龙兮鳞鳞，高驰兮冲天！

（2017年5月30日于西安先卓书院）



华山龙文化与“登顶”精神 ——在“陈州登顶华山研讨会”上的发言

华山堪称“龙山”，是一座龙文化积淀深厚的名山。

华山上苍龙岭，是华山著名险道之一，也是中华大地上最高的一道“龙脊”。华山还有盘龙岭、飞龙梯、青龙背、五龙岗、鱼龙岩、龙神洞，以及五龙潭、黑龙潭、白龙潭、黄龙潭、青龙池、都龙庙等。这是“自然龙”和“建筑龙”。之外，还有“传说龙”“人物龙”。如，相传道教著名神仙陈抟，就是由金木水火土五条神龙，由湖北武当山驮到华山来的。陈抟也自称“人中龙”，所谓“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

称华山为龙山，更重要的原因，是华山体现着龙的精神。龙象征、标志着中华民族，龙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对龙的精神，我总结概括为八个字：容合，福生，谐天，奋进。

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华山是道教名山，却也有儒家、佛家的成分，可谓古今中外，兼容并包。福生是造福众生的简称，是价值观的核心。华山人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造福众生。谐天就是与天和谐，就是尊重天道，构建生态文明。华山的生态保护是比较好的，堪称生态华山。

重点要讲的是奋进。奋进就是奋发向上、开拓进取、适变图强。《周易》第一卦《乾卦》是一个“龙卦”，此卦的阐释之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古以来，龙多被用来比称人间的杰出人物。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能在天上飞、地上跑、水中游，具有适应环境、积极应变的品性。“适变”是为了“图强”，“适变”是策略，“图强”是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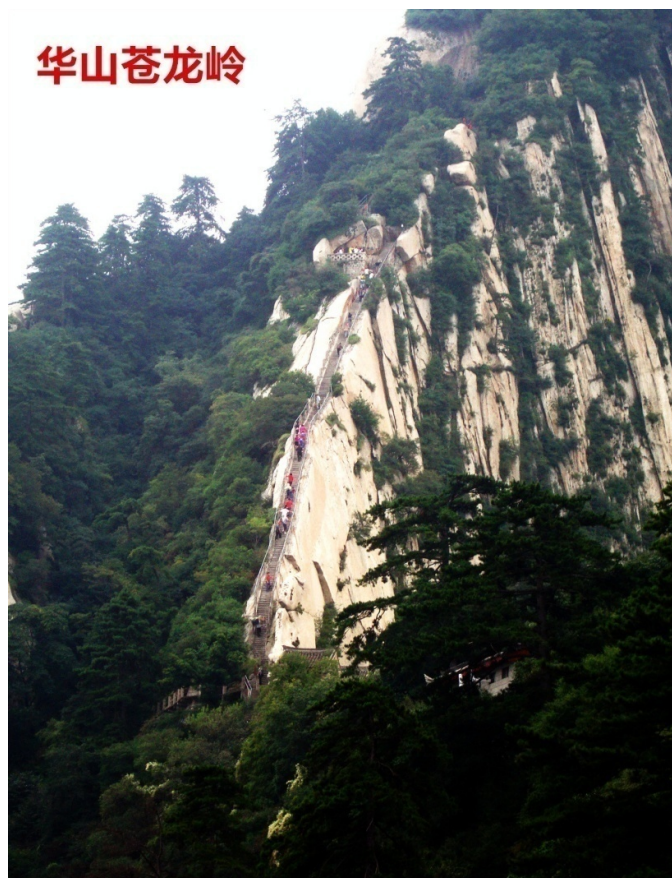
失去双腿的陈州，以惊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撑挪至华山绝顶，体现着一种“登顶”精神。“登顶”精神就是奋进精神，是华山精神、龙的精神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陈州登的是自然界的华山，而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人物，也都在攀登各自心目中、领域里的“华山”，如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如使盛唐文学达到高峰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如当代文学艺术界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张艺谋、赵季平……

我从事龙文化研究已二十多年。前些年我们讲，龙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标志者；今年以来，我多次讲，龙还应该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发展、进步、强盛的推动者、整合者和引领者，龙文化应该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构建做出贡献。显然，龙文化领域也有一座“华山”，也需要我们像陈州那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攀登上去。

最后，将陈抟老祖的自题联改一下，送给陈州：无腿千里马，志强人中龙。

（2012年8月28日）



关于《龙行天下》系列片

很高兴参加今天这个研讨会。感谢主办方，也感谢互联网，使远在加拿大的我，能够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和各位专家进行交流，向大家学习。

进入 21 世纪后，传承、萃取、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精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社会、文化相适应、相协调，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丰优的文化营养，既是国家领导层的决策和倡导，也是包括龙文化研究、弘扬者在内的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共识和追求。

在上述背景下拍摄《龙行天下》系列片，其重要意义，与龙文化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明，对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意义完全契合，可谓得天时、占地利、有人和。从该片的内容看，《龙行天下》系列片有三个结合。

第一个结合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自然主要指在自然界中生存的作为龙的取材对象的鳄、蜥蜴等动物。人文有关于龙的民俗文化，包括龙的传说、龙的制作工艺、龙的祭祀仪式、龙的舞蹈样态，等等；还有关于龙的理论文化，包括对龙的起源探讨、对龙的精神的概括、对龙的功能、意义的阐发，等等。从龙的取材对象入手展示龙文化，这在以往有关龙的专题片中是没有的或不突出的，这方面该片具有创新性。而以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方式拍摄关于龙的专题片，和龙所具备的“谐天”精神是一致的。龙是自然化人与人化自然互相渗透、彼此和谐，即“天人合一”的产物。这部片子体现了这一点。

第二个结合是远古与当今的结合。龙是中华民族的根源文化、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标志文化、时尚文化，龙与我们这个民族血脉相连地从远古走到今天，也必然与我们这个民族血脉相连地走向未来。因此，拍龙文化的片子，将远古与当今结合是必需的、必然的。在这部片子中，这种结合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

来：一是将龙的传说、历史、现状等，用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特性来分析、融会、贯穿、解说。二是以当今先进的现代化的各种技术手段进行拍摄、剪辑、配音、制作，以及后期的推广、宣传。

第三个结合是中国与外国的结合。这个结合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创团队是中外结合，参与的专家学者、摄像师、工作人员等等，有中国籍的，有外国籍的，有中国人旅住外国的；今天这个会议，也体现了这样的结合。二是拍摄对象中外结合，进入镜头的，有中国的扬子鳄、黄龙溪镇的龙舞，有非洲的尼罗鳄、印度尼西亚的巨蜥科莫多龙、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的海鬣蜥等等。这样的中外结合，是龙文化所具备的容合、开放精神的体现，也使这部片子具有了超越国界的宏阔的视野，和可为全地球村人所欣赏、所喜欢的质地。

再次，从主创人员的资质看。这部片子主创人员都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热爱者、弘扬者、践行者，也都是本行业功力深厚，学养、素质过硬的专家。总策划、总编导书云女士，早年有在北京大学和牛津大学求学的经历，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纪录片导演与制片人。她导演、拍摄的纪录片，曾获多项国际大奖，被欧美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购买、播放。我看过她策划、编导的《西藏一年》和与中外主流媒体联合拍摄的《喜马拉雅的天梯》《天河》等中国题材纪录片，为其投入之大、探掘之深、刻画之细、表现之丰、画面之美而深为感慨。所以，当她找到我，谈拍摄此片的想法，请我支持、帮助、参与时，我是很高兴的，我愿意将自己研究龙文化几十年的感悟、心得、成果提供出来。这样的主创团队，加上在座各位专家参与，以及来自方方面面的支持，使这部片子的成功，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障。

祝《龙行天下》系列片拍摄成功、龙行天下！

（《龙行天下》系列片研讨会，于2022年7月12日上午，通过线下、线上结合的方式举行。来自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多位专家出席此会。此文是笔者在会上的发言。）

就将龙英译为 loong 致全球华人的公开信（征集签名稿）

生活在全球各地的华人、华裔：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性符号，在中华文化和民族形象传播中具有重要地位。而龙在英文中对应的翻译“dragon”，在西方文化中是怪兽恶魔的名称。我们郑重向全球华人、华裔呼吁并建议：更改龙的英文翻译，将“龙”英译为“loong”。

我们认为，龙与 dragon 在本质、功能、形象上有重大区别，龙不能再与 dragon 相混同——

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精神象征，是华人的吉祥神物和情感纽带。尽管历史上有一些负面的承载，但发展至今，龙整体上已代表善和美，为人类奉献的基本上是福佑性、建设性的正能量。全球华人大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龙的传人”。龙在中华文化中地位崇高，是敬奉、祈拜、彰扬的对象。

Dragon 在西方文化中是怪兽恶魔，是凶残、战祸、恐怖的象征，整体上代表着恶和丑，给人类提供的基本上是灾难性、破坏性的负能量。dragon 在西方文化中地位低下，是被贬损、杀戮、镇压的对象。

从形象看，龙头大嘴宽、肚细腹小、鳞片平顺柔和；dragon 头小嘴尖、肚粗腹大、鳞甲生硬带刺，且生有蝙蝠翼状巨翅。整体观之，龙潇洒美观，dragon 狰狞丑陋。在《圣经》中，dragon 是最大的恶魔。几百年来，中文版《圣经》一直把 dragon 译为“龙”，使海内外几千万华裔基督教徒把龙视为魔鬼，这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也不利于国家的和平稳定。

显然，在当今中华文化参与全球话语体系构建的形势下，为龙更改译名，对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对展示中华民族的文明形象，对海内外华人的团结，对体现文化自觉、自信、自尊、自强，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龙与 dragon 的误译，可以追溯到四百多年前的 16 世纪，意大利传教士罗明

坚和利玛窦编写的《葡汉字典》，就有误译的迹象；19 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其编写的《华英字典》里，明确地将龙译为“dragon”，错误由此流传至今。

我们建议，参考将中国功夫音译为“kungfu”的做法，将龙英译为“loong”。因为英文中已有发“朗”音的意为“长”的“long”，如果用汉语拼音“long”，会造成麻烦，故给“long”加一个“o”，成为“loong”。“loong”发“龙”音，看上去好似长长的龙有两只大大的眼睛。

其实，将龙译为 loong 的方案二百年前就有人提出了。据考证，英国传教士 Joshua Marshman（马希曼），在他 1814 年出版的《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一书中，就注“龙”字音为“loong”。1817 年，一位英国外交官在他的中国游记中把“龙王庙”音译为“Loong-wang-Miao”。

此后，在中外学者的各种书籍和中外各行业的具体应用中，译龙为 loong 的做法绵延不断，直至当今——在 Google Books 中可以检索到大量实例。如：1882 年，美国传教士撰文指出龙与 dragon 有本质区别，其文章的标题是：《Pagoda, Loong and Foong-Shooy》（宝塔，龙和风水）。1940 年代，上海出品“龙凤牌香烟”，其英文名称是“Loong Voong Cigarettes”。2006 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宣布自主研发的通用 CPU（中央微处理器）集成电路芯片“龙芯”的英文名为“Loongson”。2008 年，腾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网络游戏“龙”，其英文名为“Loong”……

海外华人姓名中的“龙”字往往音译为“Loong”。如影星李小龙（Lee Siu Loong）、政治家李显龙（Lee Hsien Loong）。

我们希望全球华人、华裔在各种事业和日常生活中，若遇到龙的英译，都能够将龙译为“loong”，而不再译为“dragon”。

有人认为，西方人已经知晓龙与 dragon 的区别，从而不赞同龙的改译。我们认为：是有少数西方人对龙与 dragon 的区别有所了解，但还有更多的西方人对龙与 dragon 的区别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更有一些西方人利用龙与 dragon 的混同，攻击、诬蔑、丑化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因此，还是有错当纠为好。其它外语语种也应该尽早纠错。

（2019 年 8 月 24 日于多伦多枫华阁）



刻痕、华痕、华龙文学

2023年10月29日，加拿大高校文学社《我的青春我的梦》新书发布会在多伦多隆重举行。

加拿大中国高校校友会联合会理事长贾正杰先生在致辞中讲到（大意）：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专写“伤痕”的文学，反思过去、砥砺前行，影响深远。如今，加拿大高校文学社搞的这个由企业家周建成支持的“我的青春我的梦”全球征文，也将会载入史册，留下划痕。这个“划痕”，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华人走过的印迹，非常珍贵。

接着这位先生的话头，主持人韩笑女士说（大意）：贾先生讲的“划痕”之“划”，也可理解为中华之“华”，“划痕”文学就是“华痕”文学。

两位的说法给我启示。在随后的致辞发言中，我说：“华痕”的提法很有创意，痕如龙，不妨把“痕”字改为“龙”字，叫“华龙”文学。

我为何会有这样的提议呢？

因为，龙是中华先民对自然界多种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神物，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海内外华人大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故华人文学、华裔文学，都可称“华龙文学”。

我将龙的精神，概括为“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八个字。“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龙是容合而成的，龙的容合，参与、助力、体现、见证、标志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容合。容合是世界观、方法论。福生是造福众生的简称，无论是作为水利神、农业神，还是作为祖先神、民族神，龙都以福生为使命。福生是价值观、幸福论。谐天是与天即自然界相和谐的简称。龙是谐天的产物，是先民对宇宙自然力的感悟、认知和神化。谐天就是尊重“天道”，建设与大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文明。谐天是天人观、生态论。奋进是“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的简称。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因其努力奋进、为民族的发展进步、繁荣昌盛做出了创造性、开拓性的贡献而比龙称龙。奋进是人生观、强健论。

显然，华龙，就是体现、弘扬“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精神之龙；华龙文学，就是美抒、妙达、记录、传扬海内外华人、华裔如何“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文学。

加拿大高校文学社是一条体现、践行着龙的精神的文学“华龙”。这条龙以原野社长及其领导团队为龙头，容合了众多的文学爱好者、支持者、奉献者；这条龙以龙的精神做龙的事业，搞征文、办讲座、出文集，有声有色，成果斐然，堪称优秀的、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学之龙。我为自己能够成为这条龙的组成部分，参与活动、发挥光热、做些贡献而深感荣幸。目前，众目共睹，加拿大高校文学社这条龙已飞得优雅而壮观，飞出了气势、飞出了格局，飞出了风采，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这条龙会飞得更高远、更辉煌，从而为华龙文学的繁荣、为龙的传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为这个世界的文明美好增力、添彩。

（2023年10月31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华龙文学：容合多元、纽带情感、图腾精神

在 2023 年 10 月 29 日举行的“加拿大高校文学社《我的青春我的梦》新书发布会”上，我受与会者讲的“刻痕文学”“华痕文学”启发，在发言中提出了“华龙文学”一说。认为：龙是中华先民对自然界多种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神物，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海内外华人大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故华人文学、华裔文学，都可称“华龙文学”。之后，我对这个提法作了进一步的思考，觉得“华龙文学”至少有“容合多元”“纽带情感”“图腾精神”三个比较突出的功能或者说特色。

先说“容合多元”。“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容合的对象一定是多元的，若是一元，就谈不上容合。中华龙既是容合多元的产物，也以容合多元为己任、为功能、为特色。故“华龙文学”必然是容合多元的文学。事实也是如此，如加拿大高校文学社，无论其人员组成，还是活动开展、作品创作，都是容合多元的。再者，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产生于这块土地上的华龙文学，也自然、必然会容合其多元文化，即反映、体现其多元文化。

再说“纽带情感”。对龙文化的“纽带情感”功能，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先生有两段话讲得很到位，他说：“在中华民族诞生发展的长河中，由于繁衍生息在共同的区域，有着共同的奋斗经历和共同的风俗习惯，就产生了共同的文化标志及其强烈的认同感。”“海内外华人都会认同中华文化中龙与凤的文化标志。这些形象很容易唤起海内外华人共同的民族感情。”（钱其琛：《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人民日报海外版》1999 年 5 月 31 日）在这个地球村，凡是有龙凤形象出现的地方，都是有华人生活的地方。故“华龙文学”，自然是，

也必然是“纽带”华人情感的文学。这情感，包括亲情、爱情、友情、故土情、族群情、山水情、众生情等等。尤其是，如果用母语即汉语写作，那一定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葆有深情。

再说“图腾精神”。图腾是人类社会早期产生的与自然崇拜、族祖崇拜、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文化现象，是环境自然力对人类的作用，和人类对自身和氏族本源追溯相结合的产物。构成图腾的基本要素有：1. 图腾的实体是某种自然物（以动物为多）或天象；2. 这种自然物或天象被认为与族祖、族人有血缘关系；3. 是部族的保护神；4. 是部族的徽号标志。四条全部符合者是严格意义上的狭义图腾，部分符合者即为宽泛意义上的广义图腾。龙是着重强调徽号标志意义的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图腾”一词，本是对北美印第安某部落方言“totem”的音译，但用了“图”和“腾”这两个汉字，就有了形象感和动态感。“图”意味着形象，可引申为形象思维；“腾”有“向上升”之意，可理解为“提升”“升华”。文学，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用形象化的、审美化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从而使创作者和阅读者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升华的艺术。因此，“华龙文学”就有了“图腾精神”，即把华人、华裔乃至其他族群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精神审美化、艺术化的功能。简言之，所谓“图腾精神”，就是通过文学反映精神、升华精神。

（此文是作者 2023 年 11 月 25 日，在由加拿大高校文学社和加中经贸交流协会联合主办的“《我的青春我的梦》茶话分享会”上的发言）



庞进：正说中华龙文化

刘勇

近年来，有关中华龙文化，出现了若干个引起海内外华人广泛关注和争议的观点和问题：

一．由《狼图腾》的作者姜戎提出的“龙图腾极有可能是从游牧民族的狼图腾演变而来”的观点，及“中华民族究竟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的问题；

二．由一些基督教学者依据《圣经》提出的“龙是怪兽、是魔鬼”的观点，即“龙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理解”问题；

三．是一些人坚持和强调的“龙在中国历史上是帝王皇权的象征”的观点，及认为龙的形象“缺乏亲和力”的问题。

丙戌春节期间，在西安图书馆举办的“天禄讲坛”上，著名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中华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庞进以《正说中华龙文化》为题，以图文并茂的方式，郑重、缜密地论证、回答了这几个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庞进谈到，“图腾是人类早期产生的与宗教信仰、族祖崇拜、社会制度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文化现象，对后世文化影响很大。”“这里，牵涉到对图腾的认识问题。图腾一词，是 20 世纪初，严复先生由北美印第安鄂吉布瓦人的方言 Totem 译过来的。说来严前辈的这个译名是很妙的，其妙不仅在于发音相谐，还在于‘图’和‘腾’这两个字选得绝：Totem 的原意是‘他的亲族’，即说某种自然物（以动物为多）或天象与其族有血缘关系，是其族的始祖或亲人，从而将其尊奉为其族的徽号标志和保护神；而任何自然物都是有形象的，这便与‘图’，即‘用绘画表现出来的形象’相吻合；‘腾’呢，有‘升到空中’之意，既然是本族的徽号标志和保护神，自然要被高高在上地尊奉起来。然而，正因为这两个字的如此这般的含义，使后人很容易一见到古代一个什么图案，就

浮想联翩地以图腾视之，以至于后世直到当今，大凡有徽号标志意义的图案，都有图腾之谓。”

“一般来讲，构成图腾的基本要素有某种自然物（以动物为多）或天象，被认为与族祖、族人有血缘关系，是部族的保护神，是部族的徽号和标志等四条。四条全部符合者为严格意义上的狭义图腾，部分符合者可称为宽泛意义上的广义图腾。龙是多元容合（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神物，它来自自然物和天象又高于自然物和天象，其徽号标志的功能最明显，因而可称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

“狼有可能成为古代某些游牧民族的狭义图腾，也有可能进入龙的多元容合过程。但是，说龙图腾由狼图腾演变而来，文献证据很少且没有来自考古的实物证据的支持。至于《狼图腾》的作者姜戎提供的几条所谓‘证据’，均因判断有误而难以成立，最多只能算作一种猜测。比如，为了说明狼图腾就是龙图腾，姜戎把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内蒙古赤峰三星他拉玉龙说成是狼首龙身，进而认为‘在新石器时期原始狼图腾和龙图腾头部颈部完全相同’。稍作比较就会发现，三星他拉玉龙不是狼首，而是猪首和鹿首的综合。再如，为了说明没有翅膀的狼图腾演变成了龙图腾，姜戎断言说龙图腾也没有翅膀，岂不知长翅膀的‘飞龙’形象在汉代的石刻、砖刻上就有。”“众多动物和天象进入了龙的容合过程，狼即使成为龙的容合对象，也只能是其中的一种。所以，狭义的狼图腾不可能取代广义的龙图腾，就像人的一个指头不能代替一个人那样。”“像对许多优秀作家那样，我对姜戎是持有敬意的，因为《狼图腾》是近年来罕见的写得很棒的小说，其功力不是一般作家可以达到的。然而，称赞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也要认同作者提出的某些文化观点。”

庞进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容合的过程，龙参与、伴随、见证、标志了这个过程。龙的传人主要指文化精神的一脉相承，而非血缘意义上的基因遗传。中华始祖的文化精神与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同一。对古代一些游牧民族所崇尚的所谓狼的强悍进取、不屈不挠、团结合作等具有积极意义的精神质素，龙自然也会采取容合的态度，使其变成龙精神的一部分，事实上，龙的精神中已包含有上述精神。所以，总体上说，中华民族只能是龙的传人，而非狼的传人。”

关于第二个问题，庞进解释说，“世界各地的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中国传出去的龙，一类是西方世界出产的龙。前者主要指与中国毗邻的亚洲一些国家的龙，因受中华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其龙也是其国民崇拜的对象。后者英文称‘dragon’，汉语译作‘龙’，或‘恶龙’‘毒龙’，象征暴力和邪魔。在古希腊神话中，堤丰就是一条生着一百个蛇头，能喷火的毒龙。这条毒龙能发出呻吟声、犬吠声、狮吼声和蛇哨声。他不但是破坏力很大的旋风之父，还是水蛇、双头狗、啄食普罗米修斯的鹰等等怪物之父。堤丰曾同宙斯争夺宇宙的统治权，宙斯在众神的帮助下最终战胜了堤丰，将其打入地府。基督教经典里也提到不少龙，如《圣经·启示录》中的七头十角、等着吞食妇人孩子的大红龙，这条龙被说成是魔鬼撒旦的化身。”

通过比较，庞进指出，“中国龙是对蛇、鳄、鱼、猪、鹿、牛、马等许多动物和雷电、云雾、虹霓、龙卷风、星宿等天象多元容合的神物，其形象神奇瑰丽，其神性强大丰富，西方龙只是对蛇、鳄、鹭等少数几种动物的集合，外貌丑陋，神性小而单一；中国龙主要代表正义和善，西方龙主要代表邪崇和恶；中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文化标志，是和谐团结、吉祥嘉瑞的象征，其地位是崇高的，其象征性和凝聚力是很大的也是无可取代的，西方龙不具备这样的意义，其地位和作用在西方文化中无足轻重。总之，两种龙各有各的来由，各有各的说法，彼此没有源流承传关系，不是一回事。”

关于第三个问题，庞进说，“认为龙是帝王皇权的象征，进而认为龙是农耕文明，即黄色文明的象征，和以工业化、信息化、民主化为特征的当代文明格格不入，应该被列入批判、抛弃的对象。——这是全盘否定龙文化者的主要观点。不错，在中国漫长的阶级社会里，龙的确是帝王皇权的象征，这当然是需要认真分析清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几个事实：

1，龙起源于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是原始先民对身外自然力神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劳动人民就把龙创造出来了。帝王皇权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龙的出现自然与帝王皇权无干。

2，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龙身上具备着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

等神性，遂被帝王们看中，拿去做了自己的比附象征物。随着帝王从历史舞台渐次退出，龙也就失去了象征帝王皇权的意义，遂以吉祥物的面貌和身份，回到了劳动人民中间。

3，即使在阶级社会，龙在象征帝王皇权的同时，也没有和劳动人民断绝关系。事实是宫廷有宫廷的龙，民间有民间的龙：帝王贵胄戴龙冠、穿龙袍、坐龙椅、乘龙辇，平民百姓玩龙灯、划龙船、喝龙茶、打龙拳：两种龙尽管有交错、有互渗，却也同时并进了数千年。

4，龙作为帝王皇权的象征，对龙的地位的提升、影响力的扩大、世界各国对龙的了解和认识有正面作用，并非一无是处。”

庞进强调指出，“将龙和当代文明对立起来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龙是一个象征符号。所谓象征，一种情形，是以 A，来代表、比喻、暗示 B；另一种情形，是以 A，来代表、比喻、暗示 B、C、D、E、F、G……。龙属于后一种情形。也就是说，将龙可视作 A，帝王皇权可视作 D，除 D 之外，前面还有 B、C，后面还有 E、F、G……，我们不能因为它代表、比喻、暗示了 D，就连 B、C、E、F、G……也同 D 一块抛弃。很多象征符号都不是封闭的、僵化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我们中华民族创造、选择龙（当然还有凤）这样的象征符号，花了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漫长时光，它凝结着、寄托着亿万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想，体现着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心理认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情感纽带。如果谁能创造出一个新的能让海内外华人都认可的象征符号，来代替龙，从理论上讲，当然可以，问题是至今还没有出现。”

针对奥运吉祥物设计组某专家讲的“中国龙过于威严，缺乏亲和力”的观点，庞进指出，“龙的确有威严的一面，但也有和悦喜庆的一面。从远古到当今，威严的缺乏亲和力的龙有，和悦的不乏亲和力的龙也有——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见到过许多和悦可爱的新龙形象，如中国建设银行的‘龙博士’、河南濮阳的‘世纪新龙’、电视剧里的‘小龙人’‘小龙女’等。而且，对艺术造诣高深、思想观念也能与时俱进的中国艺术家，设计出吉祥和悦的、新颖独特的龙的形象当不算什么难事。所以，以‘中国龙过于威严，缺乏亲和力’为由，将龙排除在奥运吉祥物之外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阐述了上述观点后，庞进总结说，“龙是一个凝结着中华文化精华从而魅力无穷、具有广阔开放的襟怀从而新新不已的系统，是可以涵纳、容合各种文明的全色彩象征，也是一种包括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在内的全时态象征。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基本精神没有过时，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现代化建设，以及当代人的精神和生活依然有积极的、正面的意义。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努力找到古老的、传统的龙文化同当代社会的共通点、贯穿线、结合面，从而给这个得到广泛认同的、不可多得的文化符号注入新颖鲜活的内容，如生态龙、科技龙、民主龙，等等。”

（刊于《文化艺术报》2006年3月22日）

舞鳳飛龍

實忠陳不原 主成院究研化文鳳龍華中安西賀祝

庞进答《三秦都市报》记者问

问：龙在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发展历史上到底处于什么位置、有何关系是各方争论的一个焦点，您本人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龙在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发展历史上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龙和我们民族文化的产生、发展，与民族心理的形成有密切关系，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民族心理的外化。考古发现证明，龙至少已有八千年的历史，早在没有专制帝王的时候就有了龙；在帝王用龙的时候，民间有民间的龙；民间的龙有善有恶，以善为主；对帝王用龙也要历史地、全面地看；如今帝王已退出历史舞台，人们并没有因为龙曾象征帝王皇权、龙族中有少数恶龙为祸而打倒龙。因为，人们明白：第一，对一个从远古走来的和中华先祖、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有着密切关联的象征物不能求全责备，世上哪个人敢说自己没有缺点、不犯错误？为什么非要求龙十全十美呢？第二，除了上述两条负面的内容需要清理、批判外，龙还有更多的正面的内容，如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底蕴，和谐文化的内涵和象征，丰富多彩的以求福求吉求顺遂为主要目的的民间龙俗等等。第三，一个民族是需要标志的，就像一个人需要身份证那样，这是对外交往的必要，中华民族选择龙（当然还有凤）作为文化标志是智慧的，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哪位人士能够制造出一个能够让全世界华人都接受认可的新标志，当然可以，问题是至今还没有。第四，中国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些普世公认的文明理念，如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公平、正义、科学、理性等，中国龙是可以接受、吸纳、容合的。龙是一种全色彩、全时态的象征物，它不但能“承古”，而且能“开新”，完全能够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而前进。总之，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同时起源、形成的龙，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它是一个多元容合的形象，历朝历代、亿万中国人将自己的情感、智慧和理想寄托、灌注在龙的身上；它有缺点，也有和现代文明不吻合的负面的

承载需要清理，但是，中华民族依然热爱它，尊重它，正如歌里唱的那样：“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在世界各民族中，就文化标志而言，中国龙的认同人数之多、象征性之强、凝聚力之大，可谓无与伦比。在十几亿中国人心目中，以及许多外国人心中，中国，中华民族，龙，三位一体，不可分割。

问：作为研究龙凤文化的专家，您又如何看待这场争论？

答：龙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内容博大庞杂，优秀的精华多多，落后的糟粕亦有。因此，对待龙文化，不是不可以批评，但批评应当是善意的，建设性的，而不是诋毁式的。有个别人一出场，就采用极端的辱骂式语言，如骂龙是“畜牲”“是一节弯曲的盲肠”“谬种”“藏在历史角落的污垢”，有所谓的“假、丑、恶、毒、孽、淫”“六大罪”；从而认为龙“象征着不真，不美，不善，不正，不宁，不忠，翻云覆雨，乍存乍亡，不确定，不透明”，并将龙与“纳粹主义之徽章”相类比。在龙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标志后，以如此语言侮辱、诋毁龙，的确是举世罕见、前无古人的。而这样的辱骂，显然有伤海内外数以亿计的“龙的传人”的感情。

近年来，对中国龙加以诋毁者不是没有，如以中国龙作为侮辱对象的日本立邦漆广告。这则广告登在 2006 年 9 月号的《国际广告》杂志上，画面上有一个中国古典式的亭子，亭子的两根立柱上各盘着一条龙，左立柱色彩黯淡，但龙紧紧攀附在柱子上；右立柱色彩光鲜，龙却跌落到地上。画面旁附有对作品的介绍，大致内容是：右立柱因为涂抹了立邦漆，把盘龙都滑了下来。这则广告一面世，便在互联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不少网民一针见血地指出，要证明立邦漆的性能，完全可采用别的方式，比如将该漆泼在日本的太阳旗上，为什么偏要让中国龙滑落在日本的油漆下？显然，这是怀有仇华心理的某些日本人有意所为。还有一幅将中国龙作为仇视喻体的登在西方某报上的政治漫画。画面上，有粉红色的标着“CHINA”的半拉子中国地图；一条扬发瞪眼、形象丑陋的巨龙卧在长城之内，又长又粗的手臂却伸出来，五爪分开，紧紧地抠着地图上标着“XINJANG”的地方。其寓意十分明显。这样的漫画，反映的是企图将新疆分裂出去的“东突”恐怖分子对中国政府、中华民族的忿恨，除了西方某些盼着中国四分五裂的仇华、反华势力，谁还能为之？

如果论战是学理层面的，那当然好了。但不是，骂龙者几乎都不讲什么学理，

从知识层面上讲，属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三、其四、其五……”，即以偏盖全；比如，自己对龙文化缺乏了解，就武断地说孔子“非龙”，其实孔子不但是敬龙的，而且是中国龙学的奠基人。从思想方法上讲，属于“毁树式批判”，即一棵大树的某一枝干落了鸟粪或被虫蛀了，就主张把整棵树及树根都砍倒、挖烂、烧毁——显然走的是偏激、极端的路子。

问：简单的从“数量”上来看，您坚持和代表的观点似乎处于论战双方的“劣势”一方，您怎样理解这一现象？

答：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其实不是，据我所知，不少人都写来了正面说理的文章，但都没有发出来。还有，“弃龙”风波掀起后，新浪网曾做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表明：“认为应该继续把龙作为中国的标志形象”的，占到了94.97%。而在这次论战中的一位“骂龙”“弃龙”者，将他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发到了他的“博客”上。虽然网民的评论近日已被删除，但网页上曾有的记录表明，仅两天之内，已有33000多人点看，800多人发表了评论，我浏览过这些贴子，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博主的观点。所以判断不难得出：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弃龙”，“弃龙”者是不得人心的。

还有，从“弃龙”风波掀起到现在，明确声明坚持“弃龙”观点的，全世界范围内，不到5个人。风波乍起时，我曾接受《光明日报》记者的采访，言“龙的中国文化标志地位不可动摇”，这当然不仅是我的认识，而是海内外十几亿华人的共识。且看——

2007年1月31日，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的统一标志，标志由汉字“文”、龙、长城等元素构成。其对龙的阐释是：“龙的形象象征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具有亲切感，易于传播；动态的龙，表达了全民行动，投入到提高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中来”。

此前，中国体操队已选择绣有中国龙的“龙魂”系列服装作为唯一指定的专用礼服。

再前，2006年11月13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联欢晚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为彩龙点睛。

中国龙是中华民族精神象征

本报记者 曹继军 谢文 杜冰

12月4日有关网站转摘了一条“专家建议不再以龙作为中国形象标志”的报道,引起一片反对之声。

4日下午5点20分,上述报道所指专家、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吴友富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首先表示,自己此前从未就此事接受过媒体采访,所谓龙不再作为中国形象标志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他强调:“中国龙的形象一定要坚持!”

新浪网当天进行的相关网民调查表明,截至下午5点,近10万网民参加了投票,其中90%多的网民认为,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象征,早为中外所普遍认同,应该继续以龙作为中国形象标志。

龙的标志已成为全民族共识

“龙的标志地位不可动摇”,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庞进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西方的Dragon不能与中国龙相混同。”

他说,西方的Dragon只是对少数几种动物的集合,神性小而单一;中国龙是对许多种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融合而产生的神物,其神性大而丰富;西方的Dragon主要代表恶,可以说“充满霸气和攻击性”;中国龙则主要代表善,不存在所谓的“攻击性”,中国龙有威严的一面,更有和悦的一面;西方的Dragon在西方文化中地位不高,无足轻重,中国龙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是吉祥嘉瑞的象征。我们民族创造和选择龙(当然还有凤)这样的文化

符号,经历了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漫长时光,它凝结、寄托着各个时代、亿万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想,体现着五分之一地球人的心理认同。不说放弃了可惜,事实上也放弃了不了。

吴友富认为,龙象征中华民族团结、勇敢、一往无前的精神,这些反映了中国传统和谐理念的文化元素必须坚持。



全球化应保护文化多样性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关世杰认为,中西方关于龙的不同认识主要是由翻译引起的。众所周知,dragon在西方语境里,比如在《圣经》里是一种脖子很长、有两翼,很凶猛很可怕的动物,是人们设法要诛除的对象,而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龙是一种身体瘦长、吉祥威严的动物。最先翻译dragon的人,可能并不理解dragon在英语文化中的涵义,把它翻成了中国的“龙”,习惯成自然,造成了今天的这种情况。

国家语委和一些专家曾经建议,把“龙”翻译成“long”,而把“dragon”翻译成中国古语里的某种和西方语言中dragon比较类似的动物。庞进觉得,将Dragon直译为“劫更”或“劫根”,将龙英译为“Loong”(拼音long英文发“朗”音,所以要多加一个“o”,且将第一个字母大写)以示区别。这个前人翻译上的讹误,我们后人应该加以解决。

关世杰建议,可以由国家有关方面出面,召集权威专家研究制定龙和“dragon”的翻译标准,供翻译和使用时参照执行。他说:“我们不能因为西方文化怎么样,我们便怎么样。”



再前，1999 年 5 月 3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海内外华人都会认同中华文化中龙与凤的文化标志。这些形象很容易唤起海内外华人共同的民族感情。”2000 年 4 月 3 日，他再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从更为深层次的意义上说，龙文化首先体现出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精神内涵”；“龙的形象，最初就是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象征”；“龙，是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象征；龙文化，揭示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深刻真理”。至于天安门的“升龙”华表、天安门城楼正中以六幅“金龙和玺”衬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事实已为世人所知。

（刊于《三秦都市报》2007 年 2 月 3 日）

传统符号与时代新义

——读庞进《博大精新龙文化——以浙江龙游为例》

王哲

西哲卡西尔曾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想想也真对：我们确实生活在符号中，符号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对符号，依据不同的视角，可以做这样那样的划分，比如传统符号、现代符号，等等。中国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传统符号自然特别发达，内涵也异常丰富。那么，将众多的文化符号按其功能影响的大小排一个座次的话，哪一个会坐第一把交椅呢？毫无疑问：龙。

龙的形象，我们见到很多了，有关说辞也耳熟能详，如“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等等。那么，龙起源于何时呢？是怎么起源的呢？龙怎么就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炎黄子孙何以成为龙的传人了呢？不少人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专攻龙文化研究的庞进先生在其新著《博大精新龙文化——以浙江龙游为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7月版）中，对这些问题，都一一地做了令人信服的解答。按他的考察，“龙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已有八千年至上万年的历史”；“龙是中国古人对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云、雷电、虹、龙卷风、星宿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一种神物”；“龙的容合是一种模糊集合。直觉把握、整体关联、神秘的非逻辑和群体意象，是模糊思维的特征。这样的思维导致了古人不清晰、不精确、不惟一地将身外世界的种种崇拜对象，容合成若干个‘神物’，然后进行崇拜”。龙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容合的过程，龙参与、助力、见证、体现、标志了这个过程”。炎黄子孙之所以会成为龙的传人，是因为龙以“象征物的面目融入了华夏人的祖先崇拜”，也即伏羲、女娲等神话英雄，炎帝、黄帝等部族领袖，都有龙之态、龙之功、龙之

誉、龙之称。“祖先为龙，子孙后代自然是龙。”当然，庞进指出，“龙的传人”只是“人文”意义上的一种说法，而非遗传学上的论断。

或许有朋友会说，现在都进入网络、数码时代了，龙是古代人创造的文化符号，过时了。对此问题，我很赞同庞进在该书《后记》中所做的回答：“无论古代人，当代人还是未来人，实际上都在双重世界里生活。一重是物质的实在的世俗的世界，一重是精神的虚拟的象征的世界。没有后一重世界，人就不成其为人。而龙，还有凤凰、麒麟等，就是后一个世界的代表。中华民族选择这些象征物，已有近万年的历史，也自有选择它们的道理，不说抛弃了可惜，事实上也抛弃不了。作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已嵌入我们的骨髓，渗入我们的血液。将过去的东西梳理清楚，承续和弘扬优秀的精华，努力给祖传的象征物里注入新鲜活泼，具有民族特色，又吻合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内容，或许正是我们这代人，尤其是一代学人的使命。”

显然，庞进正是这样做的。翻开这部书，时时可见让人眼目一亮的新义。如他把龙的基本精神概括、精炼为八个字：容合、福生、谐天、奋进。这样的概括是具有时代特色的。以“容合”为例，——这是庞进创造的一个词汇，乃“容”（兼容、包容、宽容）与“合”（集合、综合、化合）的概称。容合意味凝聚，意味着合力。正因为有这样的精神底蕴，我们便理解了海内外华人何都认同龙这样的文化标志，也对龙在民族团结统一大业中所起的作用目及神会了。还有，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大家的共识，而在庞进看来，和谐，是要以容合为前提、为基础的。再如“谐天”，庞进认为，龙是人天关系的形象化表述，“人与大自然风雨与共、甘苦同行，使龙成为通天神兽，它体现着中国圣哲‘天人合一’的思想，反映着先民对天道的理解、对身外众生的尊重。”于是，庞进提出并大力倡扬“绿龙”。何谓“绿龙”？就是绿色的、谐天的龙族，就是讲生态文明的龙族。“就是要告诉世人，中华民族应该成为绿色理念深刻、绿色制度健全、绿色行为普及的与天和谐的龙族。”正因为有如此这般的诸多新义的发掘和灌注，使我们对传统符号的生命力有了新的认识，借用庞进的话说就是：“龙，不死的生存；龙，永续地活着。”

（刊于《中国文化报》2005年11月28日）

腾龙飞凤

——记龙凤文化研究专家庞进

王晓红

龙和凤，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创造出来的两种精神图腾，它们有着呼风唤雨、征兆吉祥、造福人类的神性。龙和凤的历史竟然像一根血脉贯穿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让人惊诧和好奇。而初次见面的庞进，也令我心生崇拜，他苦心钻研龙凤文化近二十年，著书十余种，撰写、发表论文、文章一百多篇，被国内乃至国际公认为此领域的专家。他还在国际互联网上，创建并主编了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中华龙凤文化”网站，且被评为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网站之一。

如果生命是一棵树，那么庞进这棵树已开花并结下了累累硕果。他提出了龙凤起源的“模糊集合——多元容合”说，对龙凤的神性，及其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系等做了创建性的开掘。他从古老的龙凤文化中析理、总结、凝练并升华出“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的基本精神，这些精神对建设和谐发展的绿色中国有着积极的意义。他的研究把人们引入历史的深处，又导向当下生活的前沿，他为古老的文化形态灌注了鲜活的时代精神，使之生气勃勃，重新获得生命。

十八年心血倾注

庞进今年刚刚五十岁，看着却已头发稀疏，眼睛也已近视，看东西，常常要摘下眼镜凑近些才能看清。原来，庞进并不近视，只是上大学时读书太用功，晚上还经常打着手电筒钻在被窝里看书，才把眼睛弄近视了。后来做文字工作，搞研究，常常需要大量地翻阅资料，不分昏昼地疲劳用眼，视力便下降了，而头发的脱落也与此有关。

1988年戊辰龙年伊始，庞进开始了对龙凤文化的研究，那时，他一个人工作在西安，白天当记者写稿子、做编辑看稿件，搞研究就只能利用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有时熬到半夜，肚子饥饿，就找一个馍就着一根葱，或一棵蒜当作夜宵。为了在龙年内把属于“中国风俗丛书”之一的《龙的习俗》撰写出来，庞进半年多时间跑了市内的不少书店，在省图书馆里泡了两个月，还把报社资料室里各地赠阅的不存档的当年的一大堆报纸抱回宿舍，从上面搜剪下有关龙的文章，分门别类，贴成几大本。利用这些剪报上提供的线索，再进一步的到图书馆查找详细资料。庞进过着近乎最简单的物质生活，做着一项繁琐复杂的整理、研究工作，终于赶在龙年年底前，推出了《龙的习俗》。

庞进原本想着到此为止，不再干这样又苦又累像苦行僧般的事情了。作为一个作家，他可以一支笔、一本稿纸，或者一台电脑，任文学的想象力海阔天空地驰骋，让生动美丽的文字流注笔端，何况此前他已出版了颇得好评的散文集《兵马俑狂想》。然而，也许是走进得太深，想拔脚时已发现难以自拔。因为不断地有新的有关龙的文章、观点、事象、民俗等等撞到眼前，撞得他心弦震动、灵感纷飞。于是他决定再出一本书，详细介绍龙文化。于是，经过连续几年的辛苦努力，《八千年中国龙文化》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成为了一本比较详尽的龙文化研究的工具书，获得了西安市第二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正是这本书，奠定了庞进在中国龙文化研究领域的地位，十多年来，一直有人不断地通过电话、网络等各种渠道寻找、求购这本书。

庞进说他现在有一根神经与龙相通，凡是有关龙文化的书，他就想方设法要买到，看到有龙图案的各种东西能收集的就要收藏起来，不能收集的，也要用相机拍下来留存。比如包装盒、塑料袋、服装、公园雕塑等。有一次他去兰州出差，带了一本龙书，火车上看了一路，下了火车走到出站口，发现有个旅行社接人的小旗上画有一条龙，就赶快追过去拍了下来。总之，庞进的生活，处处与龙相关联，生活为庞进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素材。“苦心人，天不负”，庞进选择了龙文化研究，专心致志地做了下来，从古至今，跨越了前人的成果，终于登上了龙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高峰。

雕龙琢凤谱华章

在研究龙文化的同时，庞进发现了凤凰文化的研究同样有很大的空白，而且凤文化的出现与龙文化的出现年代相仿，都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考古文物上就有表现。目前发现最早的龙在辽宁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那是用石块摆塑出的一条长达 20 米的龙，距今约八千年。而最早的凤图案，是在湖南怀化高庙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上，距今也有七千八百年的历史。龙代表水神，是古代农业文化发展的初期，人们对自然界各种爬行类、水族类动物，以及雷电、云、虹、龙卷风等自然天象通过集合创造出来的神物，龙主水，而水对农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龙的发音也是模拟打雷的轰隆声创造出来的。而凤凰则代表美神，它的出现表示吉祥。是古代人集合各种鸟禽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神物。

庞进在搜集、研究龙文化资料时，刻意把凤文化的资料也搜集、整理了起来。之后，他陆续写了一批研究凤凰文化的文章，收在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一书中。再后来，他花了十年的功夫，完成了《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一书的写作。

《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的出版，得益于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慧眼。这本书的书稿几年前已经写好，但商议了几家出版社，不是被婉言推辞，便是久拖不决。庞进对自己这部心血之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却久久不能得以面世，心中难免慨然。在 2004 年元旦前一夜，回顾自己的研究成果，压在出版社又一年了，怎样才能让这只“凤凰”飞出来，为众人所识？半夜时，灵感突现，庞进想到了全球华语电视节目收视率最高的凤凰卫视，从而想起了凤凰卫视掌门人刘长乐一贯重视传统文化精华传播、弘扬的情况，也许自己的这部凤文化专著能借凤凰卫视之力飞得更高更远。一想到这里，庞进一轱辘爬起来，连夜在电脑上给刘长乐打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他把这封信和凤书的内容、提要、目录和几章样稿一起发给了远在香港的刘长乐。刘长乐看过后，很快作出批示，由凤凰卫视资助出版此书。几经协商，双方于 2005 年 8 月签订了合同。2006 年元月，《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作为凤凰卫视十年纪念丛书之一，由中国和平出版社隆重推出，书一面世，便好评如潮，还上了几家书城的畅销书排行榜。刘长乐把这本书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读了一遍，甚为喜欢，他把这本书

作为珍贵礼品，赠送给和凤凰卫视有过从的一些政界、文化界要人。最近，一个名为“天下凤凰聚凤凰”的活动，在著名作家沈从文老先生的故乡湘西凤凰县举行，庞进作为特邀专家参与了这项活动。并在“中华凤凰文化论坛”上，和刘长乐、黄永玉、唐浩明等名人一起“说凤凰”，并接受凤凰卫视主持人的现场采访。

庞进从一个工作在新闻岗位的编辑、记者，成长为龙凤文化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值得大家学习。而他本身又是一位成就不凡的作家，他的散文拥有众多的读者，其散文集《灵树婆娑》曾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其散文《天地苍茫一根骨》入选《当代学生现代文阅读》等几十种选集，还被北京、江苏、广西等地的教育部门作为高考试题。因了他的作家身份，庞进的研究专著便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为大众所喜爱。而更主要的是，他的研究不是脱离了现实生活的翻古纸堆式的研究，而是着眼于当下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他给龙凤赋予了许多新的意蕴，让这一对古老的象征物不断地被激活，腾跃飞翔于当今中国。

（刊于《少年月刊》2006年第10期）



腾龙起凤自从容

——“龙凤之魅·庞进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侧记

张静

2006年3月25日，春意融融的季节，由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省记者协会、陕西传统文化研究院、陕西省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西安日报社等七家单位联合主办的“龙凤之魅·庞进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在西安陇海大酒店隆重召开。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对庞进十多年来取得的丰硕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会议接近尾声时，百余名专家学者联合签名，响应庞进的倡议：将龙凤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申请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会议推向了高潮。随后，海内外数百家传媒纷纷报道会议情况，而庞进的龙凤文化博客也随之落户新浪网站……

历久弥新的龙凤文化

按照庞进的考察，龙是中国古人对蛇、鳄、蜥、鱼、鲛、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云、雷电、虹、龙卷风、星宿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神物。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龙，是辽宁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龙形砌塑，距今已达八千年。而凤，则是中国古人对鸡、燕、鹰、鸟、鹤、孔雀、鸵鸟等鸟禽和太阳、风、火等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神物。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凤，是湖南洪江高庙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凤纹，距今约七千八百年。最早的龙凤纹，出土于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距今近七千年。经过七八千年的容合、演进、升华，龙凤事实上已成为海内外华人普遍认同的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

庞进认为，作为神物，龙具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兆祸、示威等神性，这些神性，是畏惧、飞离、悖逆、合和、彰力、求吉等文化心理的外化和释放；凤具有向阳、达天、自新、秉德、兆瑞、崇高、好洁、示美、喻情、等神性，这些神性，是求明、献身、负任、敬德、尚和、爱美、重情、惜才等精神品格的对应和体现。分开来讲，龙代表着中华民族刚毅强健、发奋进取的一面；凤则代表中华民族柔和美善、智慧灵动的一面。综合起来说，龙凤的基本精神可以用十个字来概括，这便是：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

正是这些基本精神，使龙凤文化历久而弥新。庞进说，龙凤文化是凝结着中华文化精华从而魅力无穷、具有广阔开放的襟怀从而新新不已的系统，是可以容纳、容合各种文明的全色彩象征，也是一种包括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在内的全时态象征。在已进入信息化时代的今天，龙凤的基本精神没有过时，其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现代化建设，以及当代人的精神和生活依然具有无可替代的、积极的、正面的意义。

比如容合，即在兼容、包容、宽容的前提下综合、整合、化合，就对我们的各项事业提供着思想、方法上的参照和支持。所谓全球化时代，实际上就是一个多元容合的时代。过去的中华龙凤，是先民们对动物、天象、华夏本土文化，以及印度佛教文化的容合；当今的中华龙凤，理当眼界更宽阔，胸怀更博大，不仅要容合自己本民族的东西，还要容合世界各民族的东西，也就是说谁的好，我就用谁的，不管它是物质的、精神的，还是体制的。只有容合，才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相一致；也只有容合，才能发展强大。

比如福生，即造福众生。龙作为水神、农业神，凤作为美神、祥瑞神，自古以来，都是以造福众生为己任的。全国以龙凤为名的企业、产品多不胜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文化现象，相信龙凤能够福佑众生是一个重要因素。福生的精神使龙凤文化有了教育的功能：身为中华龙凤族的成员，特别是身负各种职任者，应该秉赋龙凤的造福众生的精神，做尽职尽责为人民服务的善龙祥凤，而不要做玩忽职守、贪污腐化、祸害一方的孽龙恶凤。

庞进这种“努力找到古老的、传统的龙凤文化与当代社会的共通点、贯穿线、结合面，从而给得到广泛认同的、不可多得的文化符号注入新颖鲜活的内容”的研究，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一致肯定和赞赏。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

长乐认为庞进的研究体现了一种“文化自觉”，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陕西省记者协会主席尹维祖认为庞进的研究“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他把研究领域由龙文化推向凤文化，又由凤文化推向麒麟文化，还以凤凰卫视为依托，探讨凤文化的时代特征，概括为‘以和为旗，以新为胜，以才为举，以疯为乐’，把人们引入历史的深处，又导向时代的前沿”。著名评论家李星指出，庞进的研究“不是那种淘腾历史的，书斋式的研究，也不是在倒冷门、炒冷门，而是一种现代化视野下的研究”。著名文化史专家张志春说，庞进“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着意当下，瞩望未来，以与时俱进的意态，力图开掘出信仰质的内涵以激活龙凤，使之生气灌注，从原始的有意味的形式升华为鲜活的精神氛围。”著名作家晓雷认为，庞进“对龙凤文化精神的揭示，对塑造现代人的精神、观念信仰，提供着丰富的营养，对缔造新生活的伟大进程，提供着智力支持和思想支持，具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

专家题词为龙凤文化增魅

“龙凤之魅·庞进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是在3月末的一个周六召开的，近百名专家学者放弃了宝贵的休息日，专门前来参加了会议。会议还收到了不少文化名人的题词墨宝。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著名作家晓雷不约而同地写了“龙飞凤舞”四字，一个庄重古朴，一个潇洒飘逸，似乎正是龙凤文化所表达的中华文化的两个不同侧面的写照。而著名画家王西京题写的“龙凤华夏”、著名书画家李敬寅题写的“龙腾华夏，凤舞神州”、著名作家赵熙、高建群、何丹萌题写的“神龙”“凤图腾”“淮南子说凤”，青年书法家庞任隆题写的“龙凤文化源远流长”，或浓墨重彩，或古拙奇巧，均凸显的是龙凤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血肉相连，不可割离的关系。相比之下，商州才子、著名作家方英文题写的联语“雷音电形江海容，风车金衣梧桐乡”，就以含蓄和文采见长了：全联不见龙凤二字，却上下对应地将龙凤的形状、特性跃然纸上。

庞进说召开这样的高规格的研讨会，对已经迈进五十岁门槛的他而言，是空前的。著名作家和谷显然对这“人生之秋”的年龄段深有体味，他“心有灵犀”地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赠予庞进：“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

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好一个“秋日胜春朝”啊！而诗中提到的排云而上的鹤，正是凤的一个模特儿呢！和谷写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著名评论家刘炜评则专门作了一首《赠庞进》的诗，由著名作家孙见喜用行书一挥而就：“妙笔如弦奏国风，腾龙起凤自从容。春来信步层楼上，笑看桃花别样红。”同是对庞进龙凤文化研究的称赞，著名学者兼书法家费秉勋和茹桂的表述各有特点，费先生写的是“龙精凤髓，多有发撻”，茹先生写的是“击碎骄龙颌下珠，敲出凤凰五色髓”。好家伙，连“颌下珠”“五色髓”都“击碎”“敲出”了，功力该有多深呀！

庞进说他与龙凤是互动的，他把心血、功夫和慧悟给了龙凤，龙凤把魂魄、气概和灵光给了他；又说研究龙凤，使他几乎要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了，“在家里，我想做一个好儿子、好女婿、好丈夫、好父亲、好兄弟；家之外，我想做一个好学者、好作家、好编辑、好同事、好朋友、好公民……总之是落到头上的每一个社会的、生命的角色，我都想做到自己的最好”。庞进对自己的这些要求，或者说龙凤文化对庞进的深刻影响，已然为专家学者们所体察，青年书法家康金鸿的题词就有反映：“海涛盈耳龙筋健，山韵入心凤目明”。而西安市文联副主席、著名评论家周大鹏则当场挥笔，写下了“乘美游心”四个大字。看到这四个字，使人不禁联想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著名美学家陈望衡先生书面发言中的一段话：“庞进先生将龙凤的文化精神归结为‘和美’，说得非常好，我们这个世界，不仅需要高科技，而且需要和美，这和美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美，而且还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内心情感与理性的和美。”当然，与龙凤的理想性一样，完全的“和美”，也只能是一种理想，然而，有无这样的理想，对世界，对社会，对我们每一个人工作与生活，都是大不一样的！

穿越时空影响广远

庞进研究龙凤文化的著作，目前已出到八种。每一种都有故事，如列入“中国风俗丛书”的《龙的习俗》。此书出版于1988年，两年后，又出了一个台湾版。可滔滔海峡，山水相隔，庞进竟然久久看不到样书。2003年5月的一天，台湾新竹一位叫廖金文的先生通过“中华龙凤文化”网，给庞进发了一个帖子，说他

从当地图书馆里借到一本《龙的习俗》，拜读后很仰慕，还想拜读庞进的其他龙著，但跑了好多书店都买不到，问能否满足他的愿望。庞进当即回复，除答应邮寄他需要的其他几种龙著外，还提出一个要求：购买两本台湾版的《龙的习俗》。廖先生看到后，回复说书已买不到，但可以 COPY。庞进说将全书 COPY，比较费事，倒可以先将拙作的封面、封底、版权页、内容介绍、目录等扫录成文件，通过 Email 先发一下。几天后，廖先生将庞进所要的发了过来——自己生的“孩子”，十多年后才得见其容颜，真让人感慨系之！一年多时间过后，2004 年 8 月的一天，庞进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话筒里的声音陌生而清亮，带有明显的台湾味——原来是廖先生随一个旅游团已到达西安，下榻在唐城宾馆。赶去相见，双手一握，竟有多年友人一日邂逅之感。落座后，廖先生捧出了一件让庞进喜出望外的礼物——台湾版、繁体字的《龙的习俗》！不过，不是文津出版社的原版，而是复印版，是廖先生将全书一页一页复印，然后精心装订成的厚厚的一本书！……

得知“龙凤之魅·庞进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要在西安召开，廖先生“以台湾客家子弟的身份”，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函，称庞进的研究使古老的龙凤图腾更上层楼，“让中华民族更加团结”。国际龙狮总会副主席、香港龙狮麒麟貔貅体育总会会长欧绍永也发来了贺函，称他们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会员，大都读过庞进先生有关龙凤文化的著述，登陆过他主编的“中华龙凤文化网站”。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会长、著名英美文学专家刘慧琴在贺函中称庞进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海外华人了解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辨析中外文明的异同，对构建新的人文环境有着积极的重要意义，更有助于海外华人的团结和华人社会的和谐。联合国秘书处（维也纳）会务部李沛、国际原子能机构梅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奥地利共和国大使馆政务参赞黎一建、梁建全等海外人士通过网络读过庞进的不少研究成果，他们在贺函中说，华人现已遍布奥地利及欧洲各国，大家对龙凤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都以身为龙凤传人而自豪。龙因力而生，一跃冲天，变异飞腾而灵异；凤因美而发，振翅云霞，高雅美善而祥瑞。它们代表和彰显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希望庞进有机会携龙凤文化研究之成果来奥地利及欧洲访问和展示……

上述话语，足以说明海内外华人对龙凤的认同和喜爱，也说明庞进的研究成果影响之广远。

写作与研究两翼齐飞

文学写作与文化研究是不同的两个领域，而在庞进身上，这两者却和谐、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作为作家，庞进先以小说为人所知，之后也写诗歌、报告文学，进入报社工作后，更以大量的散文随笔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和喜爱。其作品集《灵树婆娑》曾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天地苍茫一根骨》等几十篇佳作被数十种选集收入。西安市文联主席、著名作家贾平凹说，庞进本来是一个作家，他的散文也写得非常优秀，他后来搞文化研究，其文笔就特别的好，而且想象力非常丰富，有详实的资料，有独特的提法，文学性价值很高，阅读起来非常有味道。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晓雷称赞庞进，由小说而散文，由作家而学者，由龙凤文化的一般研究者而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完成了身份的三级跳，令大家刮目相看。陕西省社科联主席、著名哲学家赵馥洁将“诗性的论述风格”视为庞进文化研究的一个特点。他认为，“作为散文家的庞进，思维活跃，想象丰富，感觉敏锐，富于激情。表现在学术著作中，就是寓感情于论理之中，寄意象于叙事之内，形成了鲜明的诗性叙述风格。而且书中蕴含了不少美丽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图像资料、绘画、图片，使学术著作充满了诗情画意，成了一种情理交融、图文并茂，既具感染力又有观赏性可读性的艺术品。这是许多学院派学者的著作很难企及的”。

庞进的成功，为文学写作与文化研究兼备一身提供了范例。用中国散文学会发来的贺信中的话说，就是文化研究和文学写作可以相得益彰：“文化”使“文学”深刻隽永，“文学”使“文化”喜闻乐见。

陕西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尹维祖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汇、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新闻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正是在各科的融汇中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时间一再证明，要做一个有作为的新闻工作者，就必须具备良好的人文素质，就必须占有较丰富的政治历史、哲学、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多面知识，成为一名学有专长的‘文化人’，这样才能科学驾驭新闻事件报道，写出具有文化底蕴和时代内涵的优秀作品。”他希望广大记者编辑学习庞进的治学精神，力争

在一两个领域内成为“行家里手”，走学者型、专家型新闻人才的成长道路。

无止的“新境”

十八年前，在一个婚礼宴会上，庞进有幸与主编“中国风俗丛书”的韩养民教授坐于一席，韩先生说：“龙年就要到了，龙的习俗还没人写，庞进你能不能写一写？作为丛书的一种。”就这么一句话，使庞进一脚踏进了龙凤文化——这样一个神奇万方、魅力无穷的领域。对十八年来取得的让世人瞩目的成就，庞进说任何成绩都不是个人的。“好比一棵树，如果没有土地，没有阳光，没有雨水，没有电闪雷鸣、风云际会，这棵树是不可能长高长大的。”他认为，龙凤的基本精神之一“容合”，是既可作为世界观，也可作为方法论的。有了这样的认识，龙凤文化研究就总会有“新境”，而不会有“止境”。而且，“大家的发言，也使我更清醒地知道了自己的不足，和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原载“西安之子网”2006年5月16日）

庞进的意义

孙见喜

近二十年来，庞进都在致力于龙凤文化研究。这个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源，他顺着这条河一直朝上游走。他要寻找中华文化的源头、代表中华文化的符号、中华文化的原始基因和“干细胞”。历史上，中华文化屡屡受到侵入和侵害，但受伤处屡屡能够自愈，断绝处屡屡能够再生，以致五千年延绵不绝，还屡屡把入侵者化成自己的营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庞进的答复是：因为有龙。龙是一个凝聚力特强的精神结，这个结紧紧地抱着中华文化始祖的精神内核，形成一个魅力无穷的形上图式，又具有充分开放的吸纳力，这是一个新新不已的巨系统，是涵纳、宽容、忍耐、合和等等诸种文明的全色图谱，也是一种包括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在内的全时态象征。由于有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能源，所以每当民族灾难袭来时，大中华之树虽叶落枝折而树桩坚挺不倒，原因盖出于此。

但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文化精神却屡屡遭人垢病，国家不发展，人民受欺负，说是责任在文化，这个观点庞进是不服气的。前几年，讨论西安经济为何不如东南沿海城市发展得快，有一些“学人”说是怪西安的历史包袱太重，城墙的封闭性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对此，陈忠实气愤地说，你朝城墙吐唾沫管什么用？你就是把城墙拆了西安经济就发展了吗？这是言说者在扰乱人们的视线，也是为当政者开脱。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发展，首要的责任也是最终的责任在主事当局，怎么能嫁祸于城墙或它所象征的历史文化呢？比如满清，国势衰弱，首先的责任在朝廷。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精英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结果也没有救民于水火，更没有把列强赶出中国。事情过了近一百年，历史转过了几圈螺旋线，问题总算看清楚了，原来精英们要打倒的、包括鲁迅先生呐喊的几个“蹋倒”，其实正是我们要捡回来的，正是我们应该弘扬和强

化的，且在当今之世，惟此中华民族才能真正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百多年来，对中华文化众说纷纭，主流的观点是批判的，是否定的，是弃大于扬的，他们仰头渴望和要接纳的是西方文化。有人反思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是“五四西文化运动”，而且这个“运动”的负面影响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比如中医，以1846年上海仁济医院及1866年广州博济医学校的设立为起点，在中华大地上，一百五十多年来，中医受到西医的压制越来越严重。自1917年余云岫出版《灵素商兑》一书为发端，中华大地上出现第一波否定中医的浪潮；到了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开会，由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与会十七人中没有一位中医，就在这次没有中医参加的会上通过了“废止中医案”。这不是暗箭杀人么？有学者认为，当中西医之争由民间讨论走到了以行政手段进行废止中医的境地时，中医存亡之事就成为了一件有关中华文化存亡的政治大事。所以，真正的中华学人，应该由此而警觉起来！后来，“废止中医案”导致了南京中医界的游行抗议，这个“废止案”也就不了了之。这一年，全国的中医从业者约八十万人。1925年，孙中山肝病严重，西医无奈，孙中山又拒绝中医，他的身边人将中药混入饭中，他服下曾一度使病情减轻，但孙中山得知后坚决拒绝中药一直到死。还有一个受害于西医的大人物就是梁启超。1926年梁启超因血尿住进洛克菲勒创办的北京协和医院，经过西医的一系列检查和诊断，院方认定他患有右肾肿瘤，并据此于当年的3月16日由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执刀切除了他的右肾，但术后对该器官进行病理检查时，发现右肾完全健康，一时舆论大哗。但梁启超的态度却十分宽容，病治错了，他身上没有了一个重要器官，九个月后五十五岁的文化大师也就死了，而那位执刀的刘博士却堂而皇之到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去当政务次长。这是国民党政府对西医杀人的态度。还有鲁迅，因为其父死于庸医之手，他说过“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而他自己1936年10月死于肺结核。事后其家人对他的日本朋友须藤采用的西医治疗方案提出质疑，也有人认为这是一起谋杀。西医就这么在中华大地上风行且首先拿我们的文化精英试刀。与时同时，中医在萎缩，至1949年年初，与二十年前“废止案”时相比，全国中医减少了三十万。

令人悲哀的是，到了1950年，新中国卫生部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卫生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贺诚及副部长王斌，将南京政府时期废止中医案的主要人

物余云岫邀请来参加会议，并支持他废止中医的观点。这样，新中国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实际上成了一次以围剿中医，并形成一整套行政措施以消灭中医为主题的会议。这个消灭中医的政策在执行了三年之后，全国中医业一片萧条，五十万中医难以公开行医，由此北京出现了“八老上书”事件，从而引起毛主席的关注。同时，当时国家文委副主任钱俊瑞发现了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做法并行文上报中央，毛泽东主席在 1953 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谴责民族虚无主义，撤销了贺诚、王斌的副部长职务，《人民日报》在 1954 和 1955 年开展了对中医问题的讨论和对贺诚、王斌的批判。四十四年后，到了 19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出台了《执业医师法》，这一年，虽然余云岫逝世已四十五年，但仍然要求中医取得行医执照必须考西医知识，这使许多中医师尤其是学徒出身的中医师没有得到医师执业证，无法公开行医，成为贺诚在五十年前检讨中所说的“政府取缔，人民批准”的“地下医生”。2004 年被取缔的无证医生五万余人；2005 年 7 月前被取缔的无证医生又有三万四千人。这八万余人中肯定有一些庸医，但其中大多数是未得到中医师执业证的民间医师。2005 年 4 月 27 日《福州晚报》刘磊撰文《百余居民为“游医”求情说明什么？》文中将所谓“游医”能将“感冒在大医院花一两百元都看不好，在这里七八元就可以治愈”的现实与无证行医的矛盾列举出来，文中所提及的“游医”，还是未得到执业证的民间医生。到了 2006 年，取得行医资格的中医师仅有二十七万人，而这二十七万中医走的是“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路子，如果按中医基本要求，能开出中药方的只有三万人了，再如果按中医辩证施治的理论来要求，能开出真正药方的不足三千人。2004 年，“非典”流行，西医无能为力，中医却大显身手，据广州中医学院统计，中医治疗“非典”与美国用西医治疗成功率的比例是 246：1。一百多年来，中西医争斗的腥风血雨，贯穿着中西文化的流变史，在这个流变史中，中华民族文化被打压被削弱被欺凌，遭受了与我们民族曾经饱受列强凌辱一样的命运！那么，在这一场场的自我作贱中，不难看出，我们的文化精英们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历史终于有揭开迷雾的一天。最近，美国华裔学者张绪通博士撰文揭开了西方财团策划消灭中医的惊人内幕。他文章中所提及的美国人 Hans Ruesch 撰写的文章《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he Rockefeller Drug Empire: The Drug Story)，文中清楚地告诉中国人，美国的洛克菲勒药品帝

国早在 1927 年就开始对中医做手脚了。张绪通博士说：“美国人坦白地说，洛克菲勒及其家族以学术基金会的名义，捐了一点钱给中国的医药界，美其名曰‘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目的就是要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医药学术的根源与体系产生怀疑，以至于厌弃。然后打出‘拯救中医中药’的美名，以‘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为幌子，达到彻底操纵、把控中国的中医药及其市场的目的。”美国人还写道：“洛克菲勒过去一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由于美孚石油公司几乎是‘中国油灯’用油的唯一供应者，因此他把钱用来设立中国医药基金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扮演着‘伟大的白人教父’的角色。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达四千五百万美元用来‘西化’（实际是摧垮）中医。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它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它们必须使五万万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到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西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

文化摧毁的背后是经济侵略。如果鲁迅、胡适、梁启超们了解了这卑鄙的一幕，他们还会那么迈力地传播西方文化吗？

还有，“五四”时代，有人大声叫喊：“汉字不除，中国必亡！”取消汉字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新中国建立后，国家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就是要做这个工作的。要不是王永民发明了“五笔字型输入法”，汉字可能真的就被消灭了！因为“五笔字型”，汉字在联合国的电脑输入中速度较快，输出的文本最薄，原来古老的汉字也可以与国际接轨啊！有人说，是王永民救了汉字，王永民是真正热爱中国的科学家！后来，“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这其中的微妙使多少民族文化工作者悲喜交加！

但是在其它领域，包括我们的民间社会，全盘西化的速度超出人们的想象，看看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吃什么穿什么、说什么话唱什么歌、过什么节信什么教，就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民族文化的传承者！特别在“知识界”，一些人恨不能换了自己的骨头！一个没有民族文化的民族，还有多少生存空间呢？

其实，在对中华文化的自我消解中，有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人，有把中华文化的源与流搞混了的人，当然更多的是西方培养出来的一些以“接轨”和“国际化”为借口的“学人”。什么是中国文化？一些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又一轮

“打倒孔店”的思潮潜在运行着。当年，被称为民初大儒的康圣人康有为，到西洋转了一圈回来也曾一时昏过头，他说中国要发展，男人必须三个月换一次老婆！

“五四西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为了张扬他的西化观点，一会儿说《尚书》是假的，一会儿说《孟子》是真的，可他没有仔细看一看，正是《孟子》中大量引用了《尚书》，那么到底谁真谁假呢？胡博士的学术口号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那么对待严肃的中华元典，他为什么就不小心求证一下呢？中华元典《礼记》里说：“爱天下人先爱妻子”，是民初大儒康圣人没读过《礼记》吗？所有理由都难于解释，惟一可解释的理由是：中国知识界的浮躁从“五四”就开始了！

中华文化之源，或者中华文化元典里，《尚书》《内经》《诗经》《周易》《老子》等等，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说的是“道法自然”“敬天法地”。道、天、地——人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就是在人际关系上，元典里也讲父慈子孝、君仁臣忠，这是互为因果，双向负责，共同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孟子》给“忠”的定义是“教人以善谓之忠”；郭店楚简里说，“忠”就是“恒称其君之恶者”，敢于批评皇帝、领导、上级，这就是“忠”！“孝”是什么？《荀子》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所以，中华元典文化里就没有“愚忠”“愚孝”这一说，而“打倒孔家店”时把这算到儒家的账上，实在是栽赃陷害！其实，“忠”和“孝”的变质是在西汉“三纲”之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从“阳为阴纲”演变而来，变成了单向度的，这是中华元文化的异化、退化、变质，消极意义上升为主流观念，结果是中华民族的创造性思维一代不如一代，到今天成了一些人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的根据。这里产生一个问题：民族文化一旦消失，民族还会存在多久？

西方的逻辑思维探寻世界，是单向的，它一直向物质细部解析；可中国的“道”思维是综合的、辩证的，认为矛盾双方互为依存。比如中药里边，巴豆致人腹泻，但巴豆壳却能止泻；甜瓜蒂使人呕吐，但瓜肉却解除呕吐；蓝蛇的头能毒死人，但它的尾巴却能解毒；还有杜仲皮，血压高的人服了能降血压，血压低的人服了能升血压……这些中药及其验方，里边包涵了丰富的辨证思想，这是中华文化的精粹，而西方的形式逻辑主义对此却难于解释。“降压灵”和“升压药”矛盾而相反，统一是不可能的，而中医却偏偏将矛盾的双方合谐为统一体，那么在哲学思想上谁高谁低？

中医的经络学说也给西方的高科技出了难题，他们从解剖上找不到经络实体，但可以测量到，而且经络疗法治病又是眼见着的事实。对此，西方人接受了针灸，但对针灸的理论却失语，到底谁高明呢？

承认西方科技可以使人致富，从开矿技术到制造业、从改良遗传到高速列车、从空间技术到超级航母，但我们不能无视这把剑的另一面利刃，它疯狂制造财富的同时也残害着人类自身，也在破坏着人们的生态环境。其负面效应，来自西方的大量报道使人们欲哭无泪。请看：当今环境下，全球雄性动物快速雌化，美国鳄鱼生殖功能退化，其阴茎变得弯曲而不能性交；非洲雄豹睾丸滞留腹腔发育不全；北极熊出现雌雄同体现象；五十年来，全球男性的排精量减少了一半，发达国家百分之二十的妇女失去怀孕功能；更可怕的是臭氧层出现空洞，空气中过剩的二氧化物成倍地在生物体内复制雌激素……到了如今，西方的高科技头脑才想起了一位中国老者的“天人合一”理论，可我们自己却在加倍地重复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悲剧，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自己淡忘甚至抛弃了中华元始经典。而中华元典曾指示我们的先祖，脚踏实地的走着一条“道器并重”“力智同源”的道路，他们因此而“钻木取火”，而“构木为巢”，并发明了衣裳、车船、弓矢、栽桑育蚕、培育五谷，于是，有了饮誉世界的四大发明，从而使中华民族在一段时间里引领着人类文明史的前行。

在这里，有良知的“学人”，都可以看清楚：中华民族之火，不是谁从天神以那里偷来的，他们住的房子不是上帝造的伊甸园，他们的身体更不是上帝所造而是生于泥土，他们认为“先有天地而后有万物，先有万物而后有男女”。那么，在东西方的元文化里，谁给人类文明史的解释更客观真实呢？答案是一目了然的。

我之所以崇敬庞进先生，他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其志存高远，而他主持的龙凤研究是切切实实地做着寻根探源的工作。他先后出版了八部有关龙凤研究的专著，他认为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和文化标志，是吉祥嘉瑞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具象化的一个代表。他把龙的基本神性概括为“八性十六字”，即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兆祸，示威；并由此而提出了与龙相对应的六种文化心理：敬畏、飞离、合和、悖逆、彰力、求吉；他赞美凤凰，称其有秉德、兆瑞、崇高、示美等神性，有造福众生而负责献身的品格。中国向来有

以凤凰比喻、象征人间贤君良才的传统。由此可见，龙凤彰显着中华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使世界文化之林生动而多彩。庞进还说，世界是多元的，文明是多样的，全球化不是西方文化的一元通吃，而是各种文明的多元集优。所以，庞进的学术意义绝不是对一个什么“图腾”的研究，他的着力点在中华文化的大底盘上。西北大学的炜评教授给庞进先生赠诗曰：“妙笔如弦奏国风，腾龙起凤自从容；春来信步层楼上，笑看桃花别样红。”这是学人对学人的鼓励，也是东方文化学者的自信和张扬，如果那些所谓的“学人”都能以良知和清醒对待祖国的元典文化，那么，新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是自不待言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是天地、阴阳、虚实的相互作用造成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动力，这种动力不是牛顿说的“上帝踢了地球一脚”的“第一次推动”，而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是《周易》所言“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庞进的庞字是广厦里边一条龙，这条龙放在中华元典里它是热力四射的能量之源，放在“五四西文化运动”里边它就是一条死蛇。在这里，我要告诫的是，龙文化研究切忌西方的思维模式，不要解析它，而要圆融它，不要孤立它，而要综合它。以前，有些“学人”数典忘祖，现在有些“学人”是既不数典更不知其祖，有甚者甚至认异类为祖！其实，排精量减少一半只是初步的报应，再不警醒，人类也会上演美国雄鳄鱼一样的悲剧。

对人文知识分子而言，历史考索的角度、文化持论的立场、文艺批评的理论甚至文学创作的方法，如果继续“去中国化”，非洲雄豹的命运必然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注：文中相关事例引自吕嘉戈编著的《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一书。

（刊于《商洛学院学报》2007年3月，第21卷第1期。孙见喜：著名作家，太白文艺出版社编审）

总有山楼在前头

——答《西安之子网》主编张星利问

张：2003 年我们有过一次谈话，这次通过网络。已经是地球村了，沟通很迅速也很快捷。有时候，似乎还是慢了好，可以有很多记忆，也有很多故事发生。能否给广大西安之子网的朋友介绍一下您的近况？

庞：2003 年那次谈话谈得不错，反映了我当时的写作、研究状况和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你的问题提得好，我答得也比较到位。人和人交谈贵真诚，戒虚套，一假惺惺，味道就变了，好在我们是推心置腹。眨眼间，过去了五个春秋。五年来，大家都有进步。我这里就写作、研究和文化活动而言，是出了《博大精新龙文化——以浙江龙游为例》《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龙子龙孙龙文化》《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首届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论文集》（合作主编）等六本书，发表了《龙的精神及其当代意义》（唐都学刊）《有关龙标志的几个问题》（文化月刊）《中国龙文化解读》（光明日报）及《人文伏羲》（人民日报海外版）《西安的隐士》（中华散文）《容合：宇宙的胸怀》（环球华报）等三百多篇文章，参加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组织、策划、主持了“龙凤之魅——庞进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首届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等；还先后登上了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及陕西卫视、河南卫视谈龙说凤。要说近况，年前一段时间，润色、修改、完成了《龙凤三字经》；又将《慧雨潇然》和《大悟骊山》之后的散文随笔收拢、整理为一个集子，起名为《卓立苍茫》，二十万左右，参与由陈长吟先生主编的第二套“紫香槐”散文丛书；另外，还将几年前写成的以我们家族成员命运为主线的长篇纪实文学《平民世代》又修改、润色了一遍。

年后我就到了多伦多。我是 2008 年 2 月 9 日出国的，至今已快三个月。三个月来，做的可排在首位的事情是帮助妻子，照管孩子。妻子到这边来后，考上

了位于多伦多的“百年纪念学院”，攻读电子工程专业。这样，我来后的主要任务便是带我们的年届四岁的小女儿。买菜，做饭，为孩子洗脚、洗澡，陪着玩游戏，教其识字，等等。孩子乖俏聪颖，人见人爱，在白雪红枫的土地上健康成长，让人倍感欣慰。之余，在孩子看电视、自己玩和入睡以后，还有些时间，这些时间当然不能轻易放过了。一是研究和写作：出国之前，有朋友鼓励并推荐我将龙凤文化讲到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去。“百家讲坛”是学者和大众之间的桥梁，是近年来影响很大的传播文化的“平台”。但“百家讲坛”不是你想上就可以上的，得具备种种条件。对待这类事情，我的经验和体会是“把工作做到机会前面”，也就是说，能上不能上，先得准备一个“文本”。于是，就开始了《庞进说龙》的写作。连续“奋战”了二十天，写成了一个六十多讲、近二十万字的本子。这个本子与我以往的著作有联系，也有不同，我注意借鉴刘心武、易中天、于丹等几位成功者的做法，话朝通俗的说，语朝幽默的讲，追求朴素简明与有趣有味的统一；根据内容，恰当地设问，然后一一作答；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当下的百姓生活的实际；每讲都争取叙述一个到两个有魅力的故事，以增加吸引力。做这件事我很高兴：也许它上不了“百家讲坛”，但上上其他讲坛是不成问题的，而且还可以出书。《庞进说龙》之外，还写了三十多篇散文随笔，可分为两类，一类有关龙凤文化，一类是出国之后的体验和感悟。于是就想到待些时日，再添些新作，就可以再收编、出版两个集子，一本可叫《龙鳞凤羽》，一本可叫《越界体验》或《越界行走》。

打理网站及博客也是日常要做的工作。我们的“中华龙凤文化网”（初名“中华龙文化网”）开办于1999年7月，至今已快十个年头了，访问量已过百万。办站过程中，我们提出了“研究龙凤文化，弘扬龙凤精神，团聚龙凤传人，昌盛龙凤故乡”的宗旨、“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的方针，和“原创性、综合性、专业性、普及性”的原则。宗旨、方针和原则的实现，要靠日常的细致扎实的更新、维护来保证。我统计了一下，在多伦多这三个月，我们共上传来自海内外的消息、论文、随笔等文章三百多篇，其中一部分是我的原创。

这三个月还从多伦多公共图书馆借读了若干本书，《怪异：神乎其神的智慧》《西方月亮——加拿大华人作家短篇小说精选集》《枫情万种——加拿大华人作

家散文精选集》《风雨苍黄五十年》《文化柔肠科学魂》等，这些书都是港、台出版的，国内不易看到。收获当然是很大的了，对我的研究和写作有珍贵的指导意义：以前没有想过或没有想清楚的问题，人家讲清楚了，且启发了自己进一步的思考。

张：您的龙凤文化研究已经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从凤凰卫视刘长乐先生到国内外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有关龙凤文化研究的专题活动、会议都邀请您作为专家进行演讲交流，您是龙凤文化研究的权威专家，别人做只能是盗版。做了这么多年的龙凤文化研究，您觉得您当初的想法达到了吗？

庞：不能说别人做只能是盗版。任何人的研究都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不能不学习、借鉴、吸取前辈学者的成果，也不能没有同辈学者的交流、切磋和激励，相比而言，我只是花的时间比较多些，下的功夫比较大些，做得比较系统、全面、深入些，从而取得的成果比较多些而已。当然，“盗版”者，即抄袭、剽窃者总是有的。这些年来，正式出版的图书著述侵犯我的著作权者，已发现了十多起，除个别特别严重者诉诸法律外，大部分我都“高抬贵手”，放过去了。至于网络侵权，就相当多了，我一般都是一笑置之——没有精力搭理，顾不过来了。说到当初的想法，可以说部分达到了，部分还有待努力。况且，想法也是与时俱进的，山外青山楼外楼，总有山楼在前头。

张：2006年召开的龙凤文化研讨会，取得大的反响，是总结吗？

庞：你说的是“龙凤之魅——庞进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吧？那次会议的确反响不小，新华社发了通稿，国内外一百多家媒体都有报道。对我而言，那次会议既是一次总结会、推广会，也是一次鼓劲会、鞭策会。好比一辆车，开到半路上稍事停顿，回顾一下，检查检查，修整修整，加加油，然后再朝前开。多年前，我曾言：龙是一座山，“其峰也高高，其林也密密，岩也堆秀，洞也通幽；岚托雾盘，云蒸霞蔚；草深觅兽踪，花香闻鸟语；有你览不尽的风景，有你赏不完的奇妙”；还曾言，龙是一条河，“其源也远远，其流也遥遥，波也潋潋，浪也滔滔；老溪有约，依然淙淙；新雨知时，潇潇不绝；有你打不尽的鱼虾，有你喝不完的甘泉，有你落不下的风帆”。今天，我依然是这样的认知。

张：到处都在说现在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夜，庞老师您怎么看？

庞：首先，我觉得用“复兴”不如用“再兴”。一般认为，汉、唐时期，是中华民族兴盛时期，所谓“复兴”，起码从字面上看，有恢复强汉盛唐的意思，这与我们今天讲的兴盛，意思有所不同，因为处在 21 世纪的世界各民族已非汉唐时期的“异国番邦”可比了，也就是说大家都进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讲恢复强汉盛唐，已不合时宜了。所以，不妨称“再兴”，即“再一次兴盛”。其次，与其说现在是中华民族再兴的前夜，不如说中华民族现已处于再兴的过程之中。因为在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中国已走上了兴盛之路，尽管要走的路程还很长，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张：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把不好的东西都带到了他们那里，您现在就身处国外，外国人究竟是怎么说的，您又怎么看？

庞：的确有些中国人把不好的东西带到了国外，如物质层面的劣质服装、有害玩具，行为方面的随地吐痰、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及官本位、窝里斗等；但更多的中国人则把中华民族优秀的东西带到了国外，如中国菜、中国茶、中医针灸、中国功夫，及勤奋好学、刻苦耐劳的精神、文明礼貌的言行、注重孩子的教育等。外国人中有人对中国人持不好的看法，有的甚至别有用心、恶语相加。年初，加拿大多伦多市一个议员就发表了“亚裔人像狗似地工作”“正在占居地盘”的言论；前不久，美国 CNN（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某主持人公开说，“过去五十年里，中国人基本上一直是一帮暴民和匪徒”。这显然是不怀好意的诬蔑和攻击，理应受到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反击。但是，我们要看到，对中国人大放厥词者，只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人都抱的是尊重、友好，甚至赞赏的态度。在多伦多，我参加了一个政府办的免费英语学习班（上课期间，学校还免费为学员代管孩子），班上两位老师（一主教，一助教），祖籍分别是哥伦比亚和南非；九个学生，分别来自五个国家：四个斯里兰卡人，两个阿富汗人，一个印度人，一个巴勒斯坦人，一个中国人，真可谓“五湖四海”。大家相处得很融洽，每天早上一见面，都要打招呼彼此问好，学习期间也多互相帮助，从中我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的向往和对中国人的尊重。比如阿富汗籍同学和印度籍同学就曾一边打手势，一边对我说中国与他们的国家是“neighbor（邻居）”；而老师奥力佳则喜欢泡一杯中国茶喝，有天还戴着一条缀有“康”“爱”“福”“寿”“煌”等汉字字符的手链到课堂，向我询问这些字的含义。当我借助词典将五个字的含义用

英文告诉她时，她显得特别高兴，让我教她这几个字的中文发音，并跟着读了好几遍。学习告一段落时，要搞一个“party”（聚会），大家集资，由两位阿富汗籍的同学为老师买礼物，她们买了一件起着绿花的长袖衫和一条白色的九分裤，看那产地，竟是“MADE IN CHINA”；老师奥力佳很喜欢，当即就换穿到身上。聚会开始前，奥力佳老师将一个上写“Presents the Outstanding Attendance Award to Jin Pang”的奖状颁发给我；聚会结束时，两位老师和几位同学还都再次对我说：“Very good, Pang Jin！”这当然与我平日注意守时、自律、认真学习、敬重老师、尊重每一位同学有关——没有想太多，只觉得这个班上就我一个中国人，我不能让人说中国人不好。

张：走到天涯海角都是中国人，都改变不了黑色的眼睛，黄色的皮肤，永远是龙的传人。那天听到以后心里酸酸的，我说庞老师终于要出去了！

庞：我之出国，主要是尊重妻子的选择，妻子的哥哥，也就是孩子的舅舅，六年前移民多伦多。受兄长的引导，妻子几年前动了移民的念头。技术移民的申请是2001年递交上去的，几年都没有动静，想着怕是不行了，没料想2007年2月却收到了大使馆的签证，竟然通过了！活到现在的年龄，对生活中的变迁已能够做到泰然处之、顺势而为了。我也曾有顾虑，咱是学文出身，母语是汉语，长期供职于报社，研究的对象又是中国传统的龙凤文化，出境到一个陌生的英语世界，长处怕就要变成了短处。在国外呆了几个月后，顾虑有所解除：一是加拿大是移民国家，提倡和鼓励多元文化，龙凤文化有望成为其中的一元；二是加拿大华人随着逐年移民，人数日渐增多，多伦多的华人占其总人口的比例现在是十分之一，温哥华达到了五分之一：中华文化的“市场”呈愈来愈大的趋势；三是互联网把全球联系在一起，呆在多伦多，照样可以关注中国，关注家乡，也照样可以做学问，搞创作，而且可以借助国外的图书资料——有些图书资料在国内是看不到的；四是过去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总是要通过媒介，现在则可以身临其境，可谓“零距离接触”、全方位体验。我的体会是，有这样的体验比没有这样的体验要好；对以中华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者而言，有西方文明的参照和没有西方文明的参照大不一样。比如，国内的人，尤其是一些将中国的负面情况看得过多过重的知识分子，常常免不了将西方社会想得太好。在西方社会呆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西方不是天堂，世上没有净土。所以，我说中国和加拿大，各有各的

好，各有各的不好。至于各有各的什么好，各有各的什么不好，我以后会根据自己的体验，一篇一篇地写出来，供大家参考。还有便是，我每年只在加国呆两三个月，大部分时间还一如既往地呆在中国，一如既往地干该干的事情。至于退休后如何，还有若干年时间，到时候再说吧。

张：这些年您平和了许多，也不再刻意追求什么，只是在做自己的事情，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庞：原因是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以前年轻些的时候，曾经在一些事情上与人争竞，尽管当时有许多因素促使自己那么做，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觉得不值。当然，现在的认识是反省后的认识。生活往往就是这样，不做不知道利害，做了，知道了利害，觉得还是不做好，但你已经做过了。好在可以吸取教训。多年前我曾有“顺天命，尽人事，行大道”之语，研究龙凤文化的过程中又提出“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的精神，这些其实都可以作为做人做事的原则，起码对我自己的言行，有指导和框范的意义。

张：孩子们追星是因为好玩，好看，获得他们的快乐体验。作家里也有追星一族，这么大的年龄了，还需要吗？

庞：作家里有追星一族吗？我所了解的作家中，能够称得上追星族的好像还不多，起码我就不是。无论体育明星还是文艺明星，我好像都没有产生过“追”的兴趣，但好感还是有的。当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才算“追星”。作家中有喜欢看足球赛的，如陈忠实、贾平凹，他们也肯定喜欢某些足球明星，这算不算“追星”呢？至于年龄，我觉得不应该是问题，年龄小的人能追，年龄大的人为什么就不能追？这有点像爱情，她可以产生在任何一个年龄段，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年龄段都有爱的需要，也有爱的权利。少男少女可以爱得死去活来，老头老太也可以爱得轰轰烈烈。我们以“容”的态度视之，不好吗？

张：您在网络方面是一位老前辈了，您怎么看待网络的发展？

庞：我在使用新工具方面的确动得比较早，1990年时开始用电脑写作，1999年创办网站，现在几乎是天天上网。我们的社会进步多了，但这些年最大的进步，在我看来，就是互联网的发明和普及。有报道说，中国现在的网民已达两亿，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多。好事啊！多年来，我已不怎么使用“伟大”这个词了，但我愿意将这个词赠给互联网。别人且不说，就说我自己，发稿子，传照片，看新闻，

读博客，查资料，与亲友 QQ，和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家人视频，全靠方便快捷的互联网。网络使许许多多的地球人认识了我，也使我做成了不少无网时代难做成的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生产工具又是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毫无疑问，互联网便是当今时代蓬勃发展、所向披靡、威力无穷、前景广阔的“生产力”。所以，我同意“互联网将改变世界”的判断。“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差不多是大家的共识了。如何实现民主？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现在，我们起码可以有这样的认识：互联网是民主的推进器。决策透明、表达自由、监督到位是民主的要素。过去，人们常抱怨决策不透明，指斥“暗箱操作”，说表达不自由，监督不到位。现在，网络将使不透明变得透明，使“暗箱”成为“亮箱”，使畅意的自由表达、广泛的舆论监督成为可能。所以，我说，伟大的互联网，将会把我们带到更文明的社会里去。



庞进的“容合”

张星利

给庞进先生打了几个电话，均被告之未回来。

再见庞进是在翠华山，他背了一个大包，和大家说笑，拍照，温文尔雅。

他刚从加拿大回来，因为妻子和小女儿已经在那边生活了，他现在每年有两三个月时间去那边，离退休还有十年左右时间，退休后他可能会选择也过去。

2003 年的夏天，我和庞进先生有过一次谈话，那次的谈话很真诚。那个下午有一些燥热，我们呆在空调房子里还是热出了一身汗。

“又要有一个海外的朋友了！”我说。

“网络把世界各国联结成一个利益攸关的共同体”。庞进说，“现在是真正的地球村，但无论走到哪里，即使走到天涯海角，我都是中国人，都是龙凤传人，都是炎黄子孙。”

因为从事龙凤文化研究，庞进先生的多部著作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邀请他去讲学，畅谈龙凤文化。他将龙凤的精神概括总结为“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容合”是庞进创造的一个词，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意思。现在他有了走出国门的方便，可以到世界各地去进行“容合”了。

现在的庞进先生和 2003 年的他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也有了不同。在陕西，庞进以他的二十多种著作荣耀着陕西文坛，也以他的别致的情思和朴秀的文笔为陕西文坛书写下浓重的一笔。五年后的庞进有了更多层面的追求。

走到天涯海角都是中国人！听到这句话时，我的心里酸酸的，也让我感慨良久。一件事情足可以把我们的的人生观打破，把我们对这个社会的看法打破，让它

不复存在，然后重新进行建构。我们没有选择，只有面对。我们受的教育太多，诱惑也太多。



身为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的庞进先生似乎已不执着什么东西了，也许现在唯一让他心疼的就是小女儿，孩子生得眼睛大，皮肤白，嘴巴小，脸蛋圆，是他的小凤凰。

因为办“西安之子网”的缘故，和很多人有了交往，包括好几位美籍华人、作家，画家，他们都经常往返西安和美国，这当中还有“愤青”。那么，庞进先生也要成为旅加华人了，我也真诚地祝福他，以后经常在异乡也别忘记我们这些在西安的朋友。

此时此刻我回忆起和庞进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我不禁掩面，任泪眼模糊我的视线……

（原载“西安之子网”2008年5月4日。张星利：作家，“西安之子网”创建者、主编）



老友庞进

孔明

与庞进交往时间很长，但见面次数很少，且不期而遇的时候居多。懒于交际不是原因，君子之交淡如水也不是原因。我是遵守着一个理念：热爱朋友，首先要尊重朋友的时间。鲁迅说过，占有他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庞进是才子，是君子，是智者，胸怀广大，又有壮志，“谋财”他只有才，“害命”却容易得手。才子重情，君子重义，智者不弃贤愚，时间就容易被偷取。我自知不能望其项背，但多少还有点惺惺惜惺惺的情怀，所以发自内心地理解他，尊重他，爱戴他，祝福他，期待并确信凭他的实力、努力和魅力，他能于人文学术的朗朗星空，放射出自己的熠熠光彩。

可能因为如此吧，当我得到他的皇皇大著《中国龙文化》和《中国凤文化》的时候，我的手上分明有耀眼的佛光，但我不吃惊，我只喜悦——唐僧西行终成正果的那种喜悦。就在当天晚上，我睡意全无，左捧“龙”，右捧“凤”，都沉甸甸的，不知道要先“啃”哪一部。强迫自己上床后，脑子里依旧龙腾凤舞，日出时忽发奇想：庞进是龙凤的后代吧？要不然，何以就姓了“庞”呢？何以龙钟情他，凤也钟情他呢？庞为广龙，广大之龙，不呼风唤雨，便要舞文弄墨，本性使

然嘛！

见面少，却常想，就算是君子之交吧。十二属相，我属龙，自然要亲近“广龙”。龙的传人，受着龙文化的熏陶，对龙凤学者庞进岂能不格外关注？事实上，每见报纸杂志上有庞进的名字，不论是他发表了大作，还是他的学术活动受到了跟踪，我都要买了阅读，然后珍藏。日积月累，他真像他的名字一样，终成广龙而跃进，声名鹊起而远播，国门不能阻挡，所以频频在国际学术讲台上亮相。一次文化活动中，我发现了他，长时间没有走近，而是远远地行注目礼。还是初识时的庞进，已经名扬海外了，怎么还是找不到一点广龙先生的做派？就那么站着，坐着，见谁都笑，都握手，活像一个得道的老僧。人比黄花瘦，学识不自肥，说的就是他了。终于向他走去，握手，问好，不客套，只说家常话。

凭着二十年的神交，我有了资格说庞进为学勤奋，为人厚道。天道酬勤，也酬厚道。若其不然，他的著作何以摞起来比他人还高？我几乎读过他的全部著作，读后感只有“佩服”这两个字能概括。当然也困惑，就算文思泉涌，也不能写那么多呀！学术不是创作，研究不等于想象，不呕心沥血，也要废寝忘食，汉字要在排列组合中闪烁思想，其艰难非常人可以胜任。去年的两次笔会上，与庞进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他好像喜欢独处，不能独处的时候他总抱着一本书，不能读书的时候他若有所思。在人众场合，他不爱言语，不得不开口了，他不说人，只说事，就事论事，说啥都能联系到龙凤，大家都佩服他联系得那么生动、自然、贴切。龙凤一到他嘴里，就像莲花怒放，说出来的话都带有了旷古之音。采风的时候，如果他的双眼发亮，一定是农民家的屋梁椽柱上雕饰了龙凤的图案。他听见流水，就能判断这水走势如龙，水的源头必是龙泉。他见鸡见猪都肃然起敬，读了他的书后我才恍然大悟，在他眼里，鸡就是凤、猪就是龙啊！忽然就想起了曹雪芹的话：“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痴心才有了善报，恒心才成就了硕果。读庞进书不读庞进这个人，如何能读懂他一颗寂寞的良苦用心？

心灵上亲近才是真正的亲近。我庆幸我做了庞进的朋友，所以读他的书得天独厚而津津有味。此时此刻，他的书就摆在桌案上，红红的阳光照进来，明媚如许，龙凤呈祥，我用这一片文字表达我的敬仰，对龙凤，更对他。

（刊于《文化艺术报》2009年3月18日）

《庞进文集第十三卷·龙飞凤舞》后记

本卷书稿的整理跨了秋、冬两个季节。

2023年11月8日，即“立冬”那天上午，在电脑前敲键的我，听到了隆隆的雷声，扭头看窗外，恰见一道长长的闪电，叱咤着划过阴沉的天空，一种什么东西要被撕裂的感觉掠过心头。接着，就有被称为霰(xiàn)的小冰粒，沙沙啦啦地落下，一会儿，窗台、屋檐、门阶上竟白花花一层。

两天后，11月11日早晨，故乡西安也发生了打雷、闪电的天象。不过，下的不是霰，而是鹅毛大雪。于是，网上便有了照片、视频，和抒发种种感慨的诗词、言论……

“冬雷”现象是比较罕见的了。气象部门的解释是由于冷空气与暖湿空气相遇，形成了不稳定的大气层结，导致了对流活动增强所致。

冬是实实在在地来了。冬的到来，意味着绚烂的秋成为过去，意味着生活在地球北半部的人们，在接下来的不算短的时光里，将要面对凛冽的严寒、铺天盖地的雪阵，和不便出门的蜗居。

前几天读到一篇文章，大意是秋去冬来之际，一种“悲郁综合症”会“登堂入室”：“满目的绿色和盎然的生机不复存在，只留下一些萧瑟，几许凋零”，一些人会因此而感伤、忧戚、焦虑、情绪低落，甚至抑郁。

庆幸的是，这样的“悲郁综合症”与我无缘。我想，我之所以既不悲也不郁，是几十年来，无论职任之余，还是退休之后，也无论春夏秋冬、顺境逆境，我都有事可做。这事，便是研究和写作。这两件事情，使我的心魂有了着落、情思有了寄托，没有陷入“无聊乏味没意思”的泥淖，觉得自己活得还有些价值、日子过得还有些意趣，并因之而感受到了发现、审美、创造、表达的快乐。因此，我一直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尤其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令我魂牵梦绕、用功用力最多的的龙凤文化，和表现力丰富、魅力无穷的汉语言文字，心存感激。

本书由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以电子书和纸质书相结合的方式出版发行。电子书通过“中华龙凤文化网 (<http://www.loongfeng.org>)”首发，有兴趣的读者可登录免费下载。

(2023 年 11 月 15 日于加拿大枫华阁)